

黑色文库 第八集



尚建国 著

从诗人到囚徒

黑色文库  劳改基金会出版

黑色文库 第八集

从诗人到囚徒

尚建国 著



劳改基金会

华盛顿

2004

目 录

出版缘起	9
序	13
引言	17
一落千丈	19
美味佳肴 抚摸阳光	23
遭遇逮捕	26
走过场的下马威	31
前往监狱	35
秋收时节	38
苦中作乐	44
夏涛其人	53
贫下中农	56
半年评审	62
父亲之死与法律掇客	69
搜查黑鱼	81
呈报减刑	93
队列训练与“三课”教育	100
戒烟行动	119
陈兵之死	130
孔中玉之死	135
棉田捉虫	148
生日风波	151
张振的悲剧	160

开放香烟	167
女人 女人	174
捐款捐物 告密告状	181
假释与送礼	188
担保书的曲折	195
请君入瓮美容院	199
历经曲折	206
患难真情	220
再报假释	227
重返监狱	237
离开监狱	249



与文中人物朱强摄于狱中（1995年）



在深圳创作之家，左一为文中人物刘芳芳。（1990年）



20年前的登记照（1984年）



和6岁的女儿合影（1990年）



当年工作的办公室（1991年）



与诗人艾青合影（1986年摄于艾青家）



在诗歌笔会上发言（2002年）



与诗人徐迟先生（中）留影（1992年）

出版缘起

劳改作为中共专制统治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远在其建党未久，在其江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革命根据地”已存在了。1949年中共夺取政权之后，参照了当时苏联的劳改制度，在斯大林派来的“古拉格”专家指导下，溶合了毛泽东的“改造与生产结合”的思想，发展出这套具有中国特色的监狱制度。劳改是一套政治工具，一方面要消灭犯人的独立人格和意志，剥夺其人身和思想的自由，并美其名为“改造”。另一方面要利用这项庞大的无偿劳动力，为共产政权创造财富。

早在五十年代，中国的劳改犯就被调动去筑路架桥，修河造坝，挖煤垦荒。这些无声无息的奴工为共产政府献出了健康，青春和生命，没有人记得他们。中国共产党对人民生命价值的轻贱和蔑视，直接造成了对中国人文精神及文化的摧残。随着毛泽东时代的结束，原始疯狂的暴力行为和愚民式的政治运动逐渐式微。而邓小平为暴发户和拜金主义者开辟了一条康庄大道。改革开放，“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成了社会发展的金科玉律。二十多年的开放政策使中国社会从粗暴进入俗媚，从暴戾走向糜烂。一个经过土改、反右、大跃进、文革、批林批孔、四人帮、反精神污染这些颠倒黑白是非，绝灭人性，轻视知识和道德长达四五十年社会，如果不经反省、忏悔、痛定思痛和惩恶抚善的过程，怎么可能就直接跨入现代化的社会呢？无可讳言，改革政策以来，中国在经济，文化和教育等方面有了一定的变化，但是毛泽东架构的极权政治制度，包括劳改制度并没有根本的改变。

中国大陆的社会必须经过彻底的反思，对灾难的根源进行检讨和思辩，重新认识知识和道德的重要性，中华文化中特有的人文主义精神才有复苏的可能，也只有这样才能防止荒谬无知的悲剧重新上演。然而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几十年的毁灭性破坏，得有几代人的努力才能初具成效。这样的净化过程只有在民主制度的体制内，自由和人权得到保障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开展。

作为社会最底层的劳改犯，是制度中最大的牺牲者。以往共产党将人任意划成不同的阶级。以阶级分贵贱，以阶级区分天堂和地狱。成千上万的人因为阶级出身、思想意识、政治观点、宗教信仰甚至因为微不足道的个人原因，被共产党政府送去劳改。劳改营里，在“强迫劳动”、“改造思想”、要求人人挖掘灵魂、脱胎换骨的严酷环境下，人被剥夺了意志、尊严、情感和良心，即使肉身备受折磨后，幸能存活，心灵上和精神上所受到的蹂躏和残害也万难愈合。人们在寻求历史的真实面目时，那个时期里，人为因素所造成的历史灾难，特别值得我们警惕。历史巨轮所辗过的苦难者的经历是一面忠实的镜子，幸存者的故事永远是最具有震撼力的。研究和整理劳改营幸存者的生活经历和资料就成为我们拂拭染上尘埃的历史镜子的必不可少的一个尘拂。

劳改基金会自 1992 年成立以来，一直锲而不舍地寻访及收集劳改幸存者的事迹和证据，迄今已达五百余份。在当前全球商业化的过程中，世界更倾向于资金财富的集中，文化事业的推动备为困难。虽然在重商业，轻文化的趋势下，不少幸存者非常艰苦地一字一行地把他们的亲身经历写了下来，却苦于无处出版。还有一些人不具备写作的能力，也有些人丧失了记忆的能力。那些

来自劳改的呼声和呐喊，那些血泪记录的文字实在应该有一个机会被容纳及保存。这是我们对子孙后代的负责，也是对公正及自由的承诺。劳改基金会愿意，向散布在全球，特别是如今尚在中国大陆的劳改幸存者继续征集资料，整理、编辑并出版这些文集。我们称之为《黑色文库》。

劳改营是中国畸形社会的缩影，它的幸存者就如但丁《神曲》里那些经过地狱炼火煎熬过的光怪陆离的众生。烙在这些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贱民身上的，是专制政权掌控下国家机器的铁的印记。劳改不仅对这些受难者摧筋断骨，残其躯体，还对他们洗脑换心。他们有些进去时是没有受过完整教育的青少年，出来时已是白发人；即使受过教育的人，一旦被投入这个大炼狱，也跟知识和信息长期绝缘。因此幸存的生还者中大智大勇者有之，圆滑机灵生命力特强者有之，至于心智消磨殆尽，看破红尘，苟延残喘者更占很大部分。《黑色文库》就是要保存这些人的声音，哪怕是文字粗糙，文体拙朴的记录，我们都愿保存其原始面貌。也有人身在囹圄，言不由衷，我们也都不加文饰，原文照登。相信读者自能判断。遇到当事人自己不能亲自执笔的情况，我们则尽量以接近原始叙述的语调和情感予以记录，以求传真。毛泽东统治下的中国经历了“失语”的时代，邓小平和他的继承人又想把中国人变成一个“失忆”的民族。让我们来记录历史，为专制政权谱写挽歌，为民族丧失的记忆招魂。

《黑色文库》编辑委员会

2003年9月于华盛顿

序

吴弘达

尚建国先生并不是因为政治问题被共产党政府判刑劳改的，今天他把实际服刑九年中的所见所闻栩栩如生地展现在读者面前，是很难得的。这是《黑色文库》中第一部九十年代非政治犯劳改生活的写实。

1994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决议停止使用“劳改”两字，将所有的劳改队改名为监狱，司法部下辖的劳改工作管理局改名为监狱工作管理局。当局声称这将有利于北京政府在国际社会中有关人权问题方面的斗争。意思是使用国际上通用的监狱一词，不再用有中国特色的劳改二字，也许能避免同苏联的“古拉格”那样被世人谴责。但是声明中强调“监狱对罪犯的强迫劳动及改造思想”的基本政策及内涵不变，这是名副其实的换汤不换药。尚建国在书中提到“囚服上面还用红的油漆刷着‘劳改’二字”。这就再次印证了今天的“监狱”与昔日的“劳改队”只是名词不同而已。

中共的监狱（劳改队）中从来是刑事犯为多数。政治犯所占比例在五十、六十年代是相当高的，但总是少数。许多刑事犯罪分子确实做下了无论在哪个时候、哪个社会都不能容忍、应予以惩罚的罪行。当世人批判中共的劳改制度，认为它是共产党专政的镇压工具，呼吁废除劳改制度的同时，是否也让作为劳改对象的刑事犯罪分子，归到无辜者的行列，“一二三”阔步走出监狱（劳改队）呢？也有人提出，他们只关心那些因政治、宗教、信仰等原因被中共关进监狱的人——即所谓“良心犯”或者政治犯，为之呼吁，为之争抗。至于刑事犯罪分子，则不在考虑之列，他

们罪有应得，怎么惩罚都不为过。我们应该怎么回答这样的问题？

尚建国在本书中描述的人物，大约都是刑事犯罪分子，且不论他们所经历的司法审判是否公正，仅从他们在监狱中的待遇来看，应该不难得出一个结论，即——不应该这样对待“人”。即使犯了罪，犯人也首先是一个“人”。犯了罪应受惩罚，但应尊重他们作为人的权利。呼吁把他们当作人看待，保护他们的人权，并不是庇护他们犯的罪。如果这样一些被认为十恶不赦的坏人亦在人权考虑范围之内，那当然更不用说良心犯、政治犯了。

五、六十年代，许多刑事犯罪问题都用政治罪行清算，例如一个地主子弟因饥饿偷了人民公社的粮食，这是反革命罪行，是反革命阶级的“反扑”，判刑很重的。近十多年来，中共当局刻意避免用政治罪名进行镇压，“反革命”一词已废除，而代之以“颠覆”、“盗窃国家机密”，普遍地使用“嫖妓”、“非法集会”、“邪教”等罪名来行镇压之实。

中共的政治理论莫基于马列主义的阶级与阶级斗争的观点，认为犯罪的根源来自于剥削阶级的思想及本质，它认为对刑事犯罪的斗争是政治问题，是影响到政权稳定的问题。惩罚刑事犯罪的最终目的是“改造”他们成为“社会主义新人”。尚建国书中提到，每一个囚犯必须牢记及背诵“罪犯改造行为规范”，其中首要的一条是“拥护共产党，服从党的领导”，其次才是遵守纪律，不准打架……不准留胡须等等。所谓对犯人进行“思想改造”，不仅仅是从道德上、思想上、和心理上去矫正，更重要的是有一个政治服从标准，这是世界上其他监狱所没有的。

我本身在劳改队中的十九年生活经验，与尚建国九十年代的有相同之处，亦有不同之处。在五十、六十、七十年代的劳改队中从没有听说过可以用钱来达到减刑或假释的，现在几乎比比皆是。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新现象，与整个社会上上下下的腐

败状况是相呼应的。其他方面，如批斗会、思想总结、强迫劳动、牢头狱霸都大同小异，没太多差别。共产党认为监狱、军队、警察、法院等等是国家机器、是镇压工具，这个基本出发点并没有改变。

1956年苏联赫鲁晓夫谴责斯大林，关闭了许多劳动营，包括最有名的远东地区的马加丹劳动营。从三十年代起，斯大林遣送了约一百万人到这个规模巨大的劳动营，其中大多数是刑事犯罪分子。赫鲁晓夫及苏共废弃了阶级斗争的理论，改成全民国家，但是苏联还是共产党统治的国家，还是一个党一个主义的国家，还是一个专制制度，所以劳动营依然存在，克格勃照旧横行霸道。一直到1991年苏联共产党解散，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解体，劳动营及克格勃才寿终正寝。

今天中国大陆的社会，不论在经济、文化、政治以及监狱方面，与前三十年毛泽东时代有相当程度的不同之处，本书中所描写的一些监狱状况，从犯人可以吃饱到有些干部的相对仁慈和“爱才”上看，的确跟以前不可同日而语。以前刑期满了的犯人还得“留场就业”，可以说一旦入狱，牢底坐穿，终身为奴，如今刑事犯通过关系能获得减刑或假释，再不然刑满后也可以回家。这种表象上的改善并不意味着中共政治本质有根本的变化。毛泽东的基本观念、理论、政治架构及制度都由现今共产党统治者所继承，并奉为主臬，这一点在尚建国的书中亦可见其一斑。只不过今天的劳改制度受到经济热浪的冲击，变得更为商业化，社会上的腐败风气渗透到监狱系统中，原本是执法机构的监狱，现在也以金钱和关系来支配犯人的日常生活甚至命运了。

尚建国的这本狱中纪实是目前中国监狱的一幅白描，读者在其中也可以捕捉到当今中国社会的缩影。

引 言

事事如意是危险的开始，也是灾难的开始。这句话与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有异曲同工之妙。

十多年前，我读完了大学，读完了研究生，在深圳海天出版社工作，作为一个诗人和文艺编辑，当时算得上春风得意，一帆风顺。尽管如此，我的内心却总有难以言说的躁动不安。

然而，命运突然转折——十一年前的3月7日，我从深圳回到父母所生活的那座城市——沙河市的第二天，我失去了生活中一切美好的东西，接着我身陷囹圄长达九年。在此漫长的岁月里，我饱经磨难与煎熬。但在逆境中我却找到内心的平和与沉静，我在身静思安的状态下，将牢房作书房，把刑期当学期。在一种阴差阳错的人生格局里，我以诗人与囚徒的双重视觉来严厉地自审和审视囚犯们的生存场景和人性冲撞。

为书生，为书死，为书辛苦一辈子。

吃书亏，上书当，最后死在书身上。

我坐牢是为了书，后来在监狱里拯救我的还是书——读书和写书。看来，我这一辈子是和书结下了不解之缘，想躲，躲不掉；想闪，闪不开。

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里写过这样两个人——一个被判刑五年，仿佛觉得世界的末日已经来临，脸上的生命都停止了；一个判刑十五年，却是喜气洋洋，笑得气都喘不过来了。我个人亲身感悟到，性格与心态之间存在着血肉联系，刚好能验证索氏的说法。

在引言里，我想提到两个人，一个是我的女儿，我在监狱里给她写了许多信，却始终不敢寄给她；另一个是我的母亲，她在我坐牢的那些年里变成了我的守望天使，她的坚韧、顽强，她的

悲苦、期盼……没有母亲精神上的这些闪耀着光彩的东西，我或许无法走到出狱的这一天。

另外，还有一个人是我的未婚妻刘芳芳。在我坐牢的那些年里，她经常出入于我的思念与梦境里。我曾经将她的名字刻划在茫茫田野里的一片随风摇曳的草茎上，这意味着——像草绿草黄草荣草枯一样，在埋葬我的青春岁月的地方，同时也埋葬着我的爱情。直到出狱那天，我才听到那让我窒息的消息——我刚一出事，刘芳芳就神经失常了。

我出狱的那一天，看见万里晴空中出现了一排呈人字形的大雁，那些大雁不仅飞得高，飞得快，而且还发出了一阵阵嘹亮而悦耳的叫声。这是我的新生活的最佳写照。我重新拥抱自由，开阔的天空将任我翱翔。

一落千丈

十一年前的3月7日，是一个让我刻骨铭心、不堪回首的日子。我是头一天才从深圳回到我的父母所在的这座城市——沙河市。这天中午，阳光灿烂而明亮，父母在家里正等待着我回去吃饭。我站在熙熙攘攘的街边等出租车，一辆灰色的上海轿车悄然驶到我的面前停了下来。一眨眼的工夫，从车里跳下来四、五个人，不由分说，便迅雷不及掩耳地将我迅速塞进轿车里。我清楚地记得，在将我往小车里硬塞的时候，我的额头被车门框狠狠地撞击了一下，一阵剧烈的疼痛顿时传遍全身。

我惊呆了：为什么会遭此突然袭击呢？

“你——你们是干什么的？”

车里有人半是调侃半是认真地笑说道：

“你放心，我们不是绑匪，不是来绑架你的，我们是沙河市公安局的，是想请你跟我们走一趟！”

我仍然半信半疑，只能呆坐在车上，车外依旧是阳光明媚。

到了公安局大院，他们把我带到了三楼的一间办公室里，问我吃饭没有？我说还没有，我父母还在等我回去吃午饭哩。他们说，不要紧，我们也没有吃饭，跟我们一起吃吧。其中的一个人还对我说：“你可以给家里人打个电话，但不要说是在公安局里，说是在朋友家里吃饭。”

打电话的时候，我还想，或许是有些什么误会，只要说清楚了，就能回家与父母团聚了。再说，我也不想让父母为我这么大的人瞎操心。如此一琢磨，我就在电话里对母亲撒谎，说是在朋友家里吃饭，一时回不去。母亲说，你刚从深圳回到沙河市，沙河这地方情况很复杂，你早点回来，不要让我们放心不下。母亲那语调里依稀透露出某种埋怨和担忧。

吃完饭后，开始问问题。其中一个人火气很大，动不动就吹胡子瞪眼睛地喊叫道：

“尚建国，你给我老实一点，这里不是你们深圳，这里是沙河市公安局。我们可以抓你，关你……”

我当时还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也不甘示弱，就和他硬碰硬地顶撞起来。他更加恼怒了，就说，你态度这么恶劣，今天晚上就不要回去了，我们送你去一个地方，让你好好反省反省。我也赌气说，你想送我去哪里都可以，随你的便！

夜幕降临以后，天气开始变得寒冷起来。我被送进了一个小屋里，里面燃着煤炉子，一些火焰悠悠地飘扬着，将四周灰暗的墙壁映照得一闪一亮的，倒是给我的身心添了一丝丝说不出的暖意。当时，我还以为这里是一个什么农村大队部，暗自思忖，在这里呆上一夜也不错呀！忽然，有人恶狠狠地吼叫道：

“站好！到了这儿还吊儿郎当的？先给我把鞋子脱了！”

不仅是那个凶巴巴的人，在场的其他人也都向我围了过来，有的人开始搜我的身，有的人抽出我的皮带，有的人脱下我的鞋子，好一阵折腾。

原来这里是沙河市收审所，也叫审查站。凡是被关进去的人，都要搜身。所有的物品，包括手表、现金、香烟、打火机等等，都不准带进去。不仅如此，连皮带也不让系了，皮鞋里的一点点铁块也要敲出来，据说是为了防自杀、自伤自残、越狱逃跑等等。就这样，我被折腾了个够，身上的东西统统被搜光了，皮带没了，空空荡荡的衣服随寒冷的夜风飘忽起舞，皮鞋也像断了脊梁骨似的，一点硬朗劲都没有。

屋子灯光阴森而幽暗，到处都透露出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怖氛围，让人不由得浑身起鸡皮疙瘩。我被送进了一个靠近拐角的监号。公安局送我来此处的那个人对我一脸不屑地叮嘱道：“尚

建国，你先在这里好好地反省反省！”

监号里面有两个人，他们笑容可掬地凑了过来，十分殷勤地说：“大哥，你还没有吃饭吧？这里有饼干，你将就着吃一点吧。”这让我十分感动。那时候，我还不明白，他们何以会用这种态度对待我？原来在我还没有进监号之前，看守交待过：要来一个诗犯子，可是他们却听成了死犯子，即将要判死刑的犯人。一个“诗”，一个“死”，这可是差之毫厘，谬之千里啊！可也不错，这个荒唐的误解让他们从一开始就对我惧怕三分，似乎生怕我这个活不了几天的死犯子，深更半夜会铤而走险，一把将他们掐死来陪葬。

进监号的第一个晚上，同监不仅让我吃了他们的饼干，而且还替我张罗着睡觉的地方，让我睡在头档的位置上，说我是大哥，应该睡在离马桶最远的地方，那里稍微干净一点。

接着，在无边际的黑夜里和监号内缭绕不断的臭味中，我们开始讲述各自的来历和故事。我说我是从深圳来的，是一个文化人兼诗人，在文化单位工作。他们面色狐疑地问道：

“既然如此，沙河市公安局的人怎么会把你抓到这儿来呢？送你来的那个公安局的人叫代胖子，人非常凶。”

我知道他们不太相信我的话，只好说：

“沙河市公安局的人肯定是误会了，那个代胖子弄错了，明天一定会放我出去。”

他们只是浅浅一笑，并安慰我说：

“大哥，别想那么多了，先好好地睡它一觉，养足了精神再说别的！”

他们两个人很快就呼呼地响着刺耳的鼾声，进入了不知是甜蜜还是苦涩的梦乡。我却怎么也睡不着，还天真地以为挨过这漫长而苦难的一夜，我就可以回家，获得自由了。可我哪里知道，

等待我的并不是漫长而苦难的一夜，而是八年零十个月，将近九年的苦难岁月啊！

第二天，天气转阴，初春时节，连绵不断的春雨一直下个不停，淅淅沥沥，滴滴答答，好像天被捅破了一个又一个窟窿。据说是倒春寒在四处肆虐，要把冬天残余的寒流全都挥霍殆尽。站在冷冰冰的铁门铁窗跟前，我不断地询问那些来来往往的看守人员：

“送我来这里的那个代科长呢？他怎么没有露面？我要回去！放我回去！”

没有人搭理我或接我的话茬。有的人还用眼斜睨我一下，或是抢白我一句：“你别做梦了吧！”

才过了一天，天气就变得如此恶劣，大雨笼罩着整个世界，寒气逼人，砭人肌骨。号子里到处都像长了霉似的，又腥又臭。我身上穿的衣服很单薄，不足以抵挡这骤然袭来的阵阵风寒。

也不知是过了几天几夜，我梦见自己变成了一只小小的蝴蝶，飞呀，飞呀，无论我怎么样折腾和拚搏，就是无法从号子那小小的风门处飞出去。我的梦被摇醒了：

“大哥，起来吃饭了。”

我缓缓地睁开睡眼，一时之间不知身在何处。

“大哥，你生病了吧？这里是沙河市审查站，饭来了，还是先吃饭吧。你有好几餐没有吃了。”

望着摆在面前的那种难以下咽的食物——饭是用很粗糙、甚至是霉烂了的米煮成的，还没有煮熟。菜更是糟糕，用开水在上面那么一浇一淋，再撒上大把大把的盐，浇上少许的油，连煮都不煮，就这么送来了。尽管如此，我还是得端起饭碗，可是半天都无法将那些饭菜扒进口里。

什么叫一落千丈？此时此刻，我的体会很难用语言表述。犹

如一个人走在高高的山巅，突然跌落下来。在跌落的过程中，我想抓住什么，可是什么也抓不住；我想飞起来，然而我的翅膀又被骤然袭来的狂风暴雨击打得七零八落。于是，我只能往下坠落，往下坠落……

美味佳肴 抚摸阳光

一旦关进了审查站的号子里，便没有人管了，不来提审，也不来过问，仿佛成了一堆无人问津的废品似的。我问同号子的人是怎么回事？他们给我的回答是：都这样。有的人一关就是几个月，甚至是更长的时间都没有人过问。

大约是一个星期左右以后，大家都在说要打牙祭，要开荤。他们告诉我是一种叫“漂”的东西，很好吃，很解馋。那是一种很肥腻很轻盈的肉，处于猪油和肥肉的过度状态。一般的人都不会吃它，或是把它扔掉，或是把它炼成油。在菜市场，这种肉通常是没有人光顾的，只有审查站的人认为它便宜，便把它买了回来，煮给关在监号里的人吃。果然，当漂在大白菜上面的肥腻腻的“漂”入口时，我觉得以前吃过的任何山珍海味、玉饌珍馐都无法与它媲美。在近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里，我一直处于半饥饿的状态，肚子里先前积蓄的那些油水早就被消耗一空，每天送来的饭菜里面又几乎没有什么油。因此，所谓的“漂”，吃起来其美味真是前所未有，空前绝后。我此后常常对别人说这么一句话，那就是：饥饿是最好的调味品。

在这次打牙祭吃“漂”的时候，我通过监号小小的风门看到，有一个人绝食，不肯吃东西。于是，看守拿着偌大的锅铲子撬开那人的嘴巴往里面灌。我听见耳边有人在说，“真是傻瓜，好不容易赶上了一次加餐，还要绝食，这人的脑子是不是有毛病？！”

当然，“漂”也有它的难以启齿的负面作用，即：肚子里极度缺乏油水的人，一旦骤然将它吞了进去，往往会引发腹泻拉肚子。每当有“漂”时，整个监号就会叽叽作响臭气熏天。大家吃喝拉撒睡全都在这一个号子里，无论如何都避不开，逃不掉。有一次，同监号的一个人已经拉稀拉了好久，到我们要吃饭的时候，他又要蹲马桶了。他苦皱着惨白寡瘦的脸陪笑说：

“对不起，对不起，实在是对不起。”

大家只能在他营造的缭绕不断的臭味中进餐，似乎还吃得津津有味。这种功夫是一日一日逐渐锤炼出来的，得之不易。

到了下一次又要吃“漂”的时候，我们劝他不要贪嘴了，他说无论如何都要吃，就是吃了去死，他也要吃！

“漂”就是对人有着如此巨大的诱惑力。

记得抓我的那一天，阳光明媚。入监后很长一段时间，再也没有见过阳光了。号子里只有尿骚味、体肤味、汗水味、饭馊味、霉烂味，还有其它难以名状的形形色色的味儿。在这种种气味的缠缭和包裹之下，我特别怀念阳光。多时以来，雨一直没精打采地下着。有一天，好不容易天空放晴，四周围显得亮堂起来。这时候，我才悲哀地发现，阳光很难光顾我们这个小小的监号。充其量，阳光只能通过监号那高高的天窗，在不经意之间，将它的光辉撒落一点点。

前一段时间没有阳光，现在有了阳光，它却高高在上，让我们只能望“阳”兴叹。拉稀刚好的大川看出了我眼中的渴盼，便对我说：“尚哥，你想摸一摸太阳吧？让我把你扛起来，这样你就可以摸到了。”

我瞅着大川那瘦弱的身子说：“你吃漂拉肚子，才刚好不久，这会儿要把我扛起来，你行不行呀？”

大川一拍自己的胸部说：“我的身体好，没问题！”

就这样，大川把我扛在他的肩膀上，我终于有机会用手去跟久违的阳光对话了。我觉得自己不仅是在抚摸阳光，而且更像是在握着阳光宽厚的大手，向它倾诉着一些什么，抒发着一些什么。此刻，我的脑海里盘旋着一个念头：阳光，谁也不能垄断！从大川的肩膀上下来以后，大川问我摸阳光的感觉如何？我却久久地沉默着，不知该说些什么好。

站在大川的肩头上与阳光亲密接触的那一刻，我隐约听到了一些女人的声音。良久之后，我才语焉不详地问大川他们：“这里好像还关有一些女人？”

他们不怀好意地暧昧地笑着说：“可不是吗？这里关了十几个女犯子呢。”

他们告诉我，在女犯子的监号里，也同样时兴“走过场”，即用各种各样折磨人的办法来对付刚进监号里的人，给那个人下马威，从一开始就让新犯服服帖帖，老老实实，任人宰割和摆布。女号子里面的“走过场”更是花样翻新，让人瞠目结舌。其中两个“走过场”的名目和方式，让人听了毛骨悚然：一个是“洗脸”，即用干燥的毛巾在新来的女人的阴部拼命地搓揉；另一个是所谓的“刷牙”，也就是用牙刷在刚进号子的女人的阴道里胡乱捅，胡乱戳。这是何等残忍的事情啊！可是人们在说起来的时候却是饶有兴味，津津乐道。我作为一号之长，始终不同意在监号里“走过场”，失去了许多的“乐趣”。

有一次监号放风的时候，恰好有着明媚的阳光。出人意外的是，那天还没有等我们进监号，女号的门就打开了。毕竟是彼此都很久很久没有见过异性了，那一刻，人们像是着了魔似的，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都开始一个劲地向对方抛飞吻，还说着打情骂俏的荤话。看守着急了，催促我们这边赶快进监号。在这个混乱而兴奋的时刻，我看见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女人，阳光正好照射

在她那光滑而圆润的额头上，她好像在朝着我微笑着。此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常常会回味起那天灿烂的阳光和更加灿烂的她。后来，我听说她被放了，什么事情也没有。

遭遇逮捕

我并没有在审查站待多久，第一次提审我的时候，大家所说的那个“代胖子”开门见山地问我：“怎么样？被关纯了吧？！”

“被关纯了？”一开始我并不明白这话的深刻含义，后来，我总算是体悟出来了：这意思是说，是不是被关老实了？是不是变乖了？

代胖子又说：“本来我们可以不把你关在这里的，你瞧瞧，你那天的态度有多么嚣张啊！这是你自讨苦吃。现在老实了吧？这里的滋味不好受吧？我告诉你，就是要坐牢，你也应该去你们深圳去坐牢嘛，那儿条件好，环境好，不像我们这儿这么糟糕。可是你为什么要在我们沙河市犯事呢？你要犯事也应该选择一个好一点的地方嘛。我告诉你，这儿的号子就是黑，它不是疗养院，不是敬老院，要是舒舒服服的，那不大家都跑来了？到这儿来享清福？号子就是要黑一点，让大家害怕，不敢进来，这样才能减少犯罪嘛。”

听着代胖子这样的高谈阔论，我始终缄默着，一言不发。

代胖子不大满意，他敦促我开口说话：

“不要这样嘛，这样不利于问题的解决！你以为一声不吭就行了？我告诉你，我们代表的是正义，是强大的国家机器。”

如此提审了我好几回，后来又经公安局预审科一个副科长预审了一次。那次预审特别短促而匆忙，前后时间不到二十分钟，所做的预审笔录不足一页。很快，沙河市检察院批捕科也有一个

科长对我进行了批捕审讯。

某一次放风时，大川见我身边没有其他人，便走到我跟前，轻声对我说道：“尚哥，在你还没有进监号之前，干部就特意叮嘱我们，让我们注意你的言行举动，有什么情况及时向他们反映。当然我们反映了，可以从中得到许多好处。你还记不记得，你托负责送饭的外劳的人带出去的那张纸条，让你弟弟去一趟深圳？那张纸条，根本没有送到你家里去，而是交到了干部手中了。你平时在监号里说的一些话，也都有人向干部们汇报了。在这么一个鬼地方，你可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任何一个人！”

听着大川说出这些话，一种莫名的恐惧把我的心捅得千疮百孔。恐怖夹杂着悲哀、震惊、痛楚、沮丧等情绪交织在一起，把我的整个胸腔填塞得满满的，令我窒息，无法喘过气来。我看周围的一切，觉得处处都有窥视的眼睛和窃听的耳朵，弄得我心惊肉跳。人在这样的环境里怎么能不被扭曲，不被肢解成怪物？或许连我自己都有了某种兽类的感觉。

逮捕我的时候，我没有签字。尽管如此，我还是跟逮捕我的人有某种配合。因为我想尽快把所有的程序走完，老这么拖着总不是个事。我也想快点离开审查站，自从大川告诉了我那些话之后，我是一天也不想在那里呆了，觉得那地方太脏，让人恶心。

从我被拘留的那天开始到我被逮捕，这好几个月的时间里，我一直没有理过头发，也没有剪过胡须，因此，逮捕我的那一天，我的头发长得可以梳成小辫子了，胡子更是茂盛得迎风起舞，长及胸部。偏偏这一天，电视台要来录像，摄像机一直跟随着我，拍摄到我上车为止。许久以后，我才听说，当我披头散发胡子拉碴地出现在电视屏幕上时，要不是有画外音介绍说是我，我的家人压根儿就认不出我了。当时我三十多一点，可电视上的我完全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老头子。一看到这样的画面，我母亲立马哭泣

起来，我父亲则转过脸去，眼角浮动着一层泪光。那个阳光灿烂的中午，他们等着我回去吃午饭。从那个时候直到现在，他们方才第一次看到我，还是通过电视，才有机会看到我的一副邋遢狼狽的形象。

一辆奥迪轿车将我由沙市审查站送到了沙河市看守所。

由于到看守所的时间很晚了，我被暂时安排住进了一个关押死刑犯的监号里。那是一个真正关死囚的号子。这里透露出一种让人心里慌乱不安的死亡气息，这点，我一走进号子就感觉出来了。里面羁押了三名死囚犯，全都是用沉甸甸、冷冰冰的手铐脚镣侍候着，一点也动弹不得。据说，他们已经被一审宣判为死刑，眼下正在等待着省高院的最终裁定。

尽管死亡迫在眉睫，可他们三个人都渴望着能够活下来，能够出现奇迹——省高院能够改判，取消他们的死刑。当他们听说我是一个文化人时，都争先恐后地纷纷向我倾诉，向我阐述他们的案情有哪些出入，向我描绘个人的人生故事，向我倾倒他们尚未实现的一些愿望。他们说，即使他们的案子不能改判，要被送到刑场上枪毙，也希望我能把他们的故事写出来。在这个与死亡最贴近的地方，我看到了求生的巨大而顽强的力量。人求生的欲望是那么坚韧，即使是只有一丝丝希望，也会不顾一切地去抓住它，把它紧紧地攥在手里。

在这个死囚号子里，我还看到一个特有的景观，一面墙上刻有一个“封神榜”，上面雕了有所有曾经在这个死号里关押过的、后来被枪毙了的人的名字。凝视着这样不同寻常的“封神榜”，我的内心无以名状，感慨万千。

那一夜，我与三个死囚犯人聊到了天亮。我在死囚号子里住了一夜，第二天就被转走了。后来我听说，他们三个人当中只有一个人将死刑改成了死缓，其他两个人被枪毙了。随着清脆的两

声枪响，他们求生的愿望被血淋淋地洞穿了。与此同时，他们也极不情愿地成为了那个所谓的“封神榜”上的两个死鬼。

1994年的春节，是我在监号里度过的第一个春节。除夕时分，尽管是囚禁在沙河市看守所的监号里，但这些虽然被逮捕了却仍然没有被法院判决的人们，还是强颜欢笑地过过这个中国人的传统节日。我记得当时号子里弄了不少菜，有看守所供应的、有自己家里人送来的、也有想方设法搞到的。譬如说用价值不菲的衣物、鞋子等跟外劳的犯人换来的，几百上千块钱的东西，也就换那么三两个炒菜什么的，或许还能给点酒。在号子里，别的什么东西都不重要，都是身外之物，唯有吃的食物才是最要紧的，它的价值因此而疯狂地飙升。一个炒肉丝炒猪肝，要价几十几百块钱。除此之外，除夕那天，我们还在号子里自己动手做了几个简易的菜，其中甚至还有一个“火锅”。说来真是可怜，火来自何处呢？是用棉絮搓成一个细条，然后拚命地在地上猛搓猛搓，直到搓得发热发烫，最后闪出一点点火星，再将诸如包装纸呀、快餐面袋子呀、饼干袋呀等等的东西点燃。在燃烧的过程中，凡是能够烧的东西都派上用场，这里面包括衣服、棉絮等，甚至于是一些书报。“锅”，是用一个装可乐的大饮料瓶子代替的。别看它是塑料的，见火一烧，它就要萎缩变形，可就是这个样子，它却相当经烧。我们就用它做“锅”，将它的顶部剪开，然后把各种各样的佐料和菜投放进去，一边在火上面煮着，一边趁着腾腾的热气吃着。当然得提防着看守，不能让他们发现了。

与沙河市审查站不一样，审查站是在市区里，而看守所则在沙河市东郊，这里的老鼠遍地乱跑乱窜。因此，监号里的人常常抓老鼠吃。我一次也没有吃过，觉得恶心。

一切安排妥当，大家开始吃喝起来。气氛倒也不错，其间，这个唱首歌，那个讲个笑话，逗得众人发出一阵阵哈哈的大笑。

有人提议让我表演一个节目，我忽然想起女儿小竹，那时候她只有九岁多一点，她还不知道自己的爸爸身陷囹圄哩。想着女儿小竹，当时我的脸还笑着，站起身对大家说：

“这样吧，我在这儿代表我的女儿为大家唱一首歌，这是我女儿最喜欢唱的一首歌曲——”

话刚说到这儿，我那还是笑着的脸突然湿润了，泪水一下子夺眶而出，如江河决堤，似山洪爆发。任凭怎么样努力，都无法抑制那滚滚流淌的热泪。我只好转身坐到自己的铺位上，浑身抽搐得像是在打摆子一样。大家都围拢过来，宽慰劝说我。就这样，本来是精心准备的一个除夕晚餐，叫我给弄砸了。大家嘴上虽然没有说什么，但我知道，我破坏了大家的好心情，破坏了这来之不易的苦中作乐的欢快气氛。

自从3月7日我被抓直到除夕这一天，在这突然失踪的大半年的时间里，我还是第一次潸然泪下。在此之前，我似乎一直很坚强，像个男子汉，能够面对突然出现的变故和不测。这段时间，我经历了许多事情，五花八门的审讯，形形色色的采访，我都一一应对过来了。偏偏是在我女儿身上，有着我感情最薄弱的地方。1994年的春节，是我第一次为女儿情不自禁地泪如泉涌。她还那么小，生活对她真是太不公平了。

1993年的冬天，我的父母常常冒着漫无边际的大雪来看看守所给我送一些必要的生活用品。按照规定，他们不能和我见面，只能给我送东西，由看守所的干部将那些东西转递给我。有一次，天下大雪，惨白惨白的大雪铺天盖地，将大地上的一切坑坑洼洼沟沟坎坎都掩饰了起来。那些看上去很漂亮优美的地方，其实下面恰恰是一个个危险的陷阱。就是在这次给我送东西的路上，母亲一脚踏进一个水塘里，刹那间失去了支撑，陷进了危险的池塘里。要不是我父亲眼疾手快，一把抓住了她的手臂，后果就不堪

设想了。

我自己吃点苦倒没有什么，让我心如刀绞的是，我的家人为此付出的损失和代价，那是我这一生都无法弥补的。这还仅仅是个开头。更大的灾难还在后面哩。

走过场的下马威

有一天，我们突然听说有一个号子里打死了人。就在大家议论纷纷胡乱猜测的时候，监号的大铁门忽然被打开了，一个衣衫破烂、鼻青脸肿的人被送了进来。看守向我叮嘱道：“刚进来的这个人，你可不要打人家呀！”

我是这个监号里的所谓号长，因此干部们有什么事情，都跟我打招呼。

我当即答应道：“你放心，我这个监号里不会打人。”

说是这么说了，待看守离开以后，监号里的第二把手，位子仅仅排在我后面的俗称“二档”的人，对我发出了蓄谋已久的请求：“大哥，我们监号里好不容易才进了一个新犯子，就让兄弟们开开杀戒，过过打人的瘾吧！好久都没有打人了，我这手直痒痒。”

与沙河市审查站一个样，沙河市看守所也时兴对新来的人“走过场”，即使是父亲进来了，儿子也要对老子“走过场”，有所表示，这是一条不成文的“号规”，大家都不约而同地遵循着，我却是个例外，因此“二档”乔林一直对我不满。

新来的人非常懂得号子里的规矩，一进来就乖乖地面墙而立，身体绷得笔直笔直的，然后一个九十度的弧度，将自己勾在了那里。那模样像个大大的虾米似的，脑袋顶着墙，双腿与墙壁保持着一定的距离。问他一句话，他就乖乖地答一句话，嘴里还不断

弄出颤颤抖抖的声音，表示他的温顺和可怜。显然他训练有素，曾经在监号里饱受过种种的摧残和奴役。对这样的人还雪上加霜吗？我真是于心不忍。当下，我不理乔林的茬儿，对那个新来的人说：“喂，你把头抬起来，把脸转过来，面对着我们说话！”

那人显然很清楚，在监号里面只有大哥，也就是“头档”，才有发话的权力。因此，他当即毕恭毕敬地应声答道：“是，大哥！”

待他一转过脸来，我大吃了一惊：“怎么是你呀？！大川？”

显而易见，大川也没有料到会在这么个场合下与我久别重逢。他嘴唇嗫嚅颤动着，却是说不出来。这一下我看清楚了，大川不仅仅是鼻青眼肿，而且他脖颈那儿也有着道道的伤痕，还有手臂上、腿脚上，凡是能够看见的地方，都有着明显的被打过的痕迹。

“大川，你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呀？”

大川以伤感和悲痛的声调说道：“尚哥，你不知道，我这次可是死里逃生啊！”

原来大川就是从那个打死人的号子里出来的，而他自己就差点儿被打死了。

事情是这样的：

我被逮捕不久后，大川也被逮捕了，并由审查站转到了看守所。他进了一个非常黑的号子，受尽了种种的折磨。在走过场的时候，领略了差不多一百零八个走过场的招式。这里面大过场有三十六个，小过场有七十二个，什么燕子贴墙飞、小二上茶、瞎子过河等等，不一而足，令人眼花缭乱。

煎熬了好长一段时间以后，他在号子里慢慢地混出了一点名堂了，便开始负责起他们头档的生活，无非是给头档泡泡快餐面、想方设法炒点菜而已。这一天，头档让他点火煮两个鸡蛋，他去放风地那边煮了起来。

在放风这个问题上，看守所与审查站不一样，审查站号子里没有放风场所，都是去外面放风。而看守所这边，则是在号子旁边另外又增加了一个小小的空间，大小不足十平米，作为放风场所，两边相通着。因此，一般搞小生活，都是在放风地这边进行。中间有个风门，一旦把这风门关起来了，烟雾就不会飘进号子这边。

这天，让大川迷惑不解的是，鸡蛋煮好了，可等头档要吃的时候，鸡蛋竟然少了一个。

这还了得，头档勃然大怒。先怀疑是大川偷吃了那个鸡蛋，于是，对大川大打出手，打了个皮开肉绽，遍体鳞伤。大川始终不肯招认。后来，有人出点子，说是要破这个案子很容易，往大川的肚子里灌水吧，然后让他呕吐。只要他吐出来的有鸡蛋，那就是他偷吃了。这个点子虽然有点阴损，却也搭救了大川的一条性命。水灌进去后，大川并没有吐出什么鸡蛋，于是，大川的嫌疑被排除了。另一个人则大难临头了。其实就是他偷偷摸摸溜进了风门那边，趁别人不注意的时候偷吃了那个鸡蛋，凉水一灌进了他的肚子里，鸡蛋就吐了出来。即使是他偷吃了那个鸡蛋，也命不该死呀！可事情的结果就是这个样子，他居然被活活地打死了。号子里打死人后，就被拆散了，大川被安排进了我们这个监号。

大川进了我们这个号子，出于一种生理和心理方面的惯性，一开始他总是心有余悸战战兢兢，生怕会重蹈覆辙，再次遭遇被蹂躏被摧残的命运。一段时间以后，他的脸上才开始泛出一丝丝细雨般的微笑，即使如此，也是稍纵即逝。更多的时候，他的脸上是一片荒芜，那上面充斥着许多与他的年龄极不相符的道道皱纹。只要一有机会，我就会跟他说一说以前在审查站里的事情。

让我十分感激的是，大川曾经提醒过我，说号子里有不少“窥

视的眼睛”和“偷听的耳朵”。来到看守所以后，我这方面的体会更深了。我来到看守所没两天，就有人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他是安插进来的“耳目”。当我跟大川说起这事的时候，他仍是一副小心翼翼的样子提醒我说：“人心难测啊！”

当然，我们也说别的一些事情，譬如说，大川问我从审查站过来的时候，留着那么长的头发，后来怎么样了？我说，我当时舍不得剪掉，就对看守所里的干部说我信教，一定要留着长长的头发。尽管我变着法子陈述了许多理由，可是最后我那瀑布般的长发还是被剪掉了。剪掉的时候，我的头居然感到了一阵一阵剧烈的疼痛。

尽管看守所的号子里带有放风的场所，可是由于面积太小，日照不足，所以每到阳光往回收缩的时候，监号里的人就会赤身裸体地往尽可能高一点的地方站，以享受阳光那渐渐升高离去的十分吝啬的光照。反正号子里关的都是男人，连看守也是男人，因此大家对赤身裸体都无所谓，见惯不惊，觉得很正常。

在看守所里，我前后一共待了近一年的时间，耳闻目睹了许多稀奇古怪的人和事，有自伤自残的、有装疯卖傻的、有淫秽猥亵的……最让我难忘的一件事情是，有一个人本来想装病把自己弄出去，于是他偷着吃药给自己制造一些假的病症来，没想到由于过于心切，服药量过大，他因此而丢掉了一条小命。

我前面曾经说过号子里的二档乔林，在许多问题上都与我的看法不一样，一些隔阂和磨擦愈演愈烈。最后，他试图在号子里发动一次政变，结果却让我给压下去了，并将乔林从我们的号子里撵了出去。听说他乔林去了另外一个号子里当上了头档，把那个号子弄得暗无天日乌烟瘴气。在驱逐乔林的整个过程中，大川功不可没，他因而做了号子里的二档。他和我的关系也愈来愈密切了。

前往监狱

我前后在沙河市审查站和沙市看守所两个地方一共被囚禁了一年三个月。到了 1994 年的 5 月中旬，我被判刑 12 年，送到了位于沙河市东郊的江南监狱服刑。

在过去的一年多的时间里，我曾经花费了不少的精力收集流传于号子内的各类有关的号规、号歌等资料，并设想有一天我可以用这些第一手的原始资料编辑一本《中国号子规矩大全》之类的书。可惜，这些好不容易才收集起来的珍贵资料到最后都被沙河市看守所的干部付之一炬了。

当我听说被判刑 12 年的时候，虽然没有感到天旋地转眼冒金星，但心里还是难以接受这样一个判决。那一刻，我如同狂风中的飞沙走石一样，只能任由命运的飓风把我吹刮到哪里算哪里。直到法院开庭的时候，我才有机会与我的家人见面。母亲苍老了许多，脸上的皱纹如经过霜打的枯草一般。见面后，母亲还没有开口说话，那满眶的泪水已先哗哗地滚淌下来了。我的父亲也是满面悲戚，先前黑黑的头发一下子白了不少，那是一年多的霜雪染就的吗？

也就是趁着法院开庭的这个机会，那天中午，我和家人在经历了仿佛是一年多的生离死别之后，第一次在一起吃了一餐中饭。与其说是在一起吃饭，还不如说是在一起哭诉着许许多多的往事。通过这次交谈，我知道家人曾经为我的事四处奔波，还挨了不少的宰和白眼。

要离开沙河市看守所了，号子里的许多人都给我出主意，建议我干脆跑了算了。要知道，12 年哪，这是多么难熬的漫长得几乎是没有尽头的时光啊！再说，监狱里都黑暗得很，能不能活出来，还是一个问号呢？

大川也给我出着类似的点子，让我瞅个机会跑了算了！

就是在这样的心态下，我被送到了江南监狱。

到了江南监狱入监队，一看这儿的情况并非像人们所传说的那样黑暗和恐怖。这儿的干部常常喜欢说这么一句话：法律无情，改造有情！听着这样的话，我心里倒是踏实了一些。入监一个多月以后，我被留在了入监队担任新投犯学习组长。相对而言，环境变得宽松了一些，自己支配的时间也相应地宽裕了，再加上监狱里允许使用纸笔写一写信什么的，不像以往在沙河市审查站和看守所里只能偷偷摸摸地写点小东西，收集点零碎的资料。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的手又痒痒了。不过，我的手痒痒与乔林的手痒痒是截然不同的，乔林手痒痒是想打人，而我手痒痒是想写点东西。自从我在 1993 年 3 月 7 日那个阳光明媚的中午猝然失去了自由以后，我写作的权力也相应地失去了。在过去的一年多的时间里，牢狱之灾给我带来了许多的痛苦。一种是强烈的性饥渴给身心带来的折磨和摧残；另一种就是无法写作的切肤之痛了。现在，在江南监狱入监队这个新的环境里，我想重新开始写作的愿望一下子宛如火山爆发一样，喷射而出。于是，我开始寻找一切机会写点东西。然而，好景不长，没过多久，就有人向干部反应，说我一天到晚不知是在胡写乱划一些什么。

不久，沙河市看守所又送来了一批新投犯，里面又恰恰有大川和乔林。大川与我相见，自然很高兴。可是与乔林重逢，却是有点冤家路窄的意味，因为当初毕竟是我与大川联手将他从号子里驱逐了出去。但是不管怎么说，我现在是他们的组长，无论如何都得听我的，都得服从我的命令和指挥。所以，一时之间，乔林倒对我毕恭毕敬的，不然的话，他准会吃大亏。

后来，也恰恰是在乔林的身上出了问题。

事情是这样的：那天晚点名快要结束的时候，乔林向我请假，

说他要去大便。我略一犹豫，最后还是同意了。随后，我转身离去。我走了没几步，晚点名结束后，乔林也从队列里出来了，他迈着快步往厕所那边走去。这时，另外一个组长拦住了乔林的去路，问他要去做什么？乔林说他要去做大便，并说是向我请了假。可是那个组长不让乔林去厕所，理由是那天不是我值班，我批的假不算数。两人就为这点事碰撞起来，最后是乔林先动手脱下自己的皮鞋，用那硬梆梆的鞋跟子往那个组长的脑袋上狠狠地砸去。这还了得，组员动手打组长！这在入监队的历史上是罕见的事情。这不反了天吗？！于是，所有在场的组长都跑过去殴打乔林。从沙河市看守所送来的犯人一看到这个场面，难免乡土情谊作怪，不知是谁先喊了一声：“快，快，快去帮乔林的忙！”

一眨眼的工夫，沙河市籍的犯人全都从队列里跑了出来，二话不说，就跟那些组长们打了起来。一时间，打得天昏地暗。多年以后回忆起来，那些拳脚飞舞、抱头鼠窜的混乱场面还是那么清晰。这一下子闯了大祸。干部们进来收拾残局后，当即对事情作出了处理。乔林他们大祸临头，受到极其严厉的处罚。

事后，有人向干部反应，说这批来自沙河市的新投犯敢如此嚣张，其实是在背后得到了我的怂恿和支持。不然的话，不会有那么大的狗胆！江南监狱是个大监狱，犯人来自许多不同的地方，有各自的势力。因此，干部们对拉帮结伙的现象特别警惕。在此之前，还有人还向干部们反映了可笑的情况，说我与大川的关系特别亲密，有同性恋倾向。这样一来，干部们决定把我调出入监队，安排到下面的一个农业中队去。

被调走的前夕，乔林找我，说了许多赔礼道歉的话。说他不该跟组长打那一架，让我背上一个黑锅。最后他脸上浮现出少有的愧疚神情，有些口吃地对我说：“对、对不起呀，我还做了一件错事，我不该造你和大川的谣。”

我无言以对，只能看着远处天空中无根无柢的浮云，看着它们一会儿变成面目狰狞的鬼怪，一会儿又变成舒展自如的精灵。

多年以后，我才知道，我当初被调离入监队，其实还有着另外一个更重要，同时也是更隐秘的原因，那就是，就在我被送到了江南监狱后不久，沙河市的一位领导人特意去了一趟江南监狱，对监狱的领导交待说，尚建国这个人，你们不能把他放在监狱的核心敏感部位。他这个人会说会写，放在入监队这样的地方，将来他知道和了解的事情多了，会有许多的麻烦。就这样，我最终被调离了入监队，并被送到了——一个相对说来要偏僻遥远一些的农业中队。

秋收时节

尽管秋天是一个硕果累累、香飘万里的收获季节，可古往今来有多少诗人竟然是悲秋，叹秋。天凉好个秋！其悲凉之感和沧桑之感溢于言表。

到了那个农业中队，人家告诉我，这里是二队。那二队的中队部，只能用凋敝和残破来形容。这与入监队的整齐漂亮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和巨大的反差。

新犯进了监号，排成一队，等待着搜身和清理衣物，看看是否藏有什么危险品和违禁品。我们十几个人一起被送来，这个时候，远远地看见有几个干部模样的人在那里指指点点，对我们评头品足，好像在评判着什么物品似的。

第二天，在一望无际的大田里劳动的时候，我被告之：有个徐队长要找我谈话。当时我心里忐忑不安，不知是福是祸。组长在一边鼓励我说：“不要紧的，这个徐队长人很好，他非常重视有知识有文化的人，像你的文化水平这么高，一定会在中队得到

重用。”

我来到了徐队长的跟前，他一副笑咪咪的和蔼模样。徐队长说：“我昨天没有猜错，你是研究生、诗人，是个读书人，有种不同于其他人的气质。”

在我们来到二队之前，徐队长就知道我了。他颇为善意地说：“一听说入监队要把一个研究生分配到我们这儿来，几个中队都想要你，我最后找到大队的领导才硬是把你要了过来。”

我想起当初在沙河市看守所的时候，有一次代胖子提审我，说他们已经去过深圳抄了我的家。代胖子得意洋洋对我说：“我们把你的家抄了，有些东西交给了海天出版社，这回，我们总算是把你从深圳踢了出来！”先是深圳那一脚，如今再次被入监队踢出去。在一步步被打入十八层地狱的最底层时，却有这么个徐队长站出来对我说，是他硬把我要到了二队！在如此落魄的时候，竟然有人抢着要我？我的心一下子温暖起来。在二队这个地方，我一呆就是七年多，直到我重新获得自由回归社会。徐队长与我的那次谈话，为我此后的监狱生活定了一个基调。

那天徐队长还说：“我们中队的一个宣传鼓动员还有两个多月就要满刑了。他一走，就由你来担任中队的宣鼓，到时候，你还要担任中队的积委会主任。这监号里有两百多犯人，你一定要给我把他们管好！”

与徐队长谈话结束后，组长朱强把我叫到了一边，问我跟徐队长谈得怎么样？我大致说了一下，朱强就说，“徐队长这个人非常重视知识，重视人才。”随后朱强让我过去参加劳动，那天的劳动任务是捡棉花。别人都有定额和指标，朱强没给我定任务，那意思是说，我能捡多少，就算多少。

与过去的审查站、看守所、乃至入监队比较起来，这儿的天空要辽阔得多，人站在茫茫的大田里，可以极目苍穹。思接千载，

目极八荒，观古今于一瞬。面对此情此景，我的诗兴又油然而生。我从一个非常广阔的世界里突然被关进了一个狭小局促的空间，那就是沙河市审查站。在那个十来个平米的空间里，我只能把自己幻想成是一只渺小的蝴蝶或者是蜜蜂。到了看守所，空间稍大了一些。到了入监队，空间又大了一些。这些地方都是不用劳动的，只是把人囚禁在里面。只有到了二队，这里需要每天出监号劳动，去大田里除草、整田、打药、施肥、收割、捡花等等。每天都可以从被高墙电网包裹和隔离的监号里出来，到清风悠悠、花红叶绿一望无边的大田里，劳动紧张而艰辛。

一天，忽然有一个枯涩粗哑的嗓音在我的耳畔响了起来：“你就是那个新来的研究生？！”语气里透出一种轻蔑和不屑。

一个面色黝黑的中年人，穿着泛黄的老式警服，裤腿卷得老高，露出青筋暴突的双腿，站在我面前。他的牙齿很黑，是让香烟给薰的。

正在我不知所措之际，朱强一个立正，嘴里高声喊叫着：“报告邱队长，我们新犯组正在大田里劳动。报告完毕，请指示！”

他没有搭理朱强，依旧眼望着我说：“你这哪里是在捡花？揪住一朵棉花半天不动，是在搞什么研究吧？”话里充满了讥讽和挖苦。

“我告诉你，你既然来到了我们二队，就要做好思想准备，至少要用一年的时间过好劳动、生活、思想这三关，然后才能谈别的问题。那时候你的表现要是还不错，或许我们会照顾照顾你。”

接着，邱队长就一边往前面走，一边训斥一些组长只顾生产进度，不管生产质量，满田的棉花捡得乱七八糟，留下了许多没捡干净的花花絮絮，造成大量的浪费。

一天的劳动结束后，大家排着整齐的队伍，唱着嘹亮的歌儿

往回走。到了监狱大铁门跟前，重新开始点名报数，然后进入监号。迎面是一座长长的两层楼的房子，犯人都住在一楼，二楼是会议室、活动室、大小教室、卫生室、宣鼓室、被服室、储藏室等等。监内也栽种了一些参差不齐的树，但都没有多少生机与活力，要死不活的。虽说也有两个操场，一个是篮球场，一个是羽毛球场，但西边的篮球场上是坑坑洼洼，东边的羽毛球场则是荒草凄凄。楼房的后面有水池，有露天晒衣场，其它的空地上全都长着高高矮矮的杂草，透出几分荒芜和凄凉。四周的高墙上插有形状各异的锋芒毕露的碎玻璃，上面还有一道一道的铁丝网。

各个号子里倒是打扫得很清洁干净，只是光线略暗，气味怪异。因为每一个号子里都住了不少人，白天劳动了一天，浑身黑水汗流，衣服也污秽，各种各样的怪味儿四处蔓延。

犯人白天干再重的活儿都不怕，就怕晚上学习。所谓学习，实际上就是打人，并且打得很厉害，主要是组长打组员。打人的理由各式各样，形形色色不一而足。

被邱队长在大田里训了一顿的那个晚上，组长朱强把我喊到一边，叮嘱我说，只要一看到干部来了，就要做个拚命劳动的样子。不然，连他这个当组长的都不好交待了！在此之前，别的组长已经对我发出了威胁和警告，让我小心一点，千万不要装油子哥！一个组有四个组长，值星员、记录员、监督岗、生活员。这四个组长各有分工，各有各的权利和职责。朱强是值星员，是四个组长里的一号人物。

朱强还向我介绍了有关二队的情况。譬如说，中队的三个负责人邱队长、徐队长、胡队长，实际上是三驾马车，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谁也不买谁的账。里面的情况错综复杂，朱强让我千万不要搅和进去。朱强还举例说：

“让你当中队的宣鼓，本来是管教队长徐队长管的事，可是，

如果邱队长反对的话，也有充分的理由，他可以说你没有过好三关，来中队劳动改造的时间还不足一年等等，所有这些理由都是成立的。所以，两个多月后，中队的老宣鼓走了之后，你能不能顺理成章地当上宣鼓，这还是一个未知数哩。”

朱强的话说得我一愣一愣的。

干部当中情况如此复杂，那么，在犯人当中呢？也是拉帮结伙，山头林立。监内监外的许多矛盾和冲突常常搅和在一起，真是牵一发而动全局呢！

那天晚上，各个号子里正在学习。耳朵里不时传进手掌扇在脸上、手肘击在脊背上、小凳子砸在肩膀上、床铺板打在屁股上所发出的噼哩啪啦的声音，撞击在我心坎上，令人为之颤栗。

没过多长时间，朱强对我所说的那些话，就活生生地应验了。

那是一天下午。上午出工干的活儿是栽油菜。在一眼望不到边的大田里栽种油菜是劳动强度较大的农活。干活儿时，忽然下了一阵子大雨，大家都被淋成了狼狈不堪的落汤鸡。中午收工进监号的时候，徐队长恰好在门口，见我浑身透湿、衣服紧紧贴在身上的可怜样儿，他或许是动了恻隐之心。下午出工时，徐队长来到门房通知说，让我下午留在监号里出一期黑板报。显而易见，他是以这种方式让我在监号里休息半天。

然而，邱队长却死活不同意。他认为监内已有一个宣鼓，虽然快要满刑了，还是可以办黑板报。我是个新犯子，应该到大田里去劳动改造。

就为这么点事，两个队长互不相让，相互对骂起来，引得许多人过来围观。最后居然闹到了大队领导那儿，大队领导说：

“邱队长，这留人在监内办黑板报，是他徐队长职权范围内的事情，你何必多管闲事，瞎操心？”一锤定音。

事后，朱强再三告诫我：“你这一回惹了麻烦，以后凡事都

要提防着邱队长，小心他给你小鞋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没过两天，中队要开一个批斗会。干部通知让我也到会上发言。我挺为难的，批斗的对象我并不认识。我对朱强说了我的难处，他说：“这个批斗发言，你一定要好好地上台讲一讲，这可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当初邱队长打了新犯子马军，马军不敢吭声；现在马军要满刑回家，什么也不怕了，就要找邱队长扯皮，让邱队长赔偿医药费。中队认为这是一股歪风邪气，是要胁、敲诈干部。所以，中队安排了这么一个批斗会，这是替邱队长出口气。邱队长对你有看法，你可以借这个机会缓和一下跟他的关系，跟他套套近乎。徐队长让你在会上发言，是给你一个表现自己施展才华的机会。”

朱强这么一说，我只好硬着头皮干了。批斗会在晚上，会场布置在中队大会议室里。几乎所有的干部都到场了，在会议室的前面坐了一大排，气氛庄严肃穆。被批斗的对象马军被叫到前面，身体成九十度勾在那里。这叫勾九十度，是一种司空见惯的惩罚犯人的方式。马军那个样子挺老实。批斗开始后，犯人代表一个接着一个上台发言，慷慨激昂，义愤填膺，好像跟马军有着血海深仇。我惊诧不已。发言时，就依照刚才大家发言的内容，七拼八凑地胡诌了几句。

批斗会结束后，大家对我的发言做出了评价：挺有水平的，也不要发言稿，就说得有板有眼，只是气势不磅礴，态度不鲜明，对缺乏一种穷追猛打的狠劲。即使是这样，我心里还是沉甸甸的，觉得对不住马军，我不问青红皂白，就把人家莫名其妙地批斗了一番，真是荒唐可笑！

第二天中午，在中队的厕所里，我与马军不期而遇。内疚和羞愧使我想避开马军，不敢与他对视。可是，马军笑嘻嘻地说：“你昨天晚上的发言说得真好！今天上午徐队长带我去看病，一

路上都在说你，说你是个人才，他会让你当宣鼓，当积委会主任，将来二队这监号里就是你的天下了。”

瞧马军那兴高采烈的样子，好像昨天晚上批斗的不是他，而是一个与他完全不相干的人。我批斗了他，他不怨恨我，反倒一个劲儿恭维我。是他这人完全没有自尊心呢？还是这监狱里另有一套为人处事的标准和原则呢？

马军满刑后，听说邱队长私下里还是悄悄地赔给了他两千块钱。朱强解释说：“这叫大街上打人，小巷里赔礼。那个声势浩大的批斗会一定是要开的。不是说，马军的骨折是一种陈旧性的骨折吗？那是说，他坐牢以前就骨折了，不是邱队长打的。让监狱的医院出一张这样的证明还不容易吗？其实大家心知肚明，之所以要开这么一个批斗会，主要目的在于教育那些新犯子，要是大家都像他马军那样，一挨打就要求赔偿，那这监狱还怎么办下去？这干部管理犯人，靠的就是一诈二蒙三吓四哄这么几手。马军那天晚上的表现也不错，跟干部配合得挺好，一直老老实实地勾在那儿。不然，他这两千块钱恐怕也很难要到手。”

听朱强如此一说，我觉得这监狱生活里有相当深奥的学问，需要好好地揣摩。我对朱强说：“在对待马军的问题上，徐队长与邱队长好像配合得很不错。”朱强当即正色道：“这还用说，他们毕竟要在一起共事嘛，这叫求大同，存小异。”朱强的唇上浮起了一丝丝说不出是讥讽还是赞赏的笑。

苦中作乐

整天在大田里劳动，风里来，雨里去，干着沉重而磨人的活儿。幸好这是下半年，临近年底，是农闲季节；要是赶到来年三月开春以后，一旦忙碌起来，那更是早出工，晚收工，中午吃饭

在田中。有的时候，忙乱得连解大便的时间都没有，走着走着就睡着了。农忙的时节，每天都像冲锋打仗一样，身体弱一些的人，都拖垮了。

每天在大田里耗着，苦呀、累呀、脏呀、冷呀，都不说了，我似乎还能扛得住。最让我心焦的是时间白白地流逝了。难道说，我的12年的时光就这么打发掉？等我从监狱里走出去的时候，我不仅仅是由一个年轻人变成了一个老头子，而且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废人。如今外面的社会在一日千里地迅速发展，到那个时候，我恐怕连混一碗饭吃都很困难，手中的笔怕也早已锈得拔不开了。这种忧虑折磨着我，使我变得越来越沉默寡言和抑郁哀愁了。

秋天过去了，冬天正一步一步地逼近。有一天早上，我们很早就来到棉花地里捡棉花。许多人没有鞋子，就光着脚丫子在地上走着。地上早落了霜，还下了雪，到处冻得硬邦邦的，露出一些十分锋利的冰碴子。稍不小心碰了上去，脚就会划出一个大口子，淌出一路的血来。

我记得那天是在南头捡花，所谓南头，就是在二队大田的最南端。前面跨过一条不大不小的水沟，一上坡，就有一条用水泥铺就的公路，公路的那边即是老百姓的村庄。那儿还有个鱼场，还有一个小卖部，里面商品琳琅满目，应有尽有。为此，大家一听说要去南头捡花，都十分兴奋。彼此都爱玩笑一句：快走呀，快去南头看花花！这个花花，并非指棉花，而是指那些在公路上走来走去的各色女人。这是最让大家心旷神怡的景象。

那天早上，我们首先看到的动人景象是，在大片大片的棉花枝桠和棉桃上，由于霜冻的缘故，竟然呈现出晶莹剔透、光彩夺目的亮块或是光斑来，宛如一朵朵美丽妖娆的雪莲花，把我们的眼睛照亮了。这时，有人兴奋地喊叫道：“快看哪，王嫂子来了，

王嫂子来了！”

果然对面公路边上有一个相当醒目的女人正朝我们这边迈步行来。那女人走近了，把嗓门压得低低地说：“朱强，这段时间怎么不见你们去我的小卖部买东西了呢？”朱强笑着说：“这段时间干部管得紧，不让我们过去买东西。王嫂子，你送几包烟过来吧，如果有什么白酒或是啤酒的，也一起捎带过来。”

朱强这边正说着，已经有人开始说一些黄色下流的话了：

“有哇，王嫂子那里什么都有卖的。”

“那东西有塑料的吗？卖一个给我们用用。”

“王嫂子，你那东西卖不卖？”

有些话说得污秽不堪，难以入耳，一时之间众人笑得前仰后合，东倒西歪，丑态百出。王嫂子好像并没有生气，她似乎已是见惯不惊，只是佯嗔着故意绷着脸说：“你们这些人呀，全都是些畜牲！”

此时，朱强用手指着我说：“王嫂子，你可不要一竹杆打翻一船人哪！人家可是一个知识分子，可没有惹你撩你呀。”

“他是个大学生呀？”王嫂子用一种古怪的眼神瞥视我，一边又说：“这样吧，我还是先去给你们拿东西去，等会儿，我再跟你们这位大学生好好地说一说话。”王嫂子转身走了。不一会儿，她就拿了一大堆烟呀酒呀什么的回来了。刚刚跟朱强算好账，把东西递给了朱强，正说要跟我说话，站在最北边、靠近中队部的一个监督岗忽然喊叫了起来：“朱强，要注意捡花的质量呀！”

朱强立刻明白了，这是监督岗在给他发暗号，意思是说，干部来了！朱强随即对王嫂子说：“王嫂子，你赶快走吧！我们这边的干部吃完早餐，这会儿到大田里来哩！”

经朱强这么一催促，王嫂子只好悻悻地离去。

在大田里劳动有许多的苦和累，尽管如此，但也有一些意想

不到的情形和乐趣。譬如说，能有机会一睹女人的风采，还可以说一说打情骂俏的话。如果有钱的话，则可以买一点吃的、喝的、用的东西。到了冬天，一旦在大田里发现了兔子，可以群起而追之。一旦把兔子弄到手，那一定是要送给干部们吃的，不然的话，是会被敲掉牙齿的。极少数的情况下，兔子到手了，而干部又完全不知道，这时则可以秘而不宣地悄悄将兔子在大田比较隐蔽的角落里用火煮熟，然后几个组长围坐在一起，一边吃着香喷喷的兔子肉，一边喝着从王嫂子那里买来的劣质白酒，还说一些不着边际、乱七八糟的笑话，也是相当惬意的。我还记得当时说过的一些笑话。譬如：

“一个小学生不认识‘被’这个字，老师就想用某一种实物来启发他，问道，你们家里有床吗？学生说，有。老师接下来问，床上有什么？学生答，床上有席子。老师又问，席子上面有什么？学生说，席子上面有妈妈。老师再问，那妈妈上面呢？学生说，妈妈上面有爸爸。问来问去，学生都没有说到‘被子’这个关键词，最后，老师着急了，只好迫不及待地问学生：那被子呢？学生实话实说，被子掉到地上了。”

另一个人说：“一个人被疯狗咬了，邻居看见他痛苦地坐在桌子边写着什么，以为他是在写遗嘱，便安慰地说，现在医学发达，狂犬病能够治得好，你没有必要写什么遗嘱。那人听后咬牙切齿地说，我哪是在写遗嘱，我是在写名单，我该去咬哪些人。”

那个时候警力不足，犯人又太多，种植的农田面积又过大，仅以二队来说，关押的犯人有两百五十人左右，大田的面积有近三千亩，而干警只有十来个人，所以当时要靠犯人中的各类头目，诸如宣鼓、统计、卫生员、组长等等来管理犯人。犯人头儿有相当大的权力，很多事情都可以自己安排。

白天在大田里干活，虽然苦一点，累一点，但时间也算好打

发。然而，晚上收工一进入监号，吃过晚饭后，那漫漫长夜笼罩下的监狱生活就不那么好过了。先是学习，一般情况下是一个半小时左右。所有的组员都集中到某一个号子里，然后组长开始训话。所谓训话，其实就是骂人，这个组长骂过来，那个组长骂过去，骂着骂着，就开始动手打人了。干部进来了，就由干部处理问题。干部不进来，就是组长们的天下了。在很大的程度上，组长就是干部的代言人。上这种学习，真是一种令人身心交瘁的煎熬。我上学习的时候坐在那里，觉得浑身宛若长了尖尖的硬刺，面额僵硬，而脑袋则嗡嗡作响。过了一段时间，徐队长对我说，再上学习的时候，你就去宣鼓室，就在那儿看看书，写写东西。

这一下，我总算获得了某种解脱。

有一天晚上，我正在二楼的宣鼓室里埋头看书，邱队长进去了。他走到我的面前咳嗽了一声说：“上学习的时候，你怎么一个人跑到宣鼓室里来了呢？！”

我本来想说，是徐队长让我来宣鼓室的，可是这话我又说不出口。因为邱队长和徐队长之间本来就有很深的矛盾，我这么说，岂不是雪上加霜，火上浇油吗？沉默了半晌，邱队长说：“什么都不要说了，赶快回到你们组里去上学习吧！”我刚走到门边，他又粗哑着嗓子说：“你是什么级别？刚到二队来，还是一个新犯子，就留这么长的头发呀？！快给我剃光了！”

从那以后，我就开始跟邱队长打游击战。上学习的时候，尽量不让他看见我又去了二楼的宣鼓室。

平时上完学习之后，再在号子里活动一会儿，就吹灯休息了。只有到了星期六的晚上，才可以放一放电视。那电视的遥控器都掌握在宣鼓手里，他想选什么频道，就选什么频道。我们那个宣鼓只喜欢些飞檐走壁、刀光剑影、血流成河的武打片。一般说来都是监狱附近的一些县、乡、镇自办的电视节目，喜欢播放这类

片子，播放的质量也十分糟糕，往往只看见雪花点子一闪一闪，然后是模模糊糊的人影在那儿打过来打过去，有时候甚至连人影都看不到，只听见咚、咚、咚一阵紧接着一阵的打斗之声。那个宣鼓还喜欢频繁地换台。一个星期下来，好不容易碰上星期六的晚上看电视，不是只看到了一阵又一阵的雪花点子，就是只看到了一个“换台”的无奈节目。看电视不是一种享受，而是一种摧残和蹂躏。

夜深人静了，大家都进入了梦乡，然而我却无法入眠。来到二队没有多久，我竟然患上了过敏性哮喘病。只要一闻到某种刺鼻的异味，我就会呼吸困难，甚至达到临近窒息的地步。每逢这个时候，我就只能从鼾声四起、空气污浊的号子里出来，在监号内到处走动。哪里的空气新鲜清冽，就往哪里去。监内的值班人员，不论是前后定岗，还是中间的巡岗，都跟我很熟悉了。他们问我这么晚了为什么还不睡觉？我说，我喘得厉害，如果不呼吸新鲜空气，无法度过夜晚。

自从3月7日出事以来，我曾耳闻目睹过不少人自伤自残自戕自杀。在二队，就曾经有人自杀过。那人死后，他的骨灰就埋在监狱高墙的那边。值夜班的人说，那人的鬼魂经常在这附近一带转悠，有时候是呜咽地哭泣，有时候是幽怨地唱歌，有时候是悲切地诉说，令人毛骨悚然。他们再三告诫，夜里千万不要去监号的后面，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碰上那个鬼魂。我则笑着对他们说，我也算是已经死过一回的人了，还是在沙河市审查站的时候，我就曾经为自己举行过一次别开生面的葬礼。我这么一说，那些值夜班的人一个劲地乱笑，说我是在胡说八道！

有多少个不眠的夜晚，我抬头仰望星空，看见那漆黑的天空渐渐地呈现出一点点淡淡的蓝，再变成一点点淡淡的白……

夜里因哮喘而睡不着觉，白天又要干很沉重的农活，没过多

长时间，我就生了一场病，高烧不退，直冒虚汗。中队批准我在监号里休息，暂时不用出工。好不容易用一场病换来的病假，我得好好睡一睡。白天，大家都出工了，号子没有什么人。我睡了一觉醒来，就是不想起来，身体是太虚弱了。朱强忽然从外面闯进来说，他特意从大田里回来告诉我一个好消息。

“干部今天在大田里开了会呢。那个老宣鼓不是已经刑满回家了么？这个位置空出来了，干部今天开会就是研究这个事哩！”他接着说，徐队长今天瞅准机会打了一个擦边球，瞧见邱队长出远门，不在中队，就见缝插针地在中队干部会议上讨论起宣鼓的安排问题，总算是顺利地通过了。要是邱队长在场的话，这事儿今天恐怕是会黄掉了。

朱强继续说：“徐队长这次可是用心良苦呀！他让我给你在前面开路，等把所有的局面打开了，我可就要功成身退了！”

原来，中队做出的安排是，由朱强担任中队的宣鼓，由我担任宣鼓助理。宣鼓助理？各个中队基本上都没有这么安排过，徐队长的确是用心良苦。

我的头一直疼痛得相当厉害，我勉强支撑在那儿，强打着精神。等朱强走了以后，我又昏昏沉沉地睡着了。但不一会儿又醒了。自始至终，我都处于一种神思迷糊的状态。

我担任中队的宣鼓助理后，不用顶风冒雨地出去干活了。现在已是严峻的冬天，天上常常会飘雪花。近些天来，邱队长看我会突现这种白得怪异的眼神来。

邱队长主张“劳动疗法”，认为劳动是治疗一切病患的灵丹妙药。邱队长要让我过“三关”，光是这劳动关就得让我在大田里苦苦干上一年。宣鼓朱强私下悄悄对我说，马上就要过年了，等我家里的人再来看我的时候，无论如何一定要给邱队长家里送个红包。我在心里琢磨着，我坐牢已经给家里带来巨大的灾难和

负担，我还能雪上加霜，让家人再去到处送礼，花费冤枉钱？

我知道，许多犯人家属趁着过年手上有几个钱的当口，该打点的打点，该上贡的上贡。临近过年了，大田里的活不多，犯人们主要是在监狱附近的鱼塘里挖稀泥、捕鱼等等。收工的时间也比平时早多了，回到监狱内还有空闲打打篮球什么的。过年的气氛日益浓烈起来。尽管如此，到了晚上，还是得剥那些霉棉桃。由于光照不足，大田里的许多棉桃无法绽开，所以，只能将这些霉烂的棉桃，还有一些青桃子弄回监狱来，然后再慢慢地剥棉桃。在秋冬时节，有时候甚至要剥上三、四个月，连过年都要开展“剥棉桃比赛”，从棉桃的嘴里抢夺出一些灰不灰、黑不黑的劣质棉花来。有的犯人劳动往往剥到深更半夜，手指破，指甲残，血流不止。那些剥出来的灰黑棉花上一丝丝、一缕缕地沾有他们手上的滴滴鲜血。

到了大年三十这一天，监内监外到处张贴了许多红色的春联，悬挂了大大的灯笼，监狱的门楼上插了迎风招展的红旗以及各色的彩旗。最令大家兴奋不已的是吃团年饭。大家辛苦地干了整整一年，虽说不能与家人团聚，却也能凑在一块儿饱饱美美地吃它一餐年饭。美味佳肴一盘一盘地从监号外的大伙房里端进会议室内。所有的犯人都聚集在这儿，十个人围成一桌，桌面上贴有每个人的名字，每个人的面前都放有一杯饮料，监狱不让喝酒。要正式开吃的时候，还在会议室的窗外燃放了好长好长一挂大鞭炮。

鞭炮声结束后，徐队长代表中队干部发表讲话，祝大家新年快乐，吃好喝好不想家云云。徐队长讲完话就匆匆离去了。临走前，对我叮嘱说：“多负点责，监内不要闹出什么事情来！”

徐队长匆忙走开，除了急于跟家人一起吃团年饭之外，另一原因是，过大年，他给大家一些自由。果真，徐队长一离开，不少人就从身上将预先藏好的白酒拿了出来，一口一口地往嘴里灌。

朱强本来要出面制止，我扯住了他的衣袖悄悄说：“算了，这大过年的，就让大家喝点酒，乐一乐吧！”

不一会儿，会议室就闹腾起来了。原来是为了肉丸子的事儿。每桌有十个人，然而盘里却只有六个肉丸子，有人吃不到嘴。最先嚷叫起来的，是一个名叫张振的犯人。他平时手痒痒的，就想找茬儿打人。这会儿，他逮住个理儿，岂能不借题发挥地闹腾一下？只听张振嘴里骂骂咧咧：

“他伙房的组长夏涛，平日里自己吃了喝了，拿着伙房的东西到处送给这个干部、那个干部的，还偷偷地将伙房里的米和油拿到外面去变卖，这都不说了，这大过年的，他还敢克扣我们的囚粮，一盘只给我们上六个肉丸子，老子今天非把这个婊子养的打死不可。”说着说着，就要动手把面前的饭桌掀翻。

朱强前去制止，却与张振冲突了起来。张振眼里充血，用手指头直捣朱强的鼻梁。我先将朱强扯开，然后又把张振拉到一边说：“张振，你这是何必呢？这大过年的，别闹得大家不开心。”把张振劝进了楼下的监号里，又和他聊了好半天。张振对我敞开了心扉，说他活得太苦了，每天骨头发痒，整日里就想找人打架。不过，今天发生的事情他不想让中队干部知道，不然，他家里给干部送的礼，又算是打了水漂。

我说：“今天发生的事，就此了了，不会让干部知道的。”事后，我对朱强也息事宁人地做了工作，让他不必将此事向干部汇报。

吃过团年饭，大家聚集在一起搞了一个文艺晚会。飘荡缭绕的烟雾，此起彼伏的口哨声，乱喊乱叫的嗓音，兴奋不已又疲惫不堪的人们，连唱歌的声音里都有一种说不清楚的异样成份。既有着乱七八糟的舒畅与惬意，又夹杂着许多的哀伤和苦闷。对唱得怪的、丑的、傻的、烂的，大家会拚命朝台上乱扔香烟，以资

鼓励。

夏涛其人

除夕的团年饭因为伙房组长夏涛的缘故，引起了一场哄闹和骚乱。夏涛是邱队长的关系户，很难把他扳倒。夏涛以前在小伙房为干部们做过饭。他的原则是，只要把中队第一把手邱队长侍候好，其它的事情就好办了。为此，他用尽了心计。每天早上蒸包子的时候，他总是单独为邱队长一家人蒸上一笼，那包子又大又白又饱，肉馅儿还特别多。对别的干部则是随便应付应付了事。一些小干部有意见，就反映到邱队长那儿去了，说是夏涛蒸的包子难吃死了。邱队长说：“你们别尽说瞎话，夏涛的包子弄得这么好吃，我看比大饭店里做的都好，你们还如此挑三拣四。你们太娇气，太挑剔了。”这么一来，大家也都不好再多说什么了，只将一些话闷在肚子里，背后恼怒地说，夏涛这个王八蛋真不是东西，做事还特别阴险狡诈！

夏涛对邱队长体贴入微，把邱队长侍候得舒舒服服。邱队长爱吃鳝鱼，夏涛就想方设法到处弄鳝鱼，有时候在大田和水沟里挖不到鳝鱼了，他就去附近的农村集市上买，买回来还要隐瞒真相，对邱队长撒谎说是在田里挖出来的。

夏涛的钱是羊毛出在羊身上。他时常将伙房里的一些米和油拿出去变卖。每次中队杀猪的时候，犯人们从来吃不到猪肝、猪肚、猪心等内脏或排骨、猪蹄等。有些爱说牢骚话的犯人就冷嘲热讽地说，这中队里养的猪就是怪，偏偏不长心、不长肝、不长排骨。这些怪话传进邱队长的耳朵里，他就恼怒地跑进监号里训话：“到处乱说牢骚怪话，这是一股歪风邪气，一定要坚决打击，绝不心慈手软，姑息养奸！”一顿声色俱厉的训话，大家也就噤

若寒蝉，不敢乱说话了。

那些猪肝、猪肚、猪肠、猪排骨、猪蹄等等好吃的东西，其实并不是全都没让夏涛拿出去卖掉了，有些是悄悄地送给了某些干部，而犯人们则只能吃些大肥肉。

在监狱里流行着这么一句话：不怕刑期长，只要进伙房。伙房那个地方的确不错，能吃饱穿暖。更何况夏涛是一个伙房组组长，手下还管着上百个人呢。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犯人实际上吃不饱，常常处于半饥饿状态。每餐的定量是半斤，这对成天干着超重体力活儿的犯人来说，是根本不够吃的。何况肚子里又没有什么油水。说起来是半个月杀一头猪，开开荤，可是往往兑不了现，杀猪的日子一拖再拖，或者是找个什么借口就取消了。日常的饭菜里头压根儿就没有多少油星儿。每餐半斤饭进了肚子里，不一会儿就消化殆尽了，剩下的就只是一种赶不走、驱不散的饥饿感。白天在干部的监督下要拚命地干活儿，到了晚上，更要忍受饥饿长时间的折磨，躺在被窝里，盼望着漫无边际的黑夜能够早点儿结束。在期待中吃过了早餐以后，紧接着又是出工。在一般的感受里，再没有什么事比清早出工这一时刻更让人痛苦的了，这意味着饥饿又会接踵而至。

为了一张嘴，为了解决吃饱肚子的问题，不知上演过多少令人心酸的悲剧。有人在洗碗池旁边的水沟里掏饭碴儿吃；有人偷吃别人的东西，嘴里的食物还没有吞咽下去，脑袋就被食物的主人打破了；有人半夜里肚子饿得咕咕直叫，爬起身到处找吃的东西，也顾不得有多冰凉寒冷，结果却让值班人员当作有脱逃企图的人给暴打一顿；有人在家里人接见时生怕带来的东西全都让组长拿去，于是就在接见室里吃了整整一只鸡，弄得差点儿被噎死……总而言之，吃的问题在监狱里特别严峻冷酷。

平日，大家非常关注伙房的一举一动，对伙房的种种不满积怨甚多。要说伙房的问题，那真是不少。在饭菜里发现过苍蝇、老鼠、昆虫等等，这都不说了。有些时候，饭菜弄得半生不熟，叫人难以下咽。而夏涛自己则常常用个大口袋，往监号内揣酒揣菜，自己有时还醉醺醺的。

其实夏涛也曾在大组里面吃过不少苦，也曾将别人吃剩下的东西当作宝贝，为嘴而受过惩罚。在大组里的时候，他破衣烂衫，常常用草绳子把破衣服系得紧紧的；当了伙房组长以后却是穿戴得体，非常注意修饰打扮。他的一张脸胖墩墩肉乎乎的，仿佛是什么寺院里的陶泥塑像。

他已经坐了好几回牢，颇有经验，常常喜欢用些小恩小惠来拉拢人，这一套还特别灵验。尽管有许多犯人对她相当不满，可他还是照样吃香喝辣，口袋里还有钞票花。夏涛有句口头禅：“在这个监号里，谁还能把我扳得弯？！”

春节期间，尽管发生了肉丸子事件，可总的说来，还算平和，没有出什么捅破天的大事。而二队前后左右的邻队都多多少少出了一些较大的问题。春节过后，徐队长笑容可掬地对我说：“尚建国，你们把监内弄得很平和，搞得不错！”

我说张振等人发火，是可以理解的，希望不要处理张振。我同时也反映了许多人对伙房组及夏涛的不满情绪和批评意见。

徐队长沉默了半晌，随后，仿佛有些不屑地提到了邱队长的名字：“伙房组该他老邱管，伙房组的事，由他处理吧！”

中队没有处理春节期间张振的问题，张振也好像对我怀有某种感激之情。可是，夏涛再遇到我的时候，那目光里总有一些意味深长的东西，说是敌意吧，又好像没那么严重，但却比那复杂得多，也难以捉摸得多。

朱强倒是不断提醒我——要防着夏涛一手！

贫下中农

春节过后，监内堆积如山的棉桃也剥得差不多了，马上就要进入春耕生产大忙季节了。按照惯例，每到这个时候，中队都要进行“编组活动”，即对各个大组及杂务摊点的犯人进行重新安排和调整。人员调整后，中队指定我担任宣鼓，朱强则被安排到畜牧组担任组长。张振也受到了照顾，从要起早摸黑拚命干活的大组里调到了畜牧组，专门负责养猪。张振特意找到我说：“尚兄，要不是你替我在干部面前挡了一下，我这回恐怕是进不了畜牧组。”

我笑着说：“张振，别这么说，主要是你家里人送的红包起了作用。”

过了没几天，门房那边忽然有人喊我，说是有人找我。

我以为是家里来人了，到了门房那边一看，原来是陈剑闻等几个昔日记者朋友。他们头发全都梳得油光水滑，苍蝇落在上面都会跌跟斗。衣裤全是名牌，质地、款式、做工都是一流的。特别是陈剑闻身上的那套黑色发亮的皮夹克，是真皮不说，还是名牌。脚上的皮鞋也都锃亮锃亮，能把人的眼睛晃花。

“哎哟，我们的诗人尚建国同志，今天这个样子可像一个彻头彻尾的贫下中农啦！”

话里面既有讥讽和挖苦，同时也有着怜悯和同情。

说实话，在这种情况下，我真不愿意见到陈剑闻这伙人。前些年，陈剑闻还跟着我学过一阵子写诗。那时，他对我毕恭毕敬，常常拿着一垛垛诗稿来向我讨教。他赞美我的诗写得美妙，让他百读不厌，甚至能背诵出来。我出事的前夕，陈剑闻还在沙河市的一张报纸上撰文吹捧我，说沙河市这块故乡的肥沃土壤养育和栽培了我这么一个诗人、作家，我读了大学和研究生，闯荡

世界，在深圳那个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任意挥洒，写了许多好作品。没过多久，我从深圳刚一回到沙河市，就身陷囹圄了。很快，陈剑闻就对我口诛笔伐，大肆批判和丑化我。自从我被囚禁以来，曾接受过许多媒体的采访，包括中央电视台、新华社等等，国外的不少媒体也报道过。但陈剑闻等人写我的文章里总有一种怪味儿，让人看了犯腻。翻手云，覆手雨，这时，我才体会到了它的残酷性和荒谬性。我不知是该恨自己呢，还是该恨别人。

邱队长那张黑黝黝的瘦脸上露出了少有的笑容。他的笑容不是冲着陈剑闻等一群记者而发。他笑容可掬地对陈剑闻等人说：

“欢迎，欢迎，欢迎各位记者的到来！监狱领导已经给我们打了招呼，让我们好好接待你们这些劳苦功高的记者们！”

陈剑闻则用手轻轻地拂抹着他那油亮光滑的头发，漫不经心地对邱队长说：“邱队长，我们这是来监狱采访，顺便来看看尚建国。我们以前和尚建国很熟悉。”

“那是，那是。”邱队长笑着点头道。

陈剑闻等人那天在二队呆了很长时间，中午还在中队小伙房里吃了一顿饭。陈剑闻让我也跟着他们一起进餐。邱队长先是很为难的样子，末了，或许是看在陈剑闻的情面上，还是勉强答应了：“既然陈记者开口说了话，那就让尚建国一块儿去吃饭吧！”

我却死活都不肯去。陈剑闻费尽了口舌，都没有说服我。最后，他拉下脸来说：“尚建国，我们这次来二队看你，完全是为了你好。你知道么，你们中队的邱队长对你的印象很不好，说你不认罪服法。人在屋檐下，怎能不低头？都已经到了这个份儿上了，你还能怎么样？还是乖一点，这样可以少吃一点亏。”

那天中午，直到最后我都没有去专供干部们就餐的小伙房里吃饭。事后，听说那一顿饭弄得很丰盛，不仅有鸡鸭鱼肉，而且还有乌龟甲鱼螃蟹等。监内许多人听说此事后，都说我是傻瓜蠢

货，好不容易有了一次开荤的机会，却偏偏放弃了。还有人羡慕地说，尚建国真是厉害，人都坐牢了，还有记者来看他！

我心里涌动着冤屈和耻辱，慢慢转化成一种切肤之痛。我曾经是一个诗人，热情、冲动、有理想与抱负。如今身陷囹圄，上不能侍奉父母，下不能抚养幼女，更别说去做出一番什么事业了。陈剑闻等人今天来看我，是一番好心好意，还是特意来欣赏我的狼狈与尴尬？我一时难以作出准确的判断。不过，他们说我衣衫破旧面色憔悴像个贫下中农，令我意识到，我可以蒙难蒙羞，但是，却不能放弃思想和写作的权利。记得陈独秀曾经说过这样的话：除了研究室之外，监狱是人类文明的第二个发源地。诗人但丁在他的流亡地进入了创作的黄金时代，开始了史诗《神曲》的写作。司马迁受宫刑而写《史记》……古今中外的历史上，因遭厄运受囚禁而奋笔疾书写出光辉之作的事例屡见不鲜。我自己为何不尝试一番呢？

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思想与写作渐渐地变成了我狱中生活的一部分，这是一种与人类的精神世界进行对话的方式。我一边写着长篇小说《魔鬼面具》，一边守护着自己的痛苦与悲哀，等待着历史返还我清白的那一天。作为一个诗人，我曾经被人崇敬，现今则是遭人鄙视。我如何才能洗刷这巨大的耻辱呢？我想，我应该从思想与写作中去寻求答案。

我不能像老鼠那样活着，而应该活出个人样儿来，活出一种悲壮和美丽来。

当了囚徒的诗人，还应该是一个诗人！

贫下中农？！这没有什么不好。我渐渐变得粗壮的要像树的根须一样深入到泥土之中，从那里汲取养分，同时也汲取一种安谧宁静的品格。

到了插秧时节，邱队长手上多了一样东西——是鞭子，是用

树条儿作成的。看见谁偷懒耍滑，就在谁的身上抽几下。

插秧没几天，忽然下大雨，刮大风。我们正在大田里弯着腰插秧，浑身上下像在发洪水一样，连从眼睫毛上流下来的雨水，都是一股一股的。风也十分强劲，吹过来时，人要朝着风的方向倾斜一定的角度，不然，就站不稳。

在监狱里，插秧是一件大事。每逢插秧时节，监号内不能留一个人，无论是杂务摊点的人，还是宣鼓、统计、卫生员等犯人中的头儿，抑或是各种各样的病号，统统得去大田里插秧。每个人都分配有任务。劳动技能差，或者是体力弱，完不成任务的，可以让家里人来帮忙插秧，或是出钱请人插秧。钱交给中队，由中队统一安排。在家属帮忙插秧的队伍里，我印象最深的一个人是田贵的姐姐田菲。田菲虽然是在农村种田的女人，却长得不错，脸圆圆的，眼睛大大的，与城市里的女人相比是显得有些土气，可在农村里却算得上是时髦的。头发还烫了烫，穿戴也还干净。这么一个有诱惑力的女人，不仅我瞅见了会怦然心跳，大田里每个人的眼睛都被晃花了。插秧的那些天里，田贵差不多成了宝，大家都想拉拢他，与他搭话。这个说，田贵，叫我一声“姐夫哥”，你插秧的任务我包了；那个说，田贵，别让你姐姐下田了，就让我帮你姐姐“插秧”吧！我很会“插”的。

干部经常会下到秧田里检查插秧的质量与进度，组长们更是手拿木棒，见谁不对劲，敲打几下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严重时，组长们会将那人按在水里揍一顿。人顷刻之间就成为一个泥猴，连眉眼嘴唇都分不清楚了。张振曾给我说过这么一桩往事：有一年插秧时节，恰逢他的母亲来监狱看望他。他插秧出了点小毛病，组长竟然当着他母亲的面打他。他想，“你组长平时打打我也就算了，当着我妈妈的面打我，无论如何咽不下这口气。”他还手了，和组长两个人扭打在水田里。他母亲眼睛都哭肿了，才离开

监狱。干部本来说一等插完秧就要安排他进杂务摊点，现在他居然动手打组长，所以没有照顾他，没将他从大组里调出来。直到今年过完春节后调组时，才将他调进了畜牧组。

六月份是“战三夏”即“夏收、夏插、夏管”的关键时期。一方面要把小麦收进来，另一方面要把稻谷秧苗插下去，还要将旱田里的棉花管理好，不然，迅速生长的荒草会把棉花地整个淹没掉。在六月份安排农活要交叉进行，下雨天插秧，晴天在棉花地里薅草。小麦收割以后要安排在晚上见缝插针地扬尘除杂、装包入库。

新犯子怕插秧，老犯子怕薅草，都有自己害怕干的农活。六月份里要起早摸黑，每天平均只能睡四、五个小时。两百号人要种近三千亩地，真够呛。种的品种有小麦、稻谷、棉花等等。由于睡眠少，许多人走着走着，都能闭上眼睛睡着了。成天累得精疲力竭，浑身的关节都酸痛。还有就是烂手烂脚，这主要是在水田里插秧造成的。差不多有半个月的时间要泡在水里插秧，而农田里又使用了大量的农药与化肥，因此犯人烂手烂脚的问题越来越严重。

相对而言，六月份伙食好得多，每隔几天杀一头猪改善生活；六月份忙，监规相对松一些，不像平日里那么严；也可以少上学习，多看电视；插秧时来家属，像田贵的姐姐田菲那样的女人，大家就有机会多看上几眼。还有那些周边农村来卖包子、冰棍、水果，弄得人眼花缭乱。

那天，中队给我分配的插秧任务是三亩田，限在半个月內完成，但随便我哪一天去大田里。下雨的前一天我感冒了，还发点低烧。因此下雨那天我没有出工。没多久，邱队长就让人把我叫到了大田里，并且训斥道：“尚建国，你现在当宣鼓了，连大田都不愿意来了是不是？”

我没有吱声。在这个时候说自己生病了，根本不算是个理由。因为遇到插秧，连病号都得抱病下田。一个名叫孔中玉，走路都歪歪倒倒的病人也来田里了，我就是有天大的理由也说不出口的。邱队长凶凶的目光直盯着我。站在一旁的徐队长开口说道：“尚建国，还不快下田插秧去？”

胡队长也说：“尚建国，你插秧的速度可以慢一点，但一定要注意质量哟！”

我转身向着插秧田块走去。巧的是，田贵的姐姐田菲等人就在我的附近插秧。大组插秧相隔得远一些，都集中在一起，严格按照连环包夹的规定将人排列在一块儿，三分钟一报数，五分钟一点名。这是一种防逃的措施。如果哪个人想脱逃，很快就能被发现。而我们杂务摊点的人则分散一些，好几个田块里都有人在那儿插秧。

那天，蚂蝗叮咬的事情发生了两次。一次是蚂蝗叮咬在我的大腿上，一次是咬在田菲的大腿上。蚂蝗叮咬我时，我拽了半天都没有把那只蚂蝗拽下来，反倒弄得腿上鲜血直流。一旁的田菲说，别拽，那蚂蝗是拽不下来的，得用手去用力地打，一打蚂蝗就掉下来了。我用手在淌血的大腿上一拍，蚂蝗果然被打掉了。不一会儿，田菲忽然惊慌地尖叫了起来：“蚂蝗，蚂蝗！”并向我这边跑过来，她冲着我说：“你快帮我把它打下来呀！”

我一时手足无措，田菲又一次催促：“快点，快点，快帮我把蚂蝗打下来呀！”我只好朝着她的大腿上拍打。

我拍打了田菲大腿的手火烫火烫的。有好长一段时间，我身体的其它部位都有些暗暗地嫉妒我那只火烫的手。为什么偏偏是它拥有那种殊荣呢？要知道，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和女人有过肌肤接触了。监内有人知道了我的壮举之后，称赞我是英雄救美，还说我是最有资格做田贵的姐夫哥。

然而，邱队长却在一次中队的大会上批评我这种举动是“与老百姓拉拉扯扯拍拍打打。”

这都是蚂蝗惹的祸。

半年评审

插秧苦是苦，累是累，可是“关秧门”的时候，大家的脸上还是露出了一片由衷的笑容。“关秧门”就是插秧的最后一天，通常都是在六月底或是七月初的某一天。最后插秧的这一天，任务都很轻，有时候甚至故意在头一天留下一点点小田块，然后在第二天象征性地插一插，如同是举行一个什么结束仪式似的。平日犯人们出工拉纤，总是磨磨蹭蹭的，一到收工，疾如放箭，跑得飞快。“关秧门”这天，大家出工飞快，插秧飞快，收工也是飞快。还不到中午，一天的任务便完成了。然后是加餐，如同春节吃团年饭一样，大家围在一起吃。有时候还会欢天喜地地燃放鞭炮庆贺一番。

插秧的结束实际上是一个重要的标志和分水岭，意味着上半年的结束和下半年的开始。上半年抓生产，下半年抓改造。这是监狱里的一句行话。后面紧接着就要搞半年评审了。吃过桌席以后，还有一场专门为“关秧门”放的电影。到了精彩或是枯燥处，大家都会鼓掌跺脚。尽管这个时候因为插秧的缘故，大家的手指还是肿的，脚还是烂的，甚至还淌着血，可那水深火热的艰辛日子总算是过去了。

监狱这一带是全国血吸虫重灾区，插秧又是终日浸泡在水里。因此，关了秧门以后，往往要打血防，也就是防御血吸虫的意思。半年评审随后便开始了。

先是动员，全监区的犯人全都集中到一起，八、九个中队的

人往一块儿凑。动员大会一般是放在五队召开。我们二队的人以小组为单位把人集合起来，再喊着番号步伐整齐地将队伍带到门房这边来。再次清点人数。门房干部紧张地清点着每一个人头，不敢有半点差错。两百来个人从门房出来后，还得在监狱大门外面重新清点一下人数。在监狱里，最怕的是犯人脱逃。徐队长曾经说过一句话：“如果一个中队跑了犯人，这对干部来说，是比老婆偷了人还丑的事。”防逃之弦一直绷得很紧。徐队长讲了几句话，要求大家守纪律，守规矩，不要给二队脸上抹黑。训话结束后，大队伍开始出发。五个人一排，成纵队向着五队的方向前进。这排队也是有规矩的，必须严格落实连环包夹制度，谁站在什么地方，由谁监视，由谁控管，是不能出差错的。行进过程中，既不能走到前排去，也不能落到后排去。一路之上，还得唱诸如《遵纪守法歌》等歌曲。

队伍每次行进到途中一个稍微僻静一些的地方，便要停下来解小便。到了会场上解手太不方便了。届时有一千多人，开会的地方又小，厕所只有一个，还不允许随便上厕所，得打报告，批准后才能去。因此，每到僻静地儿，便要求大家提前解好手。以前在五队开大会时，有人因为擅自去解手而受到过严厉的处罚，甚至推迟减刑。

这会儿，队伍停了下来，两百来号人齐刷刷地从裤裆里把那玩意儿掏了出来，一股股的尿飚射了出来，煞是壮观。有时候遇到前面有什么女人走过来，不用说，那女人会立马掉头而去。大队伍里便会有人小声地说说淫秽的话语，惹得大家发出一阵阵的笑声。队伍在逼近五队时，不仅要嗓音宏亮地唱歌，要一遍又一遍地喊番号，而且要踏步走，整齐地跺脚，点名报数，再一次清点人数。向五队的门房干部报告，一个接着一个地报着数鱼贯进入五队门房。在指定的位置端坐下以后，各个中队之间开始相互

拉歌，这个中队拉那个中队，那个中队又拉另一个中队：

“二队的，唱一个；二队的，唱一个！”

“三队的，来一个；三队的，来一个！”

“五队的，唱……”

唱完之后，还要继续吆喝：

“唱得好不好？妙不妙？再来一个要不要？！”

大家齐声吼叫道：

“要——”喊声震耳欲聋。

如果那边还没有动静，这个时候，中队的宣鼓就会再次吆喝道：

“一、二、三、四、五、六、七，

我们等得好着急！”

宣鼓所在的那个中队的犯人们就会紧随其后拚命应和道：

“一、二、三、四、五、六、七，

我们等得好着急——”呼叫声响彻云霄。

干部们常常鼓励各个中队相互拉歌，越火热越激烈越好。这样能烘托出气氛。有时候干部还亲自点兵点将：

“四队的，唱首歌！”

“六队的，来首歌！”

半年评审动员大会开始是主管改造的大队长洪大成做动员报告，报告内容是，总结上半年的工作和成绩，指出问题，部署下半年的改造任务。洪大队长常常喜欢这么说：“半年评审是维修站，加油站，大家都要好好地总结总结，制定出下半年的改造规划！”洪大队长还爱引用两句诗：“岁岁年年花相似，年年岁岁人不同。”来说明今年的半年评审与往年的大不相同，有着自身鲜明的特点。

在大会上，通常都会表扬和批评一些人，以便为随即而来的

呈报减刑材料造势。

大会结束后，大队领导退场，再是各个中队的干部们退场。最后是犯人们依照顺序退场。像来的时候一样，还是一个一个犯人扯着嗓子报数：“一、二、三、四、五……”鱼贯从五队的门房通过，走出来。然后，在大门外以中队为单位再次点名报数，清查人头。不能有一丝马虎。不要说少了一个人，就是报数出了差错，那个人也会倒大霉。轻者挨一顿训，重者则挨一顿打，或者是别的什么严厉的处罚。

总之，要不厌其烦地点名，要一丝不苟地报数。目的只有一个——防逃！

在返回中队的途中，已没有去的时候那么紧张和严肃了。歌还要唱，番号还要喊。回到中队大门口，还是照样要再一次点名报数。与平日从大田里收工回来不同的是，用不着半蹲在那儿，将手放在后脑勺上，然后等待着一个一个地搜身。尽管不用搜身，可还是得一个紧接着一个地报着数进监号。如果快到吃饭的时候，那就将人留在监内休息一会儿。如果时间还早，那就要出工。还要再次点名报数，将各个组的人带进带出。

总之一句话，那点名报数是时时刻刻要搞的，防逃的弦是时时刻刻要绷紧的。

大队的动员拉开了半年评审的序幕，紧接着是中队的再动员。半年评审一般都是要搞上一个来月，或者是更长的时间，五、六十天吧。什么是上半年抓生产下半年抓改造？就以上学习时间的长短来举例说明吧。插秧时节虽然苦一些，累一些，脏一些，可是晚上却要好过一点。要么是收工太晚了，不用上学习了，要么是只上那么一会儿学习，半个小时左右吧！半年评审开始以后，那晚上上学习的时间通常是在一个半小时左右。要自检自查。要相互检举揭发，揭发不出问题来还不行。还有要制定下半年的改

造计划，要制定整改措施，要评选各类改造标兵和生产能手。要呈报减刑材料。除了安排繁重的学习任务外，半年评审还有一个重要的内容，那就是搞队列训练。

在半年评审的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这一早一晚，尤其是晚上，如果没有别的事情安排，通常是要搞队列训练的。三面转法、三种步伐、集合解散、起步走时拳头要甩到胸前的第三颗纽扣、正步走时腿要绷直、脚要跌响、跑步走时要前不露肘后不露拳等等。

半年评审最精彩的部份是后期的呈报减刑材料。对监内的绝大多数犯人来说，减刑是头等大事。徐队长常喜欢说的一句话是：让大家在希望中改造。什么是希望呢？那就是减刑，减刑，再减刑，以便早日与家人团聚。每到减刑的关键时刻，那就像是众人争抢着过独木桥似的。由于粥少僧多，通常的比例是百分之二十二，因此，围绕着减刑问题，总会弄出许多事情来。

要想减刑，最好是让家里人去找点关系。如果在法院里有关系，那就最棒了。不仅是减刑利索，而且那减刑的幅度还很可观。有关系，要花钱。没有关系，只要肯花钱，也是可以找到关系的。监号外面有人放话说，他与法院里的人有关系，只要肯出一千块钱，保证能减刑一年。要想减刑，还有别的渠道。当然，如果表现非常好，又讨干部喜欢，那也是可以减刑的。能减多长时间，那完全是要看自己的运气。

监号内竞争也很激烈，都想抓住机会。更有心眼毒辣一些的，故意使绊子，写匿名信告状、栽赃，或抓住其违监违纪的事情向干部报告，及挑唆别人与之打架等等。总而言之，是泼大粪。凡此种种手段，不一而足。

所有这些事情，仿佛都与我无关。我完全是一副置身事外的样子。为此，朱强曾经问过我：“你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呢？”

说实话，我如今真是有一种悬挂在半空中的感觉。一方面，

我被外面的世界拒之门外，被以前的同事、朋友和同学所抛弃，另一方面，我又很难进入监内其他囚犯所组成的世界。他们的言谈举止，他们的思想感情，他们的为人处事都让我觉得相距很远，格格不入。在这种情形之下，我只能逃遁于书本里。我读过博尔赫斯、马尔克斯、昆得拉、左拉、乔尹斯、索尔仁尼琴等。与此同时，我挤出所有的时间，用来写作。我认为，写作的动力来源于痛苦，痛苦的灵魂是特别敏感的。据我的观察，凡是坐牢的人，刚来的头一年，思想还能闪动一些火花，还能时不时地谈论一些外面的事情，那些五彩缤纷的人和事、情和爱。然而，一年以后，回忆枯萎了，思想冷却了，似乎有个黑洞吸纳了人的精神世界。犯人们的思想被同化凝固了，所思所想基本上大同小异，那就是如何能吃饱、如何不挨打、如何受到照顾、如何减刑、如何打击别人、如何保护自己等等最基本的生存问题。

此外，大家还相互交流和传授一些盗窃技能。由于监狱实行“分管、分押”的策略，将类似的刑事犯关押在一起进行管理，这么一来，在二队关押的基本上是以盗窃犯为主的犯人。有了空闲时间，人们只要凑到一块儿，话题便会与如何偷盗等问题沾上边儿。有人走火入魔偷惯了，不偷手痒，即使到了监狱里，也照偷不误。被抓住了，挨一顿暴打，做检讨时说什么“一个鸡蛋吃不饱，一个恶名背到老”，甚至后悔得流下了眼泪。可是，一遇到机会，他还是技痒，会伸出他的手爪子。这儿是个大染缸，要想保持自己原来的色泽，真是不容易！残酷的环境，残酷到只剩下“生存”这两个字，甚至于连这“生存”二字也被扭曲了。人的身体被囚禁固然可怕，更可怕的是思想被囚禁，而更加可怕的则是人自己囚禁自己的思想，自己囚禁自己的感情！

身体不自由，能很容易觉察出来。而思想不自由，许多人都自觉，这才是更悲哀和痛心的事情。

“意志、信念、追求、希望” 这八个字给我巨大的精神力量，让我在监狱恶劣的环境里，能超越许多严峻的生存问题，而在精神领域的天空中高高地飞翔。

天空的眼泪不是雨
太阳的笑容
也不是固执的阳光
那么，美好的智慧与守望
为什么要在夕阳临窗
的时候降落
甚至于凋零成一片绝望与沮丧的
枯叶
告诉我 命运
你的主人居住在哪座花园
用什么样的梦境
才能抵达那血肉之躯
远远地看见你的翅影
一掠而过
擦破了天空光裸且细腻的
肌肤

我觉得被悬挂在半空中，这既是坏事，也是好事。诗人曾卓曾经写过一首诗《悬崖边的树》，那悬崖边的树处境十分险恶，随时随地都有可能会跌向深渊。然而，那棵悬崖边的树却偏偏要展翅飞翔。在风的扭曲下，在雨的洗刷中，飞翔成一种昂首云天的姿态，飞翔成一种精神抖擞的姿态，飞翔成……

在坐牢的那些年里，我的身体虽然被囚禁了，然而，我的思想和灵魂却一直在借助着阅读与写作这两只翅膀，高高地飞翔着，顽强地飞翔着。不管再苦，再累，遇到再大的打击和磨难，我都从来没有放弃过，没有退缩过。只要一有点时间，我就会匍伏在桌子上，像个饥饿的狼似的，在那儿阅读、思考或者是写作。为此，冬天我的手被冻僵过，冻烂过；夏天，蚊子咬得我身上满是疙瘩，特别是一双脚，常常会成为蚊蝇袭击的重要目标。为了躲避蚊蝇的叮咬，我有时候只好将一双脚泡在水盆里，将脚泡得像个发面馒头似的。

有干部看见我这个样子，便调侃着说：“尚建国，你倒跑到监狱里来赚稿费了！”

邱队长也曾私下里对别人说道：“照尚建国这种写书的劲头，我们倒应该一天收他五百块钱。”

父亲之死与法律掮客

通往二队门前的那条很长很长的泥土路，路况十分糟糕。晴天一把刀，下雨一团糟。由于前一段时间一直在下雨，路泥泞难行，所以，父母有段日子没有来看望我。父母先是一个星期看我两次，后是一个星期看我一次。这一回，差不多有半个月没有来了。我心里一方面是不愿他们如此频繁地来看我，来来回回地要跑那么多的路。另一方面，又有些牵挂，隐隐地盼望着他们能来。

这一天，天气晴好，一早上就出了太阳，到了下午，那太阳更是显得红艳艳的，飘浮在蓝天之上。大约下午三点钟左右，杂务摊点的人正在棉花地里捡棉花，值班组里来了一个人，走到我跟前悄悄地对我说：“尚建国，你爸爸妈妈来了，一直在门房那儿等你。可是，邱队长在门房值班，说什么也不让别人来喊你回

去接见，说是你在地里捡棉花，不能耽搁。另外他还说，你爸爸妈妈来接见的次数太多了，按照规定，一个月才能接见一次。所以，不让你爸爸妈妈接见。”

尽管如此，我还是只能呆在地里捡棉花，不能擅自回到中队去和父母相见。这中间的距离只有一千多米，但对我来说，却是咫尺天涯。如果得不到批准，我就是擅自走出一米，也会被扣上脱逃的罪名受罚。

今年棉花长势很好，丰收在望。地里棉花一茬一茬地多，还有许多棉桃，由于前一段时间在下雨，没有及时地炸桃，所以需要将它们弄进监号里，然后再像往年一样，每逢晚上或是下雨天无法出工的时候，便在监内将它们逐个掰开，将棉花从中剥离出来。棉花一多，地里的人手不够，监内所有的人都得参加捡棉花和剥棉桃。

这会儿，大家都知道我的父母来了，我却不能回去接见。在此期间，夏涛在棉花地的那边带着挑衅和嘲笑的神态大声喊叫着说：“尚建国，你老爹老妈来了，你怎么不回门房去接见呢？”

夏涛的脸上虽说是浮现着某种笑，但那种笑容对我来说，却显得张牙舞爪，十分凶残。我只能装聋作哑。我发现，周围的人以异样的眼光注视我。夏涛在那边若无其事地说笑着。近一段时间以来，夏涛一直想突出表现自己，以便为自己的减刑创造机会。春节六个肉丸子的风波结束以后，邱队长虽然也轻描淡写说了夏涛几句，但只是一种姿态而已，私下里邱队长处处护着夏涛，即使让他来大田里干活，也只让他干一些轻松的事儿。

我一边捡着棉花一边胡思乱想之际，邱队长忽然从大田的北边走来了。我以为邱队长是来喊我回去接见的，可是，他只是在田埂上来回地走动，好像是在看着我们捡棉花。有的棉花苗刚刚长出来，有人故意拿脚去踩那还不太大的棉苗。邱队长不知从什

么地方悄没声儿地突然钻了出来，一下子站在那个人的面前，将他逮了个正着。那人被扣了个破坏生产的帽子，狠狠地整治了一顿。这会儿，邱队长来到棉花地里，只是随便走一走，看一看，并不带着检查工作的性质，可是夏涛这个见风使舵的家伙，见邱队长一走到跟前，便表现得格外积极，格外卖力。又是大呼小叫地喊着“快点，手脚快点！”催促着伙房组的人快点儿捡棉花，又是让大家把衣服都脱了，做出个拚命干活的样子。

邱队长看见这番景象，高兴地笑了。随后，邱队长喊了夏涛一嗓子，夏涛应声答道：“到！”快步跑到邱队长面前，一个立定后，大声报告道：“报告邱队长，罪犯夏涛正在带领伙房组的全体罪犯捡棉花，报告完毕，请指示！”

夏涛在相距邱队长五米以外止步报告，声音宏亮清晰，准确无误。邱队长笑着向夏涛询问了一些事情，夏涛一一向邱队长反映了。夏涛说天刚下过雨，大伙房的柴是湿的，很难点燃，烧不着。邱队长便发话道：“你们伙房组的人回去做饭吧，不要捡棉花了。要是有人问起来，就说是我让你们回去的！”

伙房组的人呼呼啦啦地从棉花地里撤退了，临走时，夏涛还扭过头来小声地冲着我说：“尚建国，我们先走一步了。你回不回去呀？”

我心里升腾起一股耻辱之感，可却并没有吱声。我只是低着头在那儿一朵一朵地摘着棉花。周围的人也都默不作声地在那儿低头工作。过了一会儿，邱队长走了。天色开始渐渐灰暗起来，太阳慢慢西沉了。有人跑来喊我回中队接见，我说：“是邱队长让你来喊我的吗？”那人说：“不是的，邱队长去别的中队，大概是去六队喝酒去了。这会儿门房里是胡队长在值班，是胡队长让我来喊你回去的。”

回到中队部，爸爸妈妈一看见我便说：“邱队长这人心真是

狠，硬是不让我们见你，幸亏他走了，这会儿是胡队长值班。要不是胡队长让人去地里喊你回来，我们今天恐怕很难见到你。”

我妈妈还要说邱队长几句，我爸爸有些不耐烦地打断道：“别说什么邱队长了，好在这受气的日子很快就要结束了。”

“什么？怎么一回事情？！”爸爸的话还没有说完，我就迷惑不解地问道。

爸爸笑咪咪迫不及待地对我说道：“建国，有一件事，我们一直都瞒着你。我告诉你吧，你很快就可以回家了。”

“什么？”我似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爸爸讲述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他们拜托了刘金保去四处打通关系，到处求人，烧了不少香，拜了不少佛，现在事情总算是有了眉目，我很快就可以离开监狱回家了。

刘金保是我的中学同学，他曾经是个警察，后来犯了什么事儿被辞退了。后来，开了一个卡拉 OK 酒座，利用吃吃喝喝拉拉扯扯的手段拉帮结伙，也不知是在搞些什么名堂。就是这么一个不务正业的人，爸爸妈妈却将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盼望着他能将我从监狱里弄出去！

见我脸上的神情有些异样，爸爸便解释道：“我们知道，你看不起刘金保，觉得他搞的都是歪门斜道。可如今的社会就吃这一套。说不定他的手段灵验，能把事情给办好。建国，你可不要书生气太重了，会吃亏的。”

母亲的眼眶里顿时有了盈盈的泪水：“建国呀，建国，你就是不听话，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你还犟死！你难道还不明白吗？自从你坐牢以后，你先前的那些同学呀、朋友呀什么的，全都不见影儿了，都在回避我们，生怕沾上了什么霉气！谁还肯帮你的忙呢？这可不像是你在深圳风光的时候，每次你一从深圳回来，家里就塞满了人。在这种时候，人家刘金保还肯来帮你，这已经

算是很难得了。”

说到后来，母亲的嗓音渐渐地哽咽起来。既然两位老人家都这么说了，我就不好再多嘴多舌，只能缄默着，让事情顺其自然地发展吧！

我回到监号不一会儿，就开始有人叽叽咕咕地说什么我很快就要回家，离开监狱了，这真是咄咄怪事。刚才接见的时候，只有胡队长去晃了一晃，后来徐队长也去呆了一会儿，再没有别人知道这事呀。再说，根据监狱的规定，无论监号外面说什么事情，都不允许监内的人听见，可是，监号内的人总是什么都听说，什么都知道。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情呢？我自己也是才听说，并且还没有完全醒过味来，监号内已经传得沸沸扬扬了。几乎所有遇见我的人，第一句话必定是：“你马上就要回去了？”

我吱唔着，故意闪烁其词。不知道应该如何回答那么一些纷至沓来的问话。只有面对朱强时，我才推心置腹地对他说了深藏在内心的一些疑虑。朱强问我这次出去，办的是什么手续，是保释呢？还是保外就医？说心里话，不仅我没有弄清楚，就是我爸爸妈妈都没有搞明白，刘金保究竟是为我办了什么手续。我与朱强琢磨和推敲了半天，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反正不是保释，就是保外就医。也只有这两种方法能将我从监狱弄出去。

徐队长找我谈了一次心。我说了自己的困惑与怀疑。徐队长也似乎有同感，却又拿不准。他从工作出发，征求我的意见——如果我的手续办好，要离开二队了，那么该由谁来接替我的工作，当中队的宣鼓呢？我毫不犹豫地推荐了朱强。徐队长也问了夏涛在监号内的情况，那潜台词是显而易见的，夏涛也有可能出任中队的宣鼓。我直言不讳地对徐队长说了我对夏涛的看法。“夏涛这个人口是心非，假公济私，拉帮结伙，喜欢整人。要是让他担任中队的宣鼓，肯定会把监号内搞得乱七八糟乌烟瘴气，到了那

个时候，要想收拾局面，恐怕就晚了。”我知道夏涛有人罩着，上次他与别人打了架，可还是照样减刑，没有受到丝毫损失。

邱队长不让我接见的的事情发生之后还不到一个星期，也就是五天左右的时间吧，监号内始终都在议论我很快就要离开监狱的事。有人说我有本事，有人说我家里有背景，有人说现在什么都是假的，有人说我十二年的刑期，还没有搞到三年就要回去，这种搞法太不正常了。不管别人怎么说，尽管我内心深处也存在着种种的疑虑，但我还是渴望着能尽快离开监狱，回到我自己原来的生活中去。我的心灵本来已渐趋平静和安宁，不曾想，上次差点儿要夭折的接见却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让我的心潮又翻腾起来。所有的苦难就此要结束了吗？就在我暗暗期待着好消息快点儿来临之际，一天晚上，刚吃过晚饭，门房那边突然有人喊：

“尚建国——尚建国——”

那喊声有些怪异。

监内的许多人纷纷对我说：

“尚建国，是你家里来人了吧？你的材料下来了，要回家了吧？”

“回家了，可别忘了我们呀，有空来看看我们。”

“给我们写写信吧！”

在众人七嘴八舌的叮嘱与交待声中，我快步向门房那边走去。不错，是我家里来人了。我一眼见到弟弟尚建武，眼睛立即被他手臂上醒目的黑袖章火辣辣地烙了一下，心颤栗起来，揪成了抽搐的一团。

“是爸爸，他——”

这真是晴天里的一声震天雷。就在五天前，父亲还笑咪咪地对我说我很快就要回家了，就要离开监狱了。不曾想，这话竟然成了一种不祥的预言。弟弟对我说，他已经托关系找了监狱领导，

同意我回家去办理丧事。不错，我的确是要回家了，但却不是获得了自由，而是要为父亲奔丧。因为监狱的头儿已经批了我的假期，五天以前还不准我接见的邱队长这个时候倒是一反常态，相当爽快地对我说：“尚建国，你赶紧跟你弟弟他们走吧！”

中队委派了一个干部苏越与我同行，那是要监督我，怕我脚底板抹油——溜了，一去不复返。

上车离开监狱后，一路上，我像傻了似的，半天时间都不说一句话。我本来是不大抽烟的，现在要了一支，呆呆地瞧着那淡红色的圆圈一点点地向后移动。香烟每缩短一截，我的心就破碎一点。我自始至终都不敢或不愿相信，父亲就这样突然离去。父亲的身体一直都很好，自从我出事以来，他和母亲也不知来监狱探视过我多少次。弟弟向我透露了一点儿有关父亲去世的原因：刘金保是个十足的骗子，父亲完全是被刘金保这个家伙活活地给折腾死的！

天呐！这一切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回到家里，门前已经临时搭建了一个很大很大的灵棚。灵棚里张挂着父亲的遗像，灵柩放在中间，四周坐着许多亲朋好友。望着父亲的遗像，泪水一下子涌了出来。父亲是在睡梦中离开人间，走进天堂的。临死之前没有任何预兆，晚上上床睡觉，忽发脑溢血，没有吭一声，就这么睡着了。

父亲生前酷爱京剧。为此，母亲特意请了一个戏班子来为亡魂演唱。那一板一眼，一腔一调，无不悲凉凄切，催人落泪。母亲对我说：“建国，你也为你爸爸唱一曲吧！”

我唱了。我唱的是一段现代京剧选段《雄心壮志冲云天》

狱警传，似狼嚎，	贼鸠山，要密件，
我迈步，出监——	毒计用遍。

休着我	筋骨断，体肤裂，
戴铁镣，裹铁链，	意志更坚
锁住我双脚和双手。	赴刑场，
锁不住我雄心壮志	气昂昂
冲云天！	抬头 远看

父亲遗体火化那一天，开了一个追悼会，由我致悼词。父亲去世时只有五十七岁，是英年早逝。让我悲痛不已的是，父亲是为了我的事情四处奔波，日夜操劳，又受了那么多的气，他又有高血压，所以，才出事的。

这么前思后想，我读着事先写好的悼词，读着读着，我忽然大放悲声，竟然差点儿晕厥过去。父亲的死，使我意外地获得了一种发泄悲伤的机会。周围的人，母亲、妹妹和妹夫、弟弟和弟媳、我女儿、我的外甥，纷纷伸出手来，将我搀扶起来。全家人痛哭，哭声响成一片。还在监狱里的时候，听说父亲去世的消息，曾有过短暂的呆傻和麻木，这一切过去之后，是更加沉重和尖锐的悲伤与痛苦。

母亲也几次用她那长着褐斑的手背为我揩擦着脸上滚滚流淌着的泪水。

为了替父亲奔丧，监狱给了我三天假期。回到家里的头一天晚上，中队委派来监视我的干部苏越就和我睡在同一张床上。尽管睡眠的时间非常短暂，我估计，苏越一分钟也没有睡着，他的每一根神经都好像绷得很紧，生怕有那么一点儿闪失，让我溜掉了。说实话，我的确想过这个问题——干脆跑了算了！我刚出事的时候，曾经幻想着自己变成了一个小小的蝴蝶，吱溜一声就飞走了。后来，我渐渐地平静下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心居然日趋沉静了，犹如那一泓清水里的鹅卵石。但这一次，先是五天以前

父亲告诉我可能就要离开监狱回家了，后是噩耗传来，父亲猝死。前后两件事对我造成的冲击力太大了，犹如把我从地上抛到了万里晴空之上，然后再将我往深渊里狠狠地摔下去。

这么一种生存状态和心理状态，要想获得一种解脱，最快捷的方式，就是像电影《追捕》里的高仓健所扮演的那个角色一样，先脱离苦海，然后再为自己一洗清白。

在替父亲奔丧的那三天时间里，我的确想逃跑，并且也有机会。一开始苏越对我看得非常紧，几乎是寸步不离。后来，他见我并没有逃跑的意思，尤其是在父亲的追悼会上，我哭成了一摊稀泥。苏越就再不像先前那样把我看得死死的。在此期间，我有许多次单独行动的机会。每当此时，我的思想斗争就特别厉害。我设想了种种逃跑的方案——坐船、坐车、步行等等。另一方面，我思忖着身上还有热孝，父亲刚刚为我而死，死因还需要进一步搞清楚。在这个时候，我怎么能跑呢？！母亲是那么脆弱，她再也不能承受一丁点儿打击了。弟弟还替我担着风险呢，是他做担保将我从监狱里接了回来。如果我跑掉了，监狱方面肯定会将他当人质关押起来。类似的事情以前不是没有发生过。前一段时间我一直在监狱里写长篇小说《魔鬼面具》，正写在兴头上呢，如果我一跑，那就一切都付诸东流水了，我的确想将这部小说写完。如此想来想去，我终究没开溜。

在我刚出事不久，刘金保就跑到我家里，对我父母说，他可以帮我，能将我从监狱里救出来。开始，二老还将信将疑，后来，他们病急乱投医，渐渐地落入刘金保的圈套。在刘金保之前也有人跟我家里人联系过，说他们认识当权的，能将我解救出来。一旦都是明码实价，给钱就能办事。连直接经办我案子的人都做出过这样的暗示，还说，如果有省里的关系那就更好了。家里人也塞过一些红包，却是毫无效果。来到监狱后，为了能让我分配到

一个好一点的服刑场所，家里人也是四处塞红包。有的人根本没有帮一点忙，收红包的时候却一点儿也不含糊，还一个劲地说，给他的那些钱，都用来请客了。鬼知道他都请了一些什么人，或者是压根儿就没有请客，只是将钱塞进了自己的口袋里。我父母常常对我说，你现在是捏在别人的手心里，我们谁也不能得罪，人家要钱，就给他们钱。不然的话，人家会把你往死里整！

父母亲也曾去找过我的一些同学和朋友，其中有个叫谢明光的，是我的大学同学。谢近来事业蒸蒸日上，成了亿万富翁，扬名立万，炙手可热。谢明光也曾答应过我家里人，说是要帮这个忙，一定要把我从监狱里弄出来。可是到末了，谢明光也没有兑现他的诺言。

家里人开始觉得心灰意冷了，这时，刘金保出现了。他也是说得唾沫横飞。开始我父母不肯轻易表态，他们被骗怕了。刘金保就摇唇鼓舌做起工作来，感动了我的父母。不管怎么说，刘金保不同于别人，他是我的同学，我爸爸妈妈看着他长大的，对他知根知底，能把得住他。问他把我弄出来大概需要花费多少钱？刘金保却脑袋摇晃得像拨浪鼓似的笑着说：“尚叔叔，尚阿姨，说什么钱不钱的，这就见外了。我和建国是同学，他的事就是我的事，我这完全是帮忙。大家同学一场嘛，就不要提钱的事啦！”刘金保说得坦诚而真挚，我的爸爸妈妈只有点头应承的份儿。

刘金保开始也还是找了一些人，譬如说，他曾找过日用化工厂的一个叫柏新火的厂长。厂长柏新火有着一张肥胖的圆脸，嘴里正中两颗金门牙，喉结粗大，身胚墩墩实实，很壮。柏新火开始倒是乐意帮忙，想以保释的方式将我从监狱里弄出来。办理保释有一些基本的条件，譬如说，具保的一方必须是县团级以上的单位；被保的人必须是个特殊的人材，单位里的某一些科研项目或是生产离不开他，不然就会造成无可挽回的巨大损失；还有监

管的方式等等。据刘金保说，尽管保释很难办下来，他们还是排除种种困难，一路过关斩将，将事情办出了一些眉目。可就在这关键的时候，柏新火偏偏去了一趟市直机关，找到一些市里的领导咨询此事。有一位市里的领导对柏新火说：“柏厂长呀，你与尚建国非亲非故，何必要去捅这个蚂蜂窝哩。”一席话让柏新火打了退堂鼓。

以上这些事，都是刘金保对我爸爸妈妈讲述的。

刘金保说，柏新火打了退堂鼓以后，他又去找了别的单位，终于使事情再度出现了好的转机。

刘金保开始说别提什么钱不钱的，可是，事情还刚开头，他就找我父母说，并不是他要什么钱，而是现在社会风气就是这个样子，找人帮忙办事，就得请人吃饭。光吃饭还不行，还要请唱卡拉 ok，洗桑拿，泡小姐，没有这些节目，别人是不会帮忙的。刘金保反复强调不是他要拿这笔钱，而是请客需要花销。他的狡猾之处在于，每次从我家人那里只拿个几百块或是上千块钱，不会再多了。并且还写上借条，说是暂借，如果无法办妥事情，这些钱还会如数奉还。其中的一张借条是这样写的：

借条

今借到尚启华人民币壹仟元整，用于帮其子尚建国出狱之活动经费，时间定于某年某月某日见分晓。如无法办妥尚建国出狱一事，立即分文不少退还。为同学应该这么做。

借款人：刘金保

某年某月某日

据刘金保说，他请柏新火去泡小姐，结果惹上了病，柏新火

那个玩艺儿上长了一个东西，找医生看不好，那东西越长越大。听那口气好像是在怪罪我父母借钱给他，才惹出了麻烦事情！

从那个时候开始起，刘金保就这样隔三岔五地来我家借钱，美其名曰是帮我出狱。起初，那借条还写得像个样子，有规有矩。可是到后来，借条渐渐地变成了领条，领条后来又变成了收条，收条后来又变成了收款，再然后，就是连抬头上的名目都没有了，只在一张白纸上写着某月某日，柒佰元。某月某日，捌佰元，这样的白条有一大堆。

我父母竟然鬼迷心窍到了这种地步，只要刘金保一来要钱，就立马给钱。而刘金保一会儿说，我的材料马上就要下来了，我很快就可以离开监狱了；一会儿又说，还得几天，材料还在谁谁谁的手上，这人要打点一下，不然，事情就会泡汤。事已至此，只能是让刘金保牵着鼻子走，咬紧牙关，熬过这最后的苦难日子。

就在我父亲临死的前一个星期，刘金保对我父亲采取了捷报频传的战略。他今天说我明天要回来，明天又说我后天要回来，每一次他都发誓说，这一回是真的，如果他撒了谎，那就让他不得好死！我父母就相信了他。爸爸最后一回去监狱看我，实际上是专程向我报喜讯的，我很快就要回家了！

由于邱队长的阻拦，我们父子二人还差一点没有见上面。也就是这一次相见，竟然成了诀别！

父亲临死的当天，刘金保遇到我的父亲，还在对他撒谎道：“尚叔叔，你们家建国明天，至迟是后天就要回来了。这是真的。没有骗你。我发誓！”

父亲当然更愿意相信这是事实了。他不就一直在盼望着这一天吗？随后，或许是在一种幻想的陪伴之下，或许是在一种愿望的鼓励之下，父亲开始传播那子虚乌有的巨大喜讯：“我的儿子就要回来了！”

那个时候，父亲的心情一定是美滋滋的，不仅如此，在吃晚饭的时候，他还高兴地喝了酒。他抛出了一条响当当的理由——儿子明后天就要回来了，家里有这么大的喜事儿，能不喝点酒庆贺庆贺吗？！

父亲是在当晚的睡梦中离开这个世界的，离去的时候，他的脸上布满了笑容。或许是看见我从监狱里回来了！那笑容便成了他脸上永恒的表情。他没有看到我以后经历的漫长的苦难。所以，就这一点来说，父亲是幸福的，他的痛苦没有被无休无止地延长，没有被没完没了地扩大。

在这个意义上，我还要感谢刘金保用虚假的喜讯让我的父亲在死的时候面露笑容。同时我还暗暗地有些佩服刘金保这个王八蛋，他居然是个杀人不见血的残酷预言家，他对我父亲说：我不是明天就是后天回家。他的预言可怕地兑现了，我果然回来了，然而，却不是获得了自由，而是为我的父亲奔丧！

在我为父亲奔丧期间，许多事情我都渐渐地搞清楚了。连柏新火为我办理保释的事，都是刘金保虚构出来的。他除了一而再、再而三地欺骗我的爸爸妈妈之外，再也没有干一件人事。他溜得无影无踪，只留下了一大堆的白条子在我的手中。那些白条子宛若漫天的雪花，一路之上被我抛洒着，以祭奠我那英年早逝的父亲。

搜查黑鱼

父亲去世了。他是为我而死。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不愿相信这是个事实。回到监狱后，有好多次我举目望天，都仿佛在天幕的深处看到了父亲的脸在那儿隐约闪动。逢到过年过节，我会在监狱里的某一个角落为父亲燃烧一点纸，以告慰他在天之灵，

寄托我的深切哀思。

父亲死在冬天，我所在的二队的田野里，常常会栖息着大片的乌鸦。那些时飞时落的乌鸦总是很沉郁的样子，它们的翅膀上闪着淡灰且透着紫色的光泽。田野里的雪也是这儿一点，那儿一片，显得七零八落四分五裂。为了纪念父亲，我开始写一篇文章，题目叫做《戏剧人生》。我一次又一次地暗自落泪。冬天的夜里，天阴得厉害，我握笔的手常常冻僵，难以握住笔不说，我的脚更是冻得够呛，棉鞋薄得像是纸做的，五个脚趾冻得硬邦邦的，只能弓在那儿，试图挽留那么一点点的热气。可不管怎么说，我也要把这篇纪念我父亲的文章写完。

又一个春节渐渐地临近了。

到了春节的前夕，中队开始张罗着为春节做一些准备。准备之一，便是干鱼塘，将鱼塘里的鱼全都弄出来，卖一点，干部分一点，剩余的则留给犯人们过年的时候吃。

对中队来说，干鱼塘是一件不小的事情。平时想吃鱼了，只是在鱼塘里撒那么几网，捞它个几十上百斤鱼出来，让大家吃。这干鱼塘就不一样了。不仅仅是好几千、上万斤的鱼要全部弄起来，而且，平时不容易捞上来的鱼，诸如鲫鱼、黑鱼等等这些野生的，也比较珍贵的鱼便也可以随着那些家养的鱼一起弄上来。因此，中队干部对于干鱼塘这件事非常重视，邱队长他们一直盯在那儿，生怕在哪个环节上会出漏洞。这个时候，不仅仅是畜牧组的人全都出动了，连大组里的人也都浩浩荡荡地开了过来，一场声势浩大的围歼鱼的战斗就这样打响了。

还有另一种颇为壮观的景象就是，届时，附近农村的一些在农闲时节没有什么事情可干的妇女们，便会乘着这个空档来到各个中队，在人家干鱼塘之际，她们也可以浑水摸鱼，弄那么三五条或是十来条鱼。一时之间，人头攒动，鱼也欢势。尽管如此，

在干鱼塘时，对犯人的监视和控管一点儿也没有放松。犯人们心里虽然激动兴奋，但毕竟得守规矩，不能乱跑乱窜与那些来浑水摸鱼的女人们搞得太火热，贴得太近乎。充其量只能多饱一饱眼福。然而，那些农村女人可不管这么多，干部们能把犯人管得服服帖帖的，却拿她们无可奈何。她们又不是犯人，你能把她们怎么样？因此，她们常常敢往犯人堆里钻，往犯人身上蹭。这个时候，有那些胆子大的犯人便趁机在女人的身上这里摸一把，那里掐一下，逗弄调戏，将那些女人弄得咯咯直笑，眼里还飘荡出一些野野的风情。那种眼神，是一种刺激男人性欲的眼神，是一种鼓励男人进攻的眼神。不过，事情也只能到这一步就截止了，因为干部就在这附近，不能太放肆。

每逢这种时候，南头那边开小卖部的王嫂子总会出现。还有另一个叫秋霞的妇女也会出现。王嫂子是很大方的女人，她跟二队的许多犯人都很熟悉，总是和这个人调笑几句，和那个人对骂几句。大家都说王嫂子是个骚货，走到哪里骚到哪里。可朱强却对我说：“王嫂子是个不简单的女人呐，她像现代京剧《沙家浜》里面的阿庆嫂一样八面玲珑，跟谁都好，跟谁都笑眯眯的，好像很风骚的样子。可是谁也没有真正占过她的便宜。她玩的这一手叫做狼多不吃人。围着她转的男人越多，她越安全。那个秋霞就不同了，她是闷鸡子吃白米，别看平日里不大喜欢理睬人，却是真正偷人的好手，会与男人们来真的，一点儿也不含糊。她跟李金春那个热乎劲儿，谁都看得出来！”

的确如此，眼下在一大群花花绿绿嘻嘻哈哈的农村女人当中，就有王嫂子和秋霞。王嫂子与秋霞大不相同。这会儿，王嫂子是如鱼得水，跟这个人打打招呼，跟那个人飞飞媚眼。与此同时，许多的犯人都趁干部不注意的时候，将一些鱼偷偷地塞进王嫂子装鱼的袋子里。时间不长，王嫂子那装鱼的袋子就显得鼓鼓囊囊。

而秋霞则站得远远的，基本上不往犯人堆这边儿靠。大家都知道李金春与秋霞相好，便怂恿着说，李金春，快让秋霞过来呀，她一过来，我们手里的这些鱼都可以给她，让她今天满载而归。大家磨破了嘴皮子，秋霞还是无动于衷，不肯往这边来。

对犯人的这种猫腻，干部们是心知肚明的，往往只会雷声大雨点小地诈唬几句，只要不是明目张胆地送鱼给老百姓就可以了。

也有一些女人在那儿悄悄地偷鱼。干部们不仅要管这种现象，而且还要防止犯人自己偷鱼。犯人偷鱼的方法很多，其中的一种方法是，先将一些上好的鱼用脚踩进鱼塘周围的稀泥之中，将鱼藏在那儿，等过个天把，再将那些躲藏起来的鱼弄进监号里，以便过年的时候美美地吃一顿。对这种情况，干部们防不胜防。还是在干塘的前几天，朱强就对我说：

“本来以为你这个春节会回到家里过的，没有想到你人没有回去，你爸爸却离开了人世。我们今年在一起过春节，这回干鱼塘的时候，我给你弄点儿好一些的鱼，不要那些什么草鱼、鲢鱼、大头鲢子之类的家鱼。”

朱强这么说过之后，便开始行动了。他是畜牧组长，在弄鱼这个问题上有着得天独厚的先决条件。

在干鱼塘的日子里，大家都很亢奋。特别是在干过鱼塘之后，塘里的鱼都被中队弄得差不多了，大队人马要离开鱼塘回监号了，方才允许附近农村来的女人们跳进鱼塘里去抓鱼、逮鱼。此前，只有像王嫂子那样与犯人们比较熟悉的女人才敢混迹于犯人之中。干鱼塘的日子里，一天之中最壮观的时候，是干部们一声令下：“大组收工了！”这意味着，干塘捕鱼的任务完成了，塘里剩下的那么一点鱼，便是老百姓的了。早已等候多时的女人们，便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只要能将塘里的鱼弄上来，她们什么姿势和方法都可以用上去。一时之间，只见鱼塘之中，女人们千姿百

态，气象纷繁。这个被水浸透了的衣服里显现出了两个硕大的乳房，那个显现出了一个浑圆的臀部，这个糊得满脸都是稀泥，像个泥娃娃一般，那个在泥浆里跌了个斤斗，半天都爬不起来，把人的肚子都笑痛了。

在这种按捺不住的哄笑声里，大组的犯人们收工回监号了。回到监号里，还会笑着议论好久好久，说这个女人的乳房大，那个女人的屁股圆，监内的笑语让过年有了点气氛。

偏偏在这个时候，我又要再一次倒霉了。

干过鱼塘的第二、三天，正是监内晚点名的时候，邱队长忽然哗啦一声打开了监狱的大铁门，满脸铁青地走到我的面前：“尚建国，你把宣鼓室的房门钥匙给我。”在我的印象里，邱队长那天的头发很长，好像还有几根直直地竖了起来。我没有吭声，只是从裤子口袋里掏出一串钥匙递给了邱队长。

邱队长接过钥匙就噔噔噔地上楼，往宣鼓室的方向径直走去。全中队的犯人都等候在操场上，屏住等待。不一会儿，只听见邱队长在宣鼓室里怒气冲冲地吼叫了一嗓子：“值班组的人，快给我上来！”他吼声未落，值班组的人便跑步上去了好几个，一下子涌进了宣鼓室。片刻后，他们下来了，手里提溜着不少的东西，那是一些块头不小的鱼。将那些鱼送到门房外面之后，又一个一个默不作声地回到了操场上的队列里。人群里静得很，静得甚至于能听到空气中嗡嗡的声音。也许是过了几分钟，也许是过了好几个世纪，在一种令人窒息的煎熬之中，彭队长终于在门房那儿喊道：“尚建国，你过来！”

我来到了门房后，邱队长板着一张铁青的脸直截了当地逼问我：“尚建国，你给我说清楚，这些黑鱼是怎么回事儿？！”

邱队长指着一大堆黑鱼说。我一瞧，乖乖，好家伙，全是清一色的黑鱼，大小都在一、两斤之间，很匀称。估计有十来条。

看上去非常喜人。

邱队长暴跳如雷地吼叫道：“尚建国，你倒是给我说清楚，这些黑鱼到底是咋回事？怎么会跑进了你的宣鼓室？”

我那天自始至终都没有说出那些黑鱼的来龙去脉。我猜想，这些黑鱼也许是朱强弄进来的，他曾经给我打过招呼。但我不能肯定就是朱强弄进来的。再说，我无论如何都不能害朱强，把他的名字说出来。面对邱队长的质问，我承认了这些黑鱼是我的，却无法说清楚是如何将它们弄进监号的。在冲我发了一通大火之后，邱队长居然转换了一种语气对我说：

“尚建国，你知道吗？你这次能回家办理你父亲的丧事，那还不是我点了头才让你回去的嘛。如果我不同意，不管是监狱的哪个领导答应让你回家去，那也是没有用的。”

邱队长这话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还有他说这些话时的那种很特别的语气，似乎是有些推心置腑，语重心长。

黑鱼事件虎头蛇尾地结束了。开始的时候，是风狂雨骤，最后的结局却是和风细雨。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我探问过朱强。朱强说了好几种答案，其中的一种是，邱队长这是在启发我哩，他既然让我回家去奔了丧，我回到监狱后，就应该有所表示。投桃报李，这也是人之常情嘛。

至于是谁向干部通风报信，说宣鼓室里有黑鱼，朱强估计，这事儿不是夏涛干的，那就有可能是朱成干的，朱成这人最大的特点就是：凡事都喜欢向干部告密。

事情的真相到底如何，还需要进一步核实。

从宣鼓室里搜查出一大堆黑鱼，按照惯例，我是应该下大组劳动的。这是一种处罚，是对违监违纪的一种处罚。监内不能搞小生活，不能在监内烧、煮、烹、炒。更何况还把中队的鱼弄进

了监号。按照邱队长批评我的说法——这么多的黑鱼，连干部都不可能拿到家里去吃，只能是放在小伙房里干部们一起吃。而你们居然一下子弄到了这么多黑鱼，你们真是够可以的哩。到了最后，邱队长并没有让我下大组劳动。算是邱队长保了我一下。

事后，朱强不止一次地对我说：“尚建国，邱队长这是在拉拢你哩。你现在要么是对邱队长有所表示，向邱队长靠近；要么是更紧地贴近徐队长，与徐队长的关系搞得更好——这两条道路，你必须尽快选择其中的一条！”

朱强的分析颇有道理。从内心深处来说，我有些讨厌邱队长的为人。他奸诈狡猾，专横拔扈，还有些毒辣和残忍，常常干些敲诈勒索的事情。相比之下，我倒是觉得徐队长人不错。他给了我许多关怀和照顾，我家里人也曾经给他塞过红包，可他死活都不肯接受。他做人还算坦荡正直。在这种情况下，我能向邱队长靠拢吗？！我思来想去，最后决定，我不理邱队长那个茬。一切顺其自然。我该怎么样，还怎么样。如果我为此付出了什么代价，那也无所谓。我愿意承担由此带来的一切后果。

父亲去世的时候，按照当地的习俗，前来吊唁的人送了不少的锦缎被面。母亲也曾经跟我商量过：“建国，你看这样好不好，你爸爸死的时候，别人不是送了许多缎子被面吗？这些东西放在家里也没有什么用，就把它送给邱队长吧，免得邱队长一天到晚看你看不顺眼。”我说，算了吧，别劳那个神了。我硬是没有让我妈妈往邱队长的家里去。还有邱队长的老婆韩小琳，也是个很贪婪的人，门难进，脸难看，我可不愿意让母亲去碰一鼻子的灰。

这一年是个丰收年，到了年底，干部们都得到了一大笔奖金。特别是几个队长，他们的奖金都在一、两万元以上。犯人也有奖金，多的一、两百块钱，少的则是几十块钱。这算不错了。有了奖金，大家脸上都或多或少有那么一点儿笑容。

由于有了奖金，这一年的春节就过得不错。再没有出现六个肉丸子那样的风波。张振把猪也喂得很肥很肥，心也长出来了，肝也长出来了，排骨也长出来了。过年期间，这些东西大家也都吃到了。我还跟张振开玩笑说：“张振，你不仅把猪喂得膘肥体壮，而且把你自己也喂得膘肥体壮，像头猪似的！”

春节过得不错，但也滋长了两种不好的风气，一种是赌风，一种是偷风。手里有了点钱，有些人心里就烧得慌。手也痒。于是就赌，就偷。偷赌之风盛行的结果是，监内终于出了一桩轰动一时的大事。

事情是由菜园组的组长汪卫东引起的。

汪卫东是个眉眼鲜活的家伙，他笑眯眯的眼睛里常常会透露出一种得意洋洋的东西，平时爱冲动，心浮气躁。过年的那几天，他参加赌博，瘾头很大。只是他的手气不太好，不仅没有赢到钱，还搭进去了好几百块钱。他家距离监狱很近，来回也就二十多里路。春节过完之后，他决定回家去拿点钱，一来是还赌债，二来是想再赌一赌，好转败为胜。怀着这么一个念头，他在春节后的某一天早上，在把菜园组里的一些事情安排妥当后，便悄悄地上路回家了。人不知，鬼不觉，他从家里把钱拿到手之后，便回到了中队。这事他本来做得很缜密，然而总有透风的墙，还是有人向干部报告了这件事。节外生枝的是，菜园组的一个名叫黄宪昌的人，他本来并没有和汪卫东一起回家，可是他偏偏跟别人吹牛说他也跟着去了，去了一趟汪卫东的家。这本来都是犯人之间乱说的一些话，却被不知什么人报告给了干部。干部一听，这还得了？犯人擅自回家，说严重一点，就是脱逃。以前又不是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有犯人对组长说，他家住得很近，他可以回家去拿点钱。组长一听，能回去拿钱是好事呀，拿了钱还不是要孝敬组长的？组长便让那人回去了。谁知那人一去不回，跑掉了。

就为这事，组长不仅是下了大组，还被打了个皮开肉绽，打得他实在是受不了了，仿佛是一只被踩断了脊梁骨的狗似的躺在地上，四肢抽搐着，牙关里发出一阵阵野兽般的闷叫。批斗这个组长的时候，中队干部愤愤地说：“你这个狗杂种，连干部都没有权力让一个犯人回家，是谁给了你这么大的权力，你竟敢擅自放一个组员回家？！”这事过去还不是太久，大家还记忆犹新。这个汪卫东真是胆大包天，不仅自己回去了，而且还把一个组员也带回去了。这还得了？！

中队干部决定严肃处理此事。

晚点名的时候，邱队长、徐队长、胡队长等干部都到场了。所有的犯人都一排一排整整齐齐地蹲在那儿，一点儿也不敢动弹。这个时候，只听徐队长冷不丁地一声断喝：“汪卫东，黄宪昌，你们两个人给我站出来！”

那种断喝之声，听得人头皮发麻。蹲着的犯人队伍里，汪卫东先站了起来。见黄宪昌还没有动静，邱队长这时也吼了一声：“黄宪昌，快给我站出来！”

黄宪昌随即站了起来。两人到了干部面前，垂着手，耷拉着脑袋，乖乖地站在那儿，身体还绷得僵直僵直的。徐队长此时怒吼着说：“汪卫东，知道你犯了什么事吗？！”

平时洋洋自得的汪卫东此时说话却像个蚊子似的嗡嗡嗡，根本听不清在嘀咕什么。干部们又吼叫着问汪卫东犯了什么事，这一回汪卫东的声音大了许多：“我擅自回家了。”

汪卫东心里很明白，就是为了这档子事。正像有人向干部告密一样，也有人提前向他透风报信，说他今天晚上要受处罚。所以，他心里明镜似的，什么都知道。汪卫东一承认，等待他的就是手铐和电警棍。其间还用电警棍在他身体的好几个部位抽打了几下。汪卫东不怕打，却偏偏害怕电警棍，对电警棍的反应特别

敏感和强烈。所以，电警棍一杵到他某些部位，他就会杀猪般地嚎叫着，哭喊着：“邱队长、徐队长，我再也不敢了，我再也不敢了，我的妈呀，我再也不敢了……”那种撕心裂肺般的哭叫与求饶之声，让人听了，既觉得可怜，同时又觉得有些好笑。这与他平时的表现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连干部那边都有人笑出了声。

“你还有那么大的胆子吗？还敢擅自回家吗？”徐队长一边用电警棍在汪卫东的脖子上、后背上、大腿上等等地方杵着、戳着，一边怒吼着质问汪卫东。

“徐队长呀，我再也不敢了哇！”求饶之声拖着哭腔，还时不时地抱一抱徐队长的腿。意思是让徐队长手下留情。

徐队长这边正用电警棍在处理着鬼哭狼嚎的汪卫东，邱队长已经开始用另一个电警棍抽打黄宪昌了。让人惊讶的是，黄宪昌不吭一声，好像是无动于衷，一点反应都没有。黄宪昌与平日略微不同的是，他煞白着脸，嘴唇由于在忍受着什么而剧烈地颤抖着。黄宪昌这副样子真是把邱队长惹火了，气得脸上的肌肉直跳，都变了形。如果黄宪昌也像汪卫东那样哭着求饶的话，邱队长或许会放他一马，就此罢手。然而黄宪昌偏偏不哭，不告饶，这让邱队长恼怒透了，当下，邱队长紧咬牙齿恶狠狠地说：“哎哟，我还没有看见过骨头这么硬的！黄宪昌，你不怕电警棍是不是？苏干部，你去把绳子给我找来，我就不信这个邪，不信治服不了你？！我倒要看看你到底有多硬！”

邱队长叫喊的苏干部，就是跟着我回家替我父亲办理丧事的那个小干部苏越。不一会儿，苏越就不知从什么地方拿来了两根麻绳。不用邱队长吩咐，苏越自己就走上前去，用麻绳将黄宪昌的两只胳膊缠紧了，还将袖子也给扎死了……几乎是转眼工夫，苏越就将黄宪昌捆得像个粽子似的，手脚都动弹不了。

这个时候，朱强蹲在那儿悄悄地小声对我说：“这种捆法叫

做苏秦背剑，那麻绳很细，如果沾上水，捆的时间一长，黄宪昌那两只胳膊就算是废了，会落下一辈子的病根……”

只听邱队长在大声地对蹲在地上的全体犯人训话道：

“……我们就是要搞株连政策！他汪卫东跑回家了，作为汪卫东连环包夹人的黄宪昌，不是向干部报告这件事，而是也跟着去了，去了汪卫东的家。不要说黄宪昌也跟着去了汪卫东的家，就是黄宪昌没去，可他也没有向干部报告，我们这样处理他，也是应该的。我在这里再次强调一下连环包夹的重要性。以后不管是谁，他如果出了问题，那么，我就要找他前后的人，一样地严惩不贷。连环包夹，相互负责。谁让你不及时向干部报告呢？！如果说二号出了问题，我肯定也会找一号和三号的麻烦。我们就是要搞株连政策，让大家提高警惕相互监督！大家听见了没有？”

“听见了——”

众人齐声回答，喊声震天。

对汪卫东和黄宪昌的处理就算是告一段落了。徐队长当即宣布汪卫东下大组劳动，同时宣布由朱成担任菜园组的组长。操场上的人解散以后，朱强把我拉到一个僻静一点儿的角落里对我悄声说：“你知道吗？汪卫东回家拿钱这件事，一定是朱成给干部说的。朱成和汪卫东一直在明争暗斗，都想把对方整治一下。这一回，朱成借干部之手，总算是达到了他自己的目的——一方面把汪卫东踩下了大组，另一方面，他则取而代之，成了菜园组组长。他这么做不是一举两得吗？还有，我们那次黑鱼被收走，也肯定是朱成向邱队长报告的，不然的话，邱队长不会知道得那么清楚，搜查得那么准确。朱成一向喜欢向干部打小报告，以后我们得特别提防他一些。还有，找个机会我一定会好好修理修理他……”

这天晚上，刚刚才到十点钟，熄灯睡觉的哨子还没有吹响哩，

忽听监号楼房前面的水泥地上传来一声沉重而迟钝的闷响：

“咚——”响得怪且生硬，让人听后觉得毛骨悚然。

值班员突然怪异地惊叫了起来：“不好了，黄宪昌跳楼了——”那种尖锐的喊声一下子将夜空撕破了一个大口子。当我们跑到黄宪昌跳楼的现场去的时候，黄宪昌早被值班人员抬到监号的大铁门外面去了。估计立马就被送往监狱的医院去了。

事后，终于将黄宪昌跳楼的原因搞清楚了：他是受了冤枉，并没有去汪卫东的家里，他只是开玩笑对别人说他去了。他是因受冤枉而跳了楼。从二楼跳下来，双脚首先落地，虽然没有摔死，腿却被摔断了。

监号的楼房是一幢二层楼，所有的犯人都住在一楼，二楼则设有会议室、活动室、卫生室、图书室、宣鼓室、教室、被服室、保管室、储藏室、广播室等。从那以后，中队做出决定——一个人不能上二楼。要上，得一个互监小组一起上。这也就是说，要三五个人一起去，这样便于相互监督，相互负责，以防类似黄宪昌跳楼这样的事件再度发生。中队还做出严格的规定：从现在开始起，谁若是打牌赌博，一经发现，处理起来绝不手下留情。是犯人骨干的，要下大组劳动，一年之内不能再次得到照顾和启用；是一般组员的，该严管的严管，该关禁闭的关禁闭……黄宪昌跳楼，都是监内打牌赌博惹的祸。如果不是汪卫东赌博输了钱要回家去取，那就不会发生后面的一系列事情。至于黄宪昌跳楼的具体责任，那是谁也不会去追究的。

有一天夜里，朱成在睡梦中忽然被不知是什么人给暴打了一餐，打得他懵里懵咚地喊“打死人了，打死人了——”门房干部进来问是谁打了朱成？大家都说没有谁打他，是他自己在梦游，半夜里乱跑乱喊的。

事后，干部那边也没有再追查此事。据说，干部现在已经开

始有些冷落朱成了。原因是朱成谎报军情，黄宪昌并没有去汪卫东的家里，可是，朱成却打小报告说黄宪昌也去了，以至于造成了黄宪昌跳楼自杀。

呈报减刑

每年的三月份，在过完春节，开始大农忙之际，各个中队都要往上呈报一批减刑材料。对犯人们来说，这是一种鼓励，同时也是一种制约——大家要好好干，不能出差错。要在希望中改造。

中队进行动员的时候，徐队长一方面挥着他那粗壮而结实的胳膊，一方面铿锵有力地说：

“由于二队最近出了黄宪昌跳楼自杀这样相当严重的恶劣事件，因此，这一次大队给我们中队的减刑指标会减少。中队的意见是，谁的表现好，就为谁呈报减刑材料。特别是今年春节期间的表现，谁要是打了牌，赌了博，喝了酒，打了架……凡是有违监违纪的，不管他的百分考核上的分数是不是够了，不管他平时的表现如何，不管他是否够了减刑条件，中队都不会为这类人呈报减刑材料的。这就是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汪卫东这次就别想这个事了，黄宪昌也是，他现在还住在监狱的医院里，等他回到中队来，中队还要组织批斗会，对他的思想和行为进行狠狠的批斗！他想跳楼自杀，想逃避改造，想威胁干部，对他这样的人，我们就是要帮助他提高认识，端正思想，不然的话，他就会掉队。等一会儿解散以后，大家可以相互之间进行检举揭发。”

动员结束后，大家回到各自的小组写检举揭发材料，不能交空白纸。这只是一种走过场，由于大家都在一个小组里，碍于情面，不好写什么，基本上写的都是一些乱七八糟的废话。可是，等到各自有了单独写东西的机会以后，那些很有份量、很有杀伤

力的检举揭发材料便会像阵阵的雪片一样直接飞到干部的手中。于是乎，有些人的减刑希望便会葬送。

通常的减刑程序是，在中队是三榜定案。一是各小组讨论通过，二是监内的积委会讨论通过，三是干部大会上讨论通过。最后到底为哪些人呈报减刑材料，由中队干部说了算。中队再呈报给大队。大队签了意见再呈报给监狱狱政科。狱政科签了意见再呈报给法庭。法庭签了意见最后再呈报给沙河市中级法院，由沙河市中院最后裁定，下达减刑通知书。这么一来，从最初写减刑材料到最后下达减刑通知书，前后大约需要三个月左右的时间。

这一次呈报减刑材料，也有我的份。按照监狱定下的规矩，刑期五年以下的，考核期为一年，百分考核的分数要达到一百八十分；刑期五年以上的，考核期为一年半，百分考核的分数要达到两百四十分。我的刑期是十二年，我来到监狱已经快两年了，足够减刑的条件了。徐队长找到我说：

“尚建国，你这次够减刑的条件了，中队要为你呈报减刑材料。你爸爸还活着的时候为你跑什么保释，结果走了弯路，耽搁了时间。这次中队为你呈报减刑材料，希望你也要多为中队做点工作。黄宪昌跳楼的事，是有很深刻教训的。春节期间，监号里打牌赌博，你们没有好好地制止，及时向干部反映。特别是在黄宪昌的问题上，只是听人反映说他去了汪卫东的家里，却没有调查落实一番。黄宪昌很快就要从医院里回到中队了，黄宪昌回到中队以后，我希望你做一做他的思想工作，打消他的一些糊涂认识和观念。”

黄宪昌从监狱医院回来以后，我找黄宪昌聊了好几回。一开始，黄宪昌不大说话，他常常是仰卧在床上，脑袋下面垫着厚厚的衣服，也没有枕头，两条腿上着石膏，打着绷带，甚至还用绷带将他那摔断了的腿吊起来，高高地吊在铁床的中间床衬子上。

俗话说，伤筋动骨一百天。黄宪昌目前还下不了床，只能躺在那儿。在我与他闲聊了几次以后，他的话匣子终于打开了。他说：

“尚宣鼓，是我一时糊涂，当时只觉得自己受了冤枉，明明没有去汪卫东的家里，却受了那么重的处罚，把我反剪着吊起来用电警棍抽打，我想不通，就起了轻生的念头。当时我真想从二楼跳下来，一头栽在地上，摔死算了。到了医院，我还是想不通。后来，是别人给我讲了一个故事，我这才放弃了死的想法。”

“别人给你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好奇心使我不由地脱口问道。

“也是在监狱医院里的时候，大家闲着无聊，那种滋味特别难受，就胡乱讲一些故事。一个从监狱砖瓦厂去的犯人讲了段故事，那可是真实的事情——他们砖瓦厂比我们农业中队还要糟糕，一年四季，一天到晚，就圈养在那高墙电网之内，像一头猪似的，哪里也去不了。不像我们农业中队，一出工，就可以去大田里，有时候，还可以去南头王嫂子那儿看看花花世界。砖瓦厂的犯人哪里也去不了，只能乖乖地呆在那儿。可他们都是活生生的大男人呀，都有七情六欲。没有女人，当然是很痛苦了。偏偏他们监号那边有一个后门，虽然常年锁着门，却留有一道窄窄的门缝。故事也就是从这里发生的。他们那儿周围的农村妇女，有风骚一些的，就在铁门的那一边脱下裤子，让砖瓦厂里的犯人看那一道迷人的风景。每看一次，一个人给十块钱。听了这个故事后，我就想，我还很年轻，还没有结过婚，还非常渴望抱一抱女人那火烫火烫的身体哩。尚宣鼓，你想呐，连砖瓦厂里的犯人在比我们更恶劣的环境里都还那么渴望生活，渴望女人，我自己更要好好地活着出去，找一个好老婆，还要生孩子。”

这个故事把我也感动了，生活尽管是如此残酷，人们的渴望却宛如那沙漠上的芨芨草一样顽强而坚韧。我想，黄宪昌对我说

的应该是真心话，他为此再也不会轻易地放弃自己的生命了。中队干部一直害怕他会再度自杀，所以，再三叮嘱值班组的人，一定要二十四个小时看护好他，不能有半点闪失。

再一次与黄宪昌谈到女人这个话题时，黄宪昌问我：“尚宣鼓，你学问好，有文化，是一个作家诗人，从深圳那么一个大地方来。你说说，对女人的问题，你怎么看，怎么解决？”

我对黄宪昌讲到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讲到了其中的一个概念——升华，讲到我把精力沉浸到了读书与写作上，讲到了这种转移会获得一种力量，使我忘却女人而沉迷在自己精神国度里，也不管黄宪昌是否听得懂，我就这么一股脑儿地讲了下来。

过了两天，徐队长问我给黄宪昌做思想工作做得怎么样了，我说，黄宪昌再也不会自杀了。徐队长半信半疑地说，黄宪昌的思想会转化得这么快？我说，他不会自杀了。我敢保证！

“尚建国，你敢保证？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事。要是黄宪昌再出了什么事情，我可是要把你的减刑材料给抽回来！你是用什么方法做黄宪昌的思想工作，让他的思想得到转变的？还这么快？”

我本来想对徐队长说一说那个苦涩而甜蜜的门缝，我甚至还想对徐队长说一说弗洛伊德，可是到最后，我只是说，我对黄宪昌说了亲情、友情和爱情，这些人间珍贵的东西打动了，使他渴望着有一天能走出监狱的大门，回归到社会上，去成个家，干一点有价值的事情。

徐队长说，如果黄宪昌再干出跳楼自杀这类轻生的事情，那么就要抽回我的减刑材料。这话说得挺重的。减一次刑很不容易。这一次为我呈报减刑材料时，我的自我总结材料是艾奇帮我写的。一般说来都是文盲才请人写材料，还要至少给别人送一条香烟，那些有文化的犯人才会帮你写。我是一个大大的例外。不知怎么搞的，我就是不想写。心里空茫茫的——父亲的死，刘金保的骗，

从天而降的灾祸，一落千丈的命运，遥不可及的深圳，迫在眉睫的监狱，所有这些都在我的眼前打转，让我头昏眼花。

减刑的事情并不那么容易，任何一个环节卡一下，都会让你的减刑受阻，乃至搁浅。这其中最重要的环节是江南法庭这一关。基本上是它说了算。因此，减刑假释，法庭的权力最大，找它开后门、走关系的人也最多。

我的减刑材料由中队呈报上去以后，母亲来监狱探望过我一次。谈到减刑这个问题时，母亲一再叮嘱说，要慎重，千万不能有半点闪失，不然，就对不起你的爸爸，说到这儿，母亲再次伤心得泪流满面。母亲以前虽然清瘦，但身体却相当扎实。自从父亲去世后，她的身体状况明显地差了许多，满头是华发斑斑，目光也显得灰浊了，不似往年那般炯明泛亮。特别是每次一提到父亲，母亲就会潸然泪下，甚至是哽咽得说不出话来。母亲说，有一个叫邓光百的律师，很关心我的事情。这个邓光百认识江南法庭的人，能通过关系为我多减一点刑。

我说：“算了吧！在刘金保身上得到的教训还不够深刻吗？这种事没有必要再花冤枉钱。”

母亲这次却固执得很，态度坚决地说，一定要为我多减一点刑，家里花点钱就花点钱。是人重要呢？还是钱重要呢？

母亲后来果然去找那个邓光百律师。邓光百又去找了那个法庭的什么人。这样七拐八弯，据说是下了一些功夫。等减刑通知书下来时，我减了一年。减刑的幅度不算大，但也不算小。母亲说，为了减这一年，他们给法庭的人塞了二千元的红包。我心里则在暗暗地想——这是何必哟？绕了那么大的一个弯子，费了那么大的劲儿，只减了一年；要是就地找人，只需要花费一千元，就能够减一年了。人家是这样标明价码的嘛。

监内很多人的家人都是这样。每一次要减刑假释的时候，家

里的人都会四处张罗，托关系找门路。如果有人关照的话，事情会好办得多。每逢这个时候，有些人的口袋里便会塞得满满的，那脸上的笑容也平添了几分得意。正因为这样，明明够减刑条件的，却被一拖再拖。有这样问题或是那样毛病的，却是说减就减，减刑的幅度还非常大，让人觉得莫名其妙。监狱里的事往往就是这样。按照烟鬼屈高林的说法是，要有人、有钱、有关系。若是没有这三样东西，办起事来就特别难。

黄宪昌到后来果然没有再寻死觅活的了。中队还是给他呈报了减刑材料。

对二队来说，这一年的头等大事是监狱级规范化中队达标。在此之前，就大队这个范围来说，已经有一队、五队达标了。也就是说犯人的“三课学习”、行为规范、监规队纪、环境卫生、精神面貌等等方面，都已达到了监狱规定的要求与指标。各个中队的干部都相互攀比着、竞争着，都想走在规范化中队的前列。

二队更是铆足了劲头。动员的时候，中队干部说，二队的硬件设施虽然差一些，监号的围墙不够高；楼房很破旧了，需要维修；破烂不堪的木床需要换成铁床；课桌课椅也要换了；还有空地上的那些荒草和坑坑洼洼，都需要铲除和填平……这些硬件设施是差了一些，但我们不能气馁，要奋起直追，赶超其它的中队。在软件方面，我们一定要比任何一个中队都要做得好。这不需要投资，不需要花钱。只要我们大家一起努力，就一定会搞好，会搞出成绩来。到了时候，谁要是拖了中队的后腿，我就把他的腿拧下来，我说到做到……

为了争取达标，中队先制定了一系列的措施，譬如说，文明小组竞赛等等。文明小组竞赛包含许多内容，在监管改造方面有一——“大四无”，即无脱逃、无非正常死亡、无重大案件、无重大事故；“小四无”，即无打架斗殴、无打牌赌博、无酗酒闹事、

无敲诈勒索；还有若干无重大违纪现象；一般违纪现象；另外，在落实连环包夹、行为养成、三大现场管理、内务卫生、事务犯履职、参加学习等等方面都有相应的规定和要求。生产改造方面则有生产劳动、安全生产、防中暑中毒、防疫病流行等内容。

正在二队铆足了劲头积极准备规范化中队达标之际，却忽然从对面的五队传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五队跑了两个犯人！

据说是五队的卫生员带着一个同犯去大队卫生所看病，却在路上突然上了汽车跑了。等到发现之时，这两个人早已跑得无影无踪了。就为这件事情，五队的规范化中队被取消了。

忽然有一天，又从五队传来了更加惊人的消息——跑掉的两个人一个在武汉被抓，另一个则被当场击毙了！

原来，五队那两个人跑掉以后，监狱迅速组织追捕。五队负责监管改造的年队长也跟着一起去追捕了。在他的手下跑了两个人，他当即被停了职。若是两名逃跑的犯人抓不回来，那么，他不仅会被撤职，甚至于还会被扒掉警服，受到开除的处分。

五队的那个犯人卫生员是武汉人。根据以往的经验，监狱追捕队在武汉他的家附近布阵蹲点，守了一、两个月，可是没有任何线索和收获。眼看着年队长是一天比一天消瘦，满脸的凄苦与沮丧。时间拖得太长了，监狱追捕队只好收兵回营，再商良策。这一天，就要离开武汉了，大家的心里都不是滋味儿。已经开车上路了，年队长却突然要车停下来，要在街边上买点东西。武汉是个大城市，满街都是人，满街都是车。偏偏凑巧，他没走几步，竟然在街对面众多的人之中隐约看见了那个卫生员的模糊身影。年队长当即跟了上去，逼近了，一声猛喝，声震云天。那个卫生员当即吓傻了，一动也不动，就这么让年队长逮了个正着。问还有一个呢？卫生员说，在前面买东西。年队长把卫生员带到了车上，拿着手枪就和其他的追捕队员一起去逮那个逃犯。眼看着围

拢了，惊天动地一声断喝，喊着那个人的名字。那人一看，是监狱的追捕干警，撒腿就跑。年队长把手枪举了起来，“怦”的一下，他立马倒下了，再也无法动弹了。

抓到的人和死了的人被弄回来以后，还在各个中队举行了巡回批斗。汽车开到各个中队的田边地头，亮相示众，那个尸体站不起来，就让卫生员把尸体扶起来给大家看，并且还说：“瞧，这就是脱逃者的下场！”

敲山震虎，警钟长鸣，巡回批斗，这的确收到了相当的效果。

队列训练与“三课”教育

比起每年的半年评审和年终评审进行的队列训练，这一次为了达标而进行的队列训练则更加严格，甚至到了严酷的地步。

在队列训练之前，邱队长讲了一番话。“大家都知道，五队那个卫生员是个大学生，自以为智商很高，干部玩不过他。在他们脱逃之前，他就对别的犯人说，如果他跑了，干部无论如何都抓不住他。他聪明，会想绝招，干部好像斗不过他。结果呢，机关算尽太聪明，还不是给逮回来了。法网恢恢，疏而不漏。”

队列训练由苏越担任指挥，发布口令：“立正，向右看齐——”。白天整天劳动，干的是繁重的体力活。到了晚上，已经是八、九点钟，早已人困马乏，还要出操，真叫人吃不消。训练了好长时间，可是这队伍就是走不整齐，脚步零乱，姿势别扭，精神萎靡。喊口号有气无力，唱歌更是乱七八糟，没有一点儿气势，像是三天没有吃饭，打了败仗的残兵似的。邱队长和徐队长都发火了。只听邱队长一声怒吼：

“立定！算了算了，今天晚上不让你们出操了。你们就给我站在那儿。站，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吧？就给我站在那儿。一个小

时不行，给我站两个小时，两个小时不行，给我站三个小时。我也不打你们，也不骂你们。就让你们给我站在那儿。谁要是敢动一动，别怪我不客气。从现在开始，我也陪着你们站，给你们计时！”

整个队伍立马静了下来，谁也不敢动，就这么静静地站在操场上，一点儿声息也没有。

时间在寂静之中悄悄地过去。十分钟。二十分钟。三十分钟。

干部都没有离开现场。不过他们并不是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而是围绕着整个队伍转圈。一圈又一圈，慢慢地转着，像是在欣赏着什么，又像是在等待着什么。

一开始还好，可是时间一长，人就扛不住了。先是两腿发麻，身体发软，脸色也白了，浑身流汗，流的是虚汗，一股一股地流。这时，大家才明白过来，走一走是多么好呀！半个多小时以前，大家还在走着，血脉畅通地走着。邱队长一声怒吼，大家不再走了，只能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时时刻刻都得提醒着自己：不能动，千万不能动！否则，就会受到严厉的惩罚，甚至于有可能会关禁闭！

三十分钟。四十分钟。五十分钟。一个小时。

到了一个小时之后，许多人是支撑不住了。豆大的汗珠直往外渗，脸色煞白，血液流不动了，干稠得像要凝固似的。双腿一会儿轻得发飘犹如羽毛，一会儿又重得如同铅块似的。“扑通”一声，终于有人摔倒在地上，僵僵的，硬硬的，像块石头落在地上，发出的声音很脆，也很闷。

邱队长抬腕一瞅手表说：“也就这么一点能耐么！才站了一个多小时嘛。现在我问你们，是愿意出操呢，还是愿意就这么站在这儿？”

“愿意出操！”大家不假思索，异口同声地回答道。

原以为邱队长会再度发发脾气，意外的是，他这个时候却笑了。在犯人面前邱队长一向不轻易笑，如果他笑了，这就表明，他的情绪不错。

“那好，现在休息一会儿，再出操的时候，谁要是还走不好的话，那我就不客气了。你们自己掂量着办吧！解散！”

一说解散，给大家的感觉简直是解放。刚才倒下去的人被搀扶了起来，慢慢地活动活动浑身的筋骨，这才能一步一步挪动着行走。大家都在揉着膝盖，扭着脚踝，还得放松紧张了半天的神经，苦苦地笑一下。

二队的出操有了明显的进步，再唱歌、喊番号的时候，也很有精神和气势了。干部心里也有些小小的得意，便请大队的领导来二队看一看。一来是想让大队的干部提前检阅，瞅一瞅能否符合达标的要求；二来也是想炫耀炫耀，在大队干部面前露一手。

这一天，来二队看队列训练的大队领导是洪大成。洪大成在大队负责监管改造工作。他个头高大，虽是农民出身，后来上了警校，毕业多年，如今戴一副金色镶边眼镜，看样子仪表堂堂，很有风度，身上再也没有土里土气的痕迹了。洪大成有一种爱好，喜欢收集古钱币。他曾找过我，说是向我讨教有关古钱币的知识。遗憾的是，我对古钱币了解得不多，算是一个门外汉。不过，我还是尽可能地说了一点自己的想法。我的印象中，他似乎不是个贪图钱财的人。

洪大成来到二队观看队列训练。因为他是大队领导，他一到，中队的干部立马紧张起来，迅速将队伍集合在操场上。苏越张大嘴巴，特别卖力地吼叫着：

“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队伍里犯人们的喊声高亢、激越、短促、有力，应和着苏越的口令声。

这时，洪大成站在操场的北边，一手夹着香烟，一手端着茶杯，还时不时地往东或是往西走上两步。就在苏越带着整个队伍来到他的面前，准备要向他报告的时候，只见洪大成突然将手中的茶杯往地上一摔，怒不可遏地说道：

“真不像话！你们这二队搞的是什么名堂？！这哪里是队列训练，简直像是在放鸭子！乱七八糟，不成体统。你们这个样子还想达标啊？我看你们二队是硬件不硬，软件太软。距离达标的要求差得还太远太远哩……”

洪大成的一席话，把个邱队长说得恨不得能找个地缝钻进去。他脸上的皱纹好像一下子多了起来，那张瘦瘦的脸开始泛出灰色，后来又泛出黑色。嘴唇抖动着想张开来说点什么，但却迟疑着，到末了，还是像关闭大门一样，将他那两片看起来很倔强的薄嘴唇关住了。

洪大成离开二队后，邱队长倒是没有发脾气，只是咬牙切齿地说：“二队一定要达标！看来光是我们自己关起门来搞训练还不行，得去请武警来指挥训练。我就不信，二队的队列训练不能达标！”

武警来指挥队列训练，那气氛更加紧张，要求也更加严厉。中队干部天天与犯人在一块儿，朝夕相处，时间长了，在处理一些问题的时候，心里面总会掂量掂量。有些干部回到家里，他的老婆往往会告诫他：“事情不要做得太过分了，打人不要下手太重。他们都是有期徒刑的犯人，总会回家的。而你们呢，是无期的，一辈子都要呆在这儿。说不定哪天就会撞在别人的手里。”个别脾气太暴躁的干部，打犯人打得太凶了，那犯人刑满后，就会找机会出出气。因此，干部在处理一些问题时，或多或少都会打点折扣，留点余地。

武警则不然，他们好像有了用武之地，训练与管理的手段更

是异乎严厉，皮带抽得啪啪直响，有时候皮带抽在坐骨神经上，那种滋味真是说不出口。二队要争取达标，除了要搞好队列训练之外，还有许多的事情要刻不容缓地完成。

譬如说，在生活这方面，从早上起床开始，就必须做到——听到起床哨声，得迅速起床，整理内务，被褥叠放要求棱角分明、大小、高低要符合标准，摆放整齐划一。

叠被子这件事情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可是极不寻常。监内发放的一般都是破旧的棉被，有长有短，有厚有薄，有的棉被上面还有大大小小的窟窿。这样的棉絮做的被子，要想把它叠得像豆腐块似的，既要有棱有角，还要大小高低一致，那真是不简单。为此，不知有多少人挨过打，受过罚。有很长一段时间，如何叠被子成了监内谈虎色变的焦点问题。监内每天都要检查每个人的被子是不是叠得符合要求。

吃过早饭出工以后，监内没有什么人了，卫生员于波便开始检查卫生。被子叠得好不好，是检查卫生的一项重要内容。于波是个大块头，体格魁梧，身形健壮。他每天坚持做一百个俯卧撑。还常常甩甩单双杠，举一举哑铃什么的。自从五队的卫生员脱逃以后，干部们就特别敏感。曾有一个时期，徐队长见于波把身体锻炼得那么好，还以为于波是想伺机越狱哩。徐队长找于波谈了好几次话，这才放了心。徐队长还一再勉励于波不要背什么思想包袱，并不是五队的卫生员脱逃了，所有的卫生员都会脱逃，要他在监内好好地发挥作用，替干部分忧。干部的信任，让于波热血沸腾。没有干部在场的时候，他检查卫生更是极其负责，甚至有些挑剔。被子光有角没有棱不行，所谓的“棱”，就是直挺挺的一条线，像刀砍斧削似的，不能歪斜，不能塌陷。不论是正面的“棱”，还是侧面的“棱”，都得这样。其实，光用手是很难做出这等效果的。要用工具，譬如说，要用木夹子狠狠地夹；

要在被子里面塞进硬纸板，将整个被子支撑起来；要用硬硬的呢毯子做填充物，将被子托起来……，所有这些，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得到的，因此，总有人的被子叠得不那么好，不符合规定的要求。在被检查出来以后，于波便将这些没有叠好被子的人的名单公布在“曝光台”上。

收工后，劳动犯人一回到监内，第一件事情就是去“曝光台”跟前，看看自己是不是金榜题名了。要是榜上有名，那日子就不好过了。先是在小组里处罚一家伙，或是打，或是骂，或是勾九十度。等到晚上点名了，全中队的人集中在操场上，各组的人马排列得整整齐齐，都蹲在那儿，再将那些没有叠好被子的人一个一个叫到前面来，或是勾九十度，或是挂牌子，或是亮相，或是打一顿，或是做检讨，或是受批斗，事后还要扣分，既扣自己百分考核上的分，同时还要扣小组里文明小组竞赛的分。各个组的组长对这一点最恼火，因为这影响了小组在文明小组竞赛方面的成绩。所以，在中队晚点名时受到处罚的人，回到各自的小组里上学习时，还会受到再一次的处理。

由此可见，叠被子并不是一件小事，弄得不好，就会被打个鼻青脸肿眼歪嘴斜。因着这个缘故，许多人特别害怕叠被子，好像那被子就是烫手的烙铁似的。为此，在监内出现了一种所谓的“看被”，即从来不打开盖在自己的身体上，而只是像贡品一般摆放在那儿，专供检查之用。到了寒冷的冬天，躺在冷冰冰的床上，即使浑身冻得瑟瑟发抖，牙齿咯巴咯巴响，那被子也是不敢打开的。不然，早上的时间太短促，无法把被子叠得好，那拳脚又会再次上身。有的人不能把被子打开盖了，因为他压根儿就叠不出那么好的被子，那是他请人给叠的。

起床叠好被子之后，紧接着是去后面的水池子里洗漱。监号楼的后面有三个水池子。大一点的水池子里的水要干净一些，紧

挨着的两个水池小一点，里面的水质也差一点，那水都是从大池子里流过去的。洗漱的时候，能很明显地看出犯人之间的等级差别。管点事、负点责的事务犯，通常都在大池子里洗漱；略有点名堂的，在第二个池子里洗漱；老实巴交的所谓栽模子，就只能在第三个池子里将就了。

洗漱完毕后用餐。有时候饭还没有吃完，那出工的钟声就敲响。于是乎，许多让人啼笑皆非的场面就出现了。有的人一边往嘴里猛塞着饭，一边跑去集合；有的人刚吃完饭，想屙泡尿，还只屙了半截儿，就得提着裤子飞跑；有的人做卫生，垃圾还没有弄干净，只得将那些垃圾装在自己的身上，要是留在监内，让卫生员发现了，那还不要打断他的脊椎骨？……

点名报数，清查人头。组长们向门房干部打着报告：“报告某某干部，一组应出工人数多少多少，实出工人数多少多少，监内杂工几个，病号几个，报告完毕，请指示！”

门房干部会喊一嗓子：

“一组出来！”

“二组出来！”

“三组出来！”

“四组……”

人呼呼啦啦地出来了，到了田里，就开始干活。一年四季都干些什么农活呢？有一首叫做《十二月》的歌谣，对此作了些粗略的勾勒与描绘。

《十二月》

正月里是新年，
难兄难弟来团圆。

不准喝酒不准抽烟，
我的哥们哪，
老子恨不得把桌子掀！

二月里不轻闲，
要到麦田去打药。
桶数不能打少了，
我的哥们哪，
回到监号要兑现！

三月里来不好想，
营养钵打得嘭嘭响。
一天三十米不能少，
我的哥们哪，
不然你就要遭殃！

四月里来点棉籽，
一窝只点两颗籽。
一不小心慌了神，
我的哥们哪，
竹片把屁股都打紫！

五月里来栽营养钵，
我到田里去挖窝。
两米九窝不少不多，
我的哥们哪，
不然又要吃家伙！

六月里来正是夏，
我去田里把秧插。
一天到晚满身泥巴，
我的哥们哪，
再好的身体都会垮！

七月里来打棉田药，
中毒走路都睡着。
我找干部，他说没办法，
我的哥们哪，
他还说老子在装麻！

八月里来薅棉花草，
一天到晚不伸腰。
背上的皮肤晒得全烂掉，
我的哥们哪，
这种滋味儿受不了！

九月里来太阳大，
要去稻田里把沟挖。
一天到晚汗往下垮
我的哥们哪，
搞得我满身起疙瘩！

十月里来要收割，
白天田里去捡棉花。

一百二十斤任务不能少，
我的哥们哪，
晚上加班要扛包！

十一月里天寒冷，
拉了棉桃拔棉梗。
从北到南不能落后，
我的哥们哪，
不然要把我打个够！

十二月里到年底，
政治整训整纪律。
年终评审评积极，
我的哥们哪，
评来评去没有我！

从歌谣不难看出，劳动非常繁重和艰辛。一天的时光在太阳渐渐西沉之际告一段落。农闲的时候收工早一点，农忙时收工就难说了，或是在太阳下山以后，或是在天黑以后，甚至是在半夜里。譬如说，插秧的时候，如果哪个组没有完成当日的插秧任务，那么晚上就得留在田里打着火把继续插。再譬如说，到了十月份收割稻谷的时候，犯人们白天要在田里捡棉花，通常的定额是每人每天要捡一百二十斤，到了晚上则要加班入库，即将从地里收回来的稻谷在中队的谷场上扬好了，装好了，打包，扛包，送到大队的粮食仓库里。等到所有的活忙完了，回到监号之时往往已是半夜了，可是天一亮，又得起床到大田里去忙活。

不管有多忙，不管有多累，一个中队要想达标，那行为养成

是十分重要的。这里面的要求很多，譬如说，当干部进入监舍时，犯人要自动起立，不得躺卧偃坐。嘴里还要高声大喊：“干部——好”异口同声，喊出气势和节奏来。

行为养成的内容还包括——听到干部呼唤时，犯人应立即答“到”，并迅速到距干部两米处站好，听候指令。干部问话时，要立正回答。接受干部指令后，立即答“是”。干部讲话过程中，不准随便插嘴抢话。向干部陈述或回答问题时，不准指手划脚。有事需要进干部办公室时，应喊“报告”，得到允许后方可进入。在野外劳动现场有事必须找干部时，应在五米以外止步报告。曾经有个犯人在监内打架，要送去严管，大队特警队开车来接这个犯人，这个犯人在行为养成的各个方面做得还不错，尽管如此，他还是挨了一顿打，原因是，他在上车的时候没有向大队的那辆吉普车打报告，也就是没有冲着吉普车喊一声“报告——”。行为养成的内容还有，犯人与干部同一方向行进时，不得与干部擦肩并行。在较窄的路上相遇时，要自动停步，靠边让路，放下手持的工具，待干部走过五米后再起步。

落实连环包夹制度也很重要，它要求犯人的床铺、抽屉、出收工的队列、学习、劳动、娱乐时的位置必须与其连环包夹号顺序一致；相互之间保持有效的距离；每隔十分钟要点一次名；集中居住，集中就寝。出收工要求队列整齐；进出监要整队；组长的报告词要规范；喊口号、唱歌要声音宏亮；工具室、杂务摊点无衣物、无生活用品。所有这些要求必须做到的条款，首先是要会背。如果抽查时背诵不出来，将会受到惩罚。后来的要求渐渐有些松动，六十岁以上的犯人可以马虎一些，文盲也可以少背一点儿。

中队要达标，队列训练可以强攻猛治，短时间内见效，行为养成则不是三天两晨可以出成果的。关键是一个“养”字，得日

积月累，一点一滴地下功夫。

中队要想达标，还必须在“三课”教育这方面过关。“三课”指的是政治课、文化课、技术课。监狱虽说一直在抓“三课教育”，“三课”教育是那种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的东西，仅仅是个摆设而已。然而，达标验收的时候，这“三课”教育也是一项重要的指标，缺了它还不行。只好临时抱佛脚了。

在突击搞“三课”教育的那些日日夜夜里，我清楚地记得，许多人的眼睛都熬红了，走路都打着瞌睡。如果说，要是有些效果倒也罢了，问题是，压根儿就没有什么效果，倒是有许多让人哭笑不得的事情发生。

我觉得最典型的事例是，像类似李金春这样的文盲，除了自己的名字本来就是大字不识几个。李金春入狱，是因为他偷割电缆电线去卖铜卖铁，被送到监狱来劳改的。他们是一个盗窃团伙，里面的成员差不多全都是文盲。也不知是听谁说变压器等等电力设备里面有铜有铁，他们便合起伙来去偷盗。一个非常笨重的变压器里面并没有多少铜，偷出来也卖不了几个钱，也就是百十来块钱吧。在强盗这个行当里，他们也算是很蠢很笨的那种小偷了。在这个盗窃团伙里，李金春也仅仅跟着去了一、两回，在一起喝过点儿酒。他们被抓住后，判得很重，李金春算是判得最轻的。

我知道李金春与秋霞相好，就跟他开玩笑：

“李金春，不是有这么一句话么——好女不嫁文盲汉。你要再这么文盲下去的话，人家秋霞可是不会嫁给你哩。”

李金春很轻俏地抖动着一腿说：“她秋霞不也是文盲么？她还会嫌弃我吗？嗨，别说她不要我，到时候我要不要她，还得好好考虑考虑哩。”

在突击搞“三课”教育的那些日子里，李金春一开始不肯做作业，说是他做不了。文化教员艾奇原则性很强，一口一声地说：

“你怎么做不了？我把作业的答案都写在大会议室的黑板上了，你只是去抄一抄嘛。你难道连抄一遍都不会抄吗？”

一个让去做作业，一个不肯。艾奇气鼓鼓地说：“李金春，我告诉你，并不是我硬要让你做什么作业，是干部安排的。你如果不肯做的话，干部自然会找你的麻烦。到时候，你可不要怪我！”

李金春火了：“你不要拿干部来压老子，老子不吃你这一套！你不就是一个逼犯子吗？你有什么权力来管我？！”

李金春的一席话，说得艾奇的脸都气得发紫了。艾奇以前是个农村中学的老师，他是因为性犯罪才坐的牢。他有一次从女学生的寝室窗户跟前经过。那窗户上糊的纸破了一小条儿，艾奇当时不知是哪根神经搭错了，就往里面瞅了瞅，看见有个女生赤裸着身体像是在洗澡的样子。那个女学生太白了，把艾奇的眼睛都给耀花了。他就守在那儿，一直到那个女学生从寝室里走出来，原来她是他的学生严雄菊。后来他与严雄菊有了暧昧的关系。“奸污女学生，性犯罪”便成了他坐牢时的罪名。进监狱以后，他学会了纹身，用那酒精烧过的针扎在手臂的皮肤上，纹下了严雄菊的名字，这三个字的地方实际上是三块丑陋的伤疤。他如今仿佛倍加思念严雄菊，可是，这严雄菊却早已不知去了什么地方。

李金春骂艾奇是逼犯子，也就是性犯罪的意思，没有太离谱。在监狱里有一种不成文的规矩，那就是性犯罪的地位最卑贱，最让人瞧不起。李金春这么一骂，艾奇也恼怒了。两人针尖对麦芒，弄到最后，李金春居然把作业本子都给撕烂了，还口口声声地咒骂道：“艾奇，你个婊子养的，老子就是不做作业，你能把老子怎么样？有本事，你去找干部告状去呀！”

艾奇向干部汇报了此事。不用说，等待李金春的是非常严厉的处罚——他那脱得光溜溜的脊背上被大拇指粗细的绳子横七竖八地捆绑了好多道。到后来，他干渴了，由于手被反绑着，便由

别人喂他喝水。当那装着水的杯子凑近他的嘴时，他低下头去像头牛似的那样咕嘟咕嘟急匆匆地喝了起来。那样子真是狼狈。

这么一处理，李金春的犟劲没了，人也变老实了，开始乖乖地做作业。不过，他的作业本简直像天书一般，谁也无法看懂他写的作业。李金春的确是不识字，更不会写字。他只能照葫芦画瓢，黑板上怎么写，他就怎么画。一撇一捺，倒也画得认认真真，一丝不苟。只是那字组合在一起，简直就没有办法辨识了。在许多时候，他都是把这个字的一个笔划弄到那个字里面去了，那个字缺的笔划，又跑到另外一个字那儿去了。

为了争取达标，二队都付出了很大的代价。这是在软件方面所开展的工作。

在硬件建设上，二队也是憋足了一口气，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原来的围墙矮了，斑驳陈旧了，中队就将监舍楼上的隔热层给拆了，将那些拆卸下来的砖头统统加盖到围墙上，然后再在上面粉刷白石灰水。这么一来，监舍四周的围墙不仅高了许多，而且还显得特别洁白和漂亮，煞是醒目。还有伙房的房子，也是将畜牧组那边的牛棚拆了一些，弄出了不少的砖来，然后再将伙房翻修一新。什么叫拆东墙补西墙？二队的做法就是这方面的典范。将那楼顶上的隔热层拆除以后，一到炎热的夏天，呆在二楼上的人简直就像是呆在火焰山上似的，脸和屁股都会烤得红红的。

以前监内的空地上要么是光秃秃的，要么是杂草丛生。为了达标，就必须改造这种局面。犯人王国庆一直在大组里挨享受整，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为了从大组里跳出来，王国庆遂向干部提议监内的绿化问题由他来解决。他的父亲是一个园林工程师，在监内这么一个不足八亩地的空间里搞点简易的绿化，那还不是小菜一碟？

王国庆说：“我的想法是，第一，让我回去一次，我好跟我爸爸说说绿化的事情；第二，把我从大组里调出来，安排到杂务摊点上。我就这两点要求，不知中队干部会不会答应？”

中队干部答应了王国庆的要求，带着王国庆回了一趟家。没过多长时间，王国庆的父亲便开着车将品种繁多的树木花草等等全都运到了二队。将这些棕榈树、木槿树、黄杨树栽种下去，满院子绿茵茵的地毯草铺下去以后，那整个监号给人的印象就完全不一样了，不说是让人心旷神怡吧，至少也是让人耳目一新。

监舍楼的后面加修了一个晒衣场。以前晾晒衣服都是在露天地里，逢到天阴下雨，衣服就甭想晒干。因此，许多时候，犯人只好穿湿衣服，或者干脆不换衣服，不管身上的衣服有多脏，能将就一下，就将就一下。有了晒衣场之后，情况就好多了。中队还委派了专人负责此事，美其名曰是——晒衣场的场长。这个场长之职由谁来担任呢？中队决定让王国庆出任。这也是照顾他的意思。

经过前前后后大半年时间的精心准备，不论是在软、硬件的建设上，二队都觉得大体上差不多了。在此期间，最忙乱的要数中队的宣鼓室了。要写各种总结材料，悬挂各式镜框、牌匾，出墙报、板报、黑板报及宣传品，甚至于还要出监内的油印小报。教室布置得比一个真正的教室还要美观漂亮。平时这些个教室是不会派作上课之用的，要么是空在那儿，让麻雀在里面叽叽喳喳地吵架，要么是堆放一些棉桃棉花之类的东西。偶尔在里面开开会，要么是在里面搞点吃喝的小生活。有一次中队呈报减刑材料之际，有一个名叫张自新的人在教室内用酒精烧煮从大田的水沟里弄回来的龙虾，刚刚把那弄熟了的龙虾放进碗里，还没有吃上一筷子哩，就让一直在暗中盯视着他的白伟将菜碗给端到了干部面前。结果，张自新的减刑材料被束之高阁。现在要达标，要迎

接验收，就必须把教室布置得像模像样，让前来验收的领导看了心花怒放。

类似布置教室这样的工作，在迎接达标验收的过程中还有很多。所以，宣鼓室里是忙得焦头烂额。于是，就把艾奇从大组里抽了出来，让他来宣鼓室帮忙。艾奇还在大组里的时候，有一次他因为干农活干慢了挨打，我替他解过围，所以他一直对我心存感激。抽调到宣鼓室后，他一直很听我的话。

自从发生了李金春因撕毁作业本而大受皮肉之苦以后，艾奇在干部的心目中渐渐有了份量。干部觉得他办事认真，钉是钉，铆是铆，原则性很强，不像我那样总是和稀泥。李金春事件后，谁都不敢说不做作业了，不管是会不会做，会不会抄，是鬼画桃符也好，是请人捉刀代笔也好，反正是得交上一份作业。艾奇对我说，李金春在家里其实有老婆，名字叫应梅。只不过，被李的朋友陈春辉给搞了。陈春辉很爱他的老婆应梅，常常是一搞一夜。艾奇说到最后一副很贪婪很饥渴的样子。他还不住嘴地说：“李金春的老婆给他戴了绿帽子，他在监狱里就搞人家秋霞，那秋霞也真是瞎了眼，为什么偏偏会喜欢上他呢？”

按照已逐渐形成的惯例，各个中队在达标验收的前夕，都会请其他中队的宣鼓来一起参加大会战。一则是那些已经验收的中队宣鼓积累了不少经验，二则是的确需要有经验的人来帮帮手。于是，在征得了徐队长的同意之后，二队将一队的名叫刘汉志的宣鼓请来了。那刘汉志字写得特别棒，还会龙飞凤舞地画点画，在监狱里算是个非常实用的人材。到了吃饭的时候，徐队长已经给专供干部就餐的小伙房打过招呼，让小伙房单独给刘汉志炒两个菜。眼看着吃饭的时间迫在眉睫，我让艾奇去小伙房端菜，艾奇却推辞说他不敢去小伙房，怕在那儿遇到麻烦事儿。我只好自己硬着头皮去。

刚出监狱的大铁门，遇到了伙房组长夏涛。我问他小伙房为刘汉志炒的菜弄好了吗？这夏涛本来是个光头，顶上一根毛都没有，可是这个时候，他却偏偏用他那肥肥胖胖的手去抚了一下他的脑袋，仿佛他的脑袋上长满了又黑又亮的长头发。光这个样子就叫人恶心欲吐。他还打着怪腔说：“不好办呐。”

想起夏涛平时在邱队长面前那个唯唯诺诺胆战心惊的模样，再看看他现在做的姿态，说的话，我的心里就来气：

“夏涛，你这是什么意思？徐队长都已经给小伙房打过招呼了。再说，这是公事，又不是我个人要搞特殊化。”

夏涛皮笑肉不笑地说道：“那这事，邱队长知不知道？”

我“哼”了一声，往前走去，不再搭理夏涛了。

进了小伙房的门，炉灶前的人还在哗啦哗啦炒菜。为刘汉志炒的菜还没有安排上，还得等一会儿。我只好耐着性子在那儿干等着。

片刻后，我看见夏涛手里提着两只杀好了的、且冲洗得干干净净的鸡进了邱队长的家。好不容易等到刘汉志的菜炒好了，我一手端了一碗菜，也就是一个瘦肉炒白菜帮，一个肥肉烧土豆而已。刚要走进监狱的大铁门，这时，邱队长从后面急急忙忙地追赶了上来，开口叫住了我：“尚建国，你给我站住！”

我一愣，当即站在了那儿。

“你手里端的是什么？”

我略一迟疑，说道：“是在小伙房里炒的菜呀。”

“小伙房里炒的菜？尚建国，我问你，是谁给了你这样的特殊权力，你居然敢跑到小伙房里去炒菜了？”

这肯定是夏涛刚才在邱队长面前告了我一刁状，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我只能实话实说：

“邱队长，这是徐队长安排的。”

“徐队长安排的？为什么徐队长要做这样的安排呢？”

“为了达标的事情，我们把一队的宣鼓刘汉志请来了。”

邱队长紧皱眉头，满面不悦和气恼的表情说：“为了达标的事情，你们还把人家一队的宣鼓都请来了？二队自己没有宣鼓吗？二队宣鼓室里有你，还有一个专职文化教员，这还不够吗？还要去外面请人呀。”

我只好咕哝道：“邱队长，你是不知道情况，现在各个中队……”

邱队长吼声如雷：“尚建国，你说我不知道情况？你知不知道，我来这个监狱有多长时间了？什么情况我不知道？什么事情我不知道……”

在一瞬之间，邱队长的吼叫就像那决堤的洪水似的，滔滔不绝地向我倾泄而来。邱队长向我历数了他的资格与功劳——什么时候，他在什么地方担任过什么领导，什么时候，他在什么地方干过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以此来证明，监狱无论什么事情，什么情况，他都熟悉，他都清楚！

此时，正好监号内快要出工了。许多人都围了过来看热闹。邱队长突然朝着监狱大铁门那一边围观的众多犯人恼怒地吼叫道：“你们都给我滚回监号里去！”大家立刻都作鸟兽散，回到自己的监号。

邱队长随即又冲着责备道：“尚建国，不要因为你是个研究生，是个知识分子，我们对你的态度平和一些，你就要在老子的头上做鸟窝了！老子也可以对你粗暴，对你吼叫，你相不相信，我马上就可以让你下大组，让你滚回大组里劳动！”说完，邱队长拂袖而去。

为刘汉志炒的那两碗菜，我后来并没有把它们端进监号里，而是就那么放在了门房那儿。事后，还是门房干部让艾奇把它们

端进监号的。菜早都已经凉了。刘汉志倒是挺不好意思的，他一个劲儿地对我说：“尚宣鼓，这事都怪我。”

我说：“没有关系。是徐队长把你请过来的。你是客人，我本来只是想向邱队长说明一下情况的，没有想到他居然会发那么大的火。”

邱队长说要让我下大组，可是到后来没有下文。据说，是徐队长坚决不同意，说一队的宣鼓刘汉志是他请来的，这事由他来处理。事后，徐队长找我谈了一次话，让我跟邱队长说话的时候要注意方法，尽量回避，不要发生正面的磨擦和冲突。工作还是要大胆去做。

前期的准备工作做都做不完。可是到迎接验收的时候，则另有烦恼。说要验收了，二队这方面早已是如箭在弦，急不可待地等待监狱验收，结果今天说来，没来；明天说来，又没来。这样一天一天地往后推，大家的神经都绷得很紧张。特别是徐队长，他是主管改造工作的队长，人瞅着瘦了一圈，晚上做着怪梦。不是梦见犯人跑了死了，就是梦见出了什么大事故。

有一次徐队长问我，我说：“徐队长，你这是职业病。心态要放松一点，不要那么紧张。不就是个达标验收嘛，只要中队的工作做好了，就行了。不然，你的身体和精力会无法维持到监狱来检查验收的那一天。”

徐队长苦笑着说：“是我的神经绷得太紧张了，没有办法。”

人们都神经质了，只要一听见汽车响，就慌慌忙忙地到处乱跑，或者是赶快找扫帚，把地打扫得干干净净；或者是赶快把什么违监违纪的东西藏起来；或者是赶快躲藏起来，以免前来检查验收的干部碰见了，问个什么问题答不上来。

等了一个月了，监狱验收的人还是没有来。转眼间，都快到年底了。

戒烟行动

千呼万唤始出来。

快到这一年的年底了。旷野里吹来刮去的风已变得越来越凛冽寒冷，连太阳都变得冷冰冰的。

监狱当真来验收的时候，倒把二队弄了个措手不及。眼看着小汽车开过来了，开始还以为是哪个犯人的家属来接见哩，还都想瞅个稀奇。不曾想，第一个从小汽车里下来的不是别人，恰好正是监狱主管改造工作的副政委杨安。杨安是个大块头，身高体健，黑幽幽的头发朝后梳得溜光水滑，显得锃亮。粗眉大眼，脸颊饱满，双下巴。眼里有着沉稳的笑容。

邱队长一看是监狱的杨政委来了，当即慌了神，立马迎上去，脸上堆着笑意说：“杨政委来了？！”

监内的人随即将所有的人都集合起来，如此这般叮嘱了一番。本来是想把监内的老弱病残各色人等全都带出监号——每次只要上面有人来检查工作，便会将这些有碍观瞻的犯人带出监号，主要是怕他们回答不出提问，规范做得不好，又不会背诵相应的条款，会给中队惹麻烦，所以，要将这些人统统清理出去，躲避到僻静的地方。这次本来也想这么做，只是在时间上来不及了，只好让他们都躲避到二楼上去，尽量不和前来验收的干部打照面。自从发生了黄宪昌跳楼自杀的事件之后，一般是不允许犯人随便上二楼的。这回是没辙了，只能破例。楼下和操场上剩下的都是一些经过训练和挑选的精兵强将，是专门用来应付检查验收的。

检查验收的过程并不复杂，主要是在干部办公室里听汇报，看材料，然后是进监号检阅犯人的队列，查看监内各处的卫生、监管安全措施及教学设施等等情况……

出操的效果还不错。统一的深蓝色带白条的囚衣囚裤，中队

刚刚下发的崭新的草绿色解放鞋，步伐整齐，喊声宏亮，精神抖擞，倒有点儿像训练有素的军人似的。要知道，为了迎接这一天的到来，那苦可是没有少吃呀。连杨安都称赞说，二队学员们的精神面貌不错，队列会操搞得很好。当初洪大成曾恼怒地摔过手中的茶杯，说二队的队列训练弄得一塌糊涂。现在，听到杨安的赞赏之后，洪大成也随即附和着说：“二队出操搞得不错，大有进步！”

邱队长听到这话，脸上的笑容都开了花。

抽背《罪犯改造行为规范》也都还不错。留在监内操场上迎接监狱验收的犯人都表现得不差，经得起检验。可是，问题还是出在了那些躲藏在二楼上的老弱病残的犯人们身上。

据说是监狱狱政科的科长郎平元，不知什么时候悄悄地独自上了二楼，发现了那些歪瓜烂枣的犯人，便提了一些问题，还抽背了《罪犯改造行为规范》，结果很不理想。与此同时，还发现了犯人孔中玉的嘴唇上有那么一点儿小小的胡子，虽然不长，却很扎眼。

郎平元当即让孔中玉背诵《罪犯改造行为规范》的第二十一条，孔中玉吭哧了半天才勉强背了出来：

“第二十一条，除了一个月内出监的罪犯外，罪犯一律留寸发或光头，不准留胡须、长指甲；除有特殊生活习惯的少数民族犯外，女犯一律留齐耳短发，不得过颈，不烫发、染发、戴假发、涂指甲、抹口红、戴首饰等。”

郎平元打断他，问他不准留胡须是什么意思？

孔中玉知道麻烦来了，他低头站在那儿沉默了好一会儿，这才嗫嚅着说：“报——告干部，我是忘了理胡子了——”说得嗫嚅巴巴，嘴巴像是漏风似的。

总的来说，监狱这次来检查验收的效果还不错，虽有些问题

存在，譬如，有些老弱病残的犯人不能流利地背诵《罪犯改造行为规范》；孔中玉嘴唇上的胡子；监内的一些角角落落里还残存有香烟头等，但主流是好的。因此，监狱的这次验收算是通过了。

二队已成为监狱级规范化中队。

经验教训总结一下，结果是：

1、从现在开始，不管是什么样的老弱病残都要求流利地、一字不差地背诵《罪犯改造行为规范》，背不了的，或是晚上加班背；或者是每天抄五遍《罪犯改造行为规范》；要不就加大劳动强度或者是实施其它惩罚措施。总而言之，要求所有的犯人都必须对《罪犯改造行为规范》做到倒背如流滚瓜烂熟。

2、在中队批判孔中玉，揪住孔中玉的胡子不放，大会上说，小会上说，目的在于杜绝类似的事情再度发生。

3、鉴于有些犯人抽完香烟就把烟头乱丢乱扔，严重地影响了监内的环境卫生，因此，从现在开始，中队决定，要在全中队的范围内实施戒烟行动。谁要是违背了中队的这项规定，偷偷摸摸地抽了烟，中队将会严惩不贷。

背《规范》也好，揪住孔中玉的胡子不放也好，这都不是太严重的问题。最严重的问题是戒烟。

监内著名的烟鬼屈高林以充满忧伤和痛苦的声调说：“我们在监狱里坐牢也就剩下抽烟这最后一点儿乐趣了。要是再把它剥夺掉，那……”

后面是一长串肝肠寸断的叹息。

屈高林还有一句话说得更绝：“唉，要是让我戒烟的话，这比让我戒饭还要难受！”

屈高林的烟瘾的确大到不可思议的地步。在坐牢以前他也曾经风光过，还当过什么厂长。他因贪污受贿而被判刑之后，老婆跟别人跑了，孩子也不认他了，家里没有什么人来看望他，更没

有什么经济来源。他当厂长时养成的嗜烟如命的习惯，也就失去了强有力的支撑。他只好丢掉尊严，到处找别人讨要香烟，为了得到一支烟，他甚至于不惜喊别人“爷爷”、“爸爸”。时间一久，别人都讨厌他，他只好到处去捡烟头。他捡烟头的本事要比捡棉花的本事大多了，一不怕苦，二不怕脏，有时候连那些丢进痰盂里的烟头，他也会伸出手去捞。烟头捞出来晒干后，他会将还没有抽完的一些烟末剥离出来，小心翼翼地倒在一张摊开的纸上，再把那纸慢慢地卷成一支香烟的形状。抽的时候，他会慢慢地、深深地吸上一口，将嘴鼻全都完全封闭住，不让一丝丝、一缕缕的香烟泄露出去。浓浓的烟雾迅速在他的身躯里流动着，使他浑身上下从都像沉醉了一样。

屈高林就是这么一个铁杆烟鬼。为了戒烟，他付出了不小的代价。戒烟的头一天，别人都不敢抽了，因为中队在宣布这项规定的时候口气很严厉，态度很坚决。这可不是闹的玩的，谁都不敢闯这盏红灯。可屈高林偏偏找这个茬儿，居然在操场这个大庭广众的场合下抽起了香烟。他有着一口古瓷般的烟牙，比那种四环素牙齿还要糟糕。那天，也不知他从哪里弄来了一支香烟，抽烟的时候，他的脸因为某种迫不及待的渴望和贪婪而抖动着，像是着了魔，中了邪。他竟然忘记了周围人的存在，忘记了中队昨天才宣布的戒烟规定。徐队长都走到他的身边了，他还没有觉察。徐队长还故意吆喝了一声：“谁还在那儿抽烟？”

屈高林这才仿佛刚刚醒悟过来，想把手里的烟藏起来，可是已经来不及，被徐队长逮了个正着。

昨天才宣布的规定，今天就有人公开违反，还是在监内点名的时候，这还了得！徐队长当即让屈高林到队伍的前面去亮相，在那儿勾了九十度。屈高林的双手直直地垂在双腿前面，指尖点地，膝盖不能打弯，得紧紧地绷直了。这种九十度的姿势勾上一

会儿，会弄得人头重脚轻眼冒金星。

徐队长那天没有穿黄色的警服，是一副西装革履的打扮，他是去女儿徐雁的学校开完家长会，转回来监督点名时发现屈高林抽烟的。尽管屈高林勾在那儿的姿势是那么谦卑，可大家都明白，这烟，屈高林是戒不掉的。

徐队长挥动着双手训话：“中队决定戒烟，也是为大家着想。你们每个月只有五块钱的零用金，很多人一年四季家里人都从来不一趟，你们手中也没什么钱。有的人为了想方设法弄点烟抽，就不惜对家里人撒谎，说自己要减刑，让家里人拿点钱来，好四处打点。有些人是从来没有接见过，根本没有钱。有些人自己没有烟抽，就想想方设法偷别人的烟来抽。这么一来，不仅是监内偷盗之风盛行，而且还常常导致打架斗殴。再说，抽烟伤害身体，这道理大家都知道。有些人手里一有了钱，就往陈老妈子、郭老头子这些就业痞子的家里去买烟！二队私藏现金的问题相当严重，我估计监内至少有几千块钱。汪卫东为什么会赌博？黄宪昌为什么会跳楼？还不是因为手里有钱嘛。你们这些钱是如何偷偷摸摸地弄进监号里的？每次搜查的时候查得那么严，可是你们还是有办法将钱弄进监号里，这真是出了鬼了！有些人甚至更邪气，他们让家里人直接把钱寄到陈老妈子、郭老头子这些人的手里，然后，就去这些人的家里拿烟拿酒。我告诉你们，中队早就想将这些盘踞在监号周围的卖烟卖酒的黑店打掉！中队早就想把陈老妈子、郭老头子这些人迁移到大队部那边去居住！你们还要寄钱给他们的话，中队一旦发现了，不仅会没收那些钱，还会对你们作出严肃的处理。抽烟还影响监内的环境卫生，规范化中队达标验收的时候，领导就批评过，说我们中队的学员卫生意识差，烟头乱丢乱扔。这是监狱狱政科科长郎平元讲的原话。要不是监狱的杨安政委特意替我们二队说了几句话，我们中队的达标验收很可

能会泡汤。这一次验收是通过了，可是监狱还会组织复查。到那个时候，再叫监狱的领导在我们二队的监号里发现了乱丢乱扔的烟头，说不定会摘了我们规范化中队的牌子。”

徐队长语重心长地说：“学员们，中队决定戒烟，完全是为大家着想。你们虽然犯了罪，判了刑，来到二队服刑，这也算是不幸之中的万幸。因为二队还算是个比较平和的中队，干部的素质还比较高，中队一直在提倡文明管理，文明执法。既然大家来到了二队，我们干部就要做到“三像”，是哪“三像”呢？对待你们，我们干部要像医生对待病人那样，要像老师对待学生那样，要像父母对待孩子那样。”

在徐队长讲话期间，他那长而蓬松的头发不时披落下来，于是，他也就不时地用手去抚弄抚弄他的头发。

而在此期间，屈高林可是不能动弹一下的。他规规矩矩地在那儿勾着九十度，指尖着地，膝盖绷直，腰与腿之间正好形成标准准的九十度。等到对屈高林的处理结束之后，他这尊活塑像倒是像死了一般，回到监号里目瞪口呆，脸色发青，微仰着脸歪在那儿，半天都不说一句话。

因为违反中队戒烟的规定，这是屈高林遭遇到的第一次处罚。

屈高林受到的第二次处罚不是勾九十度，而是让他一次同时抽了十支烟。

一天晚上是胡队长值班，他一走进屈高林的监号里，就发现里面有着一股浓烈的烟油味儿。问是谁抽了烟？都不承认。结果在屈高林的床铺下面发现了那个过滤嘴。屈高林辩解说，不知是谁把过滤嘴放到了他的床下，是想陷害他。胡队长当时没有对此事做出处理，而只是分别找几个人问了问，这其中包括问了屈高林右边下铺的邻居张自新和睡在靠近窗户旁边最好位置上的朱成。

张自新一直以来就和屈高林之间有矛盾。张说过屈高林不少坏话，还恶意攻击和编派屈高林的趣闻轶事。前一段时间张自新的减刑材料被搁浅了。自从以后，张自新看谁都不顺眼，一天到晚牢骚满腹，巴不得所有的人都和他一样倒霉。明明是白伟端了他的龙虾，可他却硬是说屈高林在这里面也捣了鬼。

朱成的证词更不用说了，他不仅说是屈高林在监号内抽了烟，而且还提出了难以反驳的强有力证据，即只有屈高林才会将一支香烟抽得如此干净，干净到只剩下一个光秃秃的烟头了。

胡队长做事倒很细心，也是接受了上次冤枉了黄宪昌的教训，不再重蹈覆辙。为屈高林床铺下面的一个烟头，胡队长做了调查研究，最后得出结论，一屈高林这家伙不老实，明明是他抽的烟，他却偏偏说是别人想陷害他。这就把胡队长惹火了，他的倔犟脾气发作了。他怒不可遏地吼叫道：

“屈高林，你如果当时承认香烟是你抽的，我也许会放你一马，不计较这件事情，可是，你偏偏不肯承认。你不承认也没有关系，我已经问了好几个人，已经把事情弄清楚了。”

胡队长的话还没有说完，邱队长已经有些不耐烦地插进来，瞪着血红的眼珠吼叫道：

“像屈高林这种屡教不改的人还跟他罗嗦什么？他不是喜欢抽烟吗？我们今天就让他抽个够！来，我这里有一包香烟，我让他一次抽十支，分两次抽完。现在就给老子抽！”

邱队长只要一发话，自然有人替他执行命令。这时，有好几个犯人骨干走上前去，先拿出十支香烟，往屈高林的嘴巴里塞去，由于屈高林满嘴的黑牙很不整齐，有的是朝里斜着长，有的是朝外凸出，再加上十支香烟也实在是太多了，把屈高林的嘴巴全都塞得满满的，没有一点儿空隙。即使屈高林平时的烟瘾再大，要一次抽十根烟，对他来说绝对不是享受，而是一种摧残和折磨。

屈高林的嘴巴像是冒着阵阵浓烟的烟囱似的，或者说是如同一束捆绑在一起并且点燃了鞭炮似的，让人看着惊心动魄。平日里，屈高林哪怕是从地上捡了一个烟屁股，也会迅速地塞进他的嘴里扑扑地吸，吸得心旷神怡而又得意忘形。用他自己常常喜欢说的一句话来说，就是三个烟屁股，能顶上一只老母鸡！这会儿的情形恰恰相反，香烟上亮闪闪的红色圆圈并没有随着他每吸一口而向往移动，与此同时，香烟的长度也在不断地一截一截地缩短着。这会儿，那十支香烟塞在他的嘴里，他连含都有些含不住，衔不稳，又如何吸呢？！只见浓浓的烟雾一阵阵地往他的口鼻里灌去，却不见红色闪亮的圆圈，这说明屈高林没怎么吸烟，那十支香烟是在自己慢慢地燃烧着，退缩着。

十支香烟好不容易在屈高林的嘴巴里燃烧完了，邱队长还要让屈高林吸另外十支香烟时，屈高林开始讨饶了：

“邱队长，别让我抽了哇，我实在是受不了了。”

让我感到震惊的并不是屈高林讨饶的内容，而是屈高林讨饶时发出的声音——像是换了一个人似的，经过烟薰之后，屈高林的嗓音显得特别粗嘎低哑，这与他平时的大嗓门判若两人。事后，屈高林说，那十支香烟差点儿要了他的命，不仅把他的嗓子抽哑了，还把他抽烟的感觉也改变了——他以前抽烟的时候总有一种颤栗的感觉，那是一种席卷全身的难以诉说的快感。而抽那十支香烟时，他只觉得像是在喝农药似的，那种感觉糟糕透了。

屈高林还说，幸亏邱队长没有让他再抽那剩余的十支香烟，要不然的话，他恐怕会当场晕倒！

然而，没有过多长时间，当监号内有人将只抽了半截的香烟馈赠似地递到屈高林的手上时，他急忙充满感激地接过那半截烟，一只手去接烟的时候，另一只手还小心翼翼地下面接着，生怕那香烟会落到地上。至于抽烟的那个贪婪劲儿，就更不用说了。

没过多久，屈高林在田里干活时抽烟被邱队长逮了个正着。

这一次对他的处理是，让他喝烟丝水！邱队长几乎是兴高采烈地微笑着说：

“学员们，事不过三呐！他屈高林违反中队戒烟的规定，这已经是第三次了。应该如何处理他呢？我想了想，第一次是让他勾了九十度；第二次是让他一次吸了十支香烟。本来是让他抽完一包香烟的，可他向我求饶，说是他受不了了；这第三次呢，我们中队干部还是不打他，不骂他。他不是一次抽不完一包烟吗？我们这次换个玩法，不让他抽一包烟了，而是将一包烟的烟丝全都取出来，然后浸泡到水里，用碗装着。再让屈高林喝这碗烟丝水。大家好好看着，这一回我们要将屈高林伺候好。”

一包香烟的烟丝浸泡到一碗水里，看起来似乎比同时抽二十支香烟要好受一些，也容易进嘴、下肚。屈高林当时也是这么猜想的。可是，当一碗烟丝水真正喝进屈高林的肚子里时，他的反映是，“这比喝毒药都要难受。”

屈高林虽然没有中毒身亡，可留下的后患也是一言难尽的。他随后不仅是呕吐，还拉稀。一趟一趟地往厕所里跑。厕所里脏得无法下脚，排泄物到处都是。监号里有许多人连揩屁股的纸都没有，既买不起卫生纸，也弄不到其它的纸。有时候监号里发一点儿报纸，也是一抢而光。在这种情况下，每个犯人要想把自己的屁股揩干净的话，只有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了！有的人撕破衣服揩屁股，有的人撕棉絮揩屁股，有的人用树叶子揩屁股，有的人用小砖块揩屁股。当然也有那种人，上厕所不带纸，想不开（揩）。由于厕所太脏乱，所以，众多的蚊子苍蝇在那儿横冲直撞，嗡嗡乱飞。而厕所又偏偏是个容易让人对香烟产生眷念的地方，有许多人即使不那么喜欢抽烟，一旦蹲进了臭气薰天的厕所里，那也会点上一支香烟抽一抽。倒不一定是为了过过瘾，更多的则是

为了驱逐臭气，安慰一下自己的肠胃。

现在，屈高林虽然是害怕香烟了，但他蹲在如此乌烟瘴气的厕所里，又是一趟一趟地跑得那么勤快，在心有余悸之余，居然又有些思念起香烟来了。这么说来，每一次往厕所跑的时候，他不仅仅是要经受臭味的考验，同时还要经受住烟瘾的考验。所有这些对他来说，都是极大的磨难。有时候，厕所里蹲满了人，或者是他蹲厕所蹲腻味了，屈高林便会想方设法变更一下拉肚子的场所。有一回，已经大约是凌晨三点钟左右的时间了，屈高林的肚子又有问题了，他又不想往厕所里跑，于是乎，他悄悄地来到监号的后面。这个时候，监号围墙上的灯光那么迷蒙，值班员也困乏得睡着了。月亮也已经西斜得很厉害，并不那么亮堂。在监号的后院里，屈高林脚下坑坑洼洼的，他试着用脚尖拨开草茎，找到一个比较好的拉屎的地方。蹲在草丛里解着手，这时，值班员在梦中说了一句话：“我操你姐姐——”把屈高林吓得提起裤子就往自己的监室里窜。

在二队戒烟期间，屈高林三次违反了戒烟的规定，他也因此受到了三次不同方式和不同效果的处罚。最后，他虽然说不上是戒烟了，但他毕竟害怕抽烟了。特别是一想起那一碗像浓浓的黄尿一般的烟丝水，屈高林的身体就会不寒而栗。在戒烟期间，因为偷偷摸摸地抽烟而受到了惩罚的人不仅仅是屈高林一个，还有别的人，受到处罚的方式也各不相同。

某一天晚上中队放电影。天气好的时候，就在监号内的操场上放映。有时候放映机朝南，有时候朝西，就对着监号的围墙放。放映电影的那一小片墙壁要比别处白亮一些，得经常在上面刷一点儿石灰水，这样看起电影来，效果会好一些。如果遇上了刮风下雨的天气，操场上无法放了，那电影机便要抬到二楼的大会议室里去。所谓大会议室，其实只不过仅够一、二百号人堆积在里

面，拥挤不堪。那里的空气浑浊闭塞，有时候连呼吸都有些困难。中队还没有宣布戒烟之前的时候，每次放电影都会通知一声——“放电影的时候大家都不要抽烟！”自从戒烟之后，再放电影的时候，空气就变得好多了，不再是烟雾腾腾。然而，这天在会议室放电影的时候，有一个人抱着侥幸的心理，躲在一个角落里偷偷吸烟。

通常的情况下，干部都不会跑到会议室里来看那老掉牙的电影。只有没有多少娱乐活动的犯人才会对这种枯燥无味的电影感兴趣。一放电影，大家都拚命地往前面挤，往中间挤。为此还常常扯皮拉筋。这一天晚上谁都没有注意到，电影放映到一半时，邱队长悄悄地溜进来了。那个躲藏在角落里偷偷抽烟的人做梦都没有想到，邱队长会神出鬼没地站到了他的背后。

邱队长现场办公，对他作出了及时的处理：

“你是愿意放弃减刑还是愿意放弃你杂务摊点的位置呢？”

“我放弃减刑吧！”那个抽烟的人迅速作出了自己的选择。

事后，很多人都说：

“你真是个傻瓜！”

“宁愿下大组累死苦死，也不能放弃减刑的机会呀！”

“宁愿被打个皮开肉绽，或者是像屈高林那样勾九十度、一次抽十支烟、喝一大碗烟丝水……都行。那也不应该放弃减刑的机会呀。减刑可是最大的事情！”

不管别人说什么，都已经无济于事了。他的减刑材料已经被中队干部抽了出来。

后来，在回顾二队戒烟那一段历史的时候，有人唏嘘感叹地发着议论说：

“要说为二队戒烟付出最大代价的不是别人，就是放弃减刑的那个蠢货。他简直是蠢到了家！”

陈兵之死

要说放弃减刑机会的那个人蠢到了家，其实也不完全是这样。他在杂务摊点上呆久了，要他下大组，按他自己的话说——那会要了他的一条小命。如果说，在监狱里还有地狱与天堂之分的话，那么，他的选择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就在他做出这样的选择不久，大组里的一个名叫陈兵的犯人在圣诞节那天的遭遇，曾让他唏嘘了许久，并使他更认识到，他当初放弃减刑的决定是对的。

在《十二月》这首歌谣里，曾有这么几句“……拉了棉桃拔棉梗，从南到北不能落后，我的哥们哪，不然要把我打个够……”

这段歌谣说的是，到了寒气逼人北风呼啸的冬天，大田里的棉花已经不可能再炸桃子了，于是，大组里的人就只能把棉桃拉了，运回监号里慢慢剥那隐藏在其中的棉花。至于那些生长在田野里的棉梗，则需要从地里拔出来，然后再挑回中队，堆在中队的大伙房旁边。棉梗堆成很大很大的垛，像小山似的。有时候还不止堆一个垛，要堆两、三个垛。这是柴垛供中队的伙房烧一年。

这一天是12月25号圣诞节，监狱里当然不会过什么圣诞节，还是一如既往地出工，一如既往地挑棉梗。从大田的南头到北头，大约有三、四里路，这路途算是够长的了，一眼难以看到尽头。不要说挑着百十斤的棉梗走这么长的路，就是空着手走，也是够累人的。何况这一天天气还不大好，路上不少的地方都结起了一楞一楞的冰凌，远处的水塘那边则弥漫着一层灰色的薄雾。在阴郁的天空下，在寂寞的寒冷中，整个田野仿佛凝冻了。挑着棉梗走在这样的路径上，有时候还是行走在窄窄的小鸡肠子一样的田埂上，那脚上的鞋或者是光脚丫子碰触到地面时，会发出咔嚓咔嚓的响声。

大组里那些挑着棉梗飞快奔跑的犯人们倒是浑身热气腾腾

的，他们的头颅就如同是蒸笼里的一个个馒头。在挑棉梗的队伍里，犯人陈兵在圣诞节的这一天，走到了生命的尽头。死亡的蛛丝马迹已经呈现在他的脸上，其中最突出的一点就是——他的眼球发黄。他用一种萎靡不振垂死挣扎的目光看着周围的一切——他即将要离开的这个世界。他已经累得连站都站不住了，可是他还得勉强支持着，一边忍受着身上各种各样的痛疼，肩膀上还担着沉甸甸的棉梗，一边还要一路小跑着。不然的话，他就会挨打。

陈兵来到监狱一、两年了，这段时间里，他和棉花结下了不解之缘。从为棉花打营养钵开始，每天要打三十米，营养钵打得嘭嘭响，他的肩背也嘭彭响，那是他在挨打。他挨打后，从面部看，像个熊猫；从身上看，则又像个斑马。熊猫说的是鼻青眼肿，斑马说的是伤痕累累。他的身体虚弱，个子矮小。组长江波常常喜欢挂在嘴边上的一句话是：“像陈兵这样的栽模子不打，老子去打谁呀？”

陈兵是“栽模子”，就应该打。这是他的组长江波的逻辑，也是江波带组的经验和窍门。

什么是“栽模子”呢？它包含的意思非常宽泛——弱小、老实、可怜、没有关系、没有背景、家里没有钱、本人又不乖巧。其实陈兵的挨打生涯从很早就开始了，那还是他刚刚进收审所的时候，他每天像奴隶一样拚命在号子里干事情，包括擦地、捡灰、打蚊子等等，甚至于还包括号霸要撒尿，他去替人家扶鸡巴，号霸要拉屎，他去替人家掀马桶盖等等诸如此类的事情。尽管如此，他还是难逃挨打的命运，因为他是“栽模子”，好欺负。在弱肉强食为基本原则的生存环境里，这种现象显得更加突出和残暴。陈兵被一路打过来，直到打到了江波的手下。江波是那种面无表情的人，他眉骨高耸，双眼深凹，嘴唇肥厚，脸上很少显现出什么表情，或者说他的脸上是一种说不清楚的表情。江波是一种嗜

血成性的人，每天都喜欢打打人，不打人，他好像手会发痒。他的带组经验也告诉他，每天要在组里打打人，让那些“栽模子”贡献出脑袋、脸庞、肩膀和屁股来，把那些部位打红打紫，这样组里才有一种气氛，一种让人望而生畏的气氛。这叫杀鸡给猴看吧！杀的一定要是鸡，也就是那些“栽模子”。只有他们才不会反抗，不会让他下不来台。而首当其冲的就是陈兵。

他打陈兵，甚至连理由都不要。陈兵也从来没有向江波讨要过什么理由！陈兵挨了打不说，还要对打他的人说谢谢。

从打营养钵开始，江波就开始打陈兵，一直打到点棉籽、栽营养钵、到棉花地里打药，再打到薅棉花草、到去棉花地里挖沟、到捡棉花、到拉棉桃、剥棉桃，再到拔挑棉梗。一年四季打过来打过去，直打到了圣诞节的这一天，也就是陈兵死的这一天。

对陈兵来说，挨打早已是家常便饭了。比挨打更出格的事情还有哩。那是阴雨连绵的初冬时节，由于连续数天下雨不能出工，大家只能在监号里剥棉桃。那天，陈兵等人坐在小教室里剥棉桃，反正规范化中队达标验收已经通过了，教室也用不着再摆什么样子了，里面便堆满了那些没有及时盛开的霉棉花以及那些能从中剥出霉棉花的棉桃。陈兵坐在那儿机械地剥着棉桃。由于剥的时间太长了，他的手指头已经剥得长满了倒刺，有的地方还破了，流出了暗红的血。在这个时候，江波来检查质量，说陈兵的桃子没有剥干净，上面还留有棉花，是破坏生产。陈兵也不知咕哝了一句什么，江波火冒三丈，当即抓起陈兵的脑袋就对着教室的墙壁砰砰地撞上去，陈兵的额头一下子就青肿了。江波还强迫陈兵去吃那些没有剥干净的棉桃——江波把陈兵的脸摁在墙上，然后开始往陈兵的嘴里塞棉桃。

据陈兵说，在江波手下他活不下去了，他有充足的放弃生命的理由，他曾经偷偷地搓过绳子，想通过上吊的方式来结束他

的痛苦与屈辱。他终究没有这么做。他的生存哲学是——好死不如赖活着。能活一天是一天。所以，陈兵的生命也就延续到了圣诞节的这一天。

在此之前，我从陈兵那日渐枯瘦的脸蛋上，特别是他那日渐黄得怪异的眼球，就能够看出他已经病得很重了。在一个多星期以前，陈兵的眼球就开始泛出那种类似于黄油漆一样浓而凝滞的颜色，并且眼球无法转动，宛若被整个眼眶焊住了似的。我曾经向干部提出过建议，带陈兵去大队卫生所看一看。我的建议没有答案，石沉大海。陈兵已经病入膏肓了，走路连脚都抬不起来，只能在地上蹭着走。可是每天出工的时候，他还是要一如既往地跟着拖，一直拖到了圣诞节的这天上午。

距离他闭上那黄得让人感到陌生而又恐惧的眼睛只有半个小时了，他实在挑不动肩膀上的棉梗，也走不动路了，便斗胆对组长江波说：“江组长，我实在是搞不动了，能不能让我坐一会儿，休息一下，我再接着挑。”

陈兵这一次一开口，江波就爽快地答应了。陈兵刚刚放下肩头的担子，在一个外围监督岗的跟前坐下来，他的脑袋就一下子歪到一边，嘴里喷射出浓液。监督岗田贵慌忙用手去摸陈兵的口鼻，发现他已经憋了气。陈兵临死之前，喉咙里有一股很甜的味道。他躺在那儿似乎沉沉地睡着了。在此之前，他经常睡不够觉，有时候走着走着就闭着眼睛瞌睡了，像条病虫一样萎靡。这会儿，他还是穿着他那件破旧不堪且饱经风霜的囚衣，囚衣上面还用红红的油漆刷着“劳改”二字。

据田贵事后对我说，从陈兵的肩头卸下那沉甸甸的棉梗到陈兵死去，这中间只相隔了半个小时。还没有等把陈兵送到大队卫生所，他就在颠簸的路途上停止了呼吸。

有关陈兵的死因问题，干部给予的解释是：陈兵是病死的，

死于肝浮水，属于正常死亡。不会影响中队已经获得的规范化达标中队的的光荣称号和集体荣誉。

在监号内，私下里人们议论纷纷。有人说，陈兵是累死的。有人说，陈兵是被打死的。还有人说，陈兵是吃了喷了很多农药的棉桃，导致体内中毒而死亡。也有人说，陈兵是拖死的，如果早一点带他去大队卫生所或监狱医院看病的话，他也许不会死。

不管犯人们怎么样议论，干部做出的结论最有权威性，那就是，陈兵是病死的，属于正常死亡。

朱强是个非常老练的犯人，他悄悄地对我说：

“平时江波在组里养了几个“顺模子”，都是不干活的，无非是家里有钱，接见多一点，能供他江波吃喝，能给他塞点钱。这些“顺模子”不干的活，拉下的生产任务，只有靠陈兵这样一些“栽模子”去完成。所以，江波要拚命地打陈兵这些人，让他们多干一些活。幸亏江波那天聪明，没有打快死了的陈兵。否则他就吃不了兜着走了。他现在拚命说陈兵是病死的，目的是为了替他自己洗脱罪责，怕干部追究他以前打陈兵、逼着陈兵吃棉桃的那些事情。”

一条生命就这样结束了。据说陈兵是一个私生子，其父是个农村木匠，人在外地干活的时候搞大了一个女人的肚子。那女人生下他之后，要嫁人了，就把他遗弃了。陈兵差不多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从小就偷东西。他这次坐牢，也是因为偷窃。

陈兵死后，通知他的家人，似乎也没有什么人来。中队干部就将他的尸体送去火化了。骨灰没有人要，只好埋在中队花库后面的一片土坑里。土坑旁边有一颗粗壮的杨树，那上面经常有一些乱七八糟的各类鸟儿飞来飞去。

从那以后，夜里在监内值班的犯人常常会在一阵阵吹来刮去的风中听到一种若有若无的歌声。于是值班员就说，那是陈兵在

快活地唱歌。因为他死在圣诞节这一天。

孔中玉之死

陈兵死在圣诞节的上午，一年以后，在又一个圣诞节来临的前夜，二队监内另一个人——孔中玉也去天国报到了。不过，孔中玉死得没有陈兵那么突然。他的死其实早在人们的预料之中。

很长时间以来，孔中玉就是监内著名的病号。他的病是胃下垂。他的体重只有六十斤，细胳膊细腿，窄腰窄肩，瘦脸瘦屁股。看上去比那非洲难民还要瘦弱。他的病，再加上他的这副瘦骨伶仃的模样，使他根本无法去大田里干农活。所以，他只能长期呆在监号里。说是养病吧，根本谈不上，说是治病吧，也谈不上。只是呆在监号里，身体好的时候，就在监内干点儿轻松一些的活。譬如说，值值白班，扫扫地，喊喊人什么的。身体不舒服了，就卧病在床死睡，白天也睡，晚上也睡，直睡得天昏地暗四肢发麻脑袋凹陷。走起路来两腿发飘。

这个时候，我在监号内写的一部长篇小说《魔鬼面具》差不多快要完稿了。一天，孔中玉跑到宣鼓室来对我说：“尚宣鼓，你写的小说我帮你抄一遍吧！一来，你可以留个底子，二来，我也可以练练字。反正我在监内也没有什么事情可干。你就让我帮你抄抄小说稿吧！”

我还在犹豫着，旁边的艾奇帮腔说：“尚宣鼓，你就让人家孔中玉帮你抄吧。这是好事情，他抄的时候，我们也可以顺便欣赏欣赏你写的小说哩。”

我最后同意了。不过，我还是有些不大放心，便问起孔中玉的病情：“孔中玉，你这胃怎么样？不要紧吧？你帮我抄稿子，会不会影响到你的身体？”

孔中玉用一种阴郁而萎靡的目光斜视着我说：“不要紧的，我的胃里总是堵着一个硬硬的重块，非常虚弱，不愿意接受大伙房做的那些硬硬的米饭。有时候，我吃什么就吐什么。不过这一段时间好多了，能勉强吃点东西。我需要活动活动，搞点什么事情，不能老是睡在那儿。不然的话，我总有一天会睡死的。”

孔中玉说得有道理，我只好将小说稿交给他，让他身体好、同时又有空的时候帮我抄一点儿。不需要赶时间。

孔中玉瘦弱是瘦弱，但他非常有心计。当初汪卫东他们在监号里赌博的时候，孔中玉曾经替他们放过风，他搬上一个小凳子，坐在监室门口拐角的地方，懒洋洋地，斜着眼睛四处张望，一有什么风吹草动，他就拚命咳嗽，为赌博的人报信。他这个样子放风，不太容易被人发现。赌博结束后，汪卫东他们会给他一些好处，譬如说给他一点吃的、喝的、用的。

汪卫东的赌博事件闹出很大的风波以后，经过顺藤摸瓜的调查，也曾经查出了孔中玉是放风之人。中队也曾经让他跟着大组出去劳动，算是一种惩罚。他干不了重体力活不说，走路的速度还特别慢，跟不上大组出收工的队伍。有时候大组已经走得无影无踪了，他还在后面踉踉而行，还得一个组长陪着走，生怕他半路上跑掉了。又不敢打他，他已经病成了那个样子，如果一拳头打下去，说不定就会将他打散架。他干不了多少活，还要搭上一个组长的许多时间，因此，在大组里拖了一段时间后，又让他回到了监号内呆着。按某些干部的话说，只当他是个植物人！

孔中玉长期呆在监号里，一有机会，就到各个监室里转悠，看中什么东西，他就会顺手牵羊。有时还拿摸来的东西与别人交换。在监号里，一般都不会追问东西的来历和出处。

孔中玉的饭量很小，对他来说，主要问题是食物能不能吃进胃里去，以及能不能消化。在以前饥饿的年代里，孔中玉没有在

水沟里捞过饭吃。中队实行主食放开以后，他也没有像有些人那样一餐吃个一、两斤。要知道，主食放开之前，有许多人是长期处于饥饿或是半饥饿的状态中。所以，中队一放开主食，让大家敞开肚子吃，不少人就恨不得把本捞回来，拼命地猛吃，吃个肚儿溜圆，撑个饱嗝连天。

胃是最能反映一个人精神状态的器官。

主食放开以前，许多人长期吃不饱，显得黄皮寡瘦，精神萎靡，蔫头耷脑。肚子能吃饱以后，那状态真是不一样了，有些人居然是红光满面，很有精气神儿，干什么都是劲抖抖的。所以有人说监狱的饭还真是养人，别看米糙糙的，霉霉的，烂烂的，菜也很糟糕，盐倒是很充足。干部总是说，大组里要干重体力活，菜里面多放一些盐，这样吃了有劲，能增加体力。所以，菜里面盐很多，非常咸。至于油呢，则是恰恰相反，非常少，几乎是没有什么。这盐的多与油的少，倒是相映成趣，是劳改队炒菜的一大特点。菜哩，一年四季就那么几样：春天主要是吃大白菜和萝卜，白菜是那种老白菜邦子，萝卜哩，则切得像车轮子似的，又厚又大，还连筋带皮。夏天吃冬瓜，老冬瓜，很厚的皮切都不切。秋天吃土豆，大块头的土豆，煮得半生不熟。冬天则主要是吃老菜苔。那老菜苔都开了花，秆长得像小树一般，嚼都嚼不烂。中队菜园里的菜为什么都要等它长老了以后再吃呢？这是因为，那些菜只有长老了，它们的体积才会变得最大，份量也才足，弄给犯人们吃也方便许多。鲜嫩的菜是供应给干部们吃的，不仅仅是本中队的干部，还有外面的干部，只要是与二队有点儿瓜葛的干部，都有机会享用它。

孔中玉日复一日地消瘦下去。脸塌陷了，像是挖出的两个深坑，让人见了觉得毛骨悚然。这问题还是出在胃上。在二队期间，孔中玉没有在大田里受什么磨难，他没有因为在大田里干农活而

中过暑，中过毒；没有因为绝望了而喝过农药；没有因为冤屈而跳过楼；没有因为挑秧时脚底一滑，肩膀上的担子滚了出去，人也摔进了水沟里；没有因为薅草而晒破了背上的一层又一层的皮；没有因为在棉花田里捉虫完不成任务而恨不得自己也变成一条虫；没有因为拖把无法将地面拖干净而干脆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当作抹布……

不过，孔中玉也去大田参加过一些劳动，最主要的一项劳动——插秧！尽管孔中玉体重只有可怜的六十斤，像根羽毛似的轻飘，他在插秧时，常常会双脚陷进泥巴里拔不出来。他戴着湿手套，勾偻着瘦瘦的小腰，像个虾米一样地在那儿插着秧，样子古怪而可笑。插秧时节，手套非常紧俏，许多人的手都泡烂插破了，需要戴手套保护一下。每次中队的内统金来源从大队供应站进货回来后，相当多的人就会涌到金来源那儿，要求把手套卖给他们。当然不是用现金结帐，而是用零用金帐本上存的钱。监狱规定犯人不能有现金。插秧季节要手套的人太多了，供不应求。孔中玉的个子又太瘦小，根本上无法挤到人前面去。于是，他只好找我，让我给金来源打声招呼，给他留点儿手套。孔中玉以前在农村供销社当过会计，是因为贪污而来坐牢的。他对帐目管理很内行，他常常跟我说，金来源管零用金有问题，在帐目上做过手脚。考虑到孔中玉插秧的确是比别人更需要手套，所以，我常常让金来源给他留点手套。孔中玉戴着湿手套插秧，速度虽然比一般人慢许多，但也是非常认真的。

只是每当有田贵的姐姐田菲那样的犯人家属来插秧的时候，孔中玉的眼睛就特别忙碌，时不时地转过头去看看那些稀罕而鲜艳的女人。大家就会跟他开玩笑：

“孔中玉，你都这个样子了，还对女人感兴趣啊？”

“你以前搞过女人没有？”

“你这么瘦弱矮小，哪个女人会看上你呢？”

对所有这些调侃与戏谑，孔中玉统统嗤之以鼻地反击道：

“你们真是隔着门缝看人——把人看扁了！”

紧接着，他说的一句话更为绝妙：

“我告诉你们，在这个世界上，只要有我这个臭泥鳅，就不愁引不来乌鸦啄！”他这话的意思是说，一个萝卜一个坑，他这根萝卜终究是会有属于自己的一个坑的。孔中玉这话会引起大家的哄笑。心里纷纷猜想，这个孔中玉充其量也只是过过眼睛瘾，不可能有什么实际的动作。

在二队这个小范围内，短短几年里，就不断有人自杀。有个人叫袁世发，从畜牧组违纪下了大组，在大组里受了几天罪，便活不下去，最后上吊，死在中队储藏室里。还有人跳楼、喝农药、吞钉子、割腕，犯人以形形色色五花八门的方式自寻短见。可是，孔中玉自始至终都没有想过要自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都在与那不争气的胃作着艰苦卓绝的斗争。

中队没有钱把他的病治好，也曾经想为他办保外就医，让他回家去治病。只是，保外就医手续办起来旷日持久。有关材料早就递交上去了，然而却是泥牛入海，杳无音讯。连孔中玉自己都说：“我是不抱什么希望的。我家里没钱、没人，又没关系，保外就医的手续怎样办？只有等死，像陈兵那样，就死在监狱里算了。活着是犯人，死了还是犯人，永远呆在二队这个地方！”

孔中玉果真等到了这一天。

他临死的前几天，我曾经端了一碗稀饭去看他。在监狱里吃碗稀饭并不容易，这算是一种奢侈品。当我将稀饭端到孔中玉的跟前时，他张开枯瘦干裂的双唇，露出一丝感激的微笑。他低下头哼哧哼哧地去吃那碗稀稀的粥，塌陷的双颊上似乎浮现出一种类似于幸福的表情。可是，他的眼眸里却满是痛苦与无奈。吃完

稀饭后，孔中玉对我说，他憎恨贫穷，惧怕饥饿。最近几天，他老是梦见他那个死鬼爸爸。他爸爸是个饿鬼，邋里邋遢的，就是做了鬼也是这样，一点都不爱干净！作为饿鬼，他爸爸每次回家的时候，都舍不得穿鞋，光着脚。回来胡乱吃一点东西，然后就慢慢地走了，还不断地回头看他。

最后，孔中玉用他那越来越歪斜的眼睛瞅着我，是那种死亡将至的目光：“尚宣鼓，我后悔生到这个世界上来。但我无论如何，都不会自杀，我要坚持到最后！”

孔中玉最后的日子，恰好就是平安之夜。我最后见他一面，是在平安夜的九点钟左右。他上厕所，屁股就紧紧地抵在厕所的墙壁上，嘴里喃喃地对我说：“你的小说，我没有帮你抄完……”

我摆着手说：“你先照顾自己的身体要紧！”

平安夜的后半夜，夜是越来越深了，还起了雾。监号里的各种各样的花草树木，被雾一弄湿，就散发出一阵阵香气，直往人们的鼻子里灌。可是这个时候，孔中玉已经不能呼吸了，无法闻到那些弥漫于空气之中的香味了。

到了次日早上，当太阳从东方升进来的时候，阳光可以驱散那些雾气。这个时候，孔中玉的尸体早已变得冰冷而坚硬了。

孔中玉的死给监号里的犯人带来的震撼并不像当初陈兵死的时候那么大。没过多长时间发生的一件事情，却极大地震撼了监号内外。

那年的夏天好像特别热，空气都热得微微颤抖，田野里的树木、花草、农作物都冒着一缕缕的烟雾。这一天，大组的劳动任务是在棉花地里打农药。由于太阳炙如毒火，每个犯人的头顶上都扣着一顶草帽。那些草帽有新有旧，有的是破得没有了形，连整个帽檐都没有了，只剩下一个小小的帽筒，那帽筒的顶部还通天，连头发都能清清楚楚地看到。尽管如此，每个犯人头上都得

戴一顶草帽，这是中队干部的要求。不仅如此，夏天打农药的时候，中队干部还要求大家做好防中暑、中毒的工作。相关的物品，像十滴水、人丹、草帽、毛巾、口罩、手套等等，都应该有。田间劳动现场要有凉水供应，不让犯人喝生冷脏水。农药的发放回收登记要由干部亲自经手，杜绝药品流失；喷施农药时，带班干部要坚守岗位，严防中毒事故的发生，还签订了责任状。

犯人们在棉花地里打农药，不用说，那汗水比农药水来得还要快，脊背上的汗水就那么哗哗地流淌着，像自来水似的，一直流到大腿上，再流到脚踝处，再流到土地里。这个时候，另外一个事件却突然出现了。

四组的监督岗张峰在点名清查人数之时，发现田里少了一个人，他慌乱起来，一遍又一遍地清点着人数。数来数去，人数还是不够，急得他汗如雨下，惊恐万状。末了，总算搞清楚了，是四组里的一个名叫杨世忠的人不见了！

杨世忠跑了！现在得把全体组员召集到一起，再也不能分散开来打农药了。在附近找了半天，哪里还有杨世忠的人影子呢？几个组长都吓傻了，都不敢向干部报告。这边的动静，先是引起了站在附近的外围监督岗田贵的注意。田贵发现，还没到收工时间，可是四组的人却全都集中一起，呆愣愣地站在那儿。田贵边责怪着四组的组长们，一边往大田北头那边的一片树荫跑。说：“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也不马上向干部报告，是想害大家是不是？！”干部们坐在那树荫下面，避着暑。田贵气喘吁吁地跑了过来，说起话来上气不接下气：“报告干部，四组那边跑了人。”

这无异于是晴天霹雳，一下子把在场的人都给震撼得目瞪口呆。邱队长的脸蓦地变黄变白了，胡队长也张惶失措。徐队长闻讯从那头跑了过来，冲着众人大声喊叫：“还愣在这儿干什么？赶快组织追捕！”

杨世忠也就是跑了那么十分钟，因为十来分钟之前点名的时候，他人还在打农药。徐队长一估算，说是杨世忠没有跑远，可能还在二队的范围之内。充其量，也就是跑到了一队的田块那边。于是，徐队长粗喉咙大嗓子地高声喊叫道：“让杂务摊点的人都给去找人，就在二队和一队这一带好好地找一找。二、三组是老犯组，也给我去找人。人多，才能形成一个包围圈，才能把网撒开，才有可能把杨世忠给我抓住！一、四组是新犯组，就呆在原地不要动了。一、四组的学员们，我告诉你们——这个时候都给我老老实实地呆在那儿，如果谁要是在这个节骨眼上添乱，那中队干部可对他不客气了！”

邱队长将徐队长拉扯到一边说：“老徐，让二、三组的犯人也去追杨世忠，这行不行呀？要是他们乘机跑了，那如何是好？”

徐队长笑了笑说：“没关系，二、三组是老犯组，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不会乘机跑的。都这个时候了，要是我们不抓紧时间赶快去找杨世忠，说不定他当真跑掉了呢！要有什么事，由我来负责！”徐队长又对大家说：“就看大家的表现了，谁要是抓住了杨世忠，中队马上为他呈报减刑材料！”

杂务摊点的人、园组、畜牧组、耕田组、伙房组、值班组的人全都出动了，主力军当然还是二、三组这两个老犯组，光是他们就有几十号人，还都是跑得快、力气大的棒劳力。他们的动作最迅速，精神也最抖擞。这个说：“该我减刑的机会到了！”那个说：“只有我才能抓住杨世忠这个家伙！”

人多好办事，百十来号人迅速在大田里撒下了很大的一张网。不过，这里面也确实有着隐患，在干部看来，杂务摊点的人还稍微好一点儿，那两个老犯组里的人就难说了，许多人平时就想跑，只是没有机会。现在机会来了，为了能抓住杨世忠，所有的人都放了鸭子，完全失去了控管。这儿一个人，那儿一个人，全都撒

了出去。只有网撒得大，捉住杨世忠的可能性才大。与此同时，其他的人乘机跑掉的机会也大大地增大了。

不仅是整个二队沸沸扬扬地开了锅，就连大队那边也闻风而动了。二队向大队报警之后，大队那边的特警队迅即开着吉普车赶来，主管改造工作的洪大成也立马赶赴二队，到第一线亲自指挥抓逃的战斗。

与此同时，监狱方面也在各个交通要道设卡抓逃，绝不放过每一人可疑的人。监狱追捕队是个常设机构，特别富有抓逃经验。他们一出动，那就有戏唱了。

在江南监狱的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各种各样的脱逃事件。离奇古怪的也有，孙发河就是其中的一例。当初孙发河是通过厕所的暗道从监狱里逃走的。他先是去了福建沿海的一个什么寺院，在那儿替别人挑水扫地，干些打杂的活路。有时候也偷一偷香客们投入贡箱里的钱，不过从来没有被人发觉过。他是一个不错的人，挺能干的，生得膀大腰圆，浓眉大眼，还有几分英俊潇洒。他的身上有多处伤疤，一身的皮肉仿佛是一件缀满补丁的外套。他在寺院里呆了一年多，周围倒是有不少人家看中了他，想把自己家的女儿许配给他，但都被他回绝了。那个时候，他更想去台湾。有那么一家人，爸爸妈妈带一个儿子。男的不知在什么地方犯了事情，就带着一家人想往台湾那边跑。就委托孙发河置办船只、罗盘仪，以便逃跑时使用。逃跑的时候，那一家人提前开了船，将孙发河给甩了。那家人并没有逃到台湾，他们的船被台湾的军舰给拦截住了。对方害怕他们是从大陆派过去的探子，就给了他们吃的喝的东西，还给了他们一船的假人民币，将他们的船放到靠近大陆的公海上，然后随波逐流被风吹到了福建这边的海边上。

孙发河偷渡去了澳门打黑工，赚几个辛苦钱。有一天躺在澳

门公园的长凳上睡觉，却被巡逻的警察盘问，露出破绽，遂被遣送回大陆。不久，他翻山越岭偷偷进入了缅甸。缅甸当时国内政局动荡不安，不时有武装冲突发生。孙发河虽昼伏夜行小心翼翼，但到最后，他还是被当作身份不明的探子给逮住了，被递解回中国，关押在云南昆明的一个监牢里，一关就是好几年。从江南监狱脱逃之后，他也曾经在不同的时间里被不同的地方关过几回。可每一回，他都胡乱瞎编假地址假姓名而侥幸脱险。这一回不行了，几年过去了，他的谎言被戳穿了。他关得熬不住了，身体越来越虚弱，满身都长了疮疤，痒得不行，便只得说出了实情：他是从江南监狱逃出来的犯人。云南那边随即打电话与江南监狱联系，江南监狱里的干部早把孙发河这个人给忘记了，只好去查犯人档案资料。一查，还真有这么一个人。监狱将孙发河押解回来以后，孙发河在江南监狱就成了一个很有说服力的典型例证。干部们常常会这样说，谁想跑就跑呀，能跑得脱吗？不要说你在国内东躲西藏的，你就是跑到了国外又怎么样呢？孙发河不是跑出国了吗？还跑出去了七、八年，结果怎么样呢？还不是乖乖地被抓了回来？所以说，跑是没有出路的。

当然，还有别的例证，有人跑了二十年，以为刑期已经跑完了，再也不会追究了，便回到监狱里来拿释放证。不言而喻，这人是自投罗网了；有人跑到了广州，在那儿生意做得不错，还发了点财。偏偏这一天，刚刚从小汽车里钻出来，就被来自江南监狱的干部给认出来了，自然是难逃法网；还有像类似于五队卫生员他们那样的事情，人海茫茫，却偏偏狭路相逢。总的来说，要想逃跑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除了高墙电网和干部看管之外，更有犯人间相互监督和盯视。所有的犯人都背会这么一段歌谣：“脱逃刑期会增长，钱财物品挥霍光，连累亲友急爹娘……”还有什么：“人越跑越瘦，刑期越跑越长。甚至还会跑掉脑袋！”

防逃工作不断展开，今天开个针对脱逃的批斗会，明天开个脱逃犯自我剖析的现身说法会，后天搞个反逃防逃的图片展览。

要想逃跑不容易，要想跑脱那更是难上加难。特别是开展了网上追逃之后，更是这样。现在追捕逃犯的手段是越来越先进，越来越现代化了。江南监狱的干部常挂在嘴边的口头禅是：“法网恢恢，疏而不漏！”“高墙可越，法网难逃！”据我所知，能从江南监狱跑脱的犯人不多。十之八九都会被抓回来。当然也有个别的人隐姓埋名远离家乡，生活在别处。五队就曾经跑过一个犯人，一直没有抓到。二队也有一个犯人，已经跑了二十多年了。

逃跑的方式都有哪些呢？有翻墙跑的，有在外面劳动时跑的，有谎称去干什么事跑的，有借故跑的，这些都是偷偷地跑的。还有强行脱逃的。在三队就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大家都在田里劳动，忽然有两个人扔掉手中的劳动工具，撒腿就跑。猝不及防。等到大家醒悟过来，那两个人已经跑远了。结果是，一个人当时被抓住了，另一个人跑了很久，才被抓回监狱。我还听说曾有一个，手上戴着铐子还强行跑掉了。

逃跑的原因都有哪些呢？有些原因是众所周知的，除此之外，还有别的一些乱七八糟的原因，譬如说：在监狱里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有人把周边农村姑娘的肚子搞大了；有人管零用金帐贪污；有人变卖公家的物品东窗事发了；有人家里面出事了。有次一个犯人的爸爸去世了，他回家奔丧，却乘机跑了。在沿海一带混了很久，最后还是被抓住了。关在监狱的看守所里等待加刑的时候，他却上吊自杀了。他这一死不打紧，他家里人闹起来了，把事情都抖落了出来：他回家奔丧时，家里人给批准他回家的干部塞了多少红包，给带他回家的干部塞了多少红包，还带着干部去什么地方洗了桑拿，泡了小姐。此事相关的干部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处分。

总体上来看，大组的组员脱逃的居多。这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牢头狱霸敲诈勒索。后来把杨世忠捉住以后，据调查了解，他的脱逃就与此息息相关。

杨世忠一跑，立刻在江南监狱掀起了轩然大波。不仅是二队全线出击，大队重拳出击，连监狱追捕队都闻风而动了。最后捉住杨世忠的还是三组里的一个名叫佟祥林的犯人。那个时候，杨世忠其实并没有跑远，周围都是人，都是眼睛。他只能悄悄地爬行。天气炎热，干部坐得很远，组长们也是尽可能地找阴凉一点的地方站着，打农药拉开的距离也比较远，加上大田里有遮挡之物，棉花长得不矮了，稻谷还没有收割，一束束地长得很高了。所以，杨世忠趁几个组长都没有注意之际，先将背上的打药桶放了下来，后是俯身匍伏到田里，顺着棉田沟往隐蔽处慢慢地爬。

从杨世忠放下打药桶伏到地上爬开始，到他被佟祥林捉住时为止，他的脱逃生涯前前后后一共是三十五分钟。在这半个多小时里，他爬行的路程也不过是五百多米。遗憾的是，他没有逃脱。要是再给他五分钟的话，他就可以跃上宽阔的公路，进入一片自由的天地。没想到追捕的行动那么快，恰恰是在这个要命的时候，三组的组员佟祥林发现了他。

两人之间还有一段非常有趣的对话：

“哎呀，杨世忠，原来你小子躲藏在这里呀？”

“小点声，小点声。”杨世忠恳求道。

“干什么？”佟祥林皱起了眉头。

“放我一条生路吧！佟哥，不然，我会被打死的。”杨世忠哀求道。

“不行！”佟祥林的态度很坚决。

“佟哥，我们还是老乡哩，我求求你啦！”杨世忠跪在那儿祈求道。

“不行！要是把你放走了，给我加刑呀？我还想减刑呢，我只要把你抓住了，我就可以减刑回家了。”

佟祥林放开喉咙大声粗气地喊叫了起来。

就这样，杨世忠被擒获了。

正像佟祥林所期待的那样，他因为抓获了杨世忠而减了半年的刑，减刑材料一下达，没过多久，他就高高兴兴地回家了。他的余刑本来就不长，照说是没有减刑的机会了，可杨世忠偏偏为他创造了一次减刑的机会。大家都说他是平地捡了一个钱包，让他出出血，表示表示。佟祥林倒不小气，就花了五十块钱请中队的所有犯人们看了一场电影，是香港的一部武打电影。

在佟祥林获得半年减刑的同时，杨世忠则是因为脱逃罪而被加刑半年。

徐队长对我说：“从杨世忠脱逃这件事来看，监内还是存在着不少的问题。特别是牢头狱霸敲诈勒索现象很严重，中队再不管管是不行了。一定要狠狠煞一煞这股风气。杨世忠完全是被打跑的他每天都被几个组长打，让他怎么活呀？他又是一个很沉闷的人，要是我们早一点知道他有脱逃的念头，早点做做他的思想工作，不仅是挽救了他，避免了他遭受加刑的处罚和皮肉之苦，中队的荣誉也不会像现在这样遭受损害了。”

的确如此，杨世忠抓到的时候，许多人都恨不得将他打碎撕烂。因为他的脱逃有可能会让中队的减刑指标减少，让中队实行严管，不准看电视、不准搞娱乐活动。同时，要延长学习时间，一早一晚出操进行队列训练等等。这叫黄狗子吃屎，白狗子遭殃，大家都受株连和拖累。可杨世忠脱逃的原因之一是徐队长所说的牢头狱霸敲诈勒索现象。有的犯人组长一天不打人手就痒，一天不吃点美食嘴就馋，那种架势，比土皇帝都还威风。新投犯刚刚来到监狱，心理上还很脆弱，充满着恐惧与害怕，早就听说监狱

黑得很。再碰上一个专横霸道、开口骂人伸手打人，还一味地敲诈别人财物的组长，那就要出问题了。杨世忠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是一个新投犯，来到二队没有多长时间，也属于类似于陈兵那样的“栽模子”，所以，三天两头挨打挨骂。只好铤而走险，与其被打死，还不如脱逃。

徐队长要在监内消除牢头狱霸和敲诈勒索现象。四组的几个组长，包括监督岗张峰在内都被撤换了，下了大组。不仅如此，徐队长还办起了事务犯培训班，制定了《事务犯违纪下大组劳动条例》。要求事务犯不准打骂体罚组员，不准私自上学习，不准私自安排劳动任务等。在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徐队长天天晚上进监号找犯人谈心，一谈就是好几个小时。

有一个例子很有意思，也是一个新投犯，叫周刚。他早在坐牢之前就听许多人说过监狱是如何如何黑暗。因此，一进入监狱，就装成一个瘸子，拄着双拐，一走一跛，避免被分到大组劳动，躲过组长把他打伤打残。开始，中队并没有识破他的骗局，将他留在了值班组，像孔中玉还活着的时候那样，在监内值值白班，打扫打扫卫生什么的。有一回，徐队长在白天悄悄地进了监号，来到了监号楼后面的水池子附近，发现周刚手上并没有拄着双拐，却是健步如飞。徐队长当时并没有将周刚揭穿。事后，徐队长多次找到周刚谈心，开导他，终于使他放下了手上的双拐。

由于徐队长在对犯人进行个别教育上花费了不小的功夫，也取得了不小的成效，他在这一年的年底被评上了省级“个别教育能手”，还去省城开了一次表彰大会。

棉田捉虫

这一年棉花田里的虫特别多，闹虫灾，弄得监内所有的人全

都得下大田去捉虫。监内不留一个人。正是夏末秋初季节，棉虫具有顽强旺盛的生命力，各种杀虫的农药对它们都无能为力。于是，只得改换灭虫战略，进行直截了当的人工捉虫。清晨是最佳的捉虫时机。

何文是个新投犯，而且还有那么一点文化。刚下田捉虫时，何文对生活在棉花田里的各类虫的第一印象是多姿多彩，第二印象是狡猾透顶。太阳刚出东门，还没有走多远，虫儿们就不见了影儿。在此后的捉虫行动中，何文用于装虫的小玻璃瓶子一直是空空荡荡的，只有底部浅浅地爬动着一些倒霉的棉虫。何文他们的组长江波声嘶力竭地喊：快点捉哟！要是谁的数量不够，回去统统吃家伙！

何文对虫子的第三个印象是令人作呕。到中午在田间吃饭时，何文捕捉的棉虫数量依然没有达到规定的标准，这使他心急如焚。然而，在他夹起一筷子白菜往迫不及待的嘴巴里填送时，猛地瞥见菜里有条不小的青虫。这正是所谓踏破铁鞋无觅处，来得全不费工夫。何文开始在自己的菜碗中以及搁在附近的菜桶里精心寻找着那些珍贵的虫们，然后悄没声儿偷偷地装进自己的玻璃瓶里。估摸着还不够数，他就又溜进一旁的菜园里，在那些参差不齐的各色蔬菜里捉了很多虫。何文对虫子的第四个印象是阵容强大。当他将几乎是满满一瓶子的各色虫子倒在地上，整齐地排列着，一条一条清点着数量时，同伴都以惊讶的目光望着何文，不仅因为他捉虫的数量比众人略胜一筹，还因为他的喜悦溢于言表。组长江波的脸上也好像有了罕见的笑容。

抽查何文的虫子时，江波的脸色阴晴不定，让人难以琢磨。一眨眼的工夫，可怕的乌云就占据了组长江波的脸颊，且双眸颤抖着，放射出阵阵阴郁的寒光。忽然他发出一种尖利如刀似的怪笑，江波飞起一脚，将何文连同他装虫的玻璃瓶子一起踢翻在地。

“他妈的，老实说，你这些虫是从哪里弄来的？！别把老子当傻瓜！”江波吼声震天。

“从菜园里捉的。”何文小声嗫嚅。

何文对虫子的第五印象是莫名其妙。晚上睡觉时，躺在吱吱作响的床上，耳边好像总有老鼠的欢声笑语。他悄声问邻铺的“地老虎”：“喂，江波怎么会知道我的虫不是在棉花田里捉的？”“地老虎”是方春的绰号，方春不仅矮得与众不同，而且也狡猾得与众不同。他躲在被窝里笑说，这还不明白么，菜园里的虫背上有细细的毛刺，还有很大的棱子，而棉花田里的虫却没有这些特征。末了，他狡黠地一笑说，其实他也去菜园里捉了不少虫，只不过，江波并没有找他的麻烦罢了。

这是为什么呢？何文大惑不解。

何文对虫子的最后一个印象是皆大欢喜。睡梦中，他恍惚觉得自己变成了一条蠕动的虫子。

我觉得何文搞劳动不行，文化水平倒不低，于是，我向徐队长提出建议，让何文担任文化教员。徐队长考虑了一下说：“过一段时间吧，何文来中队的时间太短了，先让他在大组里磨练磨练再说吧！”

一天，我也像何文那样在棉花田里捉着虫，突然我以前的同学苏石跃带来了一些水果和食物来看我。我们已经有很多年没有见过面了，我落难坐了牢，他倒来看望，叫我深受感动。我们坐在田边聊了好一会儿天。苏石跃说，他是去找了我的母亲才知道我在江南监狱坐牢。苏石跃颇有感慨，说我母亲老多了，两只眼睛都有些昏浊了。一提起我，母亲就热泪长流，悲痛不已。苏石跃的这些话宛如锥子一般戳在了我的心上。我对苏石跃说，我坐牢，实际上，家人比我更痛苦。父亲是为我而死的，母亲更是为了我的事情把心都操碎了。

苏石跃走后，我百感交集，写成了一篇题目叫做《母亲》的文章，重温对母亲往日的温馨记忆。

生日风波

在经历了四年多的牢狱生活后，我决定要过一个生日。这个生日不是我自己的，是同我已经走到了婚姻的边缘的一个女人刘芳芳的生日。她是我小说中的主角，更是四年来我梦中的主角。我把计划一说，艾奇等人立刻表示举双手赞成，并且要帮我张罗张罗。监狱里高墙电网之下，怎么样才能办一个像模像样的生日呢？为此，艾奇倒是替我出了不少的点子。

近年来，江南监狱也发生了许多的变化，例如，在犯人过生日这一天，伙房可以为这个“寿星”单独炒菜，以示庆贺。有时候是干部特意安排的，有时候是自己要求这么做的。

艾奇给我提建议说，将伙房特意给我的生日炒的菜端进监号里来。然后，他们几个人再凑一点菜或者是点心什么的，大家聚集在一块儿热闹热闹，庆贺庆贺。所谓他们几个人，无非是几个文化教员而已。这里面也包括了何文。何文如今也成了文化教员。

地点安排在二楼的宣鼓室。

不知是谁走漏了风声，临了，不仅仅是中队的几个文化教员来了，朱强也来了，还有张振、田贵、李金春、汪卫东、黄宪昌、屈高林、于波、金来源也都来了。

也没有什么东西好吃，无非是一些花生米、兰花豆、火腿肠、皮蛋、榨菜，还有一点炒菜。另外就是苹果、桔子和梨了。

一时之间，说什么话的都有。原想在宣鼓室里办一个特别的生日，弄到最后大家打打闹闹、扯皮拉筋、荤话连篇。我的脸色不好看，发起脾气来，于是大家都离开了宣鼓室，回到了各自的

监室。

没过多久，一场祸事却降临了。

还是在中队的宣鼓室里，不少人聚集在一起，因为白伟要满刑回家了，大家凑在一起吃一餐稍微像样一点的饭，以表示送行。

按照惯例，某一个人要刑满回家了，同监人聚在一起吃一点喝一点，这在二队已是常见的事情。到了后来，还发展到为刑满的人点播影碟、放场电影什么的。然而，自从二队达标以后，要在中队实行规范化管理，管得越来越严格了。监内不准搞小生活、不准喝酒、不准伙吃伙喝、互相串换食品等等。然而，猫子有猫子的政策，老鼠有老鼠的套路。这一天，白伟的老乡江波找到我，说是要为白伟满刑聚一聚。

我说：“那好呀，你们搞吧！”

接着我这个话茬，江波又说道：“尚宣鼓，我们几个人想来看看，觉得最安全的地方还是你那个宣鼓室。干部一般都不会去那儿。我们想在宣鼓室里请客。我们也准备请你。你不会不给这个面子吧？”

这让我觉得十分为难。白伟曾经担任过中队值班组组长，与我的关系还不错。他做事比较认真负责，每次集合点名的时候，他都拿个本子做纪录。只是他为人有些粗暴，性子烈。一遇到点名迟到的人，他二话不说，照别人的脖子上或是肩膀上就是一拳，再不就是照别人的屁股上来一脚。每次他夜里值班，也有耍滑头的时候，譬如说，他能站着睡觉，这是他多年来锻炼出来的功夫。因此有人说，他这纯粹值的是干部班，给干部摆出个样子。深更半夜，干部在门房那边往监号内一瞧，白伟还直楞楞地站在那儿值班，干部也就放心了，不用再进监内查岗查哨了。

监内最痛恨白伟的人是张自新。他当初曾端过张自新的一碗龙虾，让张失去了减刑的机会，为此，张自新一直怀恨在心。如

果白伟在宣鼓室里面请客，张自新会不会钻个空子，借机发难呢？考虑到这一层因素，我是不愿意让出宣鼓室请客的。再说，中队多次说要严肃查处监内的小生活，我何必在这个时候顶风而上，冒这个险呢？！问题的另一方面是，白伟与我的关系还不错，又是江波来找我开的口。江波是大组的组长，心狠手辣凶残狂暴，很多人在他的手下都吃过亏，诸如死去的陈兵、还有活着的何文、王国庆等人。尽管这样，干部还对他非常信任和器重，说他带组很有一套经验，把一个组带得服服帖帖。在劳改队往往是组长越残暴，组员越听话；组长越平和，组员越调皮。组员们都害怕江波，所以，江波带出来的组比别的组显得要规矩许多。出于策略方面的考虑，我不能与江波的关系搞得太糟糕。现在江波跑来找我，请求用宣鼓室请一请客，不答应不太好。我左右权衡，最后终于还是同意了：

“江波，你们要用一下宣鼓室也可以，不过我要强调一点，到时候你们可千万不要喝酒哇！”

事情就这样初步定下来了。

那个时候，监内基本上没有什么人敢搞小生活了，中队在这方面抓得很紧。谁要是闯了红灯，谁倒霉！我实际上为江波他们承担了很大的风险。

江波求我的时候答应不喝酒的，可是临了，应该请的人都聚集到宣鼓室以后，江波他们却变卦了，说是为老乡送行，怎么能够不喝点儿酒呢？我也不好再多说什么。只是当他们要我也喝点酒时，我无论如何都不肯答应，坚决地回绝了。他们也不再勉强。

出事的时候，我不在现场。当时我正在二楼的宣鼓室里看点东西。白伟和江波他们刚刚离开宣鼓室不久，宣鼓室里还有着很浓很浓的白酒气味哩。

忽听楼下传来阵雷一般巨大的声响——比当初黄宪昌跳楼时

的动静要大许多倍，这让我立马心惊肉跳起来。等到我从楼上跑下去，下面早已打成了一锅热热滚滚的粥。只见人影幢幢，拳头纷飞。后来是中队干部提着电警棍和手铐等进了监号，才把打架的人驱散，并且把主要的肇事者带到门房外面问话去了。

原来别人针对的是江波。当初王国庆还在大组里的时候，经常遭到江波的殴打与敲诈。后来，王国庆通过他那当园林工程师的父亲给二队进行了一番绿化和美化。中队就照顾王国庆，将他从大组里调出来，安排进了值班组。王国庆想将江波好好地收拾一下。他还寻找了自己的同盟军，选定朱成来充当自己的帮手。朱成孔武有力，身体结实，肩膀宽厚，胳膊上的肌肉是一坨一坨绷得很紧，是一个会打架的人，能够冲锋陷阵。

朱成这晚发现江波在宣鼓室里喝酒，便找到王国庆说：“三六，你不是一直想收拾江波吗？现在机会来了！江波在楼上宣鼓室里喝酒，等酒喝完，江波下来之后，我们把他约到监舍楼后面的水池子附近再动手。中队明文规定不能喝酒，我们就抓住江波这个把柄，把他修理一顿。打完了之后，再把他往干部那儿拖，就说他在监内喝酒，我们打他是有道理的，是执行中队的规定，是为了维护监内的秩序。还有，要是干部问起来了，我们就一口咬定，只看见江波一个人在喝酒。千万不要把别人牵扯进去，不要树敌太多。”

楼上宣鼓室的酒喝了好长时间。

江波喝得醉醺醺地下来了。他一摇一晃地走进了自己的监室，想躺下来休息一会儿。一切都像朱成所预料的那样，王国庆将江波引诱到了监舍楼后面的水池子附近。江波就踉踉跄跄地跟着王国庆来到了监舍楼后面的水池子附近。王国庆上去一把抓住江波，抡起他那早已攥出了汗水的拳头，劈头盖脸地朝着江波打去。江惊惶失措地喊叫了起来：“打人啦！打人啦！”

一直藏匿在附近的朱成一下子跳到了江波的面前，拳脚就像一阵狂风暴雨似地砸向江波，直把江波打得东倒西歪，有几次还跌倒在了地上。他也顾不得自己昔日的体面与名声了，撕心裂肺地喊叫了起来：“打死人了！打死人了！”边喊边往前面跑。

犯人们在监号楼的后面打架，前面的人往往听不见动静。少数犯人一旦有了矛盾与冲突，又不想让干部来解决，两个人便会相约到监号后面进行单打独斗，以决定胜负输赢。赢的人就不用说了，输的人呢，即使被打掉了牙齿，也只能往肚子里吞，不能向干部报告。这是规矩，必须遵守。否则的话，名声就会在监号里臭不可闻。这会儿，江波拼命地往前面跑，不仅是全监号内的犯人都被惊动了，连门房里的干部都大惊失声。一向只有江波打别人的份，这时，江波被别人追得满院子跑，倒是新鲜的事儿。跟江波相好的一些人立马跑上去帮忙，一时间也分不清谁是谁，乱打一气，大家打成了一锅粥。

干部进来后，将相关的人带出监号，带到门房那边问话去了。

听说，在门房那边，当干部问起打架的有关细节时，江波说，是王国庆和朱成两个人动手打了他。朱成则说，他没有打江波，他当时只是在那儿拉架，劝说两个人不要打了。王国庆则一口咬定，他是出于正义制止江波喝酒维护监管秩序，并且还是江波先动的手，他是被迫进行还击。

干部就让江波、王国庆、朱成等一干人先回监号休息，等明天再对此事做出严肃的处理。

谁知一帮人进了监号不一会儿，又打了个不亦乐乎。这一次是江波这边的人出手打的，主要是打王国庆。看到自己的组长江波被打得头破血流，江波所在的那个小组的许多组员都愤怒了。这其中不乏以前挨过江波的打的人，可是这会儿，有人欺负了他们的组长，这里面有面子和尊严问题。所以，他们一致把枪口对

准了王国庆。朱成倒是乖巧得很，他从监狱大铁门外面一进来，逢人就说，他当时只是在劝架，所以，后来竟没有什么人去打他。只有王国庆挨打，有二、三十人一拥而上，将他打得满监号抱头鼠窜。

干部们恼怒极了，电警棍到处乱杵，手铐都弄坏了，这才将事态平息。这个时候，干部已经知道了江波是在宣鼓室里喝的酒。喝酒的人当然不只是江波一个人，还有其他的一些人，于是，这些人都迁怒于王国庆，认为是他坏的事，要不是他搅局，干部是不可能知道有人在宣鼓室里喝了酒的。所以，愤愤不平的人，特别是像白伟这样的人，就再一次将拳脚朝着王国庆踢打了过去。到后来，连干部的电警棍和手铐都失去了威慑的作用，犯人们都红了眼，什么都不怕了。

我也在到处劝架，拉了这个扯那个，偏偏在这个乱糟糟的时候，差一点跟邱队长撞在一起。邱队长正憋着一肚子的气和火，一瞅见我，当即暴跳如雷地吼叫了起来：“尚建国，这都是你们干的好事，喝酒，喝酒，居然把宣鼓室当成了饭店酒楼啊。”

邱队长吼倒是吼，可嘴里还算干净，没有吐出一个骂人的脏字。等到徐队长朝我发火的时候，他竟一反常态，一开口就是：

“尚建国，你妈的个B——”

我也火了：“徐队长，有事说事，你不要骂人啊！”我当即顶了回去。

“老子今天就是要骂你，怎么样？”

徐队长不知是怎么搞的，脸红脖子粗地冲着我又骂了一句。

“徐队长，你再骂一句试试！”

我当时也准备豁出去了。

我与徐队长的冲突起到了意想不到的特殊效果，刚才一直不听劝阻，都打红了眼的众人一见我与徐队长冲撞起来，觉得特别

稀罕，纷纷停止了打斗，朝着我和徐队长这边围拢过来。

还好，徐队长当时并没有延续他的愤怒和叫骂。他忍了忍，瞪了我一眼，便拉开铁门，往外走去，一边“咣当”一声将铁门关上了。

稍后，监号内的打斗平息之后，干部对有关人员该处罚的处罚，该教训的教训，这里面也包括了我。批评我不该让人在宣鼓室里喝酒。到头来，该受的惩罚都受到了。监号内的犯人们这才渐渐平静下来。

第二天徐队长出去开了一整天的会。晚上九点多钟，徐队长一个人进了监号，来到宣鼓室找我谈话。他向我道歉说：“尚建国，我昨天晚上不应该骂你。当时我太恼火了，无法控制住自己。”

徐队长这么一说，我有些不好意思了：“徐队长，你别这么说，我也是有责任的。我觉得这里面最根本的问题，还是要遏止和铲除牢头狱霸。如果没有江波以往的作威作福和敲诈勒索，也就不会有昨天晚上王国庆那种报复行为了。”

徐队长半天没有吭声，过了好一会儿，他说：“昨天晚上的打架事件，在我们干部中间引起了很大的争议。有的干部说，搞个什么文明管理？这倒搞得挺好，搞出鬼来了，居然在监号里一连打三架，连干部都不放在眼里，连电警棍和手铐都不起作用了。要是早些年，管理方法虽然粗暴一些，野蛮一些，可是有效果呀！谁敢在干部面前说个不字？稍有什么地方不对劲，我警拳警脚早上去了，哪里还有他闹翻天的时候？真是笑话！”

我不好插嘴说什么，只能抽象地说文明管理是大趋势。在监狱实行文明可能会带来一时的麻烦与问题，但总的说来，实行文明管理的好处是非常多的。我举了一些例子，包括了像跳楼的黄宪昌、死亡的陈兵、脱逃的杨世忠等人的事例。如果在管理方法上更文明一些，更妥当一些，也许就不会发生那些十分糟糕的恶

性事件。我还建议，类似江波那样的人，不能再当组长了，他们好像是能把一个组管下来，好像是有那么一点儿威信，但实际上，他们做出的许多事情都还得要中队干部替他们揩屁股，收拾残局。弄得不好，还会把手下的组员打伤、打残、打跑、打死。我说，昨天晚上打架是有很复杂的原因和背景，但中队决定将江波调离二队，这对二队以后的管理是有好处的！

徐队长对我的一些观点是赞同的。临离开宣鼓室之前，徐队长交待说：“从整个中队的情况来看，大家的文化水平偏低，但这里面还是有一些初中生、高中生、中专生，还有大专生。你是一个研究生，你能不能把这些文化层次高一些的人组织起来，给他们讲讲课，辅导辅导。。还可以把他们组织起来写写稿，投投稿，出出小报什么的。”我点头说：“好。”

就整个二队来说，文化水平确实偏低。很多人的身上还存在着显而易见的流氓习气及各种其它恶习。单是那身上的纹身就可见一斑。张振的左手上纹了一只蜻蜓，右臂上则纹了一个“杀”字。夏涛的右臂上纹两把交叉的斧头，左大腿内侧纹一美女图像，图像还特别大。田贵左大腿纹一行“东方不败田贵”。李金春左臂纹一条青龙，右臂纹龙虎图，胸部纹交叉剑两把及一尊罗汉像。

这很不好。至少是我看了都不舒服。

我现在是落到了生活的最底层，在炼狱里经受煎熬，但我毕竟还是文化人，我应该做一个文化使者来传播文化和知识。和徐队长谈话后，就与弟弟尚建武联系，让他把我留在沙河市母亲那儿的一些书籍与杂志全都捐献出来，在二队办起了一个小型的图书室。另一方面，我在监内给文化档次高一些的学员讲课，传播和灌输一些文化知识。还依照徐队长的吩咐，在监内组织人写稿投稿，还办起了油印小报。中队有那么一台老掉牙的油印机，每

一次油印什么东西的时候，都会弄得人手上脸上到处都是那黑黑的油墨。

我还向徐队长提出建议，在中队的学员们中间开展民主评议活动。一个月下来，每个组的组员都要对他们的组长进行一次民主评议，就他们的组长在这一个月里的表现说出个子丑寅卯来。不管怎么说吧，就是要对他们的组长品头论足，实际上是行使一种民主的权利，从而遏止监内的牢头狱霸和敲诈勒索行为，防止类似于江波那样的人和事在监内肆意横行，大行其道。

白伟在满刑前的最后一个晚上对我说：“尚宣鼓，你知道我在二队几年来的最大收获是什么吗？”他的脸上浮现出一种怪怪的歹毒的笑，怪异而阴森。“我告诉你吧，那就是，我做人的最后一点良知在二队被泯灭了！”

在我的追问下，白伟做出了一番解释。他说，他是因为盗窃罪而来二队的。以前，他仅仅会偷东西，可是，在二队这么一个环境里，一个充满着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环境里，一个五毒俱全、强者为王的环境里，他浸泡了几年以后，他不仅巩固和提高了自己原有的本领——偷，而且更是学会了全套对付人的能耐——坑、蒙、拐、骗、哄、诈、吓、糊。白伟这么说，显然对江波事件的处理有意见。江波是他的老乡，又是为他刑满而安排的送行酒，江波那天晚上吃了那么大的亏，让人打了个一塌糊涂，最后还被送去严管。这么一个结局，白伟难以接受。在江波被送去严管之后，白伟也在监号里受到了王国庆和朱成的欺负与羞辱，白伟势单力薄，不敢与之抗衡，只能忍气吞声，在刑满前的最后几天装孙子，免得遇到更大的报复与打击。连张自新都不肯饶过他，只要一有机会，张自新就会当众辱骂他几句，他也只能佯装没有听见，吃个哑巴亏算了，以免惹出更大的麻烦。

最后，白伟还对我说了一句话：“二队的干部，我在这里是

斗不过他们的。不过，出去以后，我肯定会去告他们。我这一手，也是跟干部们学的。”

张振的悲剧

江波调离二队后，张振接替他担任了三组的组长。三组是个老犯组，不好带，里面有许多难剃的刺儿头。张振在三组干了一段时间，效果还不错。可是，这个时候，他的家里出事了。

张振以前在江南监狱机械厂，后来才来农业中队。

据张振说，机械厂那边很舒服，是工业单位，上下班都很准时，不仅是生产劳动没有农业中队这么繁重，连监规队纪也没有农业中队这么严格和苛刻。然而，机械厂好是好，但是付出的代价也不小。四处托人找关系，塞红包，却是只能管一年。年年都要塞红包，年年都要经营关系，张振的家庭经济状况太好，在机械厂舒服了一段时间之后，他便被送到了二队。

就是在二队，张振的家里也花费了一些钱，不过没有机械厂那么多。有一次，他的哥哥张勇来二队探望他。张勇看上去要比张振年轻多了，他的脸庞很英俊，一片黑黝黝的秀发披在前额上。上一回张勇来二队探望张振，在路途上出了车祸，据说是一个独眼司机开着一辆已经报废了的中巴车，将张勇碾了个血肉模糊一命呜呼。出事的地点距离二队很近，那是一个三岔路口，来来往往的车很多，附近还有不少单位，车也多，据说那个地方是事故高发地段。张振家里人怕张振听到他哥哥死的消息后受到刺激太大，所以没有及时通知他，更没有让他回家去参与丧事。

失去亲人的悲哀与压力让张振走路时耷拉着个脑袋，仿佛是在为他哥哥送葬似的。他哥哥平日里给他送来的一些东西，也让他扔进火里烧掉了。他说，这是为了祭奠他的哥哥。

眼看着张振的刑期一天一天地缩短了，距离他回家的日子是越来越近了。这一天，张振的父亲来二队看望儿子。为了儿子能早一点从监狱里出来，张振的父亲一直是节衣缩食，从牙齿缝里刮出几个钱来，好给儿子买点吃的、喝的、用的，还要打点打点一些关系。张振的父亲是能节省一分钱是一分钱，从家里步行走到二队，他舍不得花费车钱。一路之上，不断地吹着冷风，等到了二队，张振的父亲已经是又饿又冻，却给张振带来了不少好吃的东西。

接见结束临走之时，张振的父亲说：“儿呀，我下个月中旬再来看你，给你带点好吃的东西。你想要点什么？”

张振则是摇摆着粗壮的手说：“爸，我什么东西都不要。我还有几个月就要回家了。你再不要到监狱来了。路途那么远，你又不愿意花钱坐车，来来回回跑得累死人了。何必呢？”

或许是由于饥饿的缘故，张振的父亲说起话来都有些喘息：“我这一趟，就少一趟。只希望你能平平安安地早点回家。家里就指望你了。”

开饭的时候，张振喊我，说他老爹带来了一些菜，让我也去吃一点。我说不必了，可是张振硬是要把我拉扯过去。几个人围在一起，你一筷子，他一匙子，吃着张振的父亲从他们家里带来的一些菜肴。

在二队吃饭这个问题上，有一个分水岭。其标志是——放开主食，集中就餐。在此之前，不用说菜了，很多人连饭都吃不饱，常常处于饥饿或是半饥饿的状态之中。主食放开、集中就餐之后，吃饱肚子的问题是解决了，大家可以敞开肚皮吃了，然而却要求在就餐时间，所有的人都要集中在一起，排好队，清点人数，发出口令——蹲下——一排一排蹲好，保持适当的距离。按规定、按秩序排队打饭打菜，然后再回到先前的队列里，规规矩矩地蹲

在那儿用餐。某一个人或是某些人吃完饭后，还不能擅自离开就餐场地，必须是按组离开，一个组一个组地离开。以小组为单位蹲在那儿也是有讲究的，要按照连环包夹规定的位置蹲，不能乱蹲，不能错蹲。一旦发现了，就会受处罚。小组也要受牵连，扣去小组文明竞赛的相应分数。那样一来组长的脸上就没有光彩了。

就餐吃饭的姿势是一个字——蹲。

进出就餐场地的行动要求是一个字——齐。人要齐，队伍更是要整齐。

对吃饭的要求就是一个字——净。碗里的饭一定要吃干净，不能有剩余的饭。一点都不能有。若是违反了这个规定，那就会受到很严厉的处罚。目的是为了杜绝浪费粮食的现象发生。

张振的父亲来监狱看望他的那一天，张振硬拽着我去他那儿吃点菜，说是他家里的菜味道特别好。因为围在那儿的人很多，我只呆了一会儿就离开了。临走时，张振还特意往我的碗里挟了好多菜。

按规定是不能伙吃伙喝互相串换食品的，可是在事务犯当中总是有一些特殊的人和特殊的事。尤其是大组的组长们，不论是他们自己接见了，还是他们手下的组员们接见了，只要是那一天有菜，他们便会邀请一些相好的事务犯围拢在一起热闹热闹，算是一种变相的请客，礼尚往来。到下一次，他也同样会受到别人的邀请，这主要是事务犯之间的应酬。一般的组员，不会有这种机会，也不敢如此张扬。他们接见了，主要的食品大部份会孝敬给组长，剩下的一点儿也只能是自己悄悄地吃。

张振现在是大组的组长了，他在监内的应酬与交际就日益频繁了起来。到了张振接见的第三天黄昏，他再一次得知了一个噩耗——他的父亲也葬身于车祸，几乎是重演了他哥哥张勇几年前的悲剧。也是独眼司机，也是已经报废了的中巴车，也是在那个

三岔路口，也是被辗得血肉模糊。上一次张振的哥哥张勇是死在前往二队的路途上，而这一回，张振的父亲则是死在刚刚离开二队的路上。

噩耗虽然晚到了两天，但还是像惊雷骤至一样，一下子把张振给打懵了。干部在告诉他父亲死讯之时，特意将他从大田里喊回了监号，将他控制在高墙电网下的监号里，就是害怕他出什么事！张振突然向监狱大铁门冲去。门房干部着急了：“张振，你要干什么？”

张振血红着圆溜溜的眼珠子说：“报告干部，我要回家！我要见我父亲最后一面，我要回家去为我父亲办理丧事。”

干部隔着大铁门的小窗口说：“张振，我可没有这个权利放你回家去。我要是那样做了，我这饭碗就保不住了。”干部说的是实话，他没有权利放张振回家。中队没有这个权利，连大队也没有这个权利。就是到了监狱领导这一级，也是要再三斟酌。犯人要回家奔丧，材料报到监狱领导那儿，签字批准的时候，监狱领导都特别小心翼翼，生怕出现什么差错。监狱领导都尚且如此，那么，中队又有哪个干部敢批准让张振回家呢？

无可奈何的张振只好扑通一声跪在了门房那儿，声泪俱下地请求干部发发慈悲，放他回家，让他回家去为父亲尽最后一点儿孝心。干部费尽口舌解释，都没有办法将张振说服，便只能任由他跪在那儿磕头如捣蒜，额头都磕红磕紫磕破了。到后来，张振不磕了，他只是静静地跪在那儿，脑袋仰了起来，目光扫射着监狱大铁门两边的墙壁。为了来监狱探望他，他的两位亲人，都先后献出了生命，在同一个路段，同一个地方，惨死于那可诅咒的车轮之下。上天这是在惩罚他吗？

哀求无望，回家无望，奔丧无望。最后，张振不知是从哪里摸出了一把干农活的铁锹，一下子将自己的左手五个手指头全都

剁了。后来，我们问张振为什么要把自己的手指头给剁了，他说：“我的老爹死了，我又不能回去奔丧。老爹临死前还给我送来了那么多好吃的菜，我现在没有别的东西给他老人家，只能把自己的手指头剁下来了。再说，这些指头也是我爹妈给我的。”

说着说着，张振的眼泪又流下来了。

张振这么一说，又让我想起了自己的父亲和他的死。这几年里，二队的犯人家总是隔三岔五地会死人，可是，死的差不多都是犯人的父亲，而很少死母亲。或许是母亲的生命更有韧性、更有耐力一些吧！

时间是医治心灵创伤最好的良药。一段时间以后，张振开始平静下来。

此后好长一段时间，别人家里再有接见带来了什么东西请我去吃，我通常都不会光临。因为我老觉得张振父亲临死之前带来的东西，一直像石块一样堵塞在我的肠胃里，不能消化。

这一天，徐队长把我喊到门房那儿对我说：“尚建国，沙河市六中的学生要来我们中队参观学习，接受教育，学生们很快就要到了。人家指名让你给他们的学生讲一课哩，你准备准备吧，等一会儿就要讲了。”

我心里不大乐意，便试探着推辞道：“徐队长，学生们要来二队参观，这是好事。但让我去给他们讲什么课，这不大好吧？”

“在来之前，他们学校的金校长已经在电话里对我说了，他们学校这一次派到我们二队来参观学习的一些学生，都是比较调皮捣蛋的。学校让他们来监狱里看看，就是想让他们受点教育，如果在学校里不好好学习，不听老师的话，整天调皮捣蛋的话，等长大之后，说不定哪一天就会触犯刑律，被判刑，然后就会被送到监狱里来坐牢。金校长的意思是，要多给这些学生们说一说监狱的真实情况。通过参观学习，让这些学生们受到教育，害怕

监狱，从而在心里树立起一道警戒线。”

我算是明白了，原来是要对学生们进行恐怖教育呐！我心里不再别扭了说，就答应下来。

徐队长说：“你去通知一下值班组和留在监内的一些人，让他们把环境卫生和室内卫生都搞好。”每一次只要外面来人，不管是什么人，监内都得把卫生搞好，到处都得搞得干干净净的。

值班组长一听说是沙河市六中的学生要来，兴奋得立马从床上跳了下来，然后扯起粗嗓子一个劲地喊道：“值班组的人都起来噢，赶快搞卫生，沙河市六中的学生很快就要来了。”紧接着是开始分工：谁负责打扫操场，谁打扫走廊，谁清理监号，每个人都有具体的卫生任务。

到了快要吃中午饭的时候，六中的学生们才浩浩荡荡地进了二队的监号。在此之前，他们还到二队的大田里去看了看，参观了二队犯人们劳动时的场面。进了二队的监号，徐队长对我说：“尚建国，先让值班组的人招呼这些学生们吃午饭，吃与大组一样的饭菜，让他们也体验体验大组的生活。”

这时，我也弄清楚了沙河六中那边为什么偏偏指名要我给学生们讲一课的原因。邬小梅是沙河六中的老师，多年以前，当我在读研究生的时候，邬小梅恰好在那个大学里读本科。因为同是沙河人，算是老乡，彼此有些共同的爱好，相互有些好感。她是一个难得的好女孩，但我们之间并没有进一步情感的发展。研究生毕业后我去了深圳，和邬小梅也没有多少来往了。不曾想，我都已经在沙河市江南监狱坐了好几年的牢了，这个时候，邬小梅却带着她的学生来到二队参观学习，还偏偏要我给她的学生们讲一课。

邬小梅还是那么优雅，她穿着一款质地很好的衣服，她的衣领里衬着一块丝巾，这着装的风格实际上体现了她的性格：优雅

而又谨慎，把自己的美丽呵护得是那么小心翼翼。

学生们吃完午饭后，参观了一溜儿排开的每一个监室。不用说地面是如何干净、被子叠得是如何整齐了，单是那漱口用的牙膏牙刷牙杯，都朝着同一个方向摆放得规规矩矩一丝不苟。还有清一色洗脸用的毛巾，挂得齐整，像是刚刚从外面买回来的。

监室外面的走廊上、操场上、花坛上、地毯草上也找不出什么杂物、纸屑等等，连花草树木上的落花与落叶都很难发现。总之，是干净到家了。许多学生都在惊叹道：“这监狱好呀，比我们学校都要干净多了！”监狱给学生们一个良好的印象。可是听了学生们的惊叹，我的心里却显得特别沉重，像是有什么东西坠在那儿。

在沙河六中金校长的掌声里，我上台讲课，很激昂地说：“同学们也许会觉得这监狱不错，这二队不错，可是你们知道吗，你们看到的仅仅只是表面现象。”

紧接着，我分别从衣、食、住、行等几个方面介绍了一下监狱的情况。衣的方面，是破衣烂衫；食的方面，是难以下咽，我说学生们吃那么一餐，由于新鲜与好奇的缘故，会觉得还不错，等到日复一日地吃这些东西的时候，你想哭都找不到地方哩；住的方面，是奇臭难闻。我说同学们，你们看到的监室干净卫生又整洁，可是你们知不知道，每天晚上收工以后，十几个人在一个小小的监室里进进出出，特别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十几个人的呼吸碰撞在一起，十几个人的汗味纠缠在一起，十几个人的脚臭交织在一起，到了那个时候，你们再来看看是一副什么样的景象，是一种什么样的味道；行的方面，是寸步难行。我的意思是说，坐牢剥夺了犯人的自由，如果不得到干部的允许，犯人是一步都不敢随便乱走的。

我在中队大会议室的讲台上这么讲述着的时候，我注意到，

下面的学生倒是听得聚精会神津津有味。在那些学生当中，也有女学生，当我的目光一遍又一遍地掠过台下的那些女学生时，我的思绪不知为什么会突然向我的女儿飞去，我突如其来地说：“同学们，我有一个女儿，跟你们的年龄差不多，只可惜，她现在不在我的身边。”也就是这么一句话，竟然使我不禁悲从中来，女儿好像成为我情感的禁区或者说是雷区吧，只要稍稍一碰触，便会将我炸个粉身碎骨皮开肉绽。那时，我在顷刻间土崩瓦解，一脸的滚滚泪水，再也讲不下去，只好奔出了会场。后来，任凭金校长怎么样磨破了嘴皮子劝我将演讲进行到底，邬小梅、甚至徐队长都来劝了，可我却不敢再去面对那些类似于我女儿一般清澈圆润的眼睛。就这样，这次讲课居然是被我的突然袭来的悲恸给葬送了。

多年来，为了我女儿能健康快乐地成长，家里人一直对她隐瞒了我在坐牢这一事实。当我从监狱里回家奔父丧时，女儿并不知道我拥有一个极为特殊的身份——“囚徒”。在办理丧事的整个过程中，她冷静地始终没有流下一滴泪水，显示出了一种与她年龄极不相称的成熟和老练。

我坐了将近九年的牢。等我从江南监狱里出来，即在我女儿十八岁那一年，她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国内的一所著名的重点大学。在这里，我很想说一句话——我很感谢她的妈妈。假若没有她妈妈的精心培育，她不可能如此争气和优秀。如果说，我是在坐牢的逆境中获得了些许生活的智慧、勇气与力量的话，那么，我的女儿也是在一种艰辛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

开放香烟

两、三年以前，在二队曾经有过一次戒烟行动。在那次长达

两年多的戒烟行动中，有许多犯人付出了惨痛的代价，遭受最多磨难的还是非屈高林莫属。有一天，在中队召开大会的时候，邱队长居然眉眼生动地笑着说：“我现在代表中队向大家正式宣布，从今天开始，中队决定开放香烟！这也就是说，大家又可以抽烟了。”

听着邱队长的宣布，人们都大惑不解，屈高林似乎是什么也没有听明白。邱队长接着解释道：“当初，中队实行戒烟，是为大家好；现在开放香烟，还是为大家好，总之是为大家好。”大会结束之后，屈高林找到我，一副可怜兮兮的苦瓜样儿：“尚宣鼓，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情？当初，中队实行定量供应，每餐每个人只能吃半斤饭，许多人都吃不饱，我也是吃不饱。不过，那个时候我学着控制自己的饭量，渐渐地，我的胃缩小了，慢慢适应了中队的定量。我每餐就吃半斤，居然是恰到好处，不多不少。等到我刚刚适应监狱的饮食习惯，中队却又突然放开主食，让大家敞开肚皮随便吃。我当时真是不知如何是好，究竟应该多吃还是少吃？这都不说了。抽烟这件事就更难说了。中队一会儿不让抽，一会儿又让抽，也不知是怎么一回事情。”

我打断了屈高林的絮叨：“哎呀，你屈高林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情呢？你既然是个著名的烟鬼，现在中队允许你抽烟，你就偷偷地抽吧！”

屈高林也要起了性子：“尚宣鼓，以前中队戒烟的时候，那样惩罚我，都没有让我把香烟给真正戒下来；可是从现在开始，尚宣鼓，你看吧，我绝对再不会抽一支烟了。要是我犯了规，天打五雷轰，我全家人都死绝。”

屈高林发着毒誓。我却是苦笑着摇摆着脑袋。

一段时间以后，我发现屈高林果然戒了烟。别人给他烟抽，他都不抽。有人甚至把香烟硬塞进他的嘴里，他还是不抽，还乱

骂那些逼迫着他抽烟的人。

铁打的监狱，流水的犯人。

在服刑的近九年时间里，我先后与上千名犯人在一块儿呆过。监狱总是这个样子，有的人被判刑送来了，有的人刑满释放了。当然还有别的一些情况，诸如保释、假释、保外就医、正常死亡、非正常死亡等等，所有这些与之相关的人，都会离开监狱，而回到自己该去的地方。

有些犯人的离去，却与我的监狱生活发生了联系。例如，金来源的刑满释放，就给我的生活带来了一定的影响。金来源是中队的内统，其职责之一，是管理犯人的零用金。他是个正儿八经的会计师，因为贪污而坐牢。对于管理账目来说，他是一把好手。中队零用金这么一点儿区区小账，他只花费天把的时间，就能将一个月的账目弄得清清楚楚。中队还另有个女干部会计，名叫黄灿，还没有结婚。人倒是长得挺漂亮，就是有点儿懒，不大愿意管事。照说，犯人零用金管理的工作应该是由她来负责，可是她懒得管这一档子事。加上服刑的犯人全都是光头男人，黄灿是一个未婚女青年，与监内的犯人打交道有些不方便。因此，黄灿便将她的权利下放给金来源，自己很少过问。

问题也就出在这个上面。

金来源会管账，又精明，他做出来的账目总是无可挑剔。可是监内却总有人反应，说金来源在零用金账上做了手脚，有贪污现象。只是中队一直没有抓住他的把柄，也看不出什么破绽，不好把他怎么样。徐队长找到我，开门见山地说：“金来源还有一段时间就要满刑了，不少人对他有反应，说他的账目有问题。从现在开始，你就把金来源的零用金账目接管过来，看看能不能从中找出一点什么问题。你也知道，中队现在的人是越来越少，劳动力严重不足。你们刚刚来二队的时候，二队有两百多名犯人，

整个监号到处都住得满满的。现在只有一百多人了，如今是走的犯人多，来的犯人少。依我看，等到你离开二队的时候，我估计恐怕连一百名犯人都不到了。”

我有些迷惑不解，便问道：“徐队长，社会上不是一直都在搞严打吗？怎么越是严打，这被判刑坐牢的人居然是越来越少了呢？”

徐队长皱着眉头，苦笑一笑说：“现在无论干什么事情都可以使用经济手段。我给你算一个账吧：如果一次抓了六个人，派出所可以放一个人；公安局可以放一个人；检察院可以放一个人；法院可以放一个人，只要有关系有门路有钱，每一个司法程序上都可以放一个人。剩下两个差一点的，好不容易送到监狱来了，其中还有一个能在监狱上层找到关系。于是，那个有关系的人就可以被安排到相对要好一些的服刑单位。剩下这个最差的，才被送到像我们二队这样条件非常艰苦的农业中队。这么一来，我们这样的农业中队人数能不锐减吗？中队差不多有将近三千亩土地，现在大组里真正种田的人还不足一百来号人。每个人平均差不多要种将近三十亩地。劳动力严重短缺，大田里缺人手呐。在这种情况下，中队只能在内部挖掘潜力。压缩杂务摊点，减少杂务人员。畜牧组那边准备将几口鱼塘交给老百姓去管，由老百姓去承包喂养。猪呢，中队也不打算养了，以后伙房要加餐吃肉，中队也没有猪可杀了，只能去外面买。不仅是畜牧组要减人，菜园组、伙房组、耕田组、杂务组，连值班组都要减人。值班组现在不是每一个班三个人嘛——前面一个巡岗，后面东边一个定岗，西边一个定岗。中队打算以后每班只安排两个人，前面一个巡岗，后面只放一个定岗算了。自从文明化中队达标验收以后，这监狱四周的围墙也加高了半米，想脱逃恐怕也不是那么容易。自从把狱霸江波送到一队去严管之后，中队另外还撤换了一些不合格的

事务犯，又在监内开展了事务犯民主评议活动，这监内与以前相比，要平和稳定多了，个别人就是想脱逃，也没有什么下手的机会。我想在监内值夜班的，每班只安排两个人，应该说是没有多大的问题。说来说去，还是人手太紧，施展不开。中队想尽量充实大组，把人都安排到生产第一线去，我们准备让一些人，包括金来源等人在内，让他们接受出狱教育，让他们下大组去重温艰苦劳动。这是有好处的，只有在监狱里吃尽了苦头，他们回到社会以后，一想起监狱就害怕，他们才不会重新犯罪。”

徐队长让我管零用金，我实在不愿意，便说：“我根本不会做账，不懂得如何弄账目，这可怎么办呢？”

徐队长说：“正因为你不懂账目，我们才决定让你来管零用金。金来源非常精通作账，可是他处处捣鬼，我们都弄不清他究竟耍了一些什么花招。”既然徐队长这么说了，我不好再说推辞的话。

徐队长又补充了一句：“尚建国，中队干部信任你，认为你诚实可靠，所以才把零用金的事交给你来管。交给别人，我们还不放心呢。希望你把这件事情干好。”就这样，我接替金来源将零用金管了起来。而金来源则下了大组，接受中队安排的出狱教育。

“劳改队里的人翻脸比脱裤子都快”，这是大家喜欢说的一句话，就为我接手续管零用金这件事情，金来源居然和我翻了脸。金来源到处跟别人说，是我在干部面前打了他的报告，才使他在即将满刑前，还下大组，接受什么出狱教育。而我也如愿以偿地管起了零用金。

管零用金是有一些好处。别的不说，单是这吃的喝的吧，以前金来源就没有缺过。大组的组员平日里喝的是凉水，有时候喝的还是田边水沟里的脏水，颜色都怪怪的，或是发黄发绿，或是发红发黑。组长们能时不时地喝点开水，好一点的，还能经常喝

点糖水，甚至是冲点儿奶粉什么的。金来源连白开水都不喝，只要他一端起杯子，就不断地往手中的开水杯子里加着白糖和奶粉。而他家里人又很少来看望他，很少给他邮寄什么东西。可见他很可能是从零用金的账上捞到了一些油水。

尽管金来源冤枉了我，可我却并没有与他计较，更没有打算去揪出他的狐狸尾巴，像徐队长对我交待的那样，查一查他到底搞了一些什么鬼，耍了一些什么花招。可是，等我真正接手此事后，才发现现实里面有许多的问题。

犯人在监内最大的消费当数香烟了。戒烟那段时间就不用说了，自从中队重新开放香烟之后，这个问题又突现出来了。盘踞在二队附近的几个黑店，这个时候都活跃起来了，不仅将香烟卖给犯人们，还捎带着卖一些白酒及用于烧火炒菜的酒精之类的东西。为了铲除这些黑店，中队干部绞尽脑汁要将他们迁走。这些店主们全都是一些就业痞子，当初也都是曾经在江南监狱里服过刑。他们当中，有原国民党军队的官兵、有土豪地主、有土匪、历史反革命等等。他们在江南监狱服刑多年，后来有的人平反了，有的人刑满了，虽然不再是犯人，可是没有别的地方可去，或者说是当时不让他们去别的地方，于是，就安排他们留场就业。当时江南监狱还叫江南农场，即是所谓的劳改队，专门从事农业劳动，以改造思想脱胎换骨。监狱总部称作总场，下面是分场，即后来的大队，再下面便是中队——关押犯人最基层的单位。现在虽然叫江南监狱了，可是有些带有历史色彩的称呼，譬如说总场、分场、大队、中队等等都在日常用语中被承袭下来。同样如此，有些历史包袱也被承袭下来，例如这些就业痞子。他们的年龄都很大了，工资收入又很低。为了贴补家用，便就近做点小生意，眼光也就盯在监狱中服刑的犯人。他们熟悉犯人的生活，做起犯人的生意来驾轻就熟，手到擒来。

现在中队干部却不允许他们这么做，要把他们撵走。他们现在毕竟不是犯人了，不会那么听话。为此，就与中队干部之间发生了一些冲突，甚至到了顶撞、对骂、动手推推搡搡的程度。难缠是难缠，可到末了，中队干部还是占了上风，将诸如陈老妈子、郭老头子这些就业痞子迁移到大队部那边去了。他们的那些黑店也就随即土崩瓦解了。

可是，随后中队三个责任人的老婆，即邱队长的老婆韩小琳、徐队长的老婆陶春碧、胡队长的老婆王方，都分别在自己的家里开起了类似的小店，也是以卖香烟为主，兼卖一些别的东西。

三个队长都是毕业于省里的警校，分配到监狱后就地取材，在附近的农村找了老婆，人都长得还不错，在农村里算是出类拔萃的，可是却没有工作。监狱为了解决这些人的后顾之忧，遂将他们的老婆都给安排了一个相应的工作岗位。三个队长的老婆都当上了保管，或者是保管农药、化肥，或者是保管什么农业生产资料。中队本来就是巴掌那么大一点，没有那么多东西需要保管，她们没有多少事情可干。

随着整个社会和监狱经济形势的发展，各方面的情况都有了很大的改变。监狱经济越来越不景气，不要说她们这些家属工了，就是正式职工，或者是监狱的干部都开始感到自己手中的饭碗并不是那么牢不可破。经济不景气，连干部的工资都开始拖欠了，三个月发一回工资，有时候要拖到半年以后才发放工资，据说是将那些发放工资的钱用于购买农药化肥这么一些急需的物资上去了。在这种情况下，家属工就只能在家里办起了小卖部，自寻出路了。由于相隔得很近，都是左右邻居，相互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最后都成为冤家对头。

在这么一个要命的时候，中队干部非要让我来管零用金，实际上是把我也推到了一个难以逃避的风口浪尖上。

中队的人际关系相当复杂，三个队长是三驾马车，都朝着各自不同的方向奔跑。在三个队长的角逐之中，我已经感到无所适从左右为难。现在，又增添了三个保管，她们都有自己的小卖部，都希望我能替她们往监号内销售一些货物，主要是利润和销量都大的香烟。

她们把货物硬塞给我，我拉不下脸来拒绝，便只能硬着头皮在监号内推销。在此期间，我推销过假烟、上了霉的烟、抽不动的过了期的烟。还推销过其它的一些东西，譬如说，某一位中队干部或他的家人病了，人家送了一些东西来慰问，自己吃不了，就来找我，让我在监内帮助推销推销。这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奶粉、水果、饮料、茶叶和香烟。

每当我在监号内卖东西，特别是卖香烟的时候，屈高林就会用凶狠的目光盯视着我：“尚建国，这些东西是从哪儿来的？”

我不理睬他。他突然往我面前一窜：“你知道吗？当初中队干部为什么会那么卖劲地驱逐人家陈老妈子、郭老头子那些所谓的黑店呢？说穿了，就是想把人家赶走以后，他们自己好来开自己的店。他们的店子难道说就是红店吗？”

屈高林又预言说：“我先把话说出来搁在这里，这三个保管的竞争已经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往后只会更激烈。好戏还在后头呢！”

女人 女人

在监内管零用金很麻烦。有很多人零用金账上有钱，甚至于是有很多钱，几百块钱或者是几千块钱。这些钱主要是家里人接见时交给干部，再由干部上到犯人的零用金账上；或者是犯人家通过邮局将钱款邮到中队，中队干部将钱取出来后再存到犯人

的零用金账上。

中队每月支付给犯人的零用金通常是五元钱，只有获得了大队宽管级待遇的犯人每月才能拿到十块钱的零用金。一般情况下，只有两、三个人能享受这种待遇，最起码也要服刑五年以上。到了我坐牢的后期，我每个月的工资从五元钱提高到了十元钱。别小看这十块钱呀，这可是犯人当中最高的工资级别。

单靠中队每月给的五元钱或是十元钱的零用金是远远不行的，根本上买不了什么东西。有的人零用金账上的钱非常多，那都是家里人给的。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方面是，有的人通过零用金账目买了东西，可是，他们却没有钱，于是，便出现了很多超支户，超支的金额在零用金账上是用红笔写的，这有点儿类似于赤字。

我从金来源的手上接过零用金的账目时，账上的存款和超支相抵之后，基本上持平。这也就是说，中队的零用金账上基本没有多少钱了。鉴于这种情况，用零用金进货就很困难了，因为账上没有钱嘛。所以，中队基本上不进什么货。这就造成了一种畸型的现象，有的人零用金账上存了很多钱，却买不到东西。因此，怨声载道，总是催促着我去进货。

零用金账上尽管没有多少钱，可是，却偏偏有人在打它的主意。中队的三个保管，她们都想更多地推销自己的商品。而按照当时的规定，中队只能从大队供应站那儿进货，从中队三个保管那儿拿货，是不允许的，只能偷偷摸摸地进行。我谁也不好得罪，有时候就只能搞搞平衡，这个家里的货要一点，那个家里的货也要一点，都不能要多了，多了就只好交差。中队的零用金账上只要有一点点钱，我便先付给她们，不拖她们的账。要拖账，就拖大队供应站的。他们那儿是大买卖。

其实大队供应站也是徒有其表。从表面上看很气派，一幢很

大的楼房，营业面积不小，像一个中型的商场。里面的营业员还有几个长得不错，甚至于有些像是城市里的很洋气的女人。大队供应站也有一个致命的问题，那就是没钱。没钱但又不能倒闭，有那么多人需要养活，因此只能勉强支撑着。他们的策略就是一个“余”字。余货、余钱，从外面拿货是余，中队去进货，还是一个余，不必用现款，等到什么时候，中队的账上有了钱，再去他们那儿结账。

刚开始去大队供应站进货的时候，是中队干部带我去的。我先在监号内统计了一下，看谁谁要什么东西。不过，零用金账上欠钱的超支户不能订货。我心里有了底，到了大队供应站便犹如照单抓药一般，应该进哪些货，很快就办好了。随后，带我去供应站的干部便在一张购货单上签上他的大名，我们便可以把货拖回中队了。有的时候是用板车，有的时候是用拖拉机，有的时候是肩扛手提，反正相隔不远，也就是五、六里地吧。

开始是中队干部签单进货，到了后来，就我一个人也可以签单进货。大队供应站附近有几分热闹，来往的人和车不少，各种各样的店铺也比邻着，类似于农村里的小集镇。这与二队的荒凉、孤寂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在许多犯人的心目中，大队部那一带的繁华与热闹简直就像是一个大都市。一般的犯人都没有机会去，我却是经常跑。有不少人很羡慕我，每次从大队回来，总是会一个劲地缠着我问一些与女人有关的问题：

“大队供应站的女营业员，哪个最漂亮？”

“哪个的乳房最大？”

“那儿是不是有许多女干部？她们漂不漂亮？”

“你去进货的时候，有没有趁机去摸一摸女人的胳膊，或者是趁机去蹭一蹭女人的屁股？”

有一次去大队进货，倒是遇到了一个干巴黄瘦的老女人，她

似乎没洗脸，拖着一点点鼻涕。她是被二队驱逐到了大队来的某个黑店的原店主，陈老妈子。陈老妈现在在大队这边开店。遗憾的是，大队这边开店的人太多了，生意不好做，有时候在风里吹一整天，也赚不了几个钱，倒是在二队的时候安逸，就呆在自己家里，犯人自然会找上门来买东西。

陈老妈子咬牙切齿地对我说：“二队不让我们在那儿做生意，那他们家属怎么可以做呢？就知道欺负我们。总有一天，我也会让她们的生意做不成。”

这就是我那天去大队进货的时候所接触到的一个女人。等到我回到监号后，好几个人逼着我说进货时的艳遇。我便胡编乱造地说，我遇到了一个女人，她是如何漂亮，如何年轻，如何风骚，她又是在街上与我相遇，跟我说了很多的话。反正是信口开河呗！只要大家开心就行。

主管生产的胡队长得到一个线报，说是菜园那边的一个地洞里，有人在那儿玩女人。

曾经有一回，胡队长从中队木工房后面的一条小路经过。那条小路长满了横七竖八的荒草，胡队长偏偏喜欢走这样的路。他走着走着，忽然发现中队木工房墙壁上有一个破洞，里面有一团黑乎乎的卷卷毛。那天活该木匠文庆功倒霉。这天他相好的女人来了，又正是七月流火的炎热夏天，木工房比较隐蔽，一般都不会有什么人去的。因为太热的缘故，女人进了木工房以后，首先就想凉快凉快，那边的墙壁上有一个洞，正好有阵阵小风吹进来，倒也凉爽。女人脱下自己的裤子，坐在那儿，对着那个墙上的破洞吹起凉风来。可是没有想到的是，偏偏让胡队长撞上了。文庆功受到的处罚是：下大组劳动。

眼下，胡队长又得到了一个线报，有人在乱来。胡队长快速行动，当即前去察看一番。

中队的菜园距离伙房不远，面积有五十多亩，一年四季种植着各种各样的蔬菜。要说种植面积也不小了，菜园的东边靠近南面的地段那儿有菜窖，也就是线报里所说的地洞。那儿平时储备一点菜，并没有什么人去。等到走近那个菜窖时，胡队长灵首先闻到了一股香香的酒味。地洞里的确有人。

此刻，菜园组组长朱成与他相好的女人桔子正在地洞里美滋滋地喝酒。

自从朱成用告密的方式将原来的菜园组组长汪卫东弄下大组后，就一直担任着菜园组组长，要管七、八个人。他自己是不用劳动的，也就是动动口，发号施令，对组员做点分工安排而已。一天的活安排下来，他自己就没有多少事可干了，他东逛逛西荡荡，主要是在菜园附近，不能超出中队这个大范围。朱成如鱼得水，在二队近三千亩土地的地界上，一年四季都有附近的村姑村妇们来卖东西。

自从朱成取代汪卫东成为菜园组组长以后，他有许多的机会与村妇们接触。今天与他一起喝酒的桔子，只是跟他相好的众多女人当中的一个。桔子将近三十岁，长得略微肥胖，模样儿还算是周正。她家就在附近的村子里，她经常来二队卖桔子，犯人们不知道她的名字，就干脆叫她桔子。前一段时间在一条小小的泥土路上，桔子与朱成不期而遇。朱成发动挑逗攻势，桔子心领神会。两个人你一言，我一语，说了半天。到后来，朱成让他手下的组员给桔子摘了一麻袋鲜嫩鲜嫩上好的蔬菜。就这样，朱成与桔子开始了他们相好的生涯，隔三岔五地偷情。

在此后的时间里，朱成基本上用大量鲜嫩的蔬菜来维持他与桔子细水长流的关系。如果他身上有了钱的话，他也会适当地给桔子一些。在这方面，王国庆倒是向朱成提供了不少的资助，当初毕竟是朱成帮助他在江波的身上出了一口气。随着时间的推移，

如今朱成与王国庆两个人的关系是越来越好了。朱成甚至于还让王国庆跟桔子玩了两回。反正大家都是朋友嘛！

朱成与桔子见面，都是事先约定好的。今天是相当安全的，因为邱队长、徐队长两个人都不在中队，据说是去大队开会了，所以，朱成特别放得开，不仅是与桔子温存了，而且还和桔子品起酒来。

恰恰在这个时候，胡队长从天而降似的，一下子出现在地洞的门口。

桔子惊叫了一声：“啊。”

朱成的反应倒还镇定：“胡、胡队长。”

那天捉奸的事情，是有犯人向胡队长报告的。平日里，胡队长就喜欢类似于窥视和偷听这类事情。譬如说，在门房里值夜班吧，一般的干部夜里都会进到监号里去转转，看看是否有什么情况；有的干部压根儿就不进监号，一整夜在门房里呼呼大睡，喊都喊不醒；每次轮到胡队长值夜班的时候，他进监号特别勤。他特别喜欢站在监室的门旁边，透过门缝来偷听里面犯人的谈话，或者是站在监号楼的后面，在监室后面的窗户那儿偷听。在二队呆得长一些的犯人都知道胡队长的这个习惯，也有犯人故意调皮捣蛋。有天晚上胡队长正好在一个监室后窗户那儿偷听着什么，里面的人已经知道他在干什么了，却偏偏装着什么都没有察觉似的，照旧乱说乱笑着。在大家的配合之下，其中的一个人忽然打开窗子，将满满一盆洗脚水倒了出去。那盆洗脚水恰好倒在了胡队长的身上，但他却不哑巴黄连不能吭声，因为不愿暴露自己。

胡队长的这种性格，监内有人很清楚。所以，便瞅着邱队长、徐队长都不在二队的时候，让胡队长去把朱成逮了个正着。将朱成逮着的那天，胡队长喊人马上把朱成用绳子捆绑了起来。同时，臭骂了桔子几句，把她从二队赶走了，警告她再也不能来二队了！

对朱成的处理结果是：下大组劳动。从那以后，朱成变得非常老实听话了，他身上再也没有那种飞扬跋扈、拨弄是非的影子了。

女人对于一个与世隔绝的囚犯来说，其意义是什么呢？

就我个人来说，在我失去自由的最初一段时间，不论是从生理的角度还是从心理的角度，我都觉得有一种对人的重大的伤害，那就是监狱生活在剥夺了自由的同时，更是剥夺了女人——剥夺了男人与女人接触的机会。

被囚禁的最初一个星期是最难熬的。

我在被子里悄悄地手淫，借以释放我对女人的那种火一般燃烧的激情与冲动。有些人白天躺在那儿就那么公开地手淫，都是年轻人，都是处在性欲燃烧的年龄和岁月，却与世隔绝，与正常的人的生活隔绝，被囚禁在只有男人的监狱里。因此，某些生命的呈现与释放便出现了扭曲与畸型的倾向。

在沙河市收审所，我见识过公开的手淫；也见识过男人间的相互抚慰——彼此手淫；还见识过某些强悍一些的人，强迫别人吮吸他那玩艺儿，或者是他让人家把屁股洗干净，然后他来“走后门”；当然，我还见识过一种奇景——爱情的种子落在监狱这最最贫脊的土地上，倒也长出了苦苦的胚芽。隔着好几个监室，男监室的收审对象，也就是还未逮捕、还未判决的人犯，与女监室的收审对象偷偷摸摸地谈着恋爱，隔墙喊话、隔窗对唱、隔门相望，那门上面有一个小小的窥视孔，俗称“风窗”。

在沙河市看守所也是大同小异——喊着女人、唱着女人、写着女人、画着女人。在所有能画的地方，包括墙上、地上、门上、床上，甚至是肌肤上——应该说是纹身吧，都画着女人。我在三个囚禁场所——沙河市收审所、沙河市看守所、江南监狱，曾看见过难以计数的纹身，除了龙虎等等凶猛的动物之外（那几乎可以说是他们自己的化身），其他纹在肌肤上的就差不多都是女人

了。形体各异、肥瘦有别的女人纹在手臂上、纹在胳膊上、纹在胸脯上，甚至纹在大腿的内侧，那临近男人阳具的部位。

在江南监狱，有一次监狱干部来二队检查工作，居然在一个犯人的《罪犯改造行为规范》的本子上，发现了那个犯人画的光屁股的女人，光屁股的女人屁股特别肥大，有着让人发笑的夸张与变形，干部们笑了。一边笑着一边说：

“犯人也是人嘛。”

“犯人也会想女人，这很正常。”

“他们都被关这么久了，能不想女人吗？”

干部们笑着，表示能够理解，并没有对那个画光屁股女人的犯人做出任何严肃查处。

我觉得，如今对犯人的管理是有所进步了，人性的东西逐渐灌注其中，要在早些年，这个画光屁股女人的犯人也许早被打得遍体鳞伤了。有些监狱开通了亲情电话，犯人可以通过电话与家人、妻子、女友等人叙家常、说情话。有些监狱里还开通了心理咨询电话，犯人有什么心理问题和心理障碍，可以通过咨询电话那头女干部美妙的嗓音而化解。

在一些实行分级处理的监狱里，大队宽管级的犯人经过允许后可以与家人一起就餐；可以与配偶同居；甚至是可以春节期间回家探亲。所有这些措施在我看来，都是在试图解决这么一个问题——不再剥夺女人，或者说，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之下，尽可能多地给犯人提供一些与女人接触的机会。

这是一种在人性人道方面的进步。

捐款捐物 告状告密

前不久徐队长外出开会时，为我买了一本《尤利西斯》，这书

读得我心事重重。

黄宪昌那次跳楼以后，他那摔断的双腿早已好得差不多了，仅仅只是走路时还有那么一点点跛，半边腿里好像是装了弹簧似的。他本人虽说是没有什么大问题了，可是他的家里却出现了危机。他女儿学习成绩非常好，以相当可观的分数考上了中学，可是因为家里实在是没有钱供女儿读书，眼看着就要辍学在家，从此失去接受教育的机会了。当我听说了这一情况后，找到徐队长说，能不能在监内为黄宪昌的女儿搞点捐款，以资助他女儿上学呢？

徐队长同意了：“这是好事嘛！我们干部也可以为黄宪昌捐点钱，支持他的女儿读书。”

捐款活动在监内开展起来了。

由于大家都很难，零用金账上没有多少钱，因此，弄到最后，并没有捐出多少钱。尽管如此，也算是大家的一点心意，重在参与。在这次捐款活动中，捐款最多的人是金来源，这让大家都深感意外。金来源还有两、三天就要离开监狱回家了，可是他零用金的账上还有一百多块钱，这在二队算是比较富裕的了。捐款的那天他表示，他要为黄宪昌女儿上学捐献一百块钱。这算是中队犯人当中捐款数量最多的了。捐款的时候，金来源赢得了大家一片赞赏与喝采的掌声。可是，私下里却有人说：

“金来源这不对劲呀！”

“恐怕是心虚吧？”

“是不是良心发现了？”

“他先是贪污和掠夺，现在倒来做慈善家来了！”

尽管话说得难听点，可是并没有谁当着他的面说。他毕竟是有天把就要刑满回家了，何必把事情做得那么绝呢！也有人说，他这是最后接受了出狱教育——下了大组，再次体会到了坐牢的

痛苦与艰辛，这才重新醒悟了。他能为黄宪昌的女儿上学捐款，这是一件好事，不要歪曲和打击人家嘛！

干部本来说让我查找一下金来源账目上的问题，可我并没有揪住金来源不放，一味地钻牛角尖。这么一来，金来源先前对我的一些误解就渐渐地消散了。临离开监狱之前，金来源找到我，请我原谅他，不要计较他前一段时间的所作所为。我说，这没有什么，你无非是说了我一些坏话，就当是一阵大风刮过去了吧！

金来源临走时，在他的零用账上我没有给他找任何麻烦，只是将他捐献给黄宪昌女儿上学的那一百块钱扣了下来。剩余的几十块钱，他从中队会计黄灿那儿领出现金，带回家去了。

在二队期间，为中队购买电视机，我也操了一回心。中队的一台旧电视机坏了，一时又拿不出钱来买新的，大家又都想看看电视。那段时间，好像是在热播一部什么电视连续剧，我便想由大家来集资购买新电视机。除了电视机，还有影碟机，是一个叫李学友的犯人出资买的。他减刑的时候，中队去上头为他打了招呼，因此他的减刑幅度很大。为感谢中队干部，他捐款为中队买了一部影碟机。

还有功放机。功放机也是一名犯人出资买的。为此，中队照顾了那个犯人，将他从大组里调到了杂务摊点。

有了崭新的电视机、影碟机和功放机，中队再搞什么娱乐活动，譬如唱卡拉ok，或是看影碟什么的，更方便了许多。

的确不错，在一段时间里，二队捐款捐物蔚然成风。只可惜，它竟埋下了一些祸根。

最近这段时间，我特别喜欢这样一些对联，有一幅对联的上联是：为书生为书死为书辛苦一辈子；下联是——吃书亏上书当最后死在书身上；横批是——没书不行。这是一幅对联。

另外还有一幅的上联是——错把牢房作书房；下联是——误

将刑期当学期；横批是——阴差阳错。

这些对联是我自己做的，这反映了我的矢志不渝的心态。我正在反复把玩着这样酸酸甜甜的心态，徐队长进了监号，来到宣鼓室，找到我说：“尚建国，你最近在写一些什么？”

见艾奇也在宣鼓室里写划着什么，徐队长便转过头来，目光马上变得有些严厉了：“艾奇，我要和尚建国谈点事情。你先出去，把门关上——”

宣鼓室里的气氛有些异样，我的心不禁怦然一跳。

徐队长再一次问道：“尚建国，你最近到底在写一些什么东西？”

说实话，我如今写小说似乎有些走火入魔，每天都要写，不管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哪怕是再累再忙，都要写一点儿。如果哪一天因为什么事情耽搁了写作，我就浑身不对劲儿，惶惶不可终日。我坐牢时间已经很长很长了，可是由于有写作这一生命的方式来支撑我的精神世界和情感世界，所以，我躁动不安的心渐渐平静下来，不再怨天尤人，也不怨日子太难熬，有时候还觉得一天的时间太短暂，还没有写多少字，太阳已经开始偏西了。我似乎比以前在外面还要忙碌得多，所有这一切，全都是因为写作。

对于我的这种状态，我想徐队长应该是有所耳闻。可是，这一会儿，徐队长为什么要如此追问我呢？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吗。我试探着说：“徐队长，我还不是在写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嘛，都是我以前在深圳的一些生活。”

“是吗？”徐队长轻轻地说了这么一句。

我觉得徐队长话里有话，更觉得他与以往对待我的态度大不一样。我随即在心里地分析了一下——徐队长刚才一进宣鼓室的门，艾奇就规规矩矩地站起来了，向徐队长行注目礼。艾奇在这

方面一直做得非常好，每一次一见到干部就立正站在那里，绷得直直的身子还会微微前倾，以表示谦卑和尊敬。在任何场所，没有干部的点头示意，或者是没有干部做出的手势，艾奇都不会或不敢往前迈进一步。

与艾奇相比，我则做得非常差。刚才徐队长进来的时候，艾奇还在毕恭毕敬地站立在那儿的时候，我却在没有得到徐队长手势邀请的情况下，就擅自坐在那儿了。我想，徐队长该不会是为了此事生气而要找我的麻烦吧？想一想徐队长应该不会这样，不会在这类事情上与我计较。那么，会是什么事呢？

在迷茫与困惑里，我终于将问题弄清楚了。原来是有人往上面写信告徐队长，说他如何如何了。那告状信偏偏是摹仿我的笔迹写的。徐队长对说，告状信他没有看到，是上头的一位领导出于好心，私下里悄悄告诉他的，说是上面的笔迹特别像是我写的，肥肥大大，一笔一划，写得很工正。

谈了一会儿之后，徐队长明确表态说：“尚建国，那位领导和我的关系非常好，他悄悄地给我说了这一切，可是，我无论如何都不相信那告状信是你写的。打死我，我都不相信。我想，这点判断能力，这点看人的眼光，我还是有的。”

与徐队长接触时间长了的人都知道，他手下管的事务犯如果出了什么差错，他批评几句骂几句，或者是打那么几下，还会继续使用这名事务犯；如果是相反，徐队长对那个犯了错的事务犯不理不睬，那家伙就得准备卷被子搬铺——要下大组了。所以，很多事务犯最怕徐队长对他视而不见。

眼下，徐队长说他不相信那告状信是我写的，可是，我心里还是有那么一点别扭，刚才徐队长一再问我最近这段时间都在写些什么？我怎么就没有往这些地方考虑问题呢？最近监内告状之风很盛行，有告邱队长的，有告胡队长的，有告其他干部的，现

在又有了告徐队长的。

告状的主要内容有：中队干部收红包；中队干部处理事情不公平；中队三个责任人纵容他们的老婆，也就是三个保管，往监号里推销各种各样的商品；滥收费，包括收取插秧款（有些犯人插秧完不成任务，便用钱款来折抵）；强行让犯人捐款捐物，包括捐款购买电视机、影碟机、功放机等等

就在前两天，大队分管纪检工作的干部还来找我问了一些与此相关的情况。我当时畅所欲言，凡是我知道的事情，我都尽可能地说了。在集资购买电视机的问题上，我说事情是我组织的。旧电视机坏了，大家又都想看看电视，于是，我就带头捐款，并且还号召大家都行动起来。

当然，大队纪检干部也找其他一些人问了情况。别人是怎么说的，那我就不得而知了。如今，也有状告徐队长的了，并且是摹仿我的笔迹写的告状信。这一来，那就更热闹了。

徐队长又仿佛是在自言自语地说：“这些人为什么会告状呢？是不是干部们对他们太好了呢？是不是我们的工作作风太民主了、对犯人的管理太文明了呢？有的中队把犯人们都管得像乖乖儿似的，谁都不敢吭一声。那些中队那么黑，却偏偏没有哪个人会告状。可是，我们中队却恰恰相反。是不是我们对犯人太仁慈了呢？这事到底是哪些人干的呢？”

徐队长不可能从我这里找到什么答案，便走了。

我陷入了沉思之中。在这一段时间，不仅仅是告状之风盛行，那告密之风更是铺天盖地，主要是针对监内的一些事务犯。譬如说，谁在监内听收音机了、谁在监内说干部的坏话了；谁在监内议论哪个干部的老婆了。近来，许多犯人都在议论着说，胡队长暗地里搞了邱队长的老婆韩小琳，而邱队长又搞了苏越的老婆，会计黄灿又被谁搞了，反正是说得有鼻子有眼。监内的一言一行，

由于告密的缘故，干部知道得清清楚楚。于是，干部就进监号内训话、辟谣、发脾气，说那些事全都是胡说八道，是无中生有。

对犯人是告密。对干部是告状。

告密，干部是大大地加以提倡和鼓励。告状，干部尽管不能公开站出来阻拦，但时常还是会威胁一下：

“干部不怕你们告！你们尽管去告。可是不能瞎告。要是哪个诬陷了干部，一旦被发现，处理起来绝不会心慈手软。再说，上面的领导还会下来进行调查了解的。你们说说看，上头的领导相信你们呢？还相信我们干部呢？”

告状信惹出的风波持续了一段时间。在此期间，上头的干部也来调查过，找有关方面的人谈过话，问过情况。到末了，一切还是原来那个样子，星星是星星，月亮是月亮，中队还是中队，干部还是干部。

在告状之风盛行的时候，中队干部先是沉默了一阵子，紧接着，就开始在监内大煞狠煞“歪风邪气”了。措施之一，是进行队伍训练，措施之二，是延长晚上的学习时间，措施之三，是加大白天的劳动强度。

有人开始抱怨了：

“是谁写的告状信？把我们大家都害苦了！”

“告个什么状？真是吃饱了撑的！”

“要是知道是谁写的告状信，抓到了他，非把他揍一顿不可！”

这么一上学习，一出操，电视根本上就不能看了。如此一来，就有人开始埋怨我了：“集资捐款买电视，买电视，买个狗屁的电视！大家都出了钱，可是，连电视都不让看。”

对于这样一些闲言碎语，我只当是耳边刮过了一阵风而已。大家的头脑都有些混乱，由于各种各样的真理与谎言的存在，许

多人都分辨不出是与非了，有些人连自己亲眼目睹的事情都不肯相信。

每月再搞事务犯民主评议时，大家也没有什么劲了，也就是走走过场，走走形式。

假释与送礼

近来不仅大队的干部，就连监狱的干部都频繁地来二队。一天，大队主管改造工作的副大队长洪大成来到二队，他在监号楼的楼梯口遇到我，便向我问了问监内最近的状况：犯人们的情绪怎么样？稳不稳定？有没有什么危险因素？犯人们都在想些什么？谈论一些什么话题等等。洪大成还说：“我准备向中队提出建议，要改善改善伙食——大组里干活很辛苦，你们大伙房里每餐能不能弄两个菜？一个菜听说不够吃。早餐当然就算了，有一个菜就行了。”

我心里在想，其实早餐的问题相当严重：份量少，特别咸不说，如果不咸，那就更不够吃了。菜里的沙又特别多，吃进嘴巴里咯嘣咯嘣响。早餐吃得糟糕，哪有力气干那么重的农活呢？我虽然这么想着，却并没有说出口，我怕洪大成说我是得寸进尺！说着说着，洪大成突然问我：“尚建国，你的刑期快过半了吧？等你的刑期过半了，就给你办个假释，让你早点回家算了。”

作为一个大队的领导，主动关心起我的假释问题，这让我心里不由得感到热哄哄的。当初刚刚给我判了十二年的刑期时，沙河市公安局的代胖子就笑着对我说：“尚建国，给你判了十二年的刑，也许是时间长了一些，但等你的刑期过半后，可以办假释呀！办个假释也花不了多少钱，也就是坐个六年牢就可以出来了，没有多大问题。”后来，徐队长也曾与我探讨过我的假释问题。现

在，洪大成是第三个向我说起假释的人。是啊，屈指一算，我实际服刑已经差不多有六年的时间了。我的刑期是十二年。按照《刑法》的有关规定，刑期过半后可以假释，当然还有别的一些条件和要求。现在这个问题已经是迫在眉睫，可以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既然洪大成问到了这件事，我便说：“洪教官，我的刑期已经快要过半了，还有两个多月，我就已经是坐牢六年了。”

“那好，到时候我们就给你办个假释。你一个从深圳来的研究生，在二队呆了这么多年，也真是不容易。”

洪教官又在监号其它各处转了转便出去了。

洪教官一走，徐队长就来问我：“尚建国，刚才洪教官都和你说了一些什么事情？”

最近以来，由于告状的缘故，组长们都不让自己的组员和干部接触，向干部反映问题。这一会儿，徐队长跑来问我，在我看来徐队长并不是要防范我什么，而是出于一种关心。于是，我说：

“洪教官和我谈了很多问题……”在一一说了那些问题之后，我说到了假释上面：“洪教官还和谈了我的假释问题，他说，只要我刑期一过半，就可以办了。”

在详细地问了许多细节之后，徐队长脸上泛出淡淡而真切的笑容说：“尚建国，这是好事呐。以前我想，等到给你办假释的时候，光凭我们中队的力量还显得有些单薄；现在，连洪教官都主动关心起你假释的事情了，我想，以洪教官的能力，这应该说是没有一点儿问题的。如果洪教官肯帮忙的话，你的假释应该说是没有多大的问题了。”

过了几天，我妈妈和弟弟来二队看我，说起假释的事情，妈妈插话说：“建国，你还记不记得邓光百这个人？就是那个律师，对，你第一次减刑的时候，人家还给我们帮过忙，他去找过江南

监狱法庭的一个什么人，一下子就给你减了一年。”

我想起来了。其实，不用找他，就在江南监狱找个人，花个一千块钱，这是明码实价的，也能减到一年。母亲还在说着：“建国，你妈比你还要着急，我是日日夜夜都盼望着你能早点回来。前不久邓光百还来找过我，说是要帮你办假释。邓光百说了，只要给他三万块钱，让他打通各个关节，那么，你假释的事情就包在他的身上了。他一定能够给你办好……”

我说：“老娘，刘金保的教训，你难道忘记了吗？凭什么要给邓光百三万块钱？他会不会像刘金保一样是个骗子呢？”

我母亲不高兴地说：“刘金保是刘金保，邓光百是邓光百。人家邓光百不管怎么样都还是个正儿八经的律师哩……”

我反驳道：“邓光百是个律师，那刘金保以前还是个警察哩。你不是太了解邓光百到底是个什么人，千万不要再轻信别人了。”

“建国，那你说，你的假释到时候怎么办好呢？”我母亲眉毛紧蹙，满脸是焦急的神情。

“老娘，我假释的事情就不用你管了，我不想让家里再为我花费冤枉钱。我在江南监狱已经呆了这么多年，跟各个方面都比较熟悉了。我很想验证一下自己的能力，看看我自己能不能把这个假释给办下来。”

妈妈又说：“建国，你说大队的那个洪教官肯给你帮忙，那你说需不需要给人家洪教官家里送点什么东西？”

我连忙摆手说：“不用，不用。等到时候有什么情况再说吧，现在没有必要这么做。”

我虽然这么说了，也不知道妈妈会不会听我的。妈妈是一个很善良很质朴的人，她总觉得人家替自己办了事，心里过意不去，便想给人家送点东西以表谢意。

每一次家里人来二队，都会给我送一些吃的东西。特别是母

亲每次来的时候，手里都会提溜着一个保温瓶，那里面必然会装着热乎乎的排骨汤。这已经成为母亲的一个标志，许多人都知道这一点。有的时候，隔着很远的距离，人家没有看清我母亲的脸，只看见了她手里提着的那个保温瓶，便会对我兴冲冲地说：“尚建国，你妈妈来了，又给你送排骨汤来了！”

我给妈妈说过许多次，让她不要再给我送什么排骨汤了。妈妈虽说答应了，可是到下一次接见，还是会给我送排骨汤来。

这一次，我跟妈妈说了，让她不要往洪教官的家里送什么礼物。也不知她会不会听我的。

妈妈和弟弟接见完毕离开二队之后，我将家里带来的菜提进监号，然后告诉朱强等人，吃饭的时候，大家都来热闹热闹。这样一餐就能将菜吃完了，这菜是不能放的。劳改队跟外面不一样，所以东西都是相好的人打伙吃。

吃饭的时候，谈起我假释的事，大家都很关心。不知为什么，我的心里却飘荡过一丝丝阴影。

一天下午两点多钟的时候，天气比较晴朗，阳光很充足。徐队长把我喊到门房值班室，告诉我，我妈妈送到洪教官家里的礼物已经被洪教官退到了中队。一听是这事，我头大了，我已经对妈妈交待过，让她不要轻举妄动往洪教官的家里送礼。妈妈还是送了，这真叫我哭笑不得。

这个时候，徐队长指着值班室沙发上一大包东西，用一种尽可能平和的声调对我说：“尚建国，这就是你妈妈送给洪教官的礼物，你把这些东西拿到监号里去吧！”

我当时很尴尬，竭力表现出某些镇静自若和若无其事的表情。把东西拿进监号以后，我才看清包裹里面有两瓶五粮液酒，另外还有两条红塔山香烟，然后就是咖啡、奶粉、麦片等等这么一些鸡零狗碎的东西。我心里在暗暗地说，老娘呀老娘，你怎么能这

样送东西呢？！

这事我在监内只对朱强一个人说了。

朱强也感到事情没有办好：“洪教官退回了礼物，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呢？洪教官该不会是那种拒小贿而收大礼的人，嫌你妈妈送的东西太少了吧？或者是，洪教官这个人比较清廉，他的确是乐意帮助你，却不会要你的任何东西。再不就是这样，洪教官是很有眼光的人，他看中了你能力和才华，看中了你以后的发展前景和光明的未来。他现在肯出面帮助你，实际上也是一种投资。上海滩上的杜月笙当初就是这么做的，他特别喜欢烧“冷灶”。什么叫烧“冷灶”呢？就是杜月笙当时最热衷于帮助和扶持那些倒霉的人，像下野的官员、落魄的文人、倒闭的商人，还有一些坐牢的军官、政客等等。反正都是一些有能耐本事，又暂时倒了霉的人。其实人处于困境之时，雪中送炭，成本也不是太高，别人就会记你一辈子的好。这就是所谓的滴水之恩，涌泉相报。”

在赞赏了一番杜月笙的“烧冷灶”之后，朱强又把话题重新扯回到了洪教官的身上：“不管洪教官是出于何种动机要退回礼物，他都不应该将这些东西退到中队来。你想一想，你妈妈只给洪教官那儿送礼物，而没有给中队的邱队长、徐队长、胡队长这些人送礼，他们心里会怎么想？我觉得，洪教官即使是要退回礼物，也应该退给你妈妈，而不是退到中队来。洪教官是不是想借这个机会显示一下自己是多么廉洁呢？”

朱强这么问我，我也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他。我的心里仿佛是有十五个水桶在打水——七上八下不说，还特别别扭，总感到不是滋味。妈妈送给洪教官的礼物在我的手里，我真不知道该如何处置。不过，有一点我是想明白了，那就是这些退回来的礼物不能让妈妈知道，不然的话，她说不定又会采取其它别的什么措施。朱强建议干脆把那些东西放在零用金的账上卖掉算了，反正这进

货卖货的事儿都是由我负责办理。我却不同意这么做。

我考虑来考虑去，最后决定还是自己来消受，奢侈一回。我在监内关系好一些的人也会参与其中。当我们消耗着这些被洪教官退回来的东西时，我总是有着这么一种感觉，好像这是一些白捡来的食物似的，不用那么心疼，舍不得。

这里的一些东西还没有吃完，这天又来了好大一厚叠《江南新生报》，我都没有瞧上一眼，就顺手将这份监狱自己办的报纸发给了大家。对于这份报纸，我真是伤脑筋透了。还是在江南监狱入监队的时候，那儿的干部就天天催促着让我为《江南新生报》写稿。不仅仅是入监队的干部，就连监狱当时宣传科的郎平元都多次跟我谈话，让我给《江南新生报》写写稿。郎平元还声称，如果我写的稿件连《江南新生报》都不肯采用的话，那就说明我的水平太低，我这个研究生就是混来的。

干部催促让我写稿，并且还对我说明了其中的道理——在《江南新生报》那儿用稿多少，这与中队的利益密切相关。可我还是无法提起笔来给《江南新生报》写稿。因为那上面的文章，全都是咒骂自己、挖苦自己，往自己的头上扣屎盆子的。这样的文章，我没有办法写。

徐队长开始也是不断催促我，什么话都对我说了。徐队长对我说，如果我当初在入监队能够多为《江南新生报》写点稿子的话，那么，我或许不会被送到下面的农业中队来，可我到末了，还是没有为《江南新生报》写过稿。以至于到后来，徐队长对我直摇头，说我这人太固执，简直拿我没有办法。

邱队长则说我是没有水平，连给一张小小的监狱报纸写稿都写不出来，还是什么狗屁研究生呢。肯定是个假文凭，也不知是从哪里混来的。

在我坐牢的那些年里，由于我没有为《江南新生报》写过稿，

我真是伤透了脑筋，也惹了不少麻烦。所以，每次从干部手里一接过《江南新生报》，我连看都不会看上一眼，便会将它们散发出去。有人拿着报纸兴奋地走过来对我说：“尚宣鼓，你快来看呐，这上面有一篇写张振的文章，说他勇救两名落水儿童。”

我拿过那个人递给我的《江南新生报》一看，只见那篇文章的大标题是——回归社会后，张振勇救两名落水儿童。全文如下：

“今年七月的一天，天气炎热。张振家乡的长江边上，有两个幼女在那儿嬉戏玩耍。不太识水性的姐妹二人在戏耍的过程中，不慎先后滑入湍急的深水里，一边拼命挣扎，一边高呼救命。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刻，恰好从这儿走过的张振听到了随风飘来的呼救声，他没有任何犹豫，一口气跑到两百多米远的江边，奋不顾身地扑进滔滔江水中，救出了其中的一个女孩。等他返身再去救另一个女孩时，那个女孩已经被江水卷到了很远的地方。此刻的张振浑身感到虚脱般的倦怠，然而这时占据他脑海的除了在波涛间挣扎的女孩的身影，还有在服刑期间监狱干警对他的谆谆教诲与劝诫，他的身上好像增添了一股巨大的力量，他竭尽全力终于将那个生命危在旦夕的女孩从死神的手中夺了回来。”

朱强却嘀嘀咕咕地对我说：“张振这事，也不知是真，还是假？现在的许多事情都很难说，让人难以捉摸。”

朱强又对我说了一件让我大吃一惊的事情：“尚建国，你知道吗？前一段时间不是有人摹仿你的笔迹写信告徐队长的状吗？你知道这件事情是谁干的吗？”他慢悠悠地说道：“是夏涛这小子干的。”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在内心深处细细地琢磨了一下——以夏涛的为人，他也可能会干出这样的事情，应该说，是有这种可能性的。朱强又说了别的一些话，其中包含有夏涛的背后还有干部在那儿指点等等。这个时候，我甚至于对朱强的话也

产生了深深的怀疑，他说的这些事到底是真还是假呢？

朱强却还说如今二队的几个队长之间争斗得很厉害，谁都想坐第一把交椅，谁会最终取得胜利，目前还很难做出结论。最后，朱强以试探的口吻问我说：“尚建国，在二队的几个队长之中，你希望谁最终战胜对手取得胜利呢？”

我未置可否，没有回答朱强的问话。

担保书的曲折

洪教官虽然退回了我妈妈送去的礼物，然而我的刑期刚刚一过半，中队还是开始着手为我办理假释的有关手续。在中队为我呈报假释材料之前，需要有关的居委会、派出所和我自己的家人出具相关的担保书。

我自己的家人当然好办，父亲去世了，于是，就由我母亲出面写了一份担保书，无非是担保我假释出去以后生活有着落及不危害社会等等。我的户口在深圳，考虑到深圳距离沙河市太遥远，而我假释出去以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又是与我母亲生活在一起，所以就由母亲户口所在地的居委会出具了一份担保书。那份由沙河市沙河区岑家台居委会出具的担保书是这样写的：

关于尚建国假释后的教育措施和就业安置的担保

江南监狱：

我居委会居民葛进秀之子尚建国，于 1993 年因投机倒把罪经沙河市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94 年投入贵监改造。根据尚建国的表现，贵监将给予其假释奖励。为此，我们表示由衷的感激。为配合贵监对尚建国搞好其假释考验期内的教育，

我们根据《监狱法》和《刑法》的有关精神，特就尚建国假释后的教育和安置问题作出如下担保：

联系尚建国的家庭和有关部门协商妥善安置好尚建国就业事宜。

监督尚建国的日常活动情况，督促其参加各项政治学习，定期向居委会、派出所和原服刑单位汇报思想。

督促其严格执行有关假释人员外出请假、回居住地销假制度和会客制度，并汇报其外出期间的活动情况。

配合贵监和有关部门对尚建国做好其它教育工作。

此致

敬礼！

沙河市沙河区岑家台居委会

亲属的担保书有了，居委会的担保书有了，去办派出所的担保书时却出了许多麻烦。

父亲去世的时候，中队派苏越带我回去办丧事，现在还是派苏越带着我前往沙河市去办理派出所的担保书。乘车到了沙河市，先到家里去了一趟。妈妈高兴得要命，又是让烟、又是让茶让座，十分热情地欢迎和接待苏越。母亲情绪异常激动，一会儿笑逐颜开，一会儿热泪盈眶。

苏越一再安慰我母亲说：“你老人家不要哭了。尚建国很快就要回来了，最多也就是再熬个三、二个月吧！”母亲破啼为笑：“那得好好感谢你们干部呀！要不是你们干部给予关照，这假释恐怕也办不了。”从家里出来后，我们直奔距离岑家台派出所。在派出所里问询了许多人，转悠了不少办公室，才被告之：“石所长不在，先把你们的介绍信放在这里，等石所长回来了，我们肯定会转给他的。”这一趟算是白跑了。

不能让我在沙河市过夜，要在天黑之前把我带回监狱。在返回的路途上，苏越感慨道：“人家派出所的人是洋警察，我们监狱里的人是土警察。去办个公事，得看人家的脸色。”

苏越的口音是那种标准的江南监狱的土话，而沙河市是相当排外的，瞧不起周围农村的那些人，时常称外地人“外马”、“土客西”、“弯管子”等等。苏越只要一开口，人家肯定会在心里叫他一声“弯管子”。再者，江南监狱在沙河市的东郊，属于农村，苏越一拿出他江南监狱的介绍信，别人便明白他来自何处了。在江南监狱一般的干部抽烟也就是抽抽软白沙这种四、五块钱一包的香烟，好一点的，则是抽上十块钱的红塔山、三五、黄鹤楼、芙蓉王等。来到岑家台派出所这天，苏越还特意去买了一包红塔山的香烟装进口袋里。与人相遇时，苏越得意地掏出红塔山香烟递过去。可是派出所里的人先是不肯接苏越的香烟，后来勉强接了，却始终拿在手里不抽，最后那人居然就那么将苏越递过去的香烟放在手里一截儿一截儿地给捏掉了。派出所里的人抽的是什么样的香烟呢？我和苏越最终还是看清楚了，人家抽的是中华、玉溪、大熊猫这样一些品牌的香烟。

第一次去岑家台派出所是这么一个结果。

第二次去，人家说，事情已经向石所长汇报了，石所长的答复是：尚建国的户口不在他们管辖的范围内，他们不能出具假释担保书。我的心凉了半截。与家人商量之后，决定由弟弟尚建武去找石所长，疏通一下关系，这样做肯定会花费一些钱。可是，如果去深圳找我户口辖区的派出所，说不定会花费更多的钱。弟弟以前在岑家台派出所治安队里干过，认识石所长，可是一说到让他去找石所长这事儿，弟弟就犯怵，好像是逼着他上刀山下火海似的。我弟弟老实巴交，胆小畏缩，害怕跟石所长打交道。现在为了我的假释，他只好硬着头皮去找石所长。为了给石所长塞

点钱送点礼，我弟弟曾多次去石所长的家，在他家门口，一等就是好几个小时，很难碰到石所长本人。

苏越见我弟弟办事畏首畏尾，便问我是否有什么办法？我说，有一个中学同学在沙河市下面的一个公安分局当局长，叫陈启星。据说，陈启星与岑家台派出所的石所长是关系很好的牌友，常常在一起打牌。苏越催促我说：“尚建国，你还不赶快给他打个电话，让他给石所长打个招呼，我估计事情就能够摆平办好！”

在苏越的鼓动之下，我给打了电话：“喂，你是陈启星吗？我是尚建国，我办假释遇到了一点麻烦，我想让你给岑家台派出所的石所长打声招呼，让他们派出所为我出具一份担保书。”

陈启星先是在那头沉默了好一会儿，然后打着官腔说：“是这么个事呀？石所长那边，我不好跟他打招呼！”

“为什么？你与石所长不是关系相当好的吗？你们不是经常在一起打牌，是很好的牌友吗？”然而，没等我把话说完，陈启星插了进来：“我以前与石所长的关系是不错，可是，人都是发展变化的嘛。我现在跟他已经没有什么交道了。”

我十分后打了这个电话，这完全是自取其辱。对陈启星的为人，我不是不清楚，他势利而善变，做官都做成精了。有好处他来得很快，一旦谁出了事，他跑得飞快，推得干净。在我的假释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我病笃乱投医，却碰了一鼻子灰。

为了能拿到岑家台派出所的一纸担保书，那段时间里，苏越带着我不知往沙河市跑了多少趟。苏越似乎比我还要着急得多，连拿个担保书这么一点小事，他苏越都办不下来，岂不是件让人笑话的事情？更何况，大队的洪教官和中队的徐队长也都在催促此事。每年的三、四月份，各个中队都会往上面呈报一批减刑、假释材料。现在已经是四月底了，二队的减刑、假释材料都已报到了大队，就只差我的了。这一次，二队呈报了两份假释材料，

除我之外，另有一个叫杨富成的犯人。中队这次也准备为他办理假释。杨富成所有的担保书都来得很及时，很顺利，所以，他的假释材料早报上去了。现在，就只剩下我的担保书在拖后腿了。

请君入瓮美容院

这一天，我们又碰了壁。苏越的情绪很恶劣，他提出建议和邀请：“真是烦死人了！现在还有点时间，我们去哪里洗个头，捶捶背吧？”我已经与世隔绝六年多了，对什么洗头、捶背、按摩这类东西，早已感到陌生和遥远。现在，既然他提出来，我当然顺从了。我们去了距离岑家台派出所不远的一个美容院。

所谓的美容院非常简陋，门面很小，像个普普通通的小理发店，就那么三、四张皮转椅，坐在上面可以吹洗、染烫、剪发。皮转椅的后面，靠墙的地方则有一排长条椅，是供人休息坐的。

一走进去，几个打扮得花里胡哨、脸上涂抹着厚厚脂粉的小姐便笑盈盈地飘了过来：“两位先生，怎么样为你们服务呀？”

苏越说：“我洗个头。”他转过头来问我：“尚建国，你呢？”

我四处瞅了瞅，在那排长条椅上坐了下来，叹息说：“唉，我就坐在这里休息一下吧！”

有小姐开始为苏越洗头，此时一个长得很瘦很瘦、但容貌还算不错的小姐坐到我的旁边，一个劲儿地问我：“大哥，你刚才唉什么气呀？有什么不顺心的事情？让我替你洗个头吧？”她身上浓厚的香气一阵阵地往我的鼻腔里钻，弄得我心里痒痒的。她告诉我她叫仙红，服侍人的本事特别大。说着说着，她的纤纤细手就开始在我的身上蹭，先是游走于我的腰背，后来在我的大腿间抚摸，再后来，她那致命的手就伸到了男人最敏感的部位。

在这种情况下，一般的男人大概只会有两种反应，要么是昏，

要么是酥。我当时的感觉应该说是介于两者之间。显而易见，这个美容院里面有名堂。自从我身陷囹圄，在此后长达六年多的时间里，女人对我来说，始终都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美妙的东西：刘芳芳吧，她只能穿梭来往于我的睡梦中；王嫂子吧，她卖的东西虽然好吃，可是她那最宝贵的东西，谁都买不到；秋霞吧，人家是名花有主，心早已归属李金春了；田菲吧，充其量只能是嗅一嗅她身上淡淡的香味和汗味；黄灿吧，那是年轻的女干部，我哪里敢有那么大的色胆；桔子吧，自从朱成下了大组以后，她也曾偷偷地来过二队好几回，还曾经托我给朱成捎带过东西。我可以武断地说，如果我想干她，她肯定不会拒绝。我有好几回都是动了心，却没有动手。并非是我有多么纯洁和高尚，而是我到了关键的时刻，总是——用一句时髦的话说——掉链子。可能还是因为心理上的多重障碍吧，她对朱成似乎是有那么一些忠贞，我对她的兴趣又不是那么特别的浓厚。至于像韩小琳、陶春碧、王方、陈老妈子……这么一些女人，在我的潜意识里，她们好像是没有性别的。

在坐牢的六年多的时间里，我还没有如此贴近地接触过哪个女性。仙红对我的纠缠，却使我在惧怕的同时，又有那么几分渴望与冲动。这一刻，我那东西已经是硬骨头一般坚挺地竖立了起来。从我走进美容院的时候起，我的脸皮就是红红的，这一会儿，我的脸上更是火烫火烫，红得像是煮熟了的虾仁。我感觉到，呼吸的不是空气，而是一团团的火焰。仙红自作主张地拉扯着我说：“到里面去吧！我给你按按摩。”没有征得我的同意，仙红就把我往后面拖。这个时候，我自己也是有些欲罢不能。苏越也开了口：“进去看看吧。”

其他的小姐和四十来岁的女老板娘，也都对我说：“进去看看吧，仙红手艺不错哩。她又不是老虎，难道说还怕她把你吃了

不成？”我在仙红的拉扯下，跟着她进了后面的一间小小的按摩室。里面光线很暗淡，只有一张按摩床横在那儿，占据了将近三分之二的空间，剩余的地方很小，两个人进去后几乎就转不过身来了。仙红开始脱裤子，我连忙慌乱地说道：“你不是要给我按摩吗？”

仙红歪着眼睛一笑说：“是你给我按摩啊。”仙红脱得精光，她的肌肤倒是挺细腻白嫩，就是太瘦，仿佛就剩下一把白白的骨头，如同一个白骨精似的。仙红开始催促我：“你快点上来呀。”要说我不想干她，那是假话。我已经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可是最终我还是放弃了。原因很多，第一，她实在是太瘦了；第二，我当时看了仙红的阴部，发现那儿有些红肿和怪异；第三，在这种地方性交，有一种恐惧不安的情绪。我的惧怕让我选择了放弃，从那按摩室里落荒而逃。

直到我与苏越来到了车水马龙的大街上，我还是置身于心慌意乱的状态中。就在这个时候，如同六年前的三月七日那样，一辆吉普车“吱”地一声刹车停在了我的跟前，随后从吉普车里下来了两个人：“你跟我们走一趟吧！”其中的一个白胖的男人对我说。

我和苏越当时都觉得莫名其妙，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特别是苏越，他的反应甚至比我要紧张得多。因为是他把我从监狱里带出来的，只要出任何一点事情，都得由他负责。他走上前去阻拦道：“你们是干什么的？我们是江南监狱的，这是我的工作证。”苏越一边说着，一边掏出自己的工作证递了过去。他留了一个心眼，只笼统地介绍了他自己，却没有说出我的身份。

苏越原以为他这么一说，会把对方吓唬住，一般说来，类似于监狱这样的单位是有一定的杀伤力的。然而，这一回不灵了。对方也亮出了他们的底牌：“对不起，他还是得跟我们走一趟。

我们是岑家台派出所的，就在马路的那一边。”

这一下子算是撞了鬼，既然监狱的警察从气势上压不过人家派出所的警察，那就只好跟别人走一趟了。到了派出所一楼南边走道尽头的一间办公室里，折腾了好一会儿，我们才算是把事情弄明白了，原来是有人告我嫖娼。

“那边美容院里有人告你嫖娼。”

白胖的那个男人肯定地说，另一个黑矮瘦小的男人也随即附和着说：“既然人家告你嫖娼，那你就一定是嫖娼了。没有什么话好说。快说，你叫什么名字？”

苏越的脸都吓黄了，那当儿，他什么都顾不上了，便开始向那白胖和黑瘦的两个警察求情，同时也透露了我的身份：“实在是对不起，他是我们监狱里的一名犯人，是由我带出来办点事情的。他要是做出了什么事情的话，还是让我把他带回去进行教育吧。”

不管苏越说了多少求情的话，对方就是不肯松口。说到后来，苏越差不多要下跪了。直到这个时候，对方才转换了口气说：“那好，你要把他带回监狱也行，但要马上交清罚款。不然的话，我们虽然是同行，那话也不好说了。”

我此时却强硬地说道：“我又没有嫖娼，凭什么要交罚款！”

白胖的男人说：“你还嘴硬？别人都把你给告了。再说，我们在那家美容院里早安排了人，一直守在那儿，就是为了钓像你这样的鱼。”

黑瘦的男人也说：“你还是承认了吧，交了罚款好走人，不然的话，麻烦可大了。前些日子，我们这儿还抓了一个嫖娼的县长，他也是态度不好，后来怎么样？不是连县长都给弄丢了吗？”

话说到这儿，苏越早已吓得够呛，说话都有点儿不利索，开始打颤：“要罚款，那得罚多少？”

白胖的男人不假思索地接茬儿说：“罚一万。他嫖娼五千；你作为一个监狱的干部把他带到美容院那种连你都是不允许去的地方，你难道说不知道吗？这样吧，你也罚五千。加在一起恰好是一万元。”白胖男人驾轻就熟，一下子就开出了个价。

苏越觉得开价太高，便开始讨价还价。可是对方始终不肯降价，还说这样已经算是不错了。苏越没辙了，便只好说：“那好吧，我现在就去弄钱。很快就回来。尚建国，你先在这儿呆一会儿。”说完，苏越就离开派出所了。

这时候，那个黑瘦的男人开始审讯我：“你叫什么名字？”

我皱着眉头说：“尚建国”。那个男人立刻惊奇地望着我说：“你就是尚建国呀？！”

“是呀，我就是尚建国，难道说这还有假吗？”

黑瘦的男人突然向我绽放出一脸灿烂的笑容：“尚建国，你难道不认识我了？我是胡子祥，你的中学同学胡子祥呀。”

我心里在嘀咕着，记忆里却是一片模糊。便模棱两可笑逐颜开地说道：“胡子祥，是吗？现在当警察了？”我与胡子祥还没有说上几句话，走道外面有人在粗喉咙大嗓门地喊叫：“胡子祥——。”

胡子祥一走，那个白胖子走过来继续审问我。我始终不承认嫖了娼。他开始从一个男人的角度循循善诱地进行推理和分析：“尚建国，你的确进了人家的按摩房。那里面只有你们两个人，那个小姐还把裤子都脱掉了，面对一个赤身裸体的女人，这个时候，你能不干人家？是男人都过不了这一关。要是我的话，早就干上了。男人就只那么一点儿出息，控制不住自己的。更何况，你在监狱里呆了那么久。见了女人，那还不是像猫儿见了腥似的，蹭地一声就猛窜了上去！不是有这么一句话么，一坐牢三年，母猪赛貂婵。”

尽管白胖男人分析得透彻，说的话句句在理，可我始终坚持立场——我没有嫖娼。

见我还是不肯认账，白胖男人便恼怒地吼叫道：“我告诉你，就你这么个态度，等一会儿，就是你们那位监狱里的干部把一万块钱拿来了，我也不会让他把你带走。”白胖男人离开后，胡子祥劝说道：“你这是何必呢？不要吭声了，就当是吃了一个哑巴亏。既然把你抓进了派出所，怎么可能会轻而易举地把你放走呢？如果能罚款放人，这已经算是不错了。不说别的，只将你在我们派出所关上一夜，不让你回监狱，那惹的麻烦就大了。你那位干部的饭碗肯定要丢掉，而你不是要办假释的吗？这么一闹，你的假释还能办么？”

为了假释，我目前还真是得忍着。胡子祥说的有道理，这里面还牵涉着苏越的命运，他很有可能为此事而丢掉饭碗。我不能再那么强硬了。我也弄清楚了，那个白胖男人是派出所里的正式干警，而胡子祥仅仅是一个联防队员，是从原单位临时抽调来的，有点儿像我弟弟以前曾经扮演过的那类角色，因为这个缘故，胡子祥也认识我弟弟尚建武。胡子祥倒真心想帮我的忙，只是他人微言轻，只能帮我敲敲边鼓。

既然如此，我只好按照胡子祥交待的那样——只当是吃了个哑巴亏，不再与白胖的男人争论对错，我不吭声了。不过我始终没有正面承认过我嫖了娼，只是保持缄默罢了。

后来，苏越来了，我弟弟尚建武和母亲都一块儿跟着来了。母亲泪盈盈地站在我的面前，眼睛含有泪水，却意外地没有流淌下来。弟弟与岑家台派出所里的许多人都很熟悉，经过他多方周旋，再加上胡子祥的帮忙，白胖男人同意将罚款降至六千元，同时答应为此事保密，不影响到我的假释。也就是说，岑家台派出所的石所长是不会知道这件事的。

交了六千元的款项之后，苏越将我带出了岑家台派出所。天色已经昏暗下来，时间很晚了。我与家人匆忙道了别，便迅速上了开往江南监狱的汽车。一路之上，苏越一再叮嘱我：“尚建国，今天的事情，你可千万不要对别人说呀！要是这事传出去，我这身警服就该扒下来了！”

我承诺道：“你放心，我不会说的！”

从那以后，苏越再也不敢带我去沙河市了。

后来，又经过了好一阵子折腾，再加上弟弟从中周旋与努力，才通过石所长将岑家台派出所的担保书给办下来。前后一共花了近三个月的时间。

我的母亲似乎再也经受不住任何打击和折腾了。

我被岑家台派出所扣住的那一天，苏越离开派出所之后，就直接去了我家。进了门后，苏越“扑通”一声就跪在我妈面前。我的母亲被吓傻了，以为我出了车祸，葬身在沙河市那车水马龙的大街上了：“是不是建国被车撞了？”

“不、不是。”跪在那儿，苏越说话都变得结巴起来。费了很大的工夫，才让母亲弄明白，我被岑家台派出所给扣住，要罚款一万元。苏越是来求援要钱的。母亲的目光由浑浊渐渐变得清晰了：“苏干部，你先站起来吧！”

苏越不肯站起来，他坚持要母亲答应立马拿出一万块钱，苏越对我母亲说：“您要是不拿出这一万块钱，我今天是死定了，我这一生算是完蛋了！”我母亲咬着牙说：“苏干部，你站起来吧，我跟你现在就去银行取钱。”苏越跟着我母亲去银行里取出了整整一万元钱，并花了其中的六千块钱，这才将一场祸事压了下来。所有这些，都是我事后听说的。

再一次来监狱探望我的时候，母亲对我说：“建国，你再不能这么折腾了，这一次为你办假释，家里不知花销了多少钱。要

是这样下去的话，你还没有回来，我恐怕就要去阴曹地府找你爸爸了。”

母亲话说得很重，尽管母亲说话时没有像以往那样泪水涟涟满面悲戚，她的脸色平和安祥，可是我却感受到一份巨大的压力。当初为我搞保释的时候，我父亲搭上了一条性命。如果这一次为我办假释，再让我的母亲受到什么伤害的话，那我真是罪大恶极，应该天诛地灭了。

可我又有什么办法呢？这一次在那个美容院里出事，真是我始料不及的。苏越事恨得咬牙切齿地对我说：“尚建国，我们这一次让人算计了，真是窝囊透了！岑家台派出所我们拿他没有办法；可是那个美容院，我早晚总有哪一天会去找他们算账。这罚款的钱，不能由我们白出，得让那家美容院给我们弥补损失。”

要说损失，那经济上的损失全由我们家承担了——六千元的罚款，苏越没有出一分钱。苏越说要去找那家美容院算账，是说给我听安慰我。其实也就是说一说而已，从来也没有真正付诸行动过。我只当是破财消灾罢了。

事情过去了一段时间以后，弟弟对我说，我的那个中学同学胡子祥还曾经向他发出热情洋溢的邀请，邀请他跟着一块儿去“抓嫖娼”，无非是设局设套引人上钩，然后几方都可以得到好处，连小姐们都有份。这样做很来钱，很有搞头。胡子祥对建武说，你哥哥的那几千块钱的罚款，很快就能赚回来。我警告弟弟：“你千万不要去做这种事情！这种钱赚不得。”

历经曲折

中队三、四月份开始呈报减刑假释材料，本来我也是这一批的，可是岑家台派出所办理担保书折腾了将近三个月吧，一直到

206

6月下旬了，我的假释材料才弄好，中队随即呈报给大队，大队又很快报到了监狱监政科。与我同时开始办理假释手续的杨富成，早已高高兴兴地回家了。

他办理假释手续仅仅花费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一切都是那么顺利和快捷。

杨富成是从其它地方调到二队来的。他当初调到二队来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在二队办理假释手续。果真如此，他调到二队来还不到一年就假释回去了。杨富成长得浓眉大眼，他那双眼睛的轮廓很大，黑黑的瞳仁大得异乎寻常，还溜溜地圆，圆得晶莹透亮。一对睫毛又弯又长，有着一一种女人般的妩媚与俏丽。他家里很有钱，一般都不穿中队下发的那种蓝不蓝、黑不黑的囚服，他喜欢穿一件价格不菲的名牌羊毛套装，看上去很有派头。他隔三岔五地会收到家里寄来的邮包或汇款，生活得很阔气。杨富成在搬弄是非、拉帮结伙、暗箭伤人等方面经验丰富。他来二队的目的很明确，是为了假释。因此，从第一天开始起，他就在各方面尽可能地表现自己，主要的还是想表现给干部看。每次监狱的杨政委一来到二队，杨富成总想方设法凑上去和杨政委搭讪几句，那种样子看上去很恶心。

有一次杨政委来到了二队，在监号内巡察了好一阵子之后，在监号楼后面的水片子附近，碰到了我。他当即喊一声：“尚建国”，并以亲切的语调对我说：“听说你们中队要为你呈报假释材料了？”

我迟疑着说：“是在着手办理我的假释手续了，不过，在沙河市岑家台派出所办担保书这个问题上，现在遇到一点麻烦。”

杨政委说：“岑家台派出所那边的问题只是暂时性的，总会解决好的。如果你的减释材料到了监狱那边，我会让监政科尽快处理的，绝不会耽搁。你是一个研究生和作家，我觉得你的时间

很宝贵，回到社会后，我相信你一定会做出成绩。在监狱里你各方面都还不错，只要你的材料一报到监狱那边去，我们会尽快替你办好手续，让你早一点回归社会，去有所作为。”

杨政委这话说得我心里热乎乎的，那些话语里有一些难得的理解、肯定与欣赏。“你的时间很宝贵”这句话，让我体验到了一种久违的愉悦之感，一扫我多日因为在岑家台派出所那边办担保书不顺利而产生的郁闷心绪。

这一回，杨富成没有找到机会与杨政委攀谈。杨政委离开后，杨富成凑过来问我和杨政委说了些什么事情？他再三的追问，我说杨政委答应在假释的事情上给我帮帮忙，我的材料一到了监狱那边，立马就会替我办理相关的手续。我甚至还转述了杨政委对我说过的那句话“你的时间很宝贵”，一定不会耽搁假释等。

听了我的讲述，杨富成说：“到时候我们就看一看谁的假释材料先下来，谁的假释手续办得更快一些！”

我当时并没有明白杨富成这句话的分量。后来，杨富成一语中的，果然走在我的前面，假释材料报上去只一个多月便批了下来。他离开二队的时候很气派，前前后后一共有八辆锃亮的奥迪牌小轿车来接他回家。据说都是他的一些亲朋好友开车来接他的。看那架势，真像是电影里的黑社会大哥，雄赳赳气昂昂地跨出监狱的铁门，一帮小兄弟即刻围拢上来。

他还没有忘记这么问我一句哩：“尚建国，我们不是有过一个约定么，看谁的假释材料先下来，手续办得更快一些。现在怎么样，对不起了，我要先走一步！”

杨富成一走，朱强就跑过来安慰我说：“尚建国，你还是耐心地等你自己的假释材料吧，不要跟杨富成比。杨富成当初还不是为了在二队办假释方便一些。人家有关系，假释手续先是在上面找好了人，由上面的人往下面打招呼，那办起来当然顺利啦；

而你则是从下面往上面办，我估计呀，你的假释还会遇到一些麻烦和障碍。”

我问朱强：“杨富成的假释办得如此顺利，不知他的关系到底是谁？”

见我问这事，朱强嘿嘿一笑说：“杨富成的关系就是监狱的杨安。他们都姓杨，据说老家是在一块儿，还有些沾亲带故的关系哩。”

“是杨政委？”我有些将信将疑。

“你还不相信是不是？从这办假释就能看得出来，尽管杨政委很欣赏你，愿意帮忙，可你毕竟和人家没有什么关系，人家为什么会那么卖力地为你奔跑呢？杨富成就不同了，是亲戚，杨政委自然会不遗余力地为他张罗了。”

很快，朱强的预言就得到了验证。

这个时候，已经是七月份了，杨富成回家都已经两个多月了。可是我的假释材料放在监狱那边还是没有什么动静。天气很闷热，大队的洪教官头上扣着一顶遮阳帽来到二队，他找到我说：“尚建国，你的假释材料又遇到了一点问题。”

“是什么问题？”我问道。

洪教官说监狱近来有个新规定：凡是办理假释的，余刑要在三年以下。而我的余刑还有将近四年，这其中我实际服刑有六年多一点，减刑一年九个月，加在一起是八年多一点；我的原判刑期是十二年，用十二年减去八年，那么，我的余刑就是差不多将近四年了。这么一来就不符合余刑三年的规定。

听说有这么一个规定，我当即争辩着说：“……洪教官，《刑法》《监狱法》上不是规定得清清楚楚么，只要服刑过半，且又符合其它的假释条件，就可以办理假释。如今监狱为什么要出台一个余刑三年的土政策呢？！这并不符合上头的规定。”

洪教官苦笑一下说：“三年余刑的规定是监狱自己搞的土政策，可是又什么办法？既然在江南监狱，那就得执行这个土政策。”

我有些灰心丧气：“这么说来，我还得再等上一年才能办理假释手续了？”

洪教官沉吟半晌后说：“为办假释你已经耽误了快半年了，再让你等待一年，好像……”说到这儿，他话锋一转：“我看你干脆给监狱的杨政委写份思想汇报，将你的想法说一说，或许杨政委能够把你作为特殊情况，开个绿灯，这种可能性也不是没有。”

关于给杨政委写一份思想汇报的事情，洪教官给我说了好一会儿，可是从内心深处来说，我实在不想写这种东西，觉得很别扭。洪教官却是一再给我打气。洪教官走后，我寻思，如果不写吧，又辜负了洪教官的一番好意，如果写则不能写得很俗气丑陋。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我终于写了这么一个东西《我与文学》：

我 与 文 学

感谢命运

截止到目前，在近二十年的岁月里，我的文学生涯主要由两大板块组成。如果说，在八十年代，我的主要兴趣和成就表现在抒情类文学作品上，那么，进入九十年代以后，我则开始向叙事倾斜和拓展了。

在九十年代最初的几年里，作为一个比较成熟的诗人，我在深圳那块热火朝天的土地上，连续撰写和出版了好几本报告文学集。然而，我却对自己越来越不满意了。我总觉得，那些报告文学集全都是短命的速朽之作，因为它们仅仅只是表现了生活浮光掠影的那一面。与此同时，一个极为强烈的愿望一直都在撞击着我的心，那就是，我应该成为一个优秀的小说家。

我觉得我在这方面有一定的天赋和潜质，我无权毁掉自己的才华。

可是，在深圳那么一个瞬息万变人心浮躁的社会环境里，我的这个愿望实现起来困难重重。这里面交织了内与外、身与心、得与失、灵与肉等诸多原因。总之，在那个时候，我想写点直逼人们内心世界的小小说的美好愿望，始终都只能成为一种旷日持久的遗憾。我曾借用过这么一句话——给我一个支点，我能撬动地球——戏谑自己，我苦笑着对自己说：如果给我一个适合的环境，那么，我一定会成为一个无愧于时代的优秀小说家。

让我始料不及的是，到最后，竟是江北这块土地成全了我的愿望，消除了我的遗憾。尽管这是一种可遇不可求的痛苦经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要说一句充满了苦涩感和酸楚感的肺腑之言：感谢命运！

感谢生活

我在江北这块土地上已足足生活了将近六年的时间。

在此之前，我从未曾在一个地方一成不变地呆如此漫长的时间。尤其是在深圳生活的那些年里，我变得越来越躁动不安了。最多每隔一个月，我便会天南地北地去出趟差，放松放松自己那紧绷的身心。那时，自己有较强的权利支配自己的行动。

在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江北的六年里，我仿佛成了一种爱静的植物。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心居然是日趋沉静了，犹若那一泓清水里的一颗鹅卵石，既清澈可见，更晶莹剔透。这是一种极佳的心境。

佛家讲究修炼，其清修的过程循序渐进——坐于椅——坐于墩——坐于厕——坐于椎——到最后，连坐在针尖上都能身

静思安。

我如今的这种身静思安的状态，恰恰来自于江北这六年囚禁的生活。尽管这生活里充满了精神的痛苦，心灵的磨难，可是我仍要说这么一句话：感谢生活！

感谢苦难

在江北生活的这六年里，我失去了人生许多宝贵的东西，这里面最让我悲痛不已的是，在1995年的冬天，我的父亲为了我的事情四处奔波，日夜操劳，最后竟引发脑溢血与世长辞了。我父亲去世的时候只有五十七岁，应该算是英年早逝吧！我的坐牢，至少折了我父亲二十年寿命。

我的其他亲人，都是身心交瘁。我总觉得，在这六年里，不仅仅是我在坐牢，我的亲人们全都统统在坐牢。而且，由于我性格的豁达以及文学事业对我强有力的支撑和充实，在这六年里，我倒是始终能把持住自己。而我的亲人则完全不同了，他们的身心已被摧残得百孔千疮了。尤其是我的母亲，在这六年里，只要一提到我的坐牢，她便会泪流满面悲从中来。我这个曾让她为之骄傲和自豪的儿子，如今竟成了她心中最大的痛苦之源。

尽管如此，我仍要感谢苦难。

因为，所有这些苦难将会成为我日后文学生涯的巨大推动力量以及我写作小说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素材。

感谢关怀

在坐牢以前，我一直工作和生活在深圳。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我是在异地他乡服刑。且我的母亲他们是由外地移居到了沙市，在荆沙一带无根无枝，无亲无戚。然而，自从我来江

北坐牢以来，我自始至终都得到了一种无私的关怀。这种关怀与血缘无关，与权利无关，与金钱无关，与种种等价交换的原则无关，与各式各样的功利和实惠无关……我想，这应该体现了人性之中美好的一面吧。

所以，在这里，我要直言不讳地说：感谢关怀！

感谢未来

我不是一个永远的囚徒。

这点决定了我必然会有一个未来。况且，我自己认为，我的未来应该会充满了多姿多彩的美好景象。这是因为，1、命运安排我来到了江北，在这里，我找到了一个合适的环境，在这几年的煎熬和磨砺中，我终于找回了我自己。而以前，在深圳的时候，我却是在逐渐丢掉和流失自己。2、在江北，我意外地获得了一个空前纯净且静谧的绝佳心境。3、以前我对人的了解犹若雾里看花，那时，我往往只看见了人的诸多外在因素，譬如：人的身份呀、人的背景呀、人的外貌呀、人的种种假象呀……在现代社会里，人的身份变幻莫测，当人去机场搭乘飞机的时候，他是一名乘客；当人去宾馆酒楼里吃饭的时候，他是一个食客；当人去商场里购物的时候，他是一位顾客……。随着社会角色的不断变化，他的身份同样在随机应变。那个时候，我常常会被这些昙花一现的现象所迷惑。而经过了在江北的几年的反思和自我表现审视，我已抓住了其中最根本的一个要素，即：不论是达官贵人也好，富翁大款也好，小民百姓也好，流氓地痞也好，他们首先都是一个人，都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从这点出发，我如今再观察人的时候，便比较容易看清人的本质了。而文学，从根上说，它应该是人学，是关于人的本质、人的本性的一种深层次的思考以及随后而来的优美的语言文字

的传达和展现。我在江北恰好练就了这种本领。4、在坐牢的这六年里，我掌握了大量颇有价值的写作素材。5、我的写作技巧似乎开始了质的升华和飞跃……综上所述，正如我在前面所描述的那样——在深圳，我曾苦笑着对自己说：如果给我一个合适的环境，那么，我一定会成为一个无愧于时代的优秀小说家。在这里，我仍要重复这句话，不过，这一回，我不是苦笑了，而是要微笑着说这句话。尽管在微笑的时候，我的眼角里会闪烁出让人不易觉察的泪花。因为，当年，在深圳的时候，这话还仅仅只是我那美好愿望的一部分，而现今，它切切实实地呈现在我的身边了。

所以，我想大声疾呼一句：感谢未来！

此文将会作为我未来的某部长篇小说的序跋或是后记。

这篇文章也可以当作是我的一个思想汇报吧。

《我与文学》这篇文章写好后，我给徐队长看了，徐队长觉得写得不错，并把它转给了洪教官。洪教官也很喜欢这文章，迅速将之转给了杨政委。过了一段时间，洪教官来到二队对我说：

“尚建国，你那个东西杨政委看了，很受感动。杨政委说了，你的假释手续会给你尽快办的。”

我郁闷在胸中的一口气总算是吐了出来。

《我与文学》这篇文章尽管是在这种背景下写的，又是因为假释这么一个缘故，可是我觉得，我在文章里说的全都是真话，吐露的是我的心声。我想，真情的流露是会打动人的。

到了十月份，也就是杨富成回去五个多月后，有一天忽然耀武扬威地来到二队。一下汽车，就恰好遇到了我，他咳嗽了一下，然后阴阳怪气地说：“尚宣鼓，你还没有回去？你的假释还没有办好？你难道想在二队当一辈子的宣鼓？”

我刚要答话，邱队长的老婆韩小琳站在她家门口悄悄地招手。我只好走过去：“韩保管，有什么事吗？”我想，或许是韩小琳又要让我给她推销什么东西了。自从我接手零用金账目以来，这方面的麻烦事越来越多，又容易得罪人，一碗水很难绝对端平。就是端平了，也还是会得罪人。中队三个保管的疑心都很重，总是怀疑我替别的保管多卖了东西，弄得我左右不是人。我曾多次找到徐队长，要求免除我的这项工作。可是，徐队长总是说：“你先干着吧。等找到合适的人选，我一定会将你替换下来。”这话说了好久，却是一直没有兑现。如今，我只要一看到哪个保管悄悄地向我招手，就知道麻烦又来了，肯定是又要让我为她们在监内销售什么东西了，但我又不能不去。在办假释的关键时刻，我更是得委曲求全，谁都不能得罪。我问“韩保管有什么事吗？”

韩小琳却催促我：“尚建国，你快进来呀！别站在门口，让别人看见了不好。”

此时此刻，我站在邱队长的家门口的确是不太好，但是如果进去了，那恐怕是更加不好吧！邱队长本来就反感我，我进了他家，他会很不高兴的。韩小琳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小声对我说：“进来吧，不要紧的。老邱不在家里。”

进了邱队长的家里，我更加后悔了。邱队长的家里很乱，韩小琳一边跟我说话，一边坐在那儿化妆。一层一层的脂粉涂抹上去，她那张脸就仿佛变成了画布一般，她整个人也显出了几分风骚的样子。我此前已经隐隐约约地听说了，韩小琳好像与胡队长有染。邱队长不在家里，韩小琳又是这么个样子，要是这一会儿邱队长突然从外面回来了，我还真有点儿说不清楚哩。我很想马上离开，可是，韩小琳以漫不经心的口气说着一个我十分关心的问题：“尚建国，监狱监政科的科长郎平元好像对你很熟悉啊！”

“郎平元？他是和我很熟悉啊！我入监队的时候就和郎平元

认识了，韩保管，你怎么突然说到了他呢？”

韩小琳一边聚精会神地画着她那细细的眉毛，一边媚媚地对我说：“郎平元前几天还来我们家吃过饭，他问到过你假释的事，说是杨政委来二队找你谈过话，你的假释问题，大家都很关心。郎平元也说了，对你假释的事情，他也会管一管的。”

我随即进一步探问道：“郎平元还说了一些什么话？”

韩小琳对镜照着她那张搽得像玩偶的假面具一般的脸，微笑着说：“我听郎平元说话的口气，他好像对你的印像不太好，他说你太清高狂妄了。”

我相信韩小琳说的是真话。郎平元的确是对我有这样的评价和看法。当初，我还在江南监狱入监队的时候，郎平元就常常喜欢来找我聊天。可是，谈着谈着，郎平元就开始对我有一些看法了，我总是在许多问题上和他发生分歧和争执，渐渐地郎平元对我不满和恼火起来。之后，他还看了一点儿我在狱中写的小说，可他总是皱眉，话也不多，再也没有当初来找我时的那种热情了。说实话，我觉得他心胸狭窄气量小，喜欢在鸡蛋里面挑骨头。现在，郎平元一方面说我清高狂妄，一方面又说要管一管我假释的事情，这到底是好的征兆还是不祥之兆呢？

韩小琳细细的眉毛已经被描画成黑黑的了，还闪耀出一种明亮的光泽。她还絮叨着：“尚建国，监狱那边也是很复杂的。郎平元与杨政委面和心不和。郎平元总觉得他更有资格当那个政委，再说，郎平元上面还有人呢，他早晚会往上爬一爬的”她接着说：“尚建国，你假释的事，徐队长并帮不了多少忙，我们家老邱倒是与郎平元关系不错，他们之间走动得很频繁，经常在一起喝酒。”

我心里在说，邱队长不是一贯都认为我狂妄高傲么，在这一点上，他的看法与郎平元不谋而合。我可不能指望邱队长替我说

什么话。一想起邱队长我就又坐不住了。前些年有一个犯人暗中喜欢韩小琳，为她写了一首打油诗：“……你是天上的织女，我却不是牛郎；我不是牛郎，只是地上的蚂蝗……”那个犯人写后觉得很得意，便跑到邱队长的家里来朗诵给韩小琳听。诗只读了一半，恰好在这个时候邱队长在外面喝了酒回来了。一看到这个场面，那还得了，当即将那个犯人踢了出去。事后，那个犯人不仅受到了五花大绑拳打脚踢的教育，还被二队撵了出去，送到别处严管去了。我可不想在自己的身上找教训，我就是不吃那一堑，也要长那一智。我不管韩小琳是否谈兴正浓，便站起来要走。嘴里同时说道：“韩保管，你要是有什么东西需要我在监号里卖一卖，你尽管说。”

韩小琳却不高兴了：“我没有什么东西要让你拿到监号里去卖。我只是想跟你说说话，难道不行吗？”

我能够明显地感受到韩小琳的不悦，然而，此处实在不是我久留之地。韩小琳见留不住我，而她家门口又好像站的有大队的干部，正在那儿叽哩哇啦地说话。所以，我只好选择从后门出去。她家后门有个很大的院子，养了很多鸡。韩小琳眼尖，在觅食的鸡群里发现了别人家的几只鸡，韩小琳恶狠狠地驱赶着：“滚滚，真是讨厌死了！一天到晚往别人家里跑，跑来混吃混喝，真是不要脸。”

我悄声问道：“韩保管，这是谁家的鸡呢？”

韩小琳嘴巴一撇说：“还能是谁家的鸡呢？还不是徐队长家的鸡，真是讨厌透了，一天到晚往我们这儿跑。他们家的鸡像他们家的人一样讨厌！尚建国，听说你也写了一份材料告徐队长的状是不是？你这一回办假释，徐队长收了你多少钱呢？”

那封告状信是有人摹仿我的笔迹写的。想必韩小琳是不了解这一情况。我现在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她，便支支吾吾地说：“韩

保管，你别听旁人瞎说。”我便匆匆地离去了。

从种种迹象来看，我的假释已经到了白热化的关键时刻了。朱强有一天对我说：“尚建国，你的假释材料已经报上去那么长时间了，杨政委又对你拍了胸脯，你又写了一份思想汇报《我与文学》。照说，是应该有动静了，估计也就是这几天吧，江南法庭的人肯定会来对你进行考核，历来都是这样。假释材料报了上去，江南法庭再派人来考核一下，抽查一下《规范》，了解了解你在中队的表现，然后就是等着假释通知书走人了。”

的确，我要做好准备，以便迎接来自江南法庭的考核。在随后的几天里，考核倒是考核了。前来对我进行考核的人并不是什么江南法庭的人，而是江南监狱狱政科科长郎平元等一行人。

那天，是徐队长来门房喊我的。我迅速来到了门房那儿，徐队长隔着铁门对我交待着：“尚建国，监狱狱政科科长他们来了，说要对你进行考核。”徐队长用钥匙打开了大铁门之后，我一边往外面走，一边纳闷地问道：“徐队长，不是说是江南法庭来考核吗？现在怎么变成狱政科科长他们来考核了呢？”

徐队长摇摇头说：“连我也弄不清楚是怎么回事。既然是郎科长他们来考核，郎科长你又是认识的，你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吧？”我苦笑了一下：“谁知道呢？”

进了中队干部的大办公室，郎平元他们正在低头看着什么，他的手指在办公桌抓挠。见我进了办公室，郎平元也没有让我坐下来，便绷着一张脸，开门见山地问我：

“尚建国，你会背诵《规范》吗？”我说：“会。”

郎平元抽了几条让我背，我有的地方背得很顺溜，有的地方却是背得嗑嗑巴巴。郎平元就用一种不屑的目光在我身上扫描着：“你是研究生，就这种水平呀？”我无言以对。

《规范》抽查结束后，郎平元等人又问了我几个问题。这次

考核便算是到此为止了。

回到监号后，朱强等人围拢上来，问我考核的情况怎么样。大家都迷惑不解为什么江南法庭的人没来考核，倒是狱政科的人来了。有人向我指出，这里面一定有什么问题。

很快，大队的洪教官就来对我说：“你是怎么搞的？怎么把这次考核给弄砸了？好不容易争取到的一次机会呀。”我被洪教官说得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心中充满了迷茫和慌乱。“洪教官，究竟是怎么啦？”洪教官有些气恼地说：“怎么啦？郎平元他们对你进行考核后，说你态度很不好，让你背诵《规范》吧，你一字一顿地像是在做什么报告，那口气，那架势像个领导。问你一些问题吧，你都回答得很离谱。还说你对你的判决有自己的看法。”

我不知应该对洪教官做何解释，心里在琢磨着，我背诵《规范》的时候是有些嗑嗑巴巴，但并没有那种做什么报告的口气呀；回答问题也很正常；对判决我可以有自己的看法嘛。如果郎平元他们对我有不好的看法，那我也没有办法。我的命运掌握在别人的手里，我又能怎么样呢。

洪教官还在继续着他的埋怨和气愤：“郎平元他们还说了，你这个人太狂妄自大，连监狱来考核的人你都没有放在眼里，真是不像话。”我争辩着说：“没有，洪教官，你听我说——”

洪教官又将话头转移到郎平元的身上：“郎平元这个人也是爱在鸡蛋里面挑骨头，既然杨政委都说话了，让他们来考核一下，那他们还挑个什么挑呢。我那天还给他们说了你的假释已经耽搁很长时间了，不要再拖了。郎平元他们当时答应得好好的，却偏偏唱了这么一出戏。现在，连我都不好说话了。”

尽管洪教官对此事很恼火，但到末了，他还是想做点挽救工作。他对我说：“我看这样吧，我还是去杨政委那儿做做工作，看看能不能想想什么办法。”可是过了几天，他再次来到二队时却

摇晃着脑袋对我说：“尚建国，不行了。我已经是尽力了，可是，连杨政委那儿都不好再说什么话了。郎平元他们对你考核完回去后，把你说得是一塌糊涂。他们说，还是先把你的假释材料压一压再说。杨政委也得尊重下面的意见啊。既然狱政科是这么个意见，杨政委也不好强迫他们给你办手续呀，这话不好说嘛，事情只能这样了。”洪教官又说：“你的假释也是折腾得够呛了，如果你放弃假释，这次想减刑的话，我去给法庭和法院那边说一说，争取给你减一年刑好不好？”

变假释为减刑？为了办假释，我已经耽误了将近一年的时间了。如果当初就办减刑而不是假释的话，那么，我的减刑材料早已下来了，也不会像现在这样折腾来折腾去的了。如今已经到了这个份儿上了，再让我放弃假释？我犹豫不决。

洪教官见我这个样子，便说：“你先考虑考虑，等你想清楚了，再告诉我吧！”我说：“谢谢你洪教官，为我的事，你操了不少心，跑了不少路，我非常感激。”洪教官摇摆着手说：“不要说什么感谢不感谢的话，你的假释没有办好，我们也有责任。再说，我们也希望你出去后为社会做出贡献！”

患难真情

正当我犹豫不决之际，一个朋友高远到二队看望我来了。高远稳重、冷静、谨言慎行。他办事的风格讲究一步一个脚印，素有“小旋风柴进”之美名。他当初也是一个诗人，诗写得相当不错，有自己的风格和韵味，在地下诗坛颇有声誉。他与我的交往，是慢慢才亲近起来的，这是他为人处事的风格。近年来，他下海做生意，常常请朋友和客户们唱歌、泡吧、吃饭，生活安逸了，他那曾经很健壮的体魄也渐渐地走了下坡路。到二队来看望我的

这一天，他的脸色有些黄，但精神却比往常要好一些。见到我，高远说：“尚大哥，我真是羡慕你啊，红光满面的，这看起来像是在坐牢呢！你看看我这个样子，黄皮寡瘦的，倒更像是一个从监牢里出来的犯人似的。”

我有些烦躁地对高远说：“哎呀，我烦都烦死了！”

高远有些迷惑地说：“咦，你不是一向都是个乐天派么？为什么这样烦躁呢？”

我对高远说了假释与减刑的事：“当初有人去找过我们家老太太，就是那个律师邓光百，他跟我老娘说，如果给他三万块钱，假释的事全包在他的身上了。我当时一口就拒绝，刘金保的教训就够深刻了，他活活将我爸爸折腾死了，另一方面，这么些年来，我们家里弄得家破人亡倾家荡产，我不想再拖累家里人了。同时，我更想检验一下自己的能力，坐牢的时间长了，跟监狱上上下下的人都熟悉，像中队的徐队长、大队的洪教官、监狱的杨政委等人，都与我的关系不错。我猜想，凭着我的能力，还有我这些年在监狱里结下的好人缘，我完全能够把自己弄出去。可是，如今一波三折，走到了今天这进退维谷的一步。这样颠来倒去的折腾，简直令人无法承受。我自己已经是这么个精神状态了，我不想为了假释再失去我的母亲。当年为办保释，我已经失去了父亲。我想，还是放弃假释算了。”

高远打断我说：“大哥，我早说要来替你办假释的事，可你就是不让我介入进来。你说的这些情况我都知道了，这样吧，从现在开始，你就不要管了，由我来处理。当今这个社会太复杂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复杂，很难把握。你说的那个郎平元，确实让人很难捉摸。我有一个远房的亲戚在江南县当副县长，我打算动用他，让他出个面来办你假释的事儿。”

高远如此这般地讲述了他的安排与计划。说到让副县长出面

宴请杨政委等人时，我建议，请客的时候不要忘了郎平元，这个人千万不要怠慢，不然他又会从中间作梗。高远说：“有句老话，宁可得罪君子，也不能得罪小人！”

高远从二队回去没过多久，他就让他那亲戚副县长出面宴请了杨政委、郎平元等人。本来也想请洪教官的，可是觉得上下级不同的人放在一起不太合适，便没有宴请洪教官。事后听我弟弟说，他当时也参加了宴会，那是在沙河市一个高档的宾馆里举行的，酒喝到兴头上时，郎平元对我弟弟说，你哥哥还是不错的，人很有水平，就是太高傲了一些。在说到办理假释的问题上时，杨政委说：“尚建国办理假释的时间已经拖延了将近一年，我们也想尽快给他办好了让他回去算了，可是现在已经到了年底，就是想办，时间上也来不及了。我看这样吧，今年春节让尚建国回家过个年，等他回来了，我们就开始给他办理假释手续，争取让他早一点离开监狱，回到社会上。”

既然杨政委把话都已经说到这个份儿上了，其他人也不好再多说什么催促的话了。时间不会太久了，也就两、三个月。在此期间还能让我回家过年，算很令人满意了。

酒酣耳热地吃好喝好以后，还安排杨政委、郎平元他们一行人洗了洗脚，捶了捶背。一系列的娱乐健身节目五彩缤纷应有尽有。

除此之外，该打点的打点，该上贡的上贡，按照高远办事的风格，一切都办理得尽善尽美。

接下来，就应该是我回家过年了。

我在江南监狱已经呆了很长时间了，属于大队宽管级，有资格享受回家探亲的待遇。再加上杨政委开了口，回家过年已经是板上钉钉子的事了。办了相应的手续后，我就要离开二队回家去过年了。

根据中队的安排，我回家过年期间，监内的事情就由朱强临时负责一下。

朱强现在是值班组长，负责维护监号内的秩序。朱强与伙房组长夏涛之间的矛盾是越来越激化了。我回家过年期间由朱强来管监号，我最担心的事情就是害怕朱强与夏涛两个人打起来了。因此，临走之前，我反复对朱强叮嘱道：“朱强，过年这几天，你千万不要和夏涛发生什么矛盾和冲突，有什么事情尽可能冷静地处理。”朱强倒是答应得挺好：“你放心吧，不会有什么事的。”

大年三十这一天清早，我们在监号里还没有吃早饭，我就听见门房那儿我母亲在呼唤我。

我迅速跑到门房那儿，只见母亲在铁门外面兴高采烈地催促着我说：“建国，我和建武接你来了，跟我们走吧！”门房值班室的干部本来还在睡觉，被母亲吵醒了，只好提着钥匙来为我开门。他知道我要回去过年的事儿，他一边打着哈欠，一边说：“怎么这么早啊？”母亲脸上浮现出歉疚的笑容说：“干部啊，真是对不起！打扰你睡觉了！不过，我们的心情你也应该理解，这么多年，我们一家人都没有在一起过年了。这次有个机会，我们特别珍惜。”

门房值夜班的干部说：“那是，那是，应该的，应该的。”

出了门房，我们还要去找徐队长拿“路条”，也就是监狱准许我回家探亲的相关手续。到了徐队长的家门口，门窗紧闭，估计一家人还在睡觉呢。母亲十分焦急，便逦直敲响了徐队长家那扇静静的大门。里面就传出了不耐烦的声音：“这么早，是谁呀？”

母亲回答道：“是我，尚建国的妈妈。”

房里的声音立即变得柔和多了：“哦，原来是您呀！等一会儿，我这就出来。”徐队长开门出来，打着哈欠有点睡眼惺忪。他

将相关的手续交到我弟弟手上叮嘱道：“我可把你哥哥交到你的手上了，你要保证他的安全，要按时去，按时回。初四晚上一定要按时回到中队，要是过了半夜十二点人还没有回来，那我们可是要报警了。”徐队长嘴上说得严，可是脸上却浮着淡淡的笑。我母亲接过话茬儿说：“徐队长，这你放心好了，我们保证按时回到中队来，初四下午就回来。”

回家的路上，说了许多的话。这一次回家没有干部监视，而且回家的时间足足有五天，我的心情放松了许多。与家人团聚之余，更多的时间，我是在整理着自己的思绪和一些相关的资料及信件。过完年回到二队之后，徐队长对我说，监狱让我写一篇文章，讲述一下我这次回家过年的感受与体会。于是，我就写了《回家过年》这篇小文章。

回家过年

大学毕业那年，我二十三岁，从那时起直到如今，在近二十年的时间里，我先后在沙河市度过了三个春节。

1983年的春节，我结婚回到了沙河市。在亲朋好友的欢声笑语的环绕和簇拥下，我和新婚的妻子在沙河市流连忘返，欢度佳节；1992年的春节，我第二次回到沙河市，与家人团聚，共享天伦。

2000年的春节，是我第三次在沙河市过年，在亲人身边过年。与以往任何一次都有所不同的是，我这次回家过年的处境虽是犹若一个风筝那样，由于线绳的缘故，不可能飞得太高，飘得太远，但我的心境却是非常恬淡，如清风明月一般。

回家过年，一个“回”字重若千钧，是那样沉重，那样苦涩。82年回家时，我是携着新婚的妻子；92年回家时，我是带

着八岁的女儿；而这一次回家，我则是孑然一身，形单影只。并且，在此期间，许多重大的变故都令人猝不及防地发生了：我的小家庭解体了；我的父亲溘然长逝；我的母亲日渐衰老……回家过年，这是一个沉重得让人喘不过气来的话题，它的支离破碎，它的物事人非，它的沧桑巨变，真是耐人咀嚼，回味无穷啊！

这么多年来，我都是一个寻寻觅觅的游子，四处飘泊，八方追索。如同犹太人和吉卜赛人一样，我也与流浪结下了不解之缘。不过，犹太人更渴望的不是流浪，而是家园；吉卜赛人则是主动的流浪者，流浪是他们与生俱来的、唯一的生活方式。作为一个文人，我始终在寻找着自己的精神家园，我知道世途辗转，心路崎岖，可我却从来都没有放弃过。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我才在过去的岁月里极少回家过年，在如此漫长的近二十年里，只在沙河市过了三个年。我清楚地记得，1990年的春节，我母亲给远在深圳的我打电话，哭着问我：怎么不回沙河市过年呢？！是呀，在潮湿闷热的南方城市深圳，我也曾远远地遥想过故土，写过诸如怀念沙河市之类的诗歌，祈盼着能有更多的时间与家人相聚在一起……

由此可见，2000年这个春节对我来说，是多么地非同寻常。回家过年。回家过年。这一次，我可以说是踏踏实实地回家过年了。在家里呆了五天，概括地说，我只干了两件事情：一是陪伴母亲，二是整理自己。

以往，我很少抽出大量的时间专门陪伴母亲。那时我陪伴的是妻子、孩子、形形色色的同学及朋友等。我像个陀螺转来旋去，如只猴子东奔西窜。而这个春节哩，我则是一心一意陪伴着母亲，陪伴母亲看电视、逛街、购物、炒菜做饭……我宛若是个尚未成年的孩童，牵着母亲的衣角寸步不离，亦步亦趋。

这种感受，已远远地离开了我许多年啊。特别是除夕夜的十一点半钟左右的时候，我陪伴着母亲去路边为死去的父亲烧钱纸，在那飞腾而起的熊熊火焰里，我仿佛回到了遥远的过去。那个时候，父母亲都很年轻，我则是无忧无虑，天真纯洁。一眨眼的工夫，我的鬓角已开始蔓延起皑皑的白雪了。

再说整理自己。在 2000 年的春节，我几乎是将自己过去的岁月全都整理了一番。这里面既包括了整理照片、各类文学作品及相关的书信、资料等，更包括了整理自己的思想感情和精神世界。

这个春节，我过得既沉静又充实，既单纯又丰富，少了过去的那种浮在面上的喧哗与热闹，而多了几分心灵的踏实与妥帖。

在这里，我想说，是江南的六年囚徒生活给了我这种身静思安的状态，让我在 2000 年的春节里，既对母亲尽了作儿子的孝道，又对自己进行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反思与整理。在此，我表示深深的谢意。

写于 2000 年 2 月 25 日

回家过年的五天时间就这么过去了。

到了初四的下午，我要返回监狱了，母亲让我带这带那，恨不得让我把整个家都带到监狱去。我不同意，最终我们达成了妥协，吃的喝的，还是要带一点儿，只是不多。

初四下午回到监狱，由于时间还很充足，我就在弟弟的陪同下去洪教官家里拜了个年。洪教官对我说道：“你的假释手续一开年我们就开始办，这一回随着一队的材料走。因为一队是全监狱的样榜单位，它的减刑假释材料要早下来一个多月哩。”从洪教

官家里出来后，我又借用弟弟的手机给杨政委打了一个电话，算是在电话里拜了拜年。杨政委在电话那边说：“尚建国，回家过年的感觉不错吧？你假释的事儿，等一过完年，我们就开始着手办理，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到了中队，我和弟弟还去徐队长家里拜了个年，实际上也是去销假，让徐队长知道我已经回到中队了，免得他心里惦记和牵挂。这也是个手续问题。进了徐队长的家，他们家里正是人声鼎沸热闹非凡，同时开了好几桌牌。见人如此之多，场面如此之大，我们也没有多停留，打了声招呼，便退了出来。

把我送到二队的门房那儿，弟弟就转身回去了。我也随即进了分别了五天的监号。如果说我对沙河市有一种怨恨、陌生和隔阂的话，那么，一回到二队的监号，则感到熟悉、亲切和兴奋。监号里张灯结彩悬挂灯笼，颇有过年的热闹气氛。许多人都纷纷和我打着招呼，说着过年过节的吉利话。

我临走之前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朱强终究还是跟夏涛打了一架，并且是打得头破血流，两个人都有伤痕，只差没有弄出人命来。朱强的头上还缠着白色的绷带，他一见到我就说：“夏涛这小子真是该打！”我问：“为什么呢？”朱强用鼻子哼了哼说：“不说别的，光是冲着他摹仿你的笔迹写告状信，想陷害你，破坏你与徐队长的关系这一点，我早就想打他了。”

我未置可否，什么话也没说。

再报假释

一年以前，中队为我呈报过一次假释材料，这一回中队又为我呈报了一次假释，不过这一回的材料是跟着一队走的，比二队的材料要早一些。第二次办理假释，开头也还算顺利，中队顺利

过了关；大队顺利过了关；监狱狱政科去年压了我一次，这一回也算顺利地过了关。可是，材料到了江南法庭那儿，又被压了下来。去年我的余刑还有四年，跟监狱规定的余刑三年才能假释的土政策还有点冲突。今年好像在这方面挑不出我的什么毛病了，我的余刑只有三年了。然而，江南法庭就是压着我的假释材料不理不睬不往沙河市法院报批。

徐队长通过种种途径打听到，我的假释材料就压在江南法庭副院长龙仕桥的手里。徐队长对我说：“你可以让你弟弟或者你朋友高远去找一找龙仕桥。”

我不想再让高远介入，他动用江南县的副县长宴请杨政委、郎平元等人，打通了那么一个关节，已经算是帮了我很大一个忙了。这一次，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障碍，就让我弟弟去找一找龙仕桥吧！

尚建武起初对龙仕桥的印象还相当好，龙仕桥已经拍了胸脯保证帮我把假释办好，说然他介入此事，那就不要再去找别的人，否则，会坏事的。

这一天，风和日丽，晴空万里，徐队长在门房那儿喊叫着：“尚建国，洪教官找你。”

我出了门房，并没有看见洪教官，却只看见了大队的那部经常来来往往的旧吉普车。徐队长对我说：“你先上车吧，洪教官在打谷场那边等你哩。”我有些疑惑。坐上车后，我心里还在嘀咕着，这是怎么一回事，还用个吉普车来接我呀？中队的打谷场距离监号不远，也就是两、三百米的路程。

下了车，见到了洪教官，他好像是有什么话难以启齿似的，停了片刻，才对我说：“你的材料下来了，减刑一年。”

什么？！我完全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在此之前，所有的信息和迹象都向我指出了一个归宿，——我的假释材料马上要下来

了，怎么搞的，一瞬间里，假释突然变成了减刑。

洪教官试图对我解释说：“尚建国，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听说是沙河市那边不同意你假释。”尽管洪教官做了种种的解释，可我心中的谜团始终是挥之不去。不过，我还是对他表示了深深的谢意。“洪教官，我的假释前前后后搞了两年，尽管最终没有搞成，可是我却对你非常感激。在这两年的时间里，你为我的事跑了不少的路，替我说了不少话，这份情，我有机会再报答吧！”

洪教官也颇有感慨：“我办了那么多的假释，还从来没有遇到过一个像你这样艰难的。要是早知道是这么一个结局的话，那么去年就应该为你报一次减刑，如果是去年减刑的话，你今年还可以再减一回，就可以回家了。”

我心烦意乱地说：“是啊，为了这个假释，前前后后已经折腾和耽搁了两、三年的时间，想想真是可怕。”洪教官也是用心良苦，他专门挑选了打谷场这么一个开阔一些的地方来对我说假释失败的事情，还派了一辆吉普车来接我，尽管只有两、三百米的距离。

与洪教官谈话结束之后，我往监号里走的时候，徐队长问我是不是假释材料下来了。更加让人啼笑皆非的是，我弟弟也在这天中午来到二队问我假释材料下来了没有。我火冒三丈大声地说道：“还搞个什么假释呀！假释已经改成减刑了，你难道不知道？”

尚建武一头的雾水：“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呀？”

我将情况说了一遍，我的话还没说完，尚建武就两眼圆睁，脸色通红地说：“我知道了，这是龙仕桥捣的鬼！我这就去找他。”便匆匆忙忙地走了。

弟弟走后不到两个小时，徐队长就在门房那儿喊我：“尚建国，尚建国。”

徐队长打开门让我进了干部值班室，有些紧张地问我：“你

弟弟刚才来过是不是？你们在一起都说了一些什么话呀？”

我问怎么啦？徐队长说：“你弟弟刚才去了龙仕桥的家，在那里说了一些很难听的话。这一会儿，龙仕桥已经给我打了五六次电话了，还给洪教官也打了五六次电话。洪教官已经去阻拦你弟弟去了，让他不要做什么傻事。你也不要再对他说什么火上浇油的话了。”

过了两天，尚建武又来了，并且给我带来了一份《致一位法官的公开信》，全文如下：

致一位法官的公开信

龙法官：

每当我冥思苦想百感交集之时，你的身影总会走进我的视野之中。

为办理我哥哥假释一事，我和你有所接触。起初，我觉得你是一位富有责任心的清廉法官。造成我出现错觉的原因在于，你的假象像迷幻药一样，将我一步步诱入你设下的圈套与陷阱。

一开始，你慷慨激昂地对我说，不要紧，你哥哥假释的事包在我身上了。你哥哥本来就是冤枉坐牢，他仅仅是牺牲品，白白耽误了大好的年华，这事我们都心知肚明，你当时欲言又止。我好感动，你能理解我哥哥的遭遇与处境，让我觉得是遇到了难得的知音。

你又一再告诫我说，你哥哥假释的事就包在我身上了，你可千万不要再去找别人了，别人一插手，这事准会办砸了，到时候后悔都来不及。当时我把你当作百里挑一的好人，信任依赖你。你既然再三叮嘱我不要再去别人帮忙，那么，我只好将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你的身上。

我想，作为一种人之常情，我应该花上几百块钱买几条高档的香烟送给你。这些年为我哥哥的事，我们几乎是倾家荡产，不知花费了多少血汗钱，甚至连我父亲五十七岁的性命都搭上了。现在这个社会就是这样，办什么事情都得花钱。当我将这层意思告诉你的时候，你在电话里对我说，你办公室里人来人往不方便，拜访就免了。有什么事情的话，你会打我的呼机，跟我联系云云。放下电话后，我心想你当真是个两袖清风的法官，连几百块钱的香烟都不肯要？谁知，我的猜想大错特错，我是太低估你的胃口了。我缺乏礼的经验，这种事怎么能在大庭广众面前办呢？

不久之后，我果真收到了你打来的传呼。我问你有什么事情？你在电话那头告诉我，你现在一家酒楼的包房里，让我立刻赶到那里去。我不知你葫芦里卖的什么药，猜测可能是你要跟我喝一场酒，应该由我买单。这个不成问题，可究竟得花多少钱呢？一时间我心里没有底。

我赶到酒楼的包房里，你对我说，你要请客，请的都是法院的头头脑脑，我明白，该到我出血的时候了。我问你是不是要钱？你眉头一皱，满脸不高兴地说，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嘛，还用问。当我倾其所有，将随身携带的钱全都送到你手上时，你马上满脸春风地说：你哥哥假释的事没问题了，所有的障碍都让我排除了。还没有等我开口，你已经开始下逐客令了：好了，你现在可以走了，我的客人一会儿就到。

我沮丧地往酒楼外面走。酒楼里的服务小姐个个浓妆艳抹，你跟她们都很熟悉，那眉目之间是心有灵犀。她们望我时的目光充满了防范和鄙夷，仿佛我是个乞丐。从此之后，我害怕再与你接触，再收到你那要命的传呼，因为你太贪得无厌了，太唯利是图了。

那天中午，我再次收到了你的传呼，我顿时心惊肉跳头皮发麻。我母亲当即恨得咬着牙说，这个姓龙的法官太不是东西了，只知道要钱，要钱，可你哥哥始终不见回来，也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会放人。姓龙的把我们家当成摇钱树了。我解释，妈，他们都说哥哥手上有几百万块钱，他们恨不得将这笔钱榨干榨尽，全都转入他们的口袋里。其实哥哥只是一个穷文人，落魄的书生，他哪里有这么一大笔钱呐！这个姓龙的每次都在那家酒楼给我打传呼，看来他与那家酒楼的关系相当熟悉。我正打算去那家酒楼，恰在这时，我们总公司从武汉来了两个人，我要接待他们，一时走不开。

我万万没想到的是，正是我这个不能赴约、不能前去看钱的电话，竟然葬送了哥哥的假释。龙法官，你的心肠也太黑，太阴毒了！在近两年的时间里，假释一事一直困扰着我哥哥和我们全家人。为办理我哥哥的假释，我们经历了多少磨难与坎坷。此前尽管被好几个相关的部门卡过，压过，在上报审批的过程中伤透了脑筋，然而，到最后还是开绿灯放行了。我哥哥的假释材料，经过了执行机关的层层审批，程序合法地呈报了上去，连你们法庭也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并通过有关的程序，同意我哥哥假释。就在这种情况下，因为我分身乏术，要接待远道而来的客人，不能赴你的“鸿门宴”，于是，你就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一棒子将我哥哥的假释打死。你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泄了你因我不能前去看钱而产生的愤恨。数日后，我去你家问询时，你一脸无辜的样子对我说，在假释的问题上你已尽了最大的努力，是市人大常委会不同意我哥哥假释，你也无能为力。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会上市人大这块遮天蔽日的巨大招牌，其实，我们已经走访过好几个相关的单位了，知道你完全是一派胡言。你的弥天大谎能欺骗谁呢？

事后我们才知道，在你把持减刑假释工作的这些年里，你不知宰过多少人，钱铺路色搭桥，你玩得多么兴高采烈啊！你甚至玩起了垄断的把戏，叮嘱不要再让别人插手，事情只能在你一个人身上吊死，你生怕别的法官分了一杯羹。你知道么，久走夜路必遇鬼！虽然一般人被你宰了都不会吭声，忍气吞声是他们共同的选择，可最终有人会不平则鸣，愤然站出来揭露你的真面目，让你原形毕露。

龙法官，你身上不仅有严重的腐败问题，有些东西甚至比腐败更恶劣，譬如你的贪婪狠毒、

毫无道义，你的丧心病狂，你看起来更像一个既绑票得钱又撕票杀人的强悍之徒。

你说过，我玩不赢你，你有背景有后台，有权有势，你可以呼风唤雨扭转乾坤。不过，我可以告诉你：市里不行，我可以去省里；省里不行，我可以去北京，我就不相信，你能称霸一时，难道还能横行一世呀？多行不义必自毙。

你的伪装终究会被剥去。你这条害人的蛀虫。

一个不平则鸣者：尚建武

看了《致一位法官的公开信》，我这才知道申报假释失败的原因。尽管我也很气愤，但还是劝弟弟暂时不要去散布和传播这封公开信。我们商议，先把公开信放起来，等以后再说。

前后折腾了两、三年的假释，结果却是毁灭性的。母亲的反应最强烈，几乎终日以泪洗脸。我无法安慰母亲。

这两、三年来为办假释而经历的种种事情的过程与细节，一一在我的脑海里浮现出来，这一路之上，我的假释就如同是一块唐僧肉一般，谁碰到了都想吃一口。我越想越生气，虽然把《致

一位法官的公开信》暂时压了下来，可心里还是一直在琢磨着这件事。在二队监舍楼门口那一带设置了好几个信箱，其中的一个就是为狱务公开而设置的。近来监狱一直在宣传和展开狱务公开活动，我想将心中的郁闷倾吐一下。借这个机会，我写了一个《假释咨询》的小东西。

假释咨询

监狱领导：

从1998年下半年至2000年上半年，在近两年的时间里，假释一事一直困扰着我。为办理假释，历经了磨难与坎坷，其间的迂回曲折及艰难险阻，不必一一尽述。可到头来，却被告之：不能假释！在此，根据狱务公开的有关精神及原则，我想就下列问题进行咨询：

我的假释材料经过了执行机关的层层审批，呈报程序合法，且我属于可以假释的对象，最后却做出了我不能假释的结论，原因何在？

我不能假释依据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哪一条哪一款的规定？

究竟是哪个机关做出了我不能假释的决定？这个决定是否形成了什么法律文书？如有类似的文书，或是一个决定或是一个通告或是一个议案，我是否有权利看一下，了解一下？

据说我不能假释与影响太大等原因有关。请问，影响太大算不算一种法律依据？能不能据此做出我不能假释的决定？

还有一些问题，因涉及到一些不便言说的内容，如有可能，我想进行当面咨询比较合适一些。

尚建国

《假释咨询》写好后，我本想将它投入监舍楼门口的邮箱里的，可转念一想，我投了进去，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开箱呢？于是，我将《假释咨询》交给了徐队长，徐队长交给了洪教官，洪教官最后交给了杨政委。

交是交上去了，可是始终没有得到任何回应与答复。日子拖久了，连我自己都心灰意冷，并渐渐地将此事忘记了。

心里烦得很，偏偏这个时候朱强又来烦我，对我说起了他与夏涛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一直以来，我都没有管这个事，现在我突然有了一个冲动，干脆把夏涛整掉算了！以前，不论是斗智还是斗勇，朱强都无法战胜夏涛。他们两个人都是组长，都有自己的实力和能力。谁把谁都扳不弯。所以，朱强总是希望我能站出来助他一臂之力。

我对朱强说：“朱强，你是值班组长，夏涛不是有个习惯么——他半夜起来不往厕所里去，而是喜欢在值班组旁边的山墙后面解小手。你们值班组找个机会把他逮个正着，还可以对他采取一些措施，谁叫他违反中队的规定，随地大小便呢。你们值班组把他处理完之后交给我，后面的事情由我来办吧！”

朱强兴高采烈地应声说道：“那好！那好！”

挑选了一个适当的机会，朱强带着值班组的人恰好堵住了正在那儿随地小便的夏涛。二话没说，他们一上去就将夏涛打了个头重脚轻天昏地暗。事情发生后，朱强他们拖拉着夏涛来找我，由我来处理。按照中队的规定，监号内发生的事情，首先是由我来解决。

夏涛被打得鼻青脸肿，他当然是不服气了：“……尚宣鼓，你看，他们值班组动手打人。你这儿要是解决不好，那我肯定会去报告干部。”

我严厉地说道：“夏涛，我听说你在值班组那边的山墙那儿解手，是不是有这么一回事情呢？”

夏涛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话，而是犟犟地说：“别人能够在那儿解手，我为什么就不行呢？”

夏涛这么说等于是将他的把柄交给了我：“夏涛，你承认你在值班组那儿解了手。”我说话的语气渐渐加重，措辞也越来越强硬。

夏涛的关系户——邱队长已经从二队调走了，据说是干部之间争斗和犯人告状的结果。传说，是当初白伟从二队刑满释放后去满世界告状，将邱队长告了个人仰马翻，被解了职，调到另外一个中队去看守门房。邱队长不胜悲愤，听说是在家哭了三天三夜，才不情不愿地去当了一个无职无权的门房干部，夏涛在二队没有靠山，不再像以前那样横行霸道了。

见我的态度一强硬，他就老实多了。他不仅没有闹事，还一再对我说：“尚宣鼓，是我错了，我是不应该在值班组那儿解手，我当时是被尿憋急了。”

晚上点名的时候，我对夏涛随地小便的事情借题发挥：“夏涛说起来是伙房组长，是一名事务犯，是一个骨干，本来应该在监号里起好的带头作用，可是，他带的什么头呢？居然带头在值班组那儿屙尿。你们大家都去那儿看一看，闻一闻，那儿都成什么样子了？骚臭难闻，白色的尿迹一片接一片。”

我站在点名的台阶上讲这番话的时候，徐队长也在一旁静静地听着。

揪住夏涛随地小便的事情不放，先是武攻，朱强他们将他打了一顿，再是文攻，我将他训斥了一番，然后是当众批评了他一晚上。如此一弄，夏涛在监号内就没有一点儿身价了。很快，他就变得霉头霉脑垂头丧气。又过了一段时间，他又因为犯了一点

儿什么小事情而被下了大组。这么一来，夏涛在监号内的辉煌时代便宣告彻底地结束了。

夏涛下去了。另外一个人却上来了，那就是朱成。朱成因桔子事件下大组很长时间以后，如今，他顶替夏涛的那个位置当上了伙房组长。很久以前，朱成曾经顶替汪卫东而担任过菜园组长。现在他是伙房组长了，比当初的菜园组长还要显赫一些，因此，监号内许多人都这么说，这个朱成是越混越好了。

重返监狱

从监狱总部那边分来了一批新犯人，一共是六人。这个数量算是不少了。现在不能跟以前相比，五、六年以前，每一次来新犯人，都是十几个人，浩浩荡荡。现在完全不一样了，每年来的次数是越来越少，而且每次来的人数更是少得可怜，有的时候只有三、四个人。二队的田亩没有变——将近三千亩，可是犯人人数量却是在锐减，还要种将近三千亩的地，大组里的人自然非常劳累辛苦。因此，总是盼望着什么时候能多分配一些新犯人到二队来，分担一下大家肩膀上的重担。

今天终于算是盼来了六个新犯人。

这六个新犯人来到二队没有多大一会儿时间，其中就有一个人冲着我喊叫道：“尚宣鼓，你还没有走呀？我早就听说你保释出去有五、六年了，你怎么还在这里呢？”

面对我的尴尬，那人嗤嗤地笑着说：“尚宣鼓，你当真把我忘记了？我是马军。”

我一时还是没有想起来面前这个自称是马军的人到底是谁？

“尚宣鼓，你记不得了？那个时候你刚来二队，你还批斗过我，在批斗会上发过言呀。”

他这么一说，我才恍然大悟，对，就是这个马军，我的确是批斗过他。我当即问道：“马军，你怎么又来二队了呢？”

马军轻描淡写地说：“还不是为了一点儿小事情。”

我为马军这样的人悲哀，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坐牢，有的甚至要坐个五、六回或是七、八回牢，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监牢里度过的。我觉得，他们自己固然要承担一部份责任，社会原因也是不可忽视的。另外，监狱对他们的教育和改造也存在着诸多问题。

我也回过头来思考，对自己的灵魂和内心的生活进行了一番探索。我想到普希金，他一生十分向往这样的境界——“我要活，为了思索和受难！”坐牢使我有充分的时间可以和自己的灵魂对话，这种对话，使我在精神上变得丰富深刻了许多。一段时间以后，我在苦苦的思索中写了一篇文章《灵魂》。

灵 魂

第一次发现自己的灵魂的存在，是在五岁那年。已经熟睡的我，却清晰地看见了无比奇异的景观：碧波荡漾的河水上行走着飘飘欲飞的帆船，那白帆洁净耀眼，比鸟儿的翅膀更加轻盈活泼袅娜多姿；一列绿油油的火车悬浮在空中，虽在疾风一样快捷地奔跑着，竟是始终在我的眼前无尽地晃动着，一直没有驶出我微笑的视线；还有连绵的芳草地和白绒绒的羔羊，却又像是一片摇拽的鸭鹅，将如雪的美丽铺展到地平线的尽头；尤其是那天空的颜色，居然是那么蓝，比蔚蓝还蓝一百倍，比瓦蓝还蓝一千倍，比靛蓝还蓝一万倍，蓝得是那么触目惊心，令人的灵魂出窍呼吸紧促。我想，这种纯净得毫无杂质的蓝，只有我的灵魂才有机缘见到，且是空前绝后唯一的一次，而我

的肉眼根本无福消受。

肉体的我睡得如同死狗一样毫无知觉，蜷卧在奶奶的脚边始终没有动弹一下，那弓腰撅臀弯脖曲腿的睡姿十分滑稽可笑。恰恰是在这种伸手不见五指的昏暗黑夜里，我的灵魂却看到了一个色泽鲜亮的世界，特别是那种令人心碎的蓝，几乎像闪电一样在转瞬之间一下子主宰了世上的万事万物。

由此，我的灵魂开始游离于我五岁的小小躯体，独自去经历和体验世间的酸甜苦辣以及悲欢离合。

不久，一场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的轰轰烈烈的运动席卷了中国大地。各种各样的灵魂们浩浩荡荡汇集在一块儿，互相指责和唾骂，彼此撕打和械斗。有的义正词严，有的强词夺理，有的居心叵测，有的面目狰狞。灵魂的扭曲与破碎随处可见，灵魂的邪恶与丑陋俯拾皆是。一次，在满街的枪林弹雨里，我看见了黄帝面南而坐的威风凛凛的灵魂，与此同时，我也看见了炎帝逃之夭夭四处躲闪的灵魂。据传说，就是这两位远古的先人在打打杀杀的厮斗与较量中缔造了中华民族。这个民族人口众多，曾有过辉煌，也有过耻辱。时光到了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人的灵魂再一次遭到了巨大的摧残与浩劫，且还是以革命的名义，革命要求在灵魂深处来一次大爆炸，其崩裂破败的碎片不仅穿透了中华民族的历史，而且还零零星星地飞落到世界各地，在一些国家燃起了星星点点的顽皮火花。

我的灵魂也被挤压得变了形，如扁扁的月亮始终都难以圆润，难以饱满。我曾看见乱哄哄的学校贴满攻击诬陷老师的各类大字报，而觉得兴味盎然，长颈鹿似地伸着脖子东瞅瞅，西望望。而那个时候，我的灵魂同样是无动于衷，悠闲得像是吃饱喝足之后四处散步的红冠雄鸡。我也曾严词批判过同学中的所谓小资产阶级情调，剪过人家的奇装异服，绞过人家抹了香

油的菊花头，还说过惊天动地的豪言壮语：要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十二级台风都刮不跑。那个时候，我的灵魂在一片声势浩大的红海洋里丧失了自己，一如漂浮在河水里的动物，那种起伏和动荡只是一种受人操纵和摆布的机械运动，了无情趣。

一场灵魂的劫难总算是在人们的伤痛中缓缓地结束了。

进了大学之后，我的灵魂一边静卧花丛，一边疗伤治病。在唐诗宋词里，李白的豪放旷达、杜甫的沉郁顿挫、柳永的缠绵悱恻、辛弃疾的慷慨激昂等，都曾如玉液琼浆的甘露一样滋润过我的精神，沐浴过我的灵魂。而远在异国他乡和遥远时代的雨果、但丁、狄更斯、席勒、雪莱、普希金、契克夫、托尔斯泰、陀斯托耶夫斯基、海明威、福克纳、卡夫卡、川端康成等人则时不时地与我悠然相见。我的灵魂常看见他们从厚厚的书籍里探出头来，用审视的目光探究着人们。当我与他们目光相碰时，我觉得我的心里有什么东西碰翻了，于是我的灵魂触电般地颤栗了起来。

就是在这里，我见识了许多高贵的灵魂，他们是人类的脊梁和支柱。他们的灵魂光彩夺目照耀于秋。在这种不朽的光辉引导下，我萎缩的精神开始焕发出了勃勃生机，我扁缺的灵魂也如沐春风一般，在一种温馨和美丽之中欣欣向荣争芳吐艳。

大学毕业后，在现实生活的滚滚浪潮里，我几经挣扎与淹没，我的灵魂也经历了迷惘、困惑、不安、痛苦等等洗炼与煎熬。陪人喝酒时，我的灵魂呕吐不止；写成堆成堆的材料时，我的灵魂欲哭无泪；看见别人纷纷巴结上司时，我的灵魂不屑一顾；看到有人巧取豪夺中饱私囊时，我的灵魂敢怒不敢言；遇见陷害他人拼命往上攀爬的现象时，我的灵魂虽愤愤不平，却没有勇气拔刀相助。听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有一位牧师，希特勒法西斯攻打波兰时，他说反正他没有打我，此事与我无

关；打法国时，他说不要紧，他不会打我；打英国时，他还这么说；等到纳粹的魔掌深入教会、将屠刀架到他脖子上时，他呼救的声音也没有人聆听了。我虽然对此中蕴含的道理了然于胸，但由于懦弱和胆怯，我并不敢勇敢地站出来伸张正义，捍卫真理。在内心和现实世界彷徨的结果使我选择了写作。在我看来，写作是寻找精神家园途径，是拯救灵魂免于沉沦的有效方式。在写作中，我毫无畏惧地将灵魂扔进烈火熊熊鬼哭狼嚎的地狱。只有在这个时候，我的灵魂才有着顶天立地的巨大勇气，敢于直面一切的丑恶和卑劣。

我离开所谓的荣华富贵和锦绣前程，再次进入高等学府攻读研究生，这是我人生的重大转折，也是我灵魂的一次升华与高扬。我与文学的血肉联系更加密不可分，穿行在人类历史的长河里，我的灵魂如畅游于其间的鱼，时而活泼地高高跃起，时而文静地卧于水中；又似翩然飞翔的水鸟，沿长河一路洒着霞光一般的歌儿，一路将展翅高翔的英姿馈赠给蓝天白云。

再次告别学生如诗如画、如酒如火的生活后，在蓦然回首间，我去了南国边陲的经济特区。我的灵魂端详着鳞次栉比高耸入云的繁华与壮观，打量着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富足与傲慢，总觉得这些东西与自己格格不入，既不是自己的期待，也不是自己的企盼。于是，我的灵魂常行走在粉面朱唇与琳琅满目之间，蜘蛛一般大腹便便的男人，蜜蜂一样腰肢纤细的女人，他们搂抱相拥在一起，相映成趣别有情调，把他们拴系在一起的纽带，是鼓凸的钱包和更加鼓凸的情欲。我的灵魂还常常攀援在蓝色的玻璃幕墙和高楼大厦的檐壁之间，从那里凝视都市人灵魂的众身相，或是在竞争中以对手的死亡作为结束，或是笑里藏刀大摆心照不宣的鸿门宴，或是腐败得浑身生蛆，却依旧装扮出铁骨铮铮大义凛然的样儿。虽在欢歌笑语中，我的灵魂

却如同奔走在朔风呼啸的严冬季节里；虽在吞食着光鲜珍贵的美味佳肴，我的灵魂却饥肠辘辘，饿得连一丝力气都没有了，只好用恼怒怨恨的目光盯视着我趾高气昂的身躯和红光满面的脸膛。我的灵魂与我的肉体南辕北辙分道扬镳，这种背道而驰的状况宛若是五马分尸似地将我撕扯得四分五裂身首异处。每到夜深人静的时候，随着鲜血遍地流淌，我被肢解成了千刀万剐的无数碎块，然后还被蹦蹦地反复切割着，直到第二天红日临窗。可是第二天在灿烂的阳光照耀之下，我居然是缓行在脸色苍白与精神倦怠里，因为在昨夜的挣扎和死亡中，我已流尽了周身上下最后一滴血，丧失了最后的元气。

在此期间，我有两次出国的机会，但我却偏偏放弃了。扪心自问，原因何在呢？连我自己都百思不得其解的是，竟是一种割舍不断的、剪不断理还乱的所谓爱恋情结。这情结包含了花容月貌的黄皮肤中国女孩，包含了生我养我的故土山川，那里的一草一木以及躲藏在每一个角落里的来自往昔岁月的回忆，会心一笑的回忆，周而复始的回忆，魂飞魄散的回忆，这一切是那么令人眷念和回味啊！

正是在这种情结的煽动和牵引之下，我返身从繁华发达的经济特区回到家乡，想在这里有所贡献，有所作为，同时也想慰藉与安歇一下自己伤痕累累千疮百孔的灵魂。当时我还自以为，在这个世界上，唯有这个地方才是我灵魂的栖息地和疗养所哩。谁知家乡一些叵测的人，一些可疑的人，他们竟恶意践踏我的眷念，将我对精神家园的探寻与觅找衍变成了一种残酷的结局——将我送进了人人惟恐避之不及的精神病院。

我成了与世隔绝的异类。

最初的日子里，我感觉自己好像生活在阴森而幽暗的坟墓中。然而此时的我却一下子丢掉了懦弱与胆怯，变得没有恐惧

和惊骇了。在为自己举行了别开生面喜气洋洋的葬礼之后，我认定的确有一副崭新的，骨骼坚实的躯体诞生了，尽管它脱胎于我身体残破不堪的废墟，但它毕竟是旭日东升的产物，因此它生机勃勃精神抖擞，拥有着取之不尽的巨大力量。这使我不禁想起了哪吒剔骨割肉还父母的故事。在丧失了肉身之后，哪吒不仅没有泯灭消亡，反倒变得坚韧无比强大无比了。不再有任何的牵挂与羁绊了，这对我无疑是个巨大的撞击。当初，我不就是因为那种魂牵梦绕的眷念之情才使自己在家乡的土地上骤然落入陷阱的吗？当我从遥远的地方飞来，落上家乡的枝头，却偏偏成了那些别有用心者的射击目标以及餐桌上的美味佳肴。现在，我的肉让他们蘸着血吃了，我的骨头被他们咬嚼吮吸得吱吱作响。我死了，却又诞生了一个全新的我自己。哪吒的故事能在我的身上上演吗？

在铅一般沉重的黑夜里，窒息压迫着我的心脏，那种咚咚的跳动似滞涩而苦闷的鼓声。这时，我的灵魂则化作一只轻灵而勇敢的黑蝴蝶，它穿行于微不足道的墙缝之间，在门和窗的任何一点缝隙里都可以自由地出入和飞翔。因此，它目睹了光怪陆离荒诞不经的世界：酒酣耳热之后，有人在强奸民意如同强奸少女一般肆无忌惮而喜笑颜开；封官加爵后，有人好大喜功变本加厉恨不能将一切都变成自己的战利品和囊中之物；勒索钱财后，有人一面继续吸食着他人的骨髓和膏脂，还强迫着人家感谢他的残忍与暴戾。当有人发现了这只黑蝴蝶，试图捕捉它时，它闪电一般飞得无影无踪，一下子就摆脱了魔掌的玷污与捉拿。我的灵魂，是一只黑色的精灵，它在狗的狂吠与追逐里翩跹过，在刀的砍杀与呼啸里飞舞过，它自始至终都是那么从容不迫若无其事。

天上的流星拖着惨白的不幸在燃烧中坠落后，连稍有良知

的狗都呜咽着哭了，它整夜的惨叫声催人泪下。因为精神病院又有了一具尸体僵硬了，它带着进来时的那副笑吟吟的开心模样。那种盛开在死亡之上的笑容，如罂粟一般即凄美又绝望。继狗一夜的哀哭之后，有人在早上打开室门，踢了死尸一脚，尔后凶凶地斥责道：他妈的，死了还笑，看来那边的生活不错，比这里强呐！

要说生活嘛，形象的比喻应该是——菜里的汤汤水水能照见人影，有时上面能闪耀几颗黄灿灿的油星，漂浮在其中的是烂菜叶子和腐菜根子。一成不变的三餐米饭有时糙得割舌锯喉，有时则酸臭难闻，故意与人的肠胃作对。

面对此种猪狗都嫌弃的食物，我的灵魂常常会进行另一种进食活动——在大观园里坐享其成，品味那种用二十只鸡子烹炒一盘茄子的极品；在铜雀台上一边观赏着美女们的清歌曼舞，一边频饮着杜康千古佳酿。我还时常应邀去参加由詹姆斯·乔伊斯、阿·罗布——格里耶、大冈铃、莱·马·里尔克、米歇尔·布托尔、马尔克斯等文学大师们举行的盛大精神会餐，我的灵魂在那里流连忘返乐不思蜀，以至于弄得满口余香，连眼眸里都蒸腾出令人心弛神往的风景来。

我庆幸有一个自由自在的灵魂。苦闷时，它能给我带来遥远天空下的一串串晴朗的鸽哨，于是我在遐想中独个微笑了；孤独时，它给我带来大地上百花争艳，万物竞相生长的美妙图景，我穿梭在花丛中。伴着奔腾的马蹄香，踏遍青山夕阳西下；寂寞时，它给我带来天籁一般的美丽音符与节奏，在雄壮与柔美之间，在磅礴与清丽之间，在大江东去与小桥流水之间，在雷鸣电闪与低吟浅唱之间我目睹了巴赫、贝多芬、柴可夫斯基、瓦格纳、勃拉姆斯等人的风采与神韵。

直到这个时候，我才恍然大悟：当初放弃出国的机会回到

家乡，本欲寻找我的精神家园，但却被人送进了精神病院。让那些人始料不及的是，我也恰恰是在与世隔绝暗无天日的精神病院里找到了我灵魂巨大的活力与蓬勃生机。其标志就是，不论处在任何厄运与险境之中，我的灵魂都能冲决一切的罗网与羁绊，如鲲鹏在九天纵情翱翔，似巨鲸在五洋欢快畅游。我应该感谢那些将我送进精神病院的人，我虽然付出了悲惨的代价，但我的收获也是辉煌灿烂的！我以痛苦的方式在寻找精神家园的崎岖路途上跨越了一大步。命运竟是如此捉弄了我，又是如此成全了我。

我有些恍然大悟、茅塞顿开了——我确实在精神方面有毛病，或者至少可以说，我在精神上没有长大。因为只有不谙世事的幼童才会一次次凑向母亲的奶头。我一厢情愿的依恋与自作多情的热爱，招致家乡给了我狠狠一巴掌，打得我眼冒金星嘴角淌血，同时也彻底打醒了我这个愚蠢的家伙，精神上的脐带早该割断了，不然，我永远没出息，永远都只能匍伏在地上爬行。

离开家乡精神病院的那天，清晨的太阳如同少女纤细的手指拨弄着我早生的华发，是在安抚还是嘲弄我？我抬望眼仰天看了看天空，并不是那种令人灵魂出窍的蓝，而是灰蓝，且夹杂着一些阴险的颜色，玄机暗藏，弄得不好，一轮才初生的鲜红太阳有可能会夭折掉，满天手舞足蹈的乌云会庆贺自己黑色的胜利，它将主宰天空，大地上的一切都会落在它阴森而恐怖的笼罩之中。

也许我的精神家园就在那片雅致且神奇的蓝色的天空下面？可在乌云滚滚的间隙里，这样的蓝天究竟在哪里呢？我的灵魂鼓励我说，去找吧，它终究不是一场游戏一场梦！

一年以前，我假释失败。我之所以能从那种毁灭性的打击中走出来，主要是因为我有着丰富的内心生活和精神生活。这部份生活的力量来自文学，除了经常与灵魂进行对话之外，我从来都没有停止过文学书籍的阅读。此外，就是坚持写作。在假释失败后的一年多的时间里，我写了一部九十多万字的长篇小说《猜谜》。我依靠文学来安抚自己，超越自己。

这一年过去后，我又有了一次减刑的机会。中队将另一批减刑、假释材料呈报了上去。每年通常都会呈报两次材料，三、四月份一次，七、八月份一次。中队的材料呈报上去以后，过了一、两个月，基本上都批了回来。唯有我的减刑材料迟迟不见回音。

我被告之，上一次是我的假释材料被压在江南法庭副庭长龙仕桥的手上，而这一次，材料又被压在他的手上。龙仕桥甚至还放出话来，尚建国要想减刑是绕不过我这一关的，要过我这一关也行，先让他的弟弟尚建武来找我。

这个时候，我的余刑不足一年了，也就是最后那么几个月吧。我心里想，他龙仕桥不想给我减刑就算了。可是弟弟却咽不下这口气，他给江南监狱的一把手，即江南监狱的监狱长黄秋胜写了一封信。

尊敬的江南监狱黄秋胜监狱长：

您好，打搅您了。

我是你监服刑人员尚建国的弟弟尚建武，我向您反映一个问题。

今年七、八月份，我哥哥所在的分监区根据他的表现和考核的结果，为他呈报了减刑材料，然后，经过监区、监狱狱政科层层审批，最后减刑材料送达到江南法庭。九月中旬，与我

哥哥一起呈报上去的减刑材料都有了结果，由沙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下达了刑事裁定书。然而，我哥哥的减刑却一直是悬而未决不了了之，一直拖到今天，都毫无结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三章第四节第三十条有明确规定：减刑建议由监狱向人民法院提出，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减刑建议书之日起一个月内予以审核裁定；案情复杂或者情况特殊的，可以延长一个月。可是我哥哥的减刑裁定呢，已经拖延了好几个月，却始终是杳无音讯。

这真是咄咄怪事。

我们了解到，我哥哥的减刑材料自从到达江南法庭后，一直压在龙仕桥的手上。龙仕桥为何要扣压我哥哥的减刑材料呢？这是因为当初在为我哥哥呈报假释的时候，龙仕桥曾一再卑鄙地敲诈过我，我为此跟他发生过一点争执。所以，龙仕桥如今要公报私仇，要在我哥哥的减刑问题上大做文章。

龙仕桥目无党纪国法，假公济私，仗势欺人，他任意扣压我哥哥减刑材料的行为，严重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败坏了江南监狱依法治监的声誉和形象。目前江南监狱在开展执法执纪“双执”专项教育整顿活动，龙仕桥这种拿法律当儿戏随心所欲的行为，简直是顶风上，他把江南法庭当成了他家里的法庭和私有财产，他想怎么玩弄，就怎么玩弄，想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我们不知道，他究竟有多大的权利，又有多大的胆量！

最后，我们恳请黄监狱长在百忙之中过问一下此事，使我哥哥减刑的事情尽早尘埃落定。

打搅了！

尚建武

2001年11月6日

由弟弟写给黄秋胜监狱长的信不难看出，二队为我呈报的减刑材料在龙仕桥那儿已经压了好几个月了。眼看又要到年底了，难道说，连我这最后一次减刑的机会都要泡汤么？尽管我心里也还是有那么点儿焦急，但我依然是再一次阻止了弟弟，让他暂时不要邮寄或是面呈这封写给江南监狱黄秋胜监狱长的信，等一等再说吧！

弟弟写的这封信还没有发出去，江南监狱的黄秋胜监狱长倒是来二队和我谈了一次话。没过多久，江南监狱自己办的一张小报就在头版头条的位置上刊登了黄秋胜监狱长与我谈话的照片，同时还配有好长一段文字，先是介绍了一下我是哪个学校毕业的研究生，在江南监狱服刑期间如何如何，然后是我与黄秋胜监狱长如何进行了坦诚的交谈，我对监狱的现行政策，如减刑、假释的呈报等等存在着一些疑虑，黄秋胜监狱长又是如何针对我的种种疑虑，耐心细致地对我谈了当前监狱文明执法、狱务公开的制度，解释了有关减刑、假释的具体政策规定，黄秋胜监狱长还仔仔细细询问了我的个人生活情况以及二队其他犯人的生活卫生状况。最后，我还主动针对监狱的农业生产以及犯人的“三课教育”等问题提出了一些合理化的建议。

我想，或许是《江南报》上的照片和这么一段文字起了作用，没过多长时间，我弟弟也没有去找江南法庭的龙仕桥，到了这一年的十二月份，也就是年底的最后二十多天的时间，我的减刑材料突然下来了，我被减去了五个月的刑期。在此之前，我已经被减了三次刑，分别是一年、九个月、一年，这最后一次是五个月。这第四次减刑的材料到我手上时，距离我刑满只有二十多天了。

在最后的二十多天里，杨政委来看过我一次，表示可以再让我提前五天回家，像两年前给我五天的探亲假一样。如果再提前五天回家的话，我离开江南监狱的那一天正好是新年的第一天，

我将在新年元旦的那一天，告别我长达九年的牢狱生活，回归到如今陌生而又日新月异的社会。

离开监狱

我即将刑满离开二队，徐队长安排朱成接替我的工作，担任中队的宣鼓。我本来想推荐朱强的，可是徐队长不同意。徐队长说朱强的能力没有朱成那么强。

这是实情。论能力，朱强的确是不如朱成。但是，朱成这个人的品质太恶劣了，他甚至于比夏涛都要恶劣许多。他因为桔子事件下大组一段时间，在那些日子里，他倒是特别会装孙子，无论见到谁，都是一副摇尾乞怜的样子。对干部，就更不用说了，三天写一份思想汇报，两天写一份思想认识，对干部说尽了天底下的好话和恭维，他甚至于使用了这样的语言——天大地大，不如徐队长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胡队长亲。那时候，邱队长已经去别的中队守门房了，所以，朱成才没有恭维邱队长一下。其实，就连当时在监号里盛行的四处告状之风都是由朱成那儿刮起来的，他还怂恿王国庆在离开二队的时候，将当初他父亲帮助二队种植的那些花草树木，还有那些绿得鲜明而美丽的地毯草等，全都带走。如果二队不让王国庆带走的话，朱成给王国庆出谋划策，让二队赔偿三万块钱。现在已经弄清楚了，一当初摹仿我的笔迹的并不是夏涛，而是朱成，他以假乱真，写了那些告状信，以达到挑拨离间、混淆视听的目的。

朱成从大组起来去担任伙房组长，以接替夏涛的工作时，我就有些后悔，当初不该整夏涛，从而让夏涛为朱成腾出了位置；现在，朱成又担任了中队的宣鼓。有些话，我不好对徐队长说，仅跟朱强说：“如果由朱成来担任二队的宣鼓的话，那么，二队

往后肯定会出乱子。”

监号内是这个样子，干部也常常是明争暗斗。几年来斗来斗去，最后的结果是苏越担任了二队的一把手，接替了邱队长当初的工作；邱队长去别的中队守门房；徐队长一直升不上去，到现在还是在原地踏步；胡队长换了一个中队，也没有升上去，整天是霉头霉脑的；其他的干部也都差不多，没有多少变化。

在即将要离开二队的前夕，我最渴望见到的一个人是女儿小竹。其实，在监狱的这些年里，我给小竹写了许多信，却始终不敢寄出去，因为她直到现在都不清楚我是在中国坐牢。有很长一段时间，小竹还以为我是出国了，一直生活在国外。这个美丽的谎言是我及家人共同编织出来的，目的在于不让她小小的心灵受到伤害。父亲在坐牢，这毕竟不是一件值得四处炫耀的事情。

另外，还有我的母亲。

这么些年来，特别是在我的父亲去世以后，母亲几乎变成了我的守望天使，她的坚韧顽强、她的悲苦期盼，没有母亲精神上这些闪耀着光彩的东西，我或许无法走到元月一日这一天。

元月一日这天，我很激动，感到这是我生命的最后一天，同时也是我生命的第一天。这天早上，来接我出狱的人很多，有我母亲、弟弟、弟媳、侄女，还有高远、苏石跃、陈剑闻、邬小梅等人。照说，元旦应该是很冷的，然而这一天，我却觉得头顶上的那一轮太阳是那么暖和温馨。这是何等巨大的甜蜜和幸福啊！

离开监狱时，我心里仿佛有着某种难于割断的依恋与牵挂。毕竟我在这里度过了许多岁月，我还曾经将我钟爱的女人刘芳芳的名字刻划在茫茫田野里的某一片随风摇曳的草茎之上，在埋葬着我的青春岁月的地方，同时也埋葬着我的爱情，只有她的名字还在草茎上一岁一枯荣，在繁衍与凋谢之间，在翠绿与枯黄之间摇曳着，倾听着我灵魂的歌唱。同样也是在这一天，我还听到了

一个让我窒息的消息，在我刚刚出事的时候，刘芳芳神经失常了。她当时的身份是我的未婚妻，她骤然听到了我身陷囹圄的消息后，不堪承受这样的打击，原本就精神脆弱的她精神失常了。

走出监狱时，我看见万里晴空的某一片阳光里出现了一排呈人字形的大雁，那些大雁不仅飞得高，飞得快，而且还发出了一阵阵嘹亮而悦耳的叫声。由此，我想起了自己在监狱里曾经有过的想象，我曾将自己想象成一只蝴蝶，还是一只小小的蝴蝶，从监号那小小的风门口飞出去，飞出去……现在，天空大了，世界大了，飞翔着的大雁啊，我把许多灿烂绚丽的遐想和情思都托载在大雁那奋力扇动着的翅膀上。

这时高远问我：“建国，在坐牢的这些年里，你的脸色一直都很好吗？一直都是红光满面吗？”

我的回答是肯定的：“是的，我的脸色一直都很好。由于我有着明确的生活目标和坚定的生活信念，对我来说，阅读、写作和思考不是苦役，而是享受，所以，不仅仅是我的脸色不错，我的身体也是始终保持着朝气和活力，很健壮的。”

高远说：“我倒是觉得你如今身上的文人气息更加浓厚了！”

高远说完笑了。

我也笑了。

其他的人问我们笑什么？我说：

“我们在笑那群大雁。”

从诗人到囚徒

黑色文库 第八集

作者/ 尚建国

出版者/ 劳改基金会黑色文库编辑委员会

责任编辑/ 廖天琪 古原

封面设计/ 蓝飞 古原

华盛顿 2004 年 9 月第 1 版

© 作者 尚建国

本书版权为作者所有，劳改基金会拥有中文发行权。非经作者及基金会同意，不得翻印、复制和转载文字和图片。

*本书由劳改基金会设计、编辑及出版。若获盈利，仅用作《黑色文库》的出版费用。

The Imprisoned Poet

By Shang Jianguo

Black Series Volume 8

The Laogai Research Foundation

Washington, DC, 2004

www.laogai.org

ISBN 1-931550-97-2

Printed in Hong Kong

定价: U.S. \$ 15.00

监狱写真

从诗人到囚徒

尚建国 著

作者简介

尚建国是中国一个诗人、作家，曾是深圳海天出版社文艺编辑。1993年被控犯经济罪入狱，他那年才三十多岁。在牢狱九年的时间里，他将所见所思诉诸于笔，对法院、监狱里的官僚腐败作风和犯人的非人待遇，都有痛苦的体会及细腻的描写，为外界了解中国目前司法及监狱系统的真实情况揭开一扇窗口。作者目前居中国大陆。

黑色文库·第八集
劳改基金会

The Imprisoned Poet
By Shang Jianguo
Black Series, Volume 8
The Laogai Research Foundation
Washington, DC, 2004
www.laogai.org

ISBN 1-931550-97-2
Printed in Hong Kong
U.S. \$ 15.00

